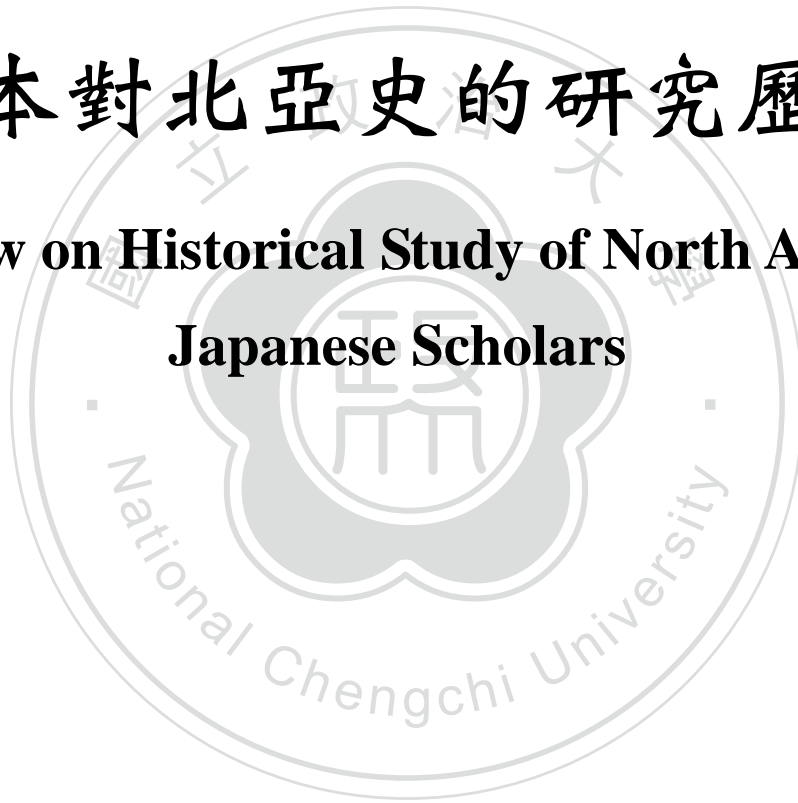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博士論文

# 日本對北亞史的研究歷程

**Review on Historical Study of North Asia by  
Japanese Scholars**



指導老師 林修澈教授

研究生 蔡長廷

2016年8月

## 謝誌

從進入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班就讀到完成博士論文，總共花了6個年頭，在這段時間需要感謝許多師長、朋友的幫助。自大學時期，我受到李明仁老師的啟發，開始對生活於亞洲北部的遊牧民感到興趣，所以當我進入政大民族系就讀時相當興奮，因為這裡有提供最多的亞洲北部遊牧民語言、歷史、文化的課程，讓我能夠盡情的在其中學習，我相當感激政治大學與民族學系。

首先要感謝的是指導老師林修澈教授，儘管他的事務相當繁重，但是當我每次到辦公室時，卻總是抽空與我討論論文。雖然老師很喜歡用比喻與調侃的方式進行討論，卻總是可以提供我重要的論文思路，使得論文進度能夠不斷的向前。跟著老師做工作時，更讓我學習到對於工作要求的嚴謹與細緻。而同門的學長姐、同學、學弟妹們在每星期的研究討論課中盡情的相互討論，更是這本論文能夠完成的最大因素。

第二位要感謝的是張廣達老師，因為鄭阿財、朱鳳玉兩位老師的介紹，我得以在張老師的研究室擔任助理，期間我收穫最大的除了老師給予我的教導外，更多的是在旁觀看老師做人處事的謙虛態度與對本身嚴格的自我要求。

第三位要感謝的是鄭欽仁老師，因為李明仁老師的引介，我得以時常協助鄭老師整理他的書庫，讓我能夠藉此與鄭老師討論學術與他的求學生涯。眾所皆知，鄭老師在東京大學求學時，在護雅夫的門下學習，對於東洋史研究的脈絡、學者間的交往等都相當熟悉，也讓我藉此能夠更深化論文中的論述。

第四位要感謝的是李明仁老師，李老師除了是我碩士班的指導教授外，認識上述三位老師都可說是因為他的穿針引線，他系統性的培養我，讓我逐步的接受相關的訓練，讓我能夠達到與上述三位老師交流的程度，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第五位要感謝的是王恩美老師，王老師的專業是東亞文化，由於我的急就章，使得王老師需要再短時間內看完我的論文，並提出寶貴的建議，這是我衷心感謝的。上面五位老師擔任我的論文口試委員，其所提出的寶貴建議，讓我能夠據此修改，讓論文更有深度與廣度。

民族系的張中復老師、黃季平老師、王雅萍老師、藍美華老師、趙竹成老師、陳文玲老師、官大偉老師、賀大偉老師等，都不斷的鼓勵我與提供我重要的論文思路，德隆助教與文思助教更是照顧我，待我如親人一般。博士班同屆的孟勳、昆晟、士煌、邵磊等人對我的鼓勵，早期中國史研究會、中古史討論會的玫茵學姐、怡青學姐、立新學長、雅如學姐、凱翔學長、宗閱學長、慧芬學姐、楓珏、志鴻等人也給予我相當多的鼓勵與幫助。嘉義大學的師長，如阮忠仁老師、陳美鈴老師、黃阿有老師、吳昆財老師、池永歆老師、汪天成老師、昭慧助教、世偉學長、嘉閔學長、喻翔學長、玉妃學姐等也時常關心並給予協助。允凡、軒豪、佩琪、韋漢、怡如、佳潔、詠欣、慧鈴、升耀、詩涵、麗梅姐、舜華姐對我的照顧與支持也是相當重要的。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一路支持我攻讀到博士，讓我能夠無憂無慮的讀書，這份恩情是無論如何也報答不了的，只能藉由這本博士論文的完成，告訴父母階段性成果已經完成，希望能夠趕快有能力奉養父母。

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原本想要一頁寫完，但是卻已寫到第二頁。我希望這本論文不只是做為我博士班的終點，也是我學術生涯的起點。

2016.08 新莊

## 摘要

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五章。本文的問題意識是希望能夠將日本於明治末期開始發展遊牧民歷史相關研究自此的一百餘年的學術變遷，做一整體性的論述。以此問題意識為基礎，遂將發變遷過程分為五章，以「北亞史」概念為主軸來進行論述。

第一章為背景，探討日本如何在東西方勢力的影響下，建構屬於自己的學術體系，從江戶時代以來的儒教史學、蘭學開始，到大清國的考證史學、西方的文明史學。在這樣的發展下，東京大學成立，以西化為主軸，其中歷史科引進以德國體系為主的學院史學，即蘭克史學。這些不同史學的觀念影響當時的知識份子，帶出了後來東洋史研究的第一批學者，如那珂通世、內藤湖南、白鳥庫吉等人，他們認為東洋史研究不應等同於中國史，開始關注起中國周邊的蒙古、突厥、女真等民族。

第二章探討北亞史研究基礎的成立，首先是白鳥庫吉對於滿洲利亞、朝鮮的神話傳說、語言比較研究，藉此建構一套阿爾泰語族的分類體系，將蒙古、突厥、女真等民族放入。其二是以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箭內互、稻葉岩吉等人對於滿洲利亞、朝鮮史的研究，最後由稻葉岩吉提出滿鮮史的體系，為當時日本學者對於自國別史之上的地域史研究的嘗試，但未成功。其三是白鳥庫吉、藤田豐八、桑原鷲臈、羽田亨的西域史研究，他們藉由對西域史的民族分類、古代城址考證，開拓西域史研究，最後再1931年由羽田亨的著作《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論》總結當時的西域史研究成果。其後在1935年，松田壽男更在此基礎上，認為西域史為東西文明的交流點，提出東西交涉史的新研究領域。其四是南条文雄、高楠順次郎、河口慧海等人發展出的印度佛教研究與西藏研究，他們多由牛津大學處學習梵語、巴利語，強調對佛教原典的研究，與前述三個研究較無交集。其五是在上述基礎上，1915年，白鳥庫吉提出東洋史是北方遊牧民與南方農耕民互動而形成的，被稱為「南北對立論」，其中的北成為其後北亞史研究體系的基礎。

第三章探討北亞史研究理論的發展，首先是乾燥亞洲史觀與異民族王朝論，前者的重點在於1938年，松田壽男提出東洋史裏漢文史料之外的非漢文史料的重要性，以及著重提出中亞史的重點，就是中介性的商業活動。這可以視為對南北對立論之外可能性的思考。後者則是1943-1944年，由東亞研究所聚集學者們所提出的，基於南北對抗論，將北魏、遼、金、元、清王朝視為不同於傳統漢人建立之王朝，要讓日本了解如何從異民族的角度統治中國。其二是探討K. A. Wittfogel的學術生涯及其提出征服王朝論的脈絡，得出征服王朝論是以中國史為背景進行探討。其三則是探討日本學

界如何理解征服王朝，在前述對征服王朝論的理解下，日本學界從北亞史的角度理解征服王朝，將先前累積的研究成果納入，完成北亞史的另一個重要基礎。1956年，田村實造與江上波夫在此時期通時推出北亞史的概論書。與此同時，內陸亞洲、中央歐亞等概念也陸續納入北亞史的討論。其四則是探討中亞史在先前的東西交涉史、乾燥亞洲史觀的基礎下，如何找出本身的主體性。此時期的成果有二，一為松田壽男認為將中亞、西亞視為中洋史，有別於東洋史與西洋史，但其後未有進展。二為確立突厥系諸民族為中亞史的主要民族，大多稱為「突厥斯坦的成立」。其五則是東洋史研究者開始關注西藏，主要學者是佐藤長，其在此時完成西藏史的歷史地理研究與時代區分，但對西藏的定位仍較曖昧，有時歸為北亞、有時歸為中亞。至此北亞史的體系已完備。

第四章是探討北亞史、中亞史裏較有爭議的地域該如何處理的問題。首先是探討內陸亞史納入討論後，成為比北亞史更為上層的地域概念，大致可認為內陸亞洲史的範圍等同於北亞史加上中亞史。其二是探討朝鮮史的定位，二次大戰戰敗後，日本學界負起發動戰爭的責任，認為朝鮮史應獨立成史，有別於滿鮮史。而滿洲利亞史也視為中國東北史。另一方面，日本學者也提出自通古斯民族的立場來看，滿洲利亞與朝鮮應可視為東北亞史。其三則是探討中亞史的主體性，1977年，間野英二提出中亞史的主體是北方的遊牧民與南方的綠洲民共同創造，批判東西交流的觀點，繼而引起論爭，最後學界認為東西交涉、南北共生的概念需並重，也將突厥斯坦的成立納入，至此中亞史的輪廓基本定型。其四討論對1950年代，Denis Sinor 提倡中央歐亞概念的引進與影響，至此學界多使用中央歐亞史、內陸亞洲史，北亞史開始較少人使用。

第五章則是探討北亞史、內陸亞洲史、中央歐亞史的差異，藉此論述遊牧民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下，比較多本具有代表性的概論書裏的地域定義後，發現北亞史、內陸歐亞史、中央歐亞史在範圍上有所變化，但重要概念皆是以騎馬遊牧民為核心所建立的遊牧文明圈，由此來看，三地域可說是一脈相承。但在世界史裏多無其論述，皆是散落於各地域中，所以應該有其獨立篇幅。

總結來說，本文從整體性的角度論述北亞史研究體系的建立，自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論、松田壽男的乾燥亞洲論、東亞研究所的異民族王朝、田村實造的征服王朝與北亞歷史世界，建構了完整的北亞史體系。另一方面，Wittfogel 的征服王朝論與 Sinor 的中央歐亞史概念也被日本學界接納，但日本學界的研究仍有其獨特性。

**關鍵字：**北亞史研究、內陸亞洲史、中央歐亞史、白鳥庫吉、松田壽男、田村實造

## 目錄

緒論 .....	1
一、問題意識 .....	1
二、學術史回顧 .....	3
三、研究材料 .....	16
四、重要辭彙定義 .....	17
第一章 北亞史在近代日本的成立 .....	19
第一節 近代日本歷史學的成立 .....	19
一、清朝考據史學與西洋文明史學的交匯 .....	19
二、新體制的創立與東洋史概念的萌芽 .....	21
第二節 從《支那通史》到《中等東洋史》 .....	25
一、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1888-1890) .....	25
二、那珂通世的「東洋史」概念(1894) .....	27
三、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1896-1898) .....	30
四、通史論述的轉變過程 .....	31
第三節 東洋史治學方法的差異—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 .....	33
第二章 北亞史的基本架構與早期發展 .....	37
第一節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經營 .....	37
一、草創期的朝鮮史研究 .....	37
二、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設立與成果 .....	42
三、稻葉岩吉的滿鮮史 .....	44
第二節 塞外史—民族分類、語文研究、原典譯註 .....	46
一、塞外民族的分類與語文研究 .....	46
二、原典史料的考證與譯註 .....	51
第三節 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論」 .....	53
一、東洋史教科書中的基礎設定 .....	53
二、南北對立論的形成與發展 .....	54
第四節 文明的十字路口—從西域史轉為東西交涉史 .....	56
一、西域史的成立、發展、體系 .....	56
二、新體系—東西交涉史的出現 .....	65

第五節 西藏—從印度學往西藏學 .....	70
一、印度學、佛教學的成立 .....	70
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西藏的想像與理解 .....	71
三、河口慧海與西藏學的成立 .....	73
第三章 北亞史的理論研究與中期發展 .....	77
第一節 乾燥亞洲史觀與異民族王朝論 .....	78
一、日本第一本的《中亞史》概說書 .....	78
二、乾燥文化地帶的提出 .....	80
三、日本西進政策與回教圈攷究所的成立 .....	82
四、乾燥亞洲的核心概念：「中介的商業活動」 .....	83
五、東亞研究所：異民族統治政策調查 .....	85
六、《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與《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 .....	89
第二節 征服王朝論的提出及其與異民族王朝論之比較 .....	96
一、Karl A. Wittfogel 與征服王朝論的誕生 .....	96
二、征服王朝論與異民族王朝論的比較 .....	106
第三節 日本對征服王朝論的繼承與批判 .....	110
一、白鳥、田村的北亞史研究：前 Wittfogel 時期 .....	110
二、田村實造等學者對征服王朝論的介紹與研究 .....	113
三、田村實造的北亞歷史世界 .....	114
四、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概念及其主編的《北アジア史》 .....	115
五、內陸亞、北亞、中央歐亞概念的重疊 .....	120
第四節 突厥斯坦的成立—從東西交涉史轉為中亞史 .....	122
一、中洋史—持續尋找主體性 .....	123
二、突厥斯坦的研究意義—突厥系諸民族對中亞的重要性 .....	125
第五節 北亞史對西藏史的接納與排拒 .....	129
一、中亞史研究裏的西藏 .....	129
二、佐藤長與西藏史研究 .....	130
三、東洋史中的西藏 .....	130
第四章 北亞史與其鄰近區域的相互關係 .....	133
第一節 北亞史概念與內陸亞史概念的整合 .....	133
一、從東洋、西洋轉變為世界史 .....	133

二、東洋史體系中的內陸亞洲史與北亞史.....	135
三、世界史體系下的內陸亞史與北亞史.....	137
第二節 東北亞史的成立—通古斯民族.....	141
一、自律性的朝鮮史像—日鮮共同合作.....	141
二、東洋史與世界史中的朝鮮—從北亞到東亞.....	142
三、東北亞的成立.....	144
第三節 中亞史的主體性—絲路史觀論爭.....	148
一、南北關係—間野英二的論點.....	148
二、概說書：江上波夫主編《中央アジア史》.....	149
三、絲路論爭之後—森安孝夫的論點.....	152
第四節 中央歐亞概念的 formed 與影響.....	154
一、Denis Sinor 的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概念.....	154
二、日本學界對中央歐亞概念的引介與接納.....	156
第五節 中央歐亞史中的西藏—藏傳佛教世界的形成與發展.....	161
一、森安孝夫.....	162
二、石濱裕美子的藏傳佛教世界論.....	163
第五章 世界史中的遊牧民.....	165
第一節 從北亞史到中央歐亞史.....	165
一、基本特徵的彙整.....	165
二、地域的擴大.....	171
三、中央歐亞史的誕生.....	174
第二節 滿洲、西亞地域的特徵與比較.....	175
一、滿洲利亞.....	175
二、西亞.....	177
第三節 世界史的基本單位.....	182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史教學與世界史概說書.....	182
二、梅棹忠夫及其《文明の生態史觀》.....	183
三、世界史的基本單位.....	186
結論.....	189
一、北亞史的建立及其調整.....	189
二、北亞史學界：面對西洋的挑戰.....	191



徵引文獻.....193

圖表目錄

圖 3-1:企劃院委託東亞研究所進行調查案之文件.....90

圖 5-1: 中央歐亞地域圖.....178

圖 5-2: 生態史觀所見的世界史.....188

表 1-1: 東洋史概說書重要概念彙整表.....35-36

表 3-1: 北魏、遼、金、元、清等 5 王朝統治特徵表.....97-98

表 3-2: 異民族王朝論與征服王朝論比較.....111

表 3-3: 異民族王朝論與征服王朝論比較表.....111-113

表 5-1: 概論書要素統整 (1956-2001) .....169-173

表 5-2: 文明的生態史觀論點簡表.....187-188



## 緒論

日本學界研究北亞史有百年以上的研究歷程，其所累積的豐碩研究成果與細緻研究方法都是相關研究者在進行相關研究時無法忽略的。筆者在閱讀北亞史的相關論文時，注意到此研究歷程雖已有學者以此為主題進行考察，但較多論述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發展，如東洋學的成立、滿鮮史的發展等課題等，所以筆者希望能再退一步，考察「北亞史」概念的形成，將「北亞史研究」的研究歷程做一整體性的論述。

### 一、問題意識

學科的發展離不開累積，而這種累積除了不斷進行新的研究之外，還要對學科的發展過程進行總結，對學科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進行反思，學科史研究就包含有這樣的目的。19世紀末開始，日本學界就開始系統的針對亞洲北部的阿爾泰語族進行研究，也就是後來的「北亞史」研究。「北亞史」做為日本東洋史學的其中一門學問，具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完整的理論建構。筆者希望能考察「北亞史」概念的形成，將「北亞史」的研究歷程做一整體性的論述。以下將此主題的背景與重要問題進行論述。

「東洋學」一詞是日本由「Oriental Studies」翻譯而來的辭彙，意為關於東方的學問，研究區域是歐洲稱為「Orient」的地區，簡單說就是非歐洲的世界。<sup>1</sup> 明治維新之後，由於日本國勢的蒸蒸日上，自覺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亞洲一分子，已經代表了與西洋文明相對的東洋文明，故借鑑德國以實證為基礎的「Oriental Studies」，重新發展對東方的整體瞭解，<sup>2</sup> 發展出「東洋學」。

「東洋學」的核心與江戶時代以來的「漢學」中傳統的道德教化不同，所以說，「東洋史」主要是從德國實證主義歷史學中產生。<sup>3</sup>

---

<sup>1</sup> 窪寺絃一，《東洋學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9），頁5。

<sup>2</sup> 田中正美，〈那珂通世〉，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頁2-4。

<sup>3</sup> 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傳統〉，《歷史學研究》270號（1962年11月），頁32。

在上述日本現代實證研究的發展背景下，「東洋學」發展出「東洋史」、「東洋文學」、「東洋哲學」的架構。<sup>4</sup> 其中「東洋史」又以北亞史研究為早期發展的重點之一，奠基者是白鳥庫吉、內藤湖南等人。白鳥庫吉是當時德國實證主義歷史學派學者 Riess 在東京大學講授歷史學的第一批學生。大學畢業後，白鳥庫吉先從西方學者尚未碰觸到的朝鮮史開始，再到滿洲利亞、蒙古利亞、西域等地域。<sup>5</sup>

北亞史的研究自白鳥庫吉開始，經歷羽田亨、和田清、池內宏、田村實造等學者的研究，建構起一個以蒙古利亞、滿洲利亞為中心的北亞歷史世界，至今仍未有相關中文論著針對北亞史的重要概念、研究成果、學術系譜進行有系統的論述，所以筆者希望能夠爬梳北亞史體系建構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北亞史研究也受到外國學界概念的影響，如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提出的征服王朝論（*Dynasties of Conquest*）與塞諾（Denis Sinor）提出的 Central Eurasia（ユーラシア/中央歐亞）的概念，被日本學界吸收。日本學者如何在吸收上述概念後，與先前日本本身的研究成果對話，進而將其概念融入北亞史的體系中。此課題屬於較少人研究的領域，中文學界幾近無相關研究成果，所以筆者大部分使用日文資料與少許的英文資料進行研究。

北亞史研究在上述發展過程中，與鄰近區域的相互關係，也隨著地域概念與研究概念的變化而產生變化。如滿洲利亞史與朝鮮史研究，形成「滿鮮史」的研究體系，被納入北亞歷史世界。其後「滿鮮史」隨著戰後歷史學方法的變化，自北亞歷史世界中獨立出來，形成東北亞歷史世界。<sup>6</sup> 內陸亞洲史、中央歐亞史等概念則都是以北亞史為基礎加入其他地域進一步發展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探討北亞歷史世界的擴大或是東北亞、內陸亞洲等歷史世界時，由於其範圍並非單純的以地理進行劃分，也有加入文化進行考量，且也需要綜合考慮「民族」、「國家」等因素，故在不同時期對於不同歷史世界都有不同的範圍。

以上是筆者對本文需要處理問題的簡要說明，希望能藉由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理解北亞史研究的整貌。

---

<sup>4</sup> 窪寺絃一，《東洋學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6。

<sup>5</sup> 中見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學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收入神田信夫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清朝と東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115-116、122。

<sup>6</sup> 中亞、西藏等區域也經歷類似的發展過程，而這些區域研究的發展也會在論文中進行討論。

## 二、學術史回顧

此部分為論述北亞概念的發展與探討，材料為對於北亞史研究的評析之相關書目，大致可以分為幾類：1.論述北亞史概念的論文。2.具有批判性質的學說史。3.重要北亞史研究者的傳記或紀念文集。故本文藉由上述書目來進行對於北亞史研究的回顧與評析。在此研究的發展過程中，隨著不同時期的研究回顧範圍，就有不同的變化。故本文以學術發展的先後分成三期：北亞史概念的形成、北亞史體系的建立、中央歐亞史的出現，探討其發展的脈絡與轉變。

### (一) 北亞史概念的形成與構成

#### 1. 南北對立論

1926年（大正15），<sup>7</sup>白鳥庫吉發表〈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在先前他對於阿爾泰語族的歷史語言學研究、神話傳說研究等為基礎，提出東洋史發展的動力為北方勢力（遊牧民）與南方勢力（農耕民）相互對立的觀點，<sup>8</sup> 此篇論文的重要性在於奠定東洋史發展的二元對立觀點，有別於內藤湖南的中國中心論。<sup>9</sup> 由於當時尚未有體系的北亞史概念，所以當時是以塞外史、塞北史的詞彙涵蓋研究的範圍。Stefan Tanaka 與窪寺紘一認為白鳥庫吉企圖重建阿爾泰語族體系，提出阿爾泰語族在東洋史的重要性，藉此提出日本在東洋的定位。<sup>10</sup>

1934年（昭和9）、1956年（昭和31），江上波夫先後發表〈考古学上より觀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人類社会における農耕民型と遊牧民

<sup>7</sup> 文中年代呈現為西元年（日本紀年），如1926年（大正15）。在同一章中，相同年代第二次出現則僅出示西元年。

<sup>8</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69-84；白鳥庫吉，〈蒙古史研究序〉，收入箭內互《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70），頁11-29。

<sup>9</sup> 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收入《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頁9。

<sup>10</sup>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88-89；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9），頁143。

型〉，從考古學論證遊牧民與農耕民的差異，補充南北對抗論。<sup>11</sup> 1936年（昭和11）、1964年（昭和39），松田壽男陸續提出絹馬交易論，從遊牧民與農耕民互市交易的歷史現象為基礎，理解南北對抗論。<sup>12</sup>

從東洋史研究的初期發展來看，南北對抗論顯示出白鳥庫吉除了建立對東洋史的基本論述外，更提升日本在遊牧民歷史研究的話語權。進一步檢視白鳥庫吉的學問，主要用語言學的考察切入，加上對於史料的批判，建立塞外民族的體系。在白鳥庫吉理解世界時，閱讀 Swinton 出版的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万国史要》）時，受到其中提到歷史上的人種只有一個，主要為高加索種，也就是白人種的看法之刺激，他認為這樣的見解是錯誤的。<sup>13</sup> 為了要糾正這樣的錯誤，衍伸出其後的研究，<sup>14</sup> 建構了阿爾泰語族的體系，可以說南北對抗就是阿爾泰語族對抗漢族的歷史。

除了南北對抗論外，1932年（昭和7），Owen Lattimore 發表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在此書中 Lattimore 首先提出「貯存地（reservoir）」概念，<sup>15</sup> 可以說是一種有別於南北對立論的觀點，<sup>16</sup> 可稱為 Frontier History。此地帶經常在遊牧民與農耕民的對抗中發揮關鍵力量，具體來說，此地帶包含北中國（North China）與滿洲利亞。由此可知，Owen Lattimore 與白鳥庫吉的差別在於，將滿洲利亞視為第三勢力，雖受兩大力量（遊牧民與農耕民）的影響，但也有能夠影響局勢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Owen Lattimore 的相關著作早於昭和15年（1940）已經有翻譯介紹，但是似乎未造成討論。<sup>17</sup> 從滿洲利亞的定位問題，可以看

---

<sup>11</sup> 江上波夫，〈考古学上より観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8 人類史の構想》（東京：山川出版社，2001），頁 59-100；江上波夫，〈人類社会における農耕民型と遊牧民型〉，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8 人類史の構想》，頁 101-110。

<sup>12</sup> 松田壽男，〈北アジア史〉，收入氏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第二卷 遊牧民の歴史》（東京：六興出版，1986），頁 366-380。

<sup>13</sup> 白鳥庫吉，〈序〉，收入高桑駒吉《參考東洋大歴史》（東京：宝文館，1906），頁 8-16。

<sup>14</sup> 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42-143。

<sup>15</sup>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p38-42.

<sup>16</sup> 石見清裕，〈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編《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東京：刀水書房，1999），頁 278-299。

<sup>17</sup> 後藤富男首先於 1940 年翻譯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書名為《農業支那と遊牧民族》，其後蒙疆財團法人蒙古善隣協會出版的《内陸アジア》第一輯（1941），未著譯

到歐美與日本學者見解的差異，也是相當值得探討的課題。目前日本學界將 Lattimore 的概念批判性繼承，提出帶狀地帶、農牧接壤地帶、農業=遊牧境界地帶等概念。<sup>18</sup>

## 2. 地域史上分出的滿鮮史、滿蒙史

### (1) 滿鮮史

白鳥庫吉的研究歷程是自朝鮮、滿洲開始，逐漸往西至蒙古、西域。<sup>19</sup> 作為開創性的研究者，設立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與箭內互、稻葉岩吉、松井等、池內宏等人提出《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等研究成果。白鳥庫吉雖使用滿韓、滿鮮等詞彙，但滿韓、滿鮮等詞彙只是滿洲、韓國或滿洲、朝鮮兩地的省略詞。<sup>20</sup> 其後，賦予滿鮮史體系性內涵的是稻葉岩吉<sup>21</sup>、三品彰英<sup>22</sup>，滿鮮史觀的內涵是從朝鮮史的他律性<sup>23</sup> 切入，認為從歷史上滿洲、朝鮮自戰國時期的燕國可視為一體，其後在朝鮮建國的高句麗、百濟都是滿洲的夫余族所建立的國家，新羅則是由移民的漢人所建立的國家。<sup>24</sup>

二次戰後，日本積極反省並欲負起戰爭責任，旗田巍、芳賀登、寺內威太郎等學者針對滿鮮史觀進行批判與總結，認為需要將朝鮮史視為一個自律

---

者，僅標出 Owen Lattimore 之名，其題目為〈蒙古草原史の展開〉。此文同為節譯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sup>18</sup> 石見清裕，〈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編《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頁 279；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07），頁 50。

<sup>19</sup> 松村潤，〈白鳥庫吉〉，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頁 37-48。

<sup>20</sup> 桜沢亜伊，〈「滿鮮史觀」の再検討—「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と稻葉岩吉を中心として〉，《現代社會文化研究》39（2007），頁 19-36。

<sup>21</sup> 稻葉岩吉，〈滿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收入氏著《支那社會史研究》（東京：大鐙閣，1922），頁 303-307。

<sup>22</sup> 三品彰英，〈滿鮮地帶の歴史〉，收入《世界史講座（第四卷）東亞世界史（二）》（東京：弘文堂，1944），頁 151-184。

<sup>23</sup> 所謂他律性就是無法由自身發展歷史，需要外力推動。自律性則為反義詞。

<sup>24</sup> 稻葉岩吉，〈滿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收入氏著《支那社會史研究》，頁 303-309。

性發展的歷史單位進行研究。<sup>25</sup> 相較於前者的批判性觀點，中見立夫、井上直樹等學者認為，從白鳥庫吉等學者的視野來看，從古代世界中的西伯利亞東北部、滿洲利亞、朝鮮半島三地，均是歷史研究中通古斯系諸民族活動的範圍，可以說是以一個廣域的歷史文化圈來設定滿鮮的。<sup>26</sup> 如再進一步延伸，滿鮮史體系與日本大陸政策的密切關係，中見立夫、井上直樹也提出用東北亞史的概念來替代，更能彰顯此地域中通古斯民族的特質。<sup>27</sup>

## (2) 滿蒙史

和田清發表〈滿蒙史論〉，他承續南北對抗論的框架，提出滿蒙史，認為遊牧民崛起的方向是由西向東（突厥系、蒙古系、東胡·滿洲系），由於遊牧民受到中國文明的影響，滿蒙逐漸混一，滿洲與中國也逐漸混一。<sup>28</sup> 但整體來說，滿蒙史的體系未如先前滿鮮史的體系論述清晰。再者，滿洲利亞與蒙古利亞的民族特性差異，也讓論述無法成立。

儘管對於朝鮮史、滿洲利亞史、蒙古利亞史各自體系性的通史研究，<sup>29</sup> 也同時進行，例如稻葉岩吉在 1915 年（大正 4）出版的《滿洲發達史》，朝鮮

<sup>25</sup> 旗田巍，〈朝鮮史研究の課題〉，收入《朝鮮史入門》（東京：龍溪書舍，1970），頁 7-48；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學思想史〉（東京：柏書房，1974），頁 119-120；寺內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そのまなざしが残したもの》（東京：刀水書房，2004），頁 17-70。

<sup>26</sup>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頁 14；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頁 229-230。

<sup>27</sup>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頁 271-273；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頁 232-239。

<sup>28</sup> 和田清，〈滿蒙史の大勢〉，收入氏著《東亞史論叢》（東京：生活社，1943），頁 269-290。

<sup>29</sup> 蒙古利亞史、滿洲利亞史是筆者為了區別於限定指涉滿洲民族的滿洲史、蒙古民族的蒙古史，但在著作中仍然是以滿洲史、蒙古史的方式呈現。如松田壽男在 1937（昭和 12）年發表的〈蒙古遊牧民とその歴史の役割—蒙古史讀本・第一章〉，其中認為蒙古史是自古以來在蒙古地域發生的歷史現象，用科學方式理解、敘述的學問。……從現今的地勢來看，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份，漠北、戈壁、漠南。……蒙古史就是以牧畜民為主體而發展的歷史。參見松田壽男，〈蒙古遊牧民とその歴史の役割〉，收入氏編《蒙古學》第 1 冊（東京：善鄰協會，1937），頁 155-156；後刊東北亞研究所編《蒙古學》（滿蒙地理歷史風俗誌叢書）（서울特別市：景仁文化社，1997），頁 153-181。

總督府主導，於 1938 年(昭和 15)出版的 35 卷本的《朝鮮史》，昭和 18(1943)年由宮崎市定主編的《支那周邊史》<sup>30</sup> 等著作。綜合來看，此時期的滿鮮史、滿蒙史的史觀的提出，應該是各地域史的研究為基礎，但是如神田信夫所言：「關於將朝鮮、滿洲、蒙古三地域的研究總合為一，不過是便宜之舉。所以此三地域的歷史雖說已經是有機的統一，但在本質論上仍然有問題。」<sup>31</sup> 從神田信夫的觀點來看，此時對於三地域統合為一的概念，只是強制性的，未有更深層的核心支撐。

從滿鮮史觀與滿蒙史觀的發展來看，與日本大陸政策是同步發展的。在讓日本為負起戰爭責任反省的同時，需要釐清的是，這些著作中的見解是否因為與大陸政策相關，就一律批判呢？經過時間的檢驗，如《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滿蒙史論叢》等成果，仍然為研究者所使用，這是可以確定的。另一方面，如接續著東北亞史為通古斯民族發展的歷史的見解，原本白鳥庫吉設定的北方遊牧民的領域無疑是逐漸細分。如此一來，在什麼條件下，地域圈或是歷史文化圈才能成立的問題，就成為需要思考的問題。

## (二) 北亞史

### 1. 遊牧國家論

1937 年(昭和 12)，松田壽男發表〈蒙古遊牧民とその歴史的役割〉，他認為遊牧國家發展的特徵就是遊牧社會的經濟必須依靠外力，提出「遊牧經濟+X=發展」的看法。<sup>32</sup> 同年，日本也翻譯 Б.Я. Борис Яковл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цов 的名著《蒙古社會制度史》，書中的重要概念「遊牧封建制」也被重點討論，詳細的討論有山田信夫的〈遊牧封建社會論〉。<sup>33</sup>

<sup>30</sup> 此書分成朝鮮史、滿洲史、蒙古史、突厥斯坦史、西藏史、印度與南洋等 6 部分。其中的滿洲史、蒙古史的概念同註 31 所述。

<sup>31</sup> 神田信夫，〈滿洲・蒙古〉(1950)，收入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 17 内陸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1988)，頁 2-4。

<sup>32</sup> 松田壽男，〈蒙古遊牧民とその歴史的役割〉，收入氏編《蒙古學》第 1 冊，頁 155-156；後刊東北亞研究所編《蒙古學》(滿蒙地理歴史風俗誌叢書)(서울特別市：景仁文化社，1997)，頁 369。

<sup>33</sup> 山田信夫，〈遊牧封建社會論〉，收入氏著《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頁 253-282。



1956年，山田信夫發表〈遊牧國家論批判〉，此文詳細回顧有關遊牧國家形成、構造、發展、衰弱的各種見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sup>34</sup> 昭和46年(1971)，護雅夫發表〈北アジア・古代遊牧国家の構造〉，論述匈奴、鮮卑、柔然、東突厥的遊牧國家構造，視其為北亞史的古代。<sup>35</sup>

如上所述，對於遊牧國家的探討，牽涉到遊牧社會的構成、與其他不同生業社會的互動交流等，具體呈現的樣貌就是關於遊牧國家的類型論與時代區分論。<sup>36</sup> 有別於前段提到滿洲利亞在北亞史裏的曖昧性，另一方面，河西回鶻、甘州回鶻、哈喇契丹等遊牧國家，是否能歸入北亞史中，成為需要討論的課題。儘管此時的北亞史中，都是將北亞、中亞一併討論，但仍是具有其模糊性，所以此處就呈現出北亞歷史世界的適用性問題。

## 2. 異民族王朝論與征服王朝論

### (1) 異民族王朝論

1943年(昭和18)至1944年(昭和19)，東亞研究所聚集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的學者編纂《異民族支那統治概說》、《異民族支那統治史》等著作，總結北魏、遼、金、元、清等王朝的統治，稱為異民族王朝。<sup>37</sup> 上述兩書的編纂者中村治兵衛承襲了南北對立論，認為：「換言之，南北抗爭史就是農耕民族與遊牧、狩獵半農耕(牧畜半農耕)民族的鬥爭史。北方民族壓倒南方民族，於支那中原樹立政權的即所謂異民族王朝。……考察異民族的支那統治時，首先就必須理解不同民族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差異。」<sup>38</sup>

### (2) 日本學界對於征服王朝論的批判與繼承

---

<sup>34</sup> 山田信夫，〈遊牧国家論批判—内陸アジア史序説に關して〉，收入氏著《北アジア遊牧民  
族史研究》，頁215-228。

<sup>35</sup> 護雅夫，〈北アジア・古代遊牧国家の構造〉，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  
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359-386。

<sup>36</sup> 山田信夫，〈古代遊牧民の活動〉，收入島田虔次等編集《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4(内陸  
アジア・西アジア)，頁19-22。

<sup>37</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頁1-2；東亞研  
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4)，頁1-4。

<sup>38</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頁1-2。

1948年（昭和23），田村實造發表〈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提出自成體系的北方民族史，應能看做是當時總結北亞民族史研究的總綱。<sup>39</sup> 田村實造提出四點：一、北方民族活躍的舞台，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廣義來說，東至滿洲，北至西伯利亞，西至中亞，成為一個地域整體，與中國本土是不同的地理世界。二、在生產樣式上，或遊牧，或狩獵與一部分農耕，與南方農耕漢民族在本質上有所差異。三、漢籍史料中的北方民族，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是以一部族為中心，吸收其他諸族，構成部落連合體的國家，至此可看出北方民族歷史的連續性。四、北族（北方民族之簡稱）國家支配的原則是絕對權力，君長必須有勇敢、才能、公平的人格特質，由君長的領導而興亡。<sup>40</sup> 以上述觀察為基礎，進行北方世界的分期。第一期是 B.C.300 至 A.D.900，北方民族統合為部落連合體的遊牧國家向南方民族展現優勢武力，南方民族則以強勢的政治、文化力影響北方，是兩元對立並交互影響時期。第二期是 A.D.1000 至 AD.1400，北方民族受到隋唐文化影響，產生民族自覺，進而發展併吞南方世界，是北方民族以武力統一南北兩世界的時期，建立不同於前期的國家型態。第三期是 A.D.1400 至 A.D.2000，此時期的清朝，不同於第二期的元朝，致力消除民族對立，懷柔漢民族，而清朝也是北方民族發展的終點。<sup>41</sup>

1949年，Karl A. Wittfogel 與馮家昇合著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提出中國史可分為典型中國王朝與征服王朝、滲透王朝兩大類。他認為征服王朝是以武力進攻中國，統治中國一部分或全土，而滲透王朝則是以半和平的滲透方式進行統治，但兩者統治的方式也不相同。<sup>42</sup> 進一步比較遼、金、元、清四個朝代後，在征服者本身的生業可以發現可分為遊牧民族與擁有牧群的農業民族兩類，進一步理解這些民族與中國文明的互動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類：遼是文化抵抗型、金是文化讓步型、清則是處於前兩者中間的過渡型。北魏的狀況不同於前四個王朝，由於是主動或被動的先進入中國境內居住，以滲透的方式建立政權，所以稱為滲透王朝。但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兩者的界線是移動

---

<sup>39</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1948），頁36-48。

<sup>40</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38-39。

<sup>41</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40-48。

<sup>42</sup> Karl A.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9.,pp1-16.

的，但兩種方式最後都形成複雜的二元社會，兩者的制度與文化形態均無多大區別。<sup>43</sup>

同年田村實造介紹征服王朝論，並提出相關課題：「1.征服王朝一向被視為中國史的一環，或者是北亞史的一環；是否應該由包含中國史和北亞史高層次的立場考察。2.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的差異，以及衍身而來如何看待北魏與前燕國家性格之問題。」<sup>44</sup> 田村實造的北亞世界的時代區分論，<sup>45</sup> 可以說是更進一步完善先前提出的北方民族史的架構，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歷史世界。但無疑仍是在東洋史的架構下進行論述。(2) 村上正二從歐亞大陸的角度出發，可說將征服王朝論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下進行討論，雖仍在東洋史架構中，但已有相當的世界史意識。首先藉由比較歐洲與亞洲的社會型態，認為前者是農牧一致型，後者是農牧分離型，所以農牧分離型才導致兩者的對立關係。遊牧社會對於馬匹使用方式的改進，產生了與農耕社會對抗的遊牧國家。遊牧國家在歷史發展中的系譜則是：匈奴、柔然（初期遊牧王朝）→南匈奴、北魏（滲透王朝）→突厥、回鶻（後期遊牧王朝）→遼、金、元、清（征服王朝）。<sup>46</sup>

1962年（昭和37）12月，長澤和俊發表〈近年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の研究動向〉中歸納對於征服王朝的批判時認為：「山田信夫認為征服王朝將這些政權興亡單純視為的循環現象，而未注意其在地域與時間上的差異。」<sup>47</sup> 1971年（昭和46），原山煌發表〈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の一視点について〉，<sup>48</sup> 回顧歷來的遊牧民族史研究，認為從史料的不足導致

<sup>43</sup> Karl A.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p15-16, 24-25.

<sup>44</sup>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收入氏著《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71），頁627、635。

<sup>45</sup> 田村實造，〈北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と發展〉，收入氏著《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原以〈北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發表於《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第10輯》京都：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会）（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4），頁1-58。

<sup>46</sup> 村上正二，〈征服王朝〉，收入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世界の歴史6 東アジア世界の變貌》（東京：筑摩書房，1961），頁147-185。

<sup>47</sup> 長沢和俊，〈近年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の研究動向〉，《史学雑誌》71：12（1962），頁52。

<sup>48</sup> 原山煌，〈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の一視点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0：2/3（1971）頁262-269。

分析游牧國家結構時無法獲得更明確的成果，所以提出與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合作途徑，做為以後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1972年（昭和47），吉田順一在〈北アジアの歴史的発展と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の征服王朝理論〉中指出：「將不同生活形態的女真所建立的征服王朝一併納入征服王朝中，這是需要再討論的。如果征服王朝理論要納入的金、清的話，那麼征服王朝應該解釋為與中國農耕社會對立而發展，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之游牧王朝。」<sup>49</sup> 1993年（平成5），島田正郎在《契丹國—游牧の民キタイの王朝》提到：「田村實造有條件的接受征服王朝論，不如說是由津田左右吉的見解詳細說明而發展的。」<sup>50</sup> 這點可以說是點出日本學界從本身的研究成果就可得出征服王朝的論點。

日本對於征服王朝論的批判與闡述有下列3點值得注意：（1）如田村實造、村上正二、護雅夫等人開始注意到北亞歷史世界在世界史中的定位。這當然是因應戰後學界對於既有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的體制的反省，提出世界史體系的思考。<sup>51</sup>（2）連結松田壽男等人發展的乾燥亞洲、內陸亞洲等概念，<sup>52</sup> 產生北亞、中亞、內陸亞、乾燥亞等數種概念並行的狀況。在1971年出版的《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叢書中，內陸亞成為綜合北亞、中亞的上層概念。<sup>53</sup>（3）田村實造等學者雖積極介紹征服王朝理論，但在之前的異民族王朝論、北方歷史世界分期，均已具體提出對於北亞歷史的歸納與總結，為何直接使用 Karl A. Wittfogel 的征服王朝論，此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如村

<sup>49</sup> 吉田順一著、鄭欽仁譯，〈北アジアの歴史發展と魏復古の征服王朝理論〉，後譯〈北亞的歷史發展與魏復古的征服王朝理論〉，收入鄭欽仁、李明仁譯著《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180-181。

<sup>50</sup> 島田正郎，《契丹国—游牧の民キタイの王朝》（東京：東方書店，2014），頁231。

<sup>51</sup> 油井大三郎，〈社会構成体史と世界史、そして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收入研究会「戦後派第一世代の歴史研究者は21世紀に何をなすべきか」編集《われわれの歴史と歴史学》（東京：有志舎，2012），頁39-49。

<sup>52</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東京：四海書房，1938），頁21-23；松田壽男〈序章〉，收入江上波夫、松田壽男，《図説世界文化史大系 第13巻 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東京：角川書店，1961），頁27-31。

<sup>53</sup> 佐藤長，〈総説〉，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281-296；山田信夫，〈古代游牧民の活動〉，收入島田虔次等編集《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4（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頁19。

村上正二認為：「這個名稱（征服王朝）比使用中國塞北民族王朝或異民族王朝等曖昧的概念來處理北族諸王朝的政治性格更好，所以最近日本方面也廣泛的使用。」<sup>54</sup> 這也是島田正郎認為 Karl A. Wittfogel 的征服王朝論並無超越日本學界先前的研究成果。<sup>55</sup>

### （3）北亞史概說書

1956 年，山川出版社也發行了「世界各國史」系列叢書，第 12 冊為江上波夫主編的《北アジア史》。此書為目前最早的北亞史概說書之一，具有重要地位。此書有別於以往中國周邊史的撰寫形式，將蒙古利亞、南西伯利亞、滿州利亞、朝鮮為中心的民族史歸為北亞史。<sup>56</sup> 同年，岩崎書店出版アジア史講座，第四卷為田村實造的《北アジア史》，其中以附編形式包含西藏與中亞，範圍以蒙古利亞為中心，往東包含滿洲，西接準噶爾利亞，是以遊牧文化圈來涵括上述地域。<sup>57</sup> 1981 年（昭和 56），山川出版社發行新版的《北アジア史》，由護雅夫、神田信夫主編，此版本中由護雅夫所撰寫的序論中，強調北亞史的主體性，同時論述與鄰近地域的關聯，地域包含蒙古利亞、南西伯利亞、滿州利亞。<sup>58</sup> 1999 年（平成 11），同朋舍出版若松寬編著的《北アジア史》，北亞的範圍是以蒙古利亞為主，滿洲視為東北亞，西藏也是獨立的歷史單位。<sup>59</sup>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自 1956-1999 的 40 多年間，北亞史體系已定型，是以騎馬遊牧民為主體的歷史，地域是以蒙古利亞為主，滿洲、朝鮮、西藏則是定位較曖昧，但曖昧的部分尚未有人進行考察。其中的過程或可說是從塞外史、周邊史→北亞史的演變過程。其二，北亞史雖已定型，但由於此歷史世界的設定是以文化圈進行設定，所以地理範圍會隨著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定義，如護雅夫、神田信夫主編的新版《北アジア史》，在討論與鄰近中亞

<sup>54</sup> 村上正二，〈征服王朝〉，收入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世界の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變貌》（東京：筑摩書房，1961），頁 147-185。

<sup>55</sup> 島田正郎，〈契丹国—遊牧の民キタイの王朝〉（東京：東方書店，2014），頁 164。

<sup>56</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56）。

<sup>57</sup> 田村實造，《北アジア史》（田村實造、羽田明監修「アジア史講座」）（東京：岩崎書店，1956），頁 1。

<sup>58</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新版）》（東京：山川出版社，1981），頁 1-8。

<sup>59</sup> 若松寬，《北アジア史》（竺沙雅章監修「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京都：同朋社，1999），頁 4-5。

的關係時，即認為中亞的突厥化就是自北亞興起的突厥所帶動，如此兩者的歷史也可以視為內陸亞史理解。<sup>60</sup> 江上波夫主編的《中央アジア史》則提出大中亞史的概念，<sup>61</sup> 歐美學者也有相同見解。<sup>62</sup> 但目前學者尚未針對各個歷史世界的主體性與延伸性做相關的討論。其三，David Christian 在 1994 年發表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一文，探討內陸歐亞在世界史的定位。Di Cosmo 則在 1999 年發表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Asian History 一文，探討中央歐亞諸遊牧國家的類型與分期。<sup>63</sup> 但目前尚未有日本與歐美的相關討論。

### （三）中央歐亞史的出現

1965 年（昭和 40），山田信夫發表〈アルタイ学の課題〉，其認為：「阿爾泰諸族的歷史不是像突厥族、蒙古族的單一民族史，也不是像是蒙古利亞史、突厥斯坦史的單一地域史，是必須將阿爾泰諸族全體作為一個歷史世界來把握，並在世界史中找到正確的位置。」<sup>64</sup> 1978 年（昭和 53），山田信夫發表〈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構想〉，提出：「中央歐亞史是要取代直到目前使用的中亞史、內陸亞史、北亞史的用法。根據在於將歐亞大陸的中央地域視為一體進行歷史考察。……但是經過思考，北亞史與南亞、中亞、內亞等比較，發現完全不是地理的概念。提到北亞史時，其內容說是包含東北亞，不如說有時卻是從滿洲到蒙古利亞、準噶爾利亞、哈薩克斯坦的範圍。所以產生中央歐亞史的想法。」<sup>65</sup>

<sup>60</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新版）》，頁 3-5。

<sup>61</sup>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頁 iii-iv。

<sup>62</sup> Robert L. Canfield, "Introduction", Robert L. Canfield ed., *Turko-Per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vii-viii.

<sup>63</sup> David Christian,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 2 (1994) : 173-211; Nicola Di Cosmo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Asian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0 : 1 (1999) : 1-40; 狄宇宙，田歡譯，〈內亞史上的國家形成與階段劃分〉，收入伊沛霞等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3-70。

<sup>64</sup> 山田信夫，〈アルタイ学の課題〉，收入山田先生著作刊行会《天山のかなた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京都：阿吡社，1994），頁 98。

<sup>65</sup> 山田信夫，〈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構想〉，收入山田先生著作刊行会《天山のかなたユーラシ

1987年（昭和62），杉山正明從氣候帶開始論述，認為橫貫歐亞兩洲的乾燥地帶大致上是中央歐亞的範圍，跟內陸亞或中亞有所差異。<sup>66</sup> 此後，進一步提倡本田實信提出的蒙古時代史之概念，將世界強烈聯繫互動的時代自地理大發現往前追溯至蒙古時代。<sup>67</sup>

2010年（平成22），堀敏一討論到東亞與北亞的關係時認為：「田村實造所謂北亞歷史世界雖然是一個獨立成形的世界，然而，東亞歷史世界卻以同北亞的關係構成重要的內容。我認為北亞和東亞這兩個歷史世界有一部份相互重合，而形成其歷史過程。」<sup>68</sup> 2013年（平成25），岡田英弘的〈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が果たす役割〉，提出：「中國史與西歐史中的重要歷史分期，其中的主要力量都是中央歐亞之力量，所以可以說兩者的歷史變革都不是自發的內部力量。」<sup>69</sup>

森安孝夫則在前人基礎上綜合歸納，提出「中央ユーラシア型國家」的概念，此地域以ユーラシア的草原、沙漠、綠洲，輔以森林草原地帶。此處提及的「中央ユーラシア型國家」，可說是善用騎馬技術的遊牧民創造的國家，應可用廣義的征服王朝來理解，儘管其中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政權。<sup>70</sup> 此處也是回應了先前田村實造、村上正二有人在討論征服王朝概念時提到：「征服王朝可以說是普通名詞，在亞洲史上，西亞的伊兒汗國、薩珊帝國、塞爾柱土耳其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等」，<sup>71</sup> 作為普通名詞的征服王朝，廣泛的適用於中央

---

アと日本人》，頁93-94。

<sup>66</sup> 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7），頁12-13。

<sup>67</sup> 本田實信，《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頁i-viii；杉山正明，《世界史を変貌させたモンゴル—時代史のデッサン》（東京：角川書店，2000），頁149-163。

<sup>68</sup> 堀敏一，《東アジア世界の歴史》（東京：講談社，2008），頁28-29。

<sup>69</sup>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が果たす役割〉，收入氏著《岡田英弘著作集2 世界史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13），頁156。

<sup>70</sup> 森安孝夫，〈日本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並びに東西交渉史研究の歩み—イスラム化以前を中心に—〉，《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0（1995），頁1-26；〈基調講演：内陸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現場への提言〉，《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6（2011），頁3-34；《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頁iv-vii、4-5。

<sup>71</sup>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收入氏著《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頁625-626。

歐亞史中。

近年來，研究者也從歐亞史概念出發，開始使用「東部ユーラシア（東部歐亞）」的概念，<sup>72</sup> 荒川正晴、菅沼愛語等學者都提出此概念，荒川正晴認為：「指涉帕米爾以東，從中亞到東方，包含如中國、蒙古等地域。」<sup>73</sup> 菅沼愛語則認為：「東部ユーラシア（東部 Eurasia）具體來說指涉包含中華（唐）、西藏（吐蕃）、北亞（突厥、回鶻）、東北亞（渤海、契丹）、朝鮮半島（高句麗、新羅、百濟）、日本、南方的南詔（雲南）、越南等廣泛的地域。」<sup>74</sup> 兩者的說法並無矛盾，以後者較為明確。

從上述的回顧看到，北亞史、中亞史、內陸亞史、中亞歐亞史概念的變遷，這些概念是相容並能同時使用，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無排他性。這樣的變遷應跟近年來世界史、全球史研究的興起相關，讓研究者更能思考各個歷史世界間的互動與交流。東部歐亞概念的運用也是如此，雖從上述菅沼愛語的定義來看，與東洋史的範圍類似，但是使用東部歐亞的概念無疑能讓視野更加開闊，加強與西部歐亞的連結。

總體看來，從白鳥庫吉提出南北對抗論開始，奠定了北亞史的基本論述，就是遊牧民對抗農耕民。其後白鳥庫吉等學者自滿鮮史研究開始，研究領域逐漸向西擴張。因為大陸政策的關係，使得此時期的學術有積極的發展，但在日本於二次大戰戰敗後，研究者一方面持續反省戰爭責任，另一方面也重新檢討滿鮮史的研究成果。從檢討可知，當時的滿鮮史設定是以一個歷史世界存在的，而近年來以新的樣貌—東北亞重新出現。針對滿蒙史的討論則較少，是值得發展的課題。滿鮮史與滿蒙史對於北亞歷史世界的影響為何，滿洲占有何種地位，是核心問題。

在研究成果的大量累積下，研究者對於北亞遊牧國家的類型與結構開始進行歸納總結。日本學者在自成體系的基礎下，參考歐美、蘇聯的研究成果，

---

<sup>72</sup> 荒川慎太郎、澤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辺健哉編，《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東京：勉誠出版，2013）；森部豊，《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渉》（東京：勉誠出版，2014）。

<sup>73</sup> 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頁1。

<sup>74</sup> 菅沼愛語，《7世紀後半から8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国際情勢とその推移—唐・吐蕃・突厥の外交關係を中西に一》（廣島：溪水社，2013），頁4-5。



如針對遊牧封建制、遊牧國家結構的討論。征服王朝論則成為北亞歷史世界體系成立的最後一塊拼圖，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但對於滿洲地域的金、清兩王朝是否能歸納為征服王朝，成為一個爭論點。另外，各歷史世界的交互影響（北亞與東亞、北亞與中亞），也讓各歷史世界的範圍有所伸縮，成為另一爭論點。以蒙古利亞為中心發展的騎馬遊牧民的影響力能有多大，是在研究時值得研究的課題。

近年來，中央歐亞的概念成為使用的主流，但對於北亞、中亞、內陸亞的概念並未捨棄，而是並存使用。所以從上述相關研究的討論，可以發現尚未有人回顧其與北亞、中亞、內陸亞的相互關係，此點也是需要探討的課題。學界雖已經陸續開始注意北亞史研究的檢討，但是目前仍著重於東洋史、滿鮮史等較早發展的學術史。所以如能從北亞史的概念出發，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進行討論的話，也許對於上述各項討論能夠更加清楚的定位。

### 三、研究材料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採取文獻研究法，相關材料又可分為下列三種：

- (一) 北亞史研究重要學者的相關著作，如《白鳥庫吉全集》（全十卷）、《羽田亨博士史學論文集》（上）、（下）、《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上）、（中）、（下）等，從研究著作的脈絡中尋找北亞史研究的發展。
- (二) 學界針對北亞史的相關研究，回顧式評述前者如《日本民族学の回顧と展望》、《日本歴史學界の回顧と展望 17 内陸アジア》、《日本歴史學界の回顧と展望 16 朝鮮》、《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 4 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東洋史研究》、《東洋學報》、《東方學》等專書與期刊；後者則如《東洋學の系譜》、《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東方學回想》等書，從中了解北亞史重要學者的成長過程與思想變化。
- (三) 以北亞史為主題的歷史專書，因日本學界在每個世代均有習慣集結當時的重要研究成果，彙整為通論性的歷史專書，將研究成果介紹給普羅大眾，所以能從此類書籍對北亞史研究的發展有所了解。如《北アジア史》、《北アジア史（新版）》、《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 7 北アジア史》等書。

#### 四、重要辭彙定義

在北亞史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各學者對於北亞、中亞、內陸亞、中央歐亞都有不同的定義。以下就本文所使用的北亞、中亞、內陸亞、中央歐亞等概念進行說明：

- (一) 北亞：北亞的核心地域是蒙古利亞<sup>75</sup>、滿洲利亞、西伯利亞三部分，這三地域包含遊牧、狩獵、半獵半農、半牧半農等不同的生業，但共通點是掌握騎射技術，又可統稱為騎馬民。西藏則是儘管與東亞、北亞、南亞、中亞均有密切聯繫，但在宗教上與北亞有密切連結，所以在論述北亞史時都會提到西藏。
- (二) 中亞：中亞的核心地域就是突厥斯坦，其中又可分為東突厥斯坦（今新疆）、西突厥斯坦（今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哈薩克等五國）。西藏部分則是因為在交流方面有密切相關，在1989年後，就被納入中亞的範疇內。
- (三) 乾燥亞洲：此概念首先將亞洲分為：溼潤亞洲（農耕）、亞溼潤亞洲（狩獵）、乾燥亞洲（遊牧）等三部分。乾燥亞洲包括蒙古利亞、突厥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島、土耳其、敘利亞、安那托利亞等位於亞洲內陸的地域。其中包括遊牧民、綠洲農耕民。地域除了包括北亞、中亞之外，往西至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地域。
- (四) 內陸亞洲：此概念首先是指涉亞洲大陸的內陸地帶，主要包括北亞與中亞兩地域，也就是蒙古利亞、滿洲利亞、突厥斯坦、西藏等四部分。
- (五) 中央歐亞：此概念指涉歐亞大陸的內陸地帶，與內陸亞洲的地域大致重合，但往西也包含南俄草原，比內陸亞洲更加廣闊。

---

<sup>75</sup> 文中地名之呈現，如滿洲（Manchuria），為避免於滿洲民族混用，使用 Manchuria 之漢譯，稱為滿洲利亞。蒙古則使用 Mongolia 之漢譯，稱為蒙古利亞。



# 第一章 北亞史在近代日本的成立

本章論述日本明治初期至明治末期的學術發展。第一節論述清國考據學與西洋文明史學對於明治初期知識分子的影響。第二節論述在此影響下，日本開始發展出獨自的通史著作，具體就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其後他更發展出東洋史的概念。第三節論述隨著東洋史的發展，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是如何建立東洋史相關的教學體系。

## 第一節 近代日本歷史學的成立

近代日本在對歷史的認知，大體而言可分為兩個潮流，一個是在江戶時代漢學中的儒教史學傳統，其重點是歷代興亡的政治史與勸善罰惡的道德教化歷史。另一個潮流是江戶時代後期，蘭學引進日本後，開始對於西洋史的關心，特別受到其中的啟蒙思想影響，最終於明治初期形成文明史的潮流。<sup>1</sup> 前者受到批判後，被受到清國考證學影響的考證史學取代，再與德國實證主義史學結合，形成以東京大學主要影響範圍的主流史學。相較於前者，文明史學則在民間影響較大。本節討論上述史學的發展過程。

### 一、清朝考據史學與西洋文明史學之交匯

從江戶時期的寶曆元年（1761）至明和9年間（1772），由井上金峨、吉田皇墩導入清國考據學，產生一群考證主義者，成為明治時期考證史學的前身。<sup>2</sup> 1869年（明治2）3月，政府設置「史料編輯國史校正局」，以考證史學為主要研究方法編輯國史；5月，「史料編輯國史校正局」改稱「國史編輯局」，但因不同學派間的鬥爭而使得國史編纂業務暫停。<sup>3</sup>

<sup>1</sup> 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頁1-2。

<sup>2</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9），頁125-126。

<sup>3</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126。

1871年（明治4）7月，明治政府實施廢藩置縣的政策，正式確立了近代日本的國家體制。此時到明治20年之間，日本全面學習西洋進行近代化。<sup>4</sup> 近代化的相關政策中有關教育的部分，主要著眼於加速提升國民的知識水平。另一方面也推行海外留學與招聘外國人才，加強對於西洋文化的攝取吸收。<sup>5</sup> 1872年（明治5），太政官正院設置「歷史課」，接續先前「國史編輯局」所負責的國史編纂業務。1875年（明治8），「歷史課」改稱「修史局」，局中的學者有重野安繹等人，<sup>6</sup> 這批學者就是其後帶領日本史研究的重要人物，自此可知從江戶時期受到清國考據學開始，至其後實證史學的發展，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1874年（明治7），近代化潮流所傳入的歐洲歷史學著作也影響了當時人的思想，如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1874) 的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的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ish*. Vol. I, 1857. Vol. II, 1861. (《英國文明史》)、William Swinton (1833-1892) 的《萬國史要》等著作陸續被引介翻譯。如 Guizot 的著作陸續於 1875 年（明治 8）室田充美譯為《歐洲文明史》、1874 年荒木卓爾、白井哲夫譯為《泰西開化史》，同年永峰秀樹譯為《歐羅巴文明史》。Buckle 的著作則是 1875 年大島貞益譯為《英國開化史》、1879 年（明治 12）土居光華、萱生奉三譯為《英國文明史》。<sup>7</sup> 上述著作都對福澤諭吉、那珂通世、白鳥庫吉等人有重要影響。

上述 Buckle 與 Guizot 著作都影響了福澤諭吉，<sup>8</sup> 當時福澤諭吉 (1834-1901) 也在自己開辦的慶應義塾中選擇教授 Buckle 的《英國文明史》

---

<sup>4</sup> 有關此近代化時期，學界慣稱為「文化開化」，根據大久保利謙的研究，此詞彙是幕末明治初年的新詞彙，首先使用的著作是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一書，其意思是指西洋的進步文化，為英語 Civilization 的譯詞，由於廣泛使用的結果，使得「文化開化」一詞逐漸有更多的涵義。參見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63；大久保利謙，〈四文明開化〉，《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 6 明治の思想と文化》，頁 107-108。

<sup>5</sup> 大久保利謙〈四文明開化〉《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 6 明治の思想と文化》，頁 113-115。

<sup>6</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26。

<sup>7</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93-94。

<sup>8</sup> 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頁 115。

與 Guizot 的《歐羅巴文明史》兩書，<sup>9</sup> 其後提倡東洋史的那珂通世，當時在慶應義塾的速成班（變則科）<sup>10</sup> 就學時就有研讀上述著作，更有抄譯《英國文明史》的紀錄留下，也是由於此時在慶應義塾的就學，讓那珂通世學習中國傳統經學以外的西方學問體系。<sup>11</sup>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の概略〉也是受到上述文明史著作的影響。<sup>12</sup> 文明史著作的重要性在於啟發知識份子對於不同歷史書寫的觀念，但是儘管如此，仍未能完全讓當時的知識份子從重視歷代興亡與道德教化的儒教史學傳統中解放。<sup>13</sup>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的文明史著作，擴展了明治初期知識份子的思考，其中「西歐史等同於文明史，也是最進步歷史」的概念也影響了日本知識份子。這讓福澤諭吉提供日本一條近代化的道路，但是西洋中心觀，在其後也成為研究者想要超越的觀點。如當時仍未就讀東京帝國大學的白鳥庫吉，就是閱讀上述 Buckle、Guizot、Swinton 等人的文明史著作後，對於如 Swinton 認為世界上有歷史的僅有亞利安種族的相關敘述，也讓白鳥庫吉有想要證明非是如此的動力。<sup>14</sup>

## 二、新體制的創立與東洋史概念的萌芽

在文明史的潮流之下，日本學者也開始從文明史的角度撰寫著作，如上述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田口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1877-1882）、

<sup>9</sup> 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頁 116-117。

<sup>10</sup> 福澤諭吉在青年時期於蘭學者緒方洪庵的適塾學習，1858 年（安政 5）受到中津藩的命令，在江戶的築地鐵砲洲（今東京都中央區明石町）開辦蘭學塾，也就是慶應義塾的前身。1868（明治元）年，將蘭學塾遷往芝新錢座（今東京都港區海岸三田町），更名為慶應義塾。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71-73。

<sup>11</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95。

<sup>12</sup> 松沢弘陽，〈文明論における「始造」と「独立」—『文明論之概略』とその前後—（一）〉，《北大法学論集》31（3/4）（1982），頁 347-375；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東京：柏書房，1974），頁 58；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05。

<sup>13</sup> 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頁 112。

<sup>14</sup> 白鳥庫吉，〈學習院に於ける史學科の沿革〉（1928），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78-379；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42-143。

那珂通世的〈日本上古年代考〉（1878）同樣也受到影響。<sup>15</sup>

1874年，慶應義塾畢業的那珂通世，即刻前往大阪的慶應義塾分校擔任英語教師。但因為大阪當時通商之地，對於學問的需求未如預期，所以僅開辦一年就關閉慶應義塾分校。1875年，那珂通世透過福澤諭吉的引介，前往荻（今山口縣）的巴城學舍任教。<sup>16</sup> 1876年（明治9），從荻回到東京，在擔任洋洋社擔任會員，並開始撰寫論文，其中較為重要的是〈上古年代考〉（後改題為〈日本上古年代考〉）。此文的重點在於利用中國、朝鮮的史料，考察比對《日本書紀》的紀年問題，在當時廣泛受到注意。這無疑是受到西洋史學觀念影響，進行史料比較考證，但也引起國學派的抗議，認為是有損國體。但是整體來說，那珂通世因此文開始受到重視，與此同時他也著手開始撰寫《支那通史》。<sup>17</sup>

1877年（明治10），「修史局」改稱「修史館」，重野安繹任一等編輯官。隔年重野安繹等修史館學者受到西洋歷史體裁的影響，決定要進行史體的變革與採用西洋的歷史敘述法。同年，昌平學校、開成學校、醫學校合併，改稱東京大學，設置法、理、文、醫學等四學部，其中文學部分為兩科：1. 「史學哲學及政治學科」2. 「和漢文學科」。<sup>18</sup> 1879年，東京大學「史學哲學及政治學科」改為「哲學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史學廢止，原因為找不到能講授史學的人才。<sup>19</sup>

1881年（明治14），「修史館」的重野安繹更動原以《大日本史》為基礎的修史基礎，改為《大日本編年史》的編纂體制。<sup>20</sup> 1882年（明治15），東京大學校長加藤弘之考慮在引進西洋學術的同時，也需持續培養固有的漢學人才，在經過文部省同意後，在文學部附設「古典講習科」，講授「正史、雜史、法制、辭章、事實考證、支那法制、漢文」。<sup>21</sup> 同年，「哲學科」下

<sup>15</sup> 大久保利謙，〈四 文明開化〉，《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 6 明治の思想と文化》，頁109；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23-28。

<sup>16</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101-102。

<sup>17</sup> 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26-28。

<sup>18</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頁412-413。

<sup>19</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414-415。

<sup>20</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127-128、168。

<sup>21</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505；中見立夫，〈日本

的「哲學課程」改為「西洋哲學課程」，並增設「東洋哲學課程」。<sup>22</sup> 1883年（明治 16）增設「支那古典講習科」，又稱「乙部」。「古典講習科」則稱「甲部」。<sup>23</sup> 1884年（明治 17），因「甲部」、「乙部」容易讓人有優劣之分，故將「甲部」與「乙部」分別改為「古典講習科國書課」與「古典講習科漢書課」。<sup>24</sup> 1885年（明治 18），「和漢文學科」分為「和文學科」與「漢文學科」兩科，同年中止「古典講習科」招生。<sup>25</sup>

上述主要是「修史館」與「東京大學」的發展變遷。「修史館」在重野安繹為主的學者推動下，將原先以儒教史學為基礎的《大日本史》編纂體制，改為以考證史學與西洋敘事方式的《大日本編年史》編纂體制。「東京大學」則較為複雜，中國史學在此時主要是在「古典講習科國書課」、「古典講習科漢書課」裏講授。

1886年（明治 19），日本政府公布「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改組為帝國大學，<sup>26</sup> 其中分為法、文、理、醫、農、工等六個分科大學。同年，政府廢止「修史館」。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帝國大學「古典講習科漢書課」畢業的市村瓚次郎、岡田正之、長尾兩山、林泰輔、瀧川龜太郎等人組建東洋學會，刊行《東洋学会雜誌》。<sup>27</sup> 上述研究者多為古典講習科的畢業生，卻萌生了東洋的概念，這應可說是在帝國日本國勢發展中，想要與西洋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分庭抗禮的心態，可說是以研究中國、日本地域的古典文化為主體的

---

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18。

<sup>22</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503。

<sup>23</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416。

<sup>24</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416。

<sup>25</sup> 古典講習科漢書課儘管只有召募兩期，但人才輩出。第一期生於明治20年畢業，共有28名，對東洋學有重要影響的有市村瓚次郎、林泰輔、岡田正之、瀧川龜太郎等人。第二期生於明治21年畢業，對東洋學有重要影響的有兒島獻吉郎、長尾兩山等人。參見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505-506；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学者たち》〈東京大学『古典講習科』の人々〉（東京：研文出版，1998），頁135-136。

<sup>26</sup> 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頁430。

<sup>27</sup>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頁25；中嶋敏，〈市村瓚次郎〉，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頁28-29。



東洋學，<sup>28</sup> 與之後的白鳥庫吉等人發展的東洋學，在性質上應有所不同。

1887年（明治20），「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設「史學科」，並聘請德國教授 Ludwig Riess（1861-1928）講授史學。Riess 為德國歷史學家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學生。自此開始，「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開始有教員講授近代西方歷史學的史料批判、客觀敘述等科學研究方法。<sup>29</sup> 此時 Riess 主要講授西洋史與史學方法等課程。此時史學科裏僅講授西洋史。1888年（明治21），因日本政府將「修史局」廢除，並將修史事業移交「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新設之「編年史編纂掛」負責，而原屬「修史局」之編輯長重野安繹（1827-1910）、編修久米邦武（1839-1931）、星野恒（1839-1917），亦轉任文科大學教授，故增設「日本歷史」課程。<sup>30</sup> 同年白鳥庫吉也同時進入史學科就讀。1889年（明治22），帝國大學增設「國史學科」。



<sup>28</sup>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頁25。

<sup>29</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153。

<sup>30</sup>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臺灣史研究》16（3）（2009），頁89；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頁431。

## 第二節 從《支那通史》到《中等東洋史》

第二節討論自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到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間，日本學界對於東洋史理解的變遷。首先考察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中的基本概念與撰寫過程，其次討論由此萌生的東洋史概念。接著探討受到那珂通世影響的桑原鷺藏所撰寫的《中等東洋史》。最後進行比較，藉此歸納此時期的對於東洋史理解的變遷。

### 一、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1888-1890）

1888年，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第一卷，由當時漢學科教授中村正直（1832-1891）與島田重禮（1838-1898）寫序。文中以漢文書寫，內容是體系的呈現中國史。書中主要有以文明開化的概念對中國史進行考察：

漢人談治，必稱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謂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雖不盡如漢人所稱，而當四鄰皆純夷之時，漢土獨為禮樂之邦，政教風俗已擅美於東洋，足以觀古代開化之一例矣。秦漢以下二千餘年，歷朝政俗殆皆一樣，文化凝滯，不復進動，徒反復朝家之興廢而已。……蓋支那建國甚久，成俗極固，其開化之度，亦非四夷之可及。故胡人或能以其武勝漢，而以其文則必自服於漢，雖胡君在上，其國則依然漢唐之中國也。民之情態一定不變，無進無退，恰如在範型之中。此支那開化之所大異於西國也。<sup>31</sup>

由那珂通世上述的論述，可見從將中國文明視為東洋的進步文明，胡人雖統治中國卻仍無法從文明上取而代之。但是自秦漢至清，卻只見停滯，文明未有進步，固定僵化，此與西洋文明不同。那珂通世使用了比較文明的方法，

---

<sup>31</sup>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一卷（東京：中央堂，1890），頁6。

論述中國史的胡人與漢人，再比較中國文明與西洋文明。<sup>32</sup> 另一方面，那珂通世也將亞洲的人種進行分類，分為六類：支那種（漢人）、韓種（高麗種、朝鮮人）、東胡種（滿洲種）、韃靼種（此種又分蒙古種、土耳其種兩種，土耳其種又稱回回）、圖伯特種（韃靼與印度混合）、江南諸蠻（此種又分苗、獠、僚三種）。<sup>33</sup> 那珂通世從人種之別來看亞洲大勢則認為：

支那史者，漢人之史也。漢人為之主，而韃靼東胡參之，遞為盛衰，以成東亞細亞之沿革。至近世，韃靼種稍衰，滿人以東胡遺種大興，遂定今代之業。今以其民口較諸漢人不過百分之三，然既秉主權，稱為貴種，漢人雖眾，勢力反不及也。<sup>34</sup>

此處則說明亞洲人種之互動，可看出已有以東亞細亞為觀察之範圍，並進一步點出韃靼種、東胡種的重要性。之後對於中國史加以分期：

今圖編述之便，假分古今為三大紀，自唐虞三代至六國并於秦，二千餘年是為上世。自秦歷漢唐至宋金之衰，千四百餘年是為中世。自元初歷明至今六百八十年是為近世。中世近世又各因其三代分為三紀，每紀以一卷充之，以敘歷代治亂分合之概畧。庶幾初學之徒，或得由以察我鄰邦開化之大勢矣。<sup>35</sup>

那珂通世將中國史分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打破先前儒教史學觀點的《十八史略》傳統，更重要的是從文明史的角度，考察中國開化之過程。<sup>36</sup> 整體來看，是以文明史觀為基底，考察整體中國史，體例也有別於傳統，講述文物沿革，在論述西域諸國時也將西洋研究成果放入，可讓讀者更清楚歐亞世界大勢，並增加歷史地圖、帝王世系表、官職沿革表等，輔助理解，是重要

<sup>32</sup> 田中正美，〈那珂通世〉，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5。

<sup>33</sup>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一卷，頁4-5。

<sup>34</sup>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一卷，頁5。

<sup>35</sup>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一卷，頁6-7。

<sup>36</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169。

的改變。<sup>37</sup>

此書問世後，日本的各級學校都開始將其作為教科書使用，取代了《十八史略》。但是由於那珂通世寫至蒙古部分時，由於缺乏文獻與相關知識，所以無法下筆，《支那通史》未能完成。以此為因，那珂通世開始接觸三宅米吉（1860-1929）自西洋帶回的東洋學相關書籍，由此開始自學蒙古語、突厥語、波斯語等古代語言，才有其後《成吉思汗實錄》的誕生。<sup>38</sup>

大約同時的明治 25 年（1892），市村瓊次郎（1864-1947）與瀧川龜太郎（1865-1946）出版《支那史》。此書也是採取近代的敘述方式，首先論述地理、人種。如與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相比較的話，首先就是《支那史》是完整的論述，《支那通史》僅論述至宋。其二，前者使用日文書寫與西元紀年，後者使用漢文書寫與日本紀年。其三，前者未對中國史進行分期，後者則是分為三期。<sup>39</sup> 其四，相當重要的是，後者已經有歷史分期的概念，將中國史劃分上世、中世、近世，此分期基準也為之後的學者所沿用。

## 二、那珂通世的「東洋史」概念（1894）

1893 年（明治 26），東京帝國大學實施講座制度。<sup>40</sup> 此時文學部共有 9 學科：哲學科、國文學科、漢學科、史學科、博言學科（Philology）、英文學科、獨逸文學科（德文）、教育學科、仏蘭西文學科（法文）。其中在漢學科設置「漢學支那語學」3 講座，其後因桑原鷺藏、中山久四郎為漢學科學生時，建議修改課程，漢學科增設支那歷史，由那珂通世講授。<sup>41</sup> 1894 年（明治 27），那珂通世參加由高等師範校長嘉納治五郎為主的教授，以及

<sup>37</sup> 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傳〉，收入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刊行會編《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上卷（東京：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刊行會，1929），頁 297；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69。

<sup>38</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71-172。

<sup>39</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74。

<sup>40</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通史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86），頁 862。

<sup>41</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 626；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 東洋學の磁場》，頁 26。

高等中學校等教授舉辦的歷史科會議，在會中那珂通世發言：

明治 27 年時，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先生，與同校教授、大學教授、高等中學校教授等開會，進行中等學校中各教授學科的調查。在歷史科會議中，那珂通世君提議將外國歷史分為東洋歷史與西洋歷史兩部分，列席者皆贊同，此為東洋史成為學科科目的開始。<sup>42</sup>

提出如此發言的因由為：

從來中等學校的外國歷史科目，其中是講授被歐美稱為世界史的萬國史，以及詳細講授支那史。是因我國在世界史中，簡略如東洋之歷史，特別是支那事蹟。我國關於歐美，也就是西洋諸國之歷史，雖是以歐美的世界史為基準進行講授，但從以支那為開端，朝鮮、印度等其他與我國有密切關係的東洋諸國的事蹟，也有詳細講授的必要，以讓我國能編成適當的東洋諸國之歷史，以補世界史的另外一半。是而中等學校講授科目中的外國歷史兩分，新設東洋史之原因。<sup>43</sup>

至此可知日本學界開始注意到東洋諸國歷史的重要性，故那珂通世提出將外國歷史分為東洋史與西洋史的提議。同年 9 月，文部省發布尋常中學校的各學科要領，歷史科的部分：

尋常中學校的歷史科以國史為主，世界史為輔，講授歷史之一般事蹟，以豐富經驗，培養良好感情。世界史分為東洋史、西洋史，東洋史中特別詳述支那史。

東洋歷史以支那為中心，述說東洋諸國之治亂興亡大勢，相對於西洋歷史，為世界歷史的一半。講授東洋歷史時，需注意我國與東洋諸國自古如何相互影響，又需說明東洋諸國與西洋諸國之關係。故目前支那歷史

<sup>42</sup> 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傳〉，收入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刊行會編《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上卷，頁 303。

<sup>43</sup> 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傳〉，收入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刊行會編《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上卷，頁 303-304。

以歷代興亡為主，但未論述人種的盛衰消長。東洋歷史不僅為東洋諸國之興亡，必需論述支那種、突厥種、女真種、蒙古種等之盛衰消長。其教授事項大略如上述。<sup>44</sup>

上述的歷史科教學要領，可以看到對於東洋諸國的關心，儘管是以中國為中心，但是對於不同民族間的互動也有所注意。

1895 年（明治 28）至 1896（明治 29）年間，那珂通世在《大日本教育會雜誌》中發表《東洋地理歷史講義》共十回，講述亞洲地理二回、朝鮮史二回、支那史三回（包含中亞史）、印度史二回、北亞史一回。<sup>45</sup> 從《東洋地理歷史講義》中可得知此時的東洋史概念相較於早先的《支那通史》更加擴大，而上述那珂通世的著作，無疑都影響到桑原鷺藏及其著作《中等東洋史》。<sup>46</sup> 1896 年 5 月，那珂通世開始擔任帝國大學「漢學支那語學」的第三講座，以講師職位負責講授支那歷史，此時受其學風薰陶的有桑原鷺藏與狩野直喜。<sup>47</sup>

當東洋史正式成為中等學校歷史科要領中的講授重點後，如市村瓚次郎與藤田豐八等學者也陸續出版以東洋史為名的通史著作。明治 29 年，藤田豐八出版《中等教科東洋史》，1897 年（明治 30），市村瓚次郎出版《東洋史要》，但市村瓚次郎此書是將《支那史》進行濃縮，而體例方面較無更動，故不介紹。

藤田豐八在《中等教科東洋史》的〈凡例〉提到：「本書以東洋史為題，實以興亡於東方亞細亞的民族為主的一般史。」<sup>48</sup> 可說是具體實現那珂通世對於東洋史的思考，將各民族興亡為重點，但仍是支那史為主軸進行論述。此書的時代分期也與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時代分期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此書以中國為主，論述東洋史，也對朝鮮、印度、北亞遊牧民，從與中國的交流互動上有較多著墨。藤田豐八將亞洲民族分為 7 類：漢族、苗族、通古斯族、都爾古族（Turk）、蒙古族、圖伯特族（Tibet）、韓族。

<sup>44</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97-198。

<sup>45</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99。

<sup>46</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99。

<sup>47</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201-202。

<sup>48</sup> 藤田豐八，《中等教科東洋史》（東京：文學社，1897）。

### 三、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1896-1898）

1898年（明治31）桑原鷺藏出版《中等東洋史》。<sup>49</sup> 桑原鷺藏在《中等東洋史·總論》提到：「東洋史就是以東亞為主，以明瞭民族盛衰、國家興亡的歷史，與西洋史相對，構成世界史的一半，今以山川形勢為基準，將亞洲大陸分成五部份。東亞、南亞、中亞、西亞、北亞。……東洋史以東亞為主，因其沿革自古皆明，同時與東洋史有許多直接、間接之關係，南亞及中亞的沿革就不得不略述。至於北亞，因氣候寒冷，人煙亦稀少，因此在亞洲的大勢上，未成為重要事件的舞台。西亞則因與歐洲發展無法分離之故，也在東洋史範圍之外。」<sup>50</sup>

從上述可看到從那珂《支那通史》到桑原《東洋史》的轉變，首先日本學者意識到如要理解亞洲的歷史，就必須對於亞洲有更多理解，但當時主要論述的根據仍多以中國史料為基礎，<sup>51</sup> 另一方面，桑原鷺藏也提到民族在東洋史的定位：「東洋史中的所有事件，常占有主動位置的就是亞洲人種，即黃色人種。波斯的伊朗族，特別是如印度的印度亞利安族。歐洲人種，即所謂白色人種，有時在亞洲東部所發生的事件中，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但大體而論，他們仍屬於客人。」<sup>52</sup> 而有哪些民族創造東洋的歷史呢？桑原鷺藏提到：「東洋史的主人是亞洲人種，依照慣例可以大致分為兩類，西伯利人種、支那人種。支那人種可再細分為三族：漢族、藏族、交趾支那族。西伯利人種有四族：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突厥族。」<sup>53</sup>

從上述《中等東洋史》的設定可以知道，相較於先前以中國史為東洋史主軸的設定，桑原鷺藏對於東洋史的設定更進一步，認為東洋史的主體是各個民族，其中突厥族、漢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在東洋史的發展上佔有重要

<sup>49</sup> 吉澤誠一郎，〈東洋史學の形成と中國〉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頁57-58。

<sup>50</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收入《桑原鷺藏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17-18。

<sup>51</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頁5。

<sup>52</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頁22-23。

<sup>53</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頁23-24。

地位。<sup>54</sup> 民族創造歷史的概念，這從書中的章節安排也可清楚看到，雖同樣是受到那珂通世的三時期區分法影響，但增加了近世期與該時期主導民族的標題，如上古期：漢族膨脹時代、中古期：漢族優勢時代、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代、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sup>55</sup> 有關近世期的部份，在英國的印度侵略、鴉片戰爭、俄國的中亞侵略、印度的狀況、法國的侵略等部份使用相當篇幅說明。<sup>56</sup> 但是此時的東洋史仍然是以中國史為中心。<sup>57</sup>

#### 四、通史論述的轉變過程

根據前述三本著作，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藤田豐八的《中等教科東洋史》、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將三位作者對於時代分期、地域區分、民族分類、東洋史的概念彙整於表 1。

表 1-1：東洋史概說書重要概念彙整表

	《支那通史》	《中等教科東洋史》	《中等東洋史》	備註
時代分期	上世、中世、近世	上世、中世、近世	上古、中古、近古、近世	以《支那通史》為基礎
地域區分		東亞：中國、日本、朝鮮 南亞：印度、安南、暹羅、緬甸 西亞：阿富汗斯坦、俾路芝 斯坦 <sup>58</sup> 、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 北亞：西伯利亞、突厥斯坦	東亞：中國、朝鮮 南亞：印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 中亞：西突厥斯坦 西亞：波斯、小亞細亞、阿拉伯 北亞：俄領西伯利亞	

<sup>54</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頁 24。

<sup>55</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頁 25-26。

<sup>56</sup> 伊集院立，〈近代日本の世界史教科書における東洋史と世界史の叙述：歴史教育と歴史研究〉《社会志林》56（1）（2009），頁 29。

<sup>57</sup> 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頁 134。

<sup>58</sup> 巴基斯坦之音譯。



民族分類	1.支那種（漢人） 2.韓種（高麗種、朝鮮人） 3.東胡種（滿洲種） 4.韃靼種（此種又分蒙古種、土耳其種兩種，土耳其種又稱回回） 5.圖伯特種（韃靼與印度混合） 6.江南諸蠻（此種又分苗、獠、僚三種）	1.漢族 7.韓族 3.通古斯族 5.蒙古族 4.都爾古族 6.圖伯特族 2.苗族	1.漢族 4.日本族（包括韓族） 5.通古斯族 6.蒙古族 7.突厥族 2.藏族 3.交趾支那族	
東洋史概念	從西洋文明史觀切入考察，有整體亞洲的概念，但以中國史為主。	已有東洋史概念，認為東洋史的主軸為中國史。	已有東洋史概念，認為東洋史的主軸為中國史，並將民族的比重增加。	

資料來源：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一卷（東京：中央堂，1890）。

藤田豐八，《中等教科東洋史》（東京：文學社，1897）。

桑原鶯藏，《中等東洋史》，收入《桑原鶯藏全集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

由表 1 可知，從時代分期來看，三者一脈相承，以那珂通世的三時段時代區分法為主，斷限也完成相同，僅桑原鶯藏增加近世期，論述歐人進入亞洲之歷史。地域區分，藤田豐八與桑原鶯藏則各有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已出現北亞一詞，但是僅是初步的劃分，主要指涉俄屬西伯利亞。民族分類部分，為東洋史成為教科書後的重要概念，儘管三者對於各民族的系統、排序、分類歸屬、名稱各有不同，但是基本分類不變，大致為漢族、苗族、通古斯族、日韓族、蒙古族、突厥族、西藏族等 7 類。對於東洋史的理解，則可見逐漸演進的過程，從模糊到清晰，但此時期的東洋史仍以中國史為主軸，對於北亞、西域、印度、朝鮮的論述，則是以中國與周邊交流的角度考察論述。

### 第三節 東洋史治學方法的差異—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

1897年，日本政府基於對於國家發展的需要，決定在關西設置能與「（東京）帝國大學」相互競爭的京都帝國大學，其中有法、醫、理工、文四分科大學。<sup>59</sup> 京都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木下廣次認為：「京都帝國大學不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分校，而是一所獨立的大學。為了學校的長期生存與發展，我們必須有獨立的辦學特點。」<sup>60</sup> 同年「（東京）帝國大學」改稱為「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明治34），時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的內藤湖南，發表〈京都大学と樸学の士〉，他認為清國之強盛實因樸學之士備出，而目前國民期盼京都大學的設置是因對於僅有東京大學的現況有所不滿，加上東京大學壟斷學術，而京都此地遠離政治中心，可無視名利的追求學術，故在此時空背景下，京都大學應以培養樸學之士為其最大的天職。<sup>61</sup> 所謂樸學也就是清國考證學的簡稱，至此可知內藤湖南的思考。<sup>62</sup>

1904年（明治37），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將9學科整併為哲學、史學、文學三科。同時「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聘請白鳥庫吉，講授「漢魏六朝西域史」、「塞外民族文化史」、「滿鮮上代史」等課程。<sup>63</sup> 1906年（明治39），京都帝國大學設置文科大學，首任文科大學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為狩野直喜，設置哲學、史學、文學三科，首先有講座教師的是哲學。1907年（明治40），「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原定聘請桑原鷺藏擔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但是當時桑原鷺藏仍在清朝留學，故由籌備委員

<sup>59</sup> 《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出版會，1956）。

<sup>60</sup> 《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出版會，1956）。

<sup>61</sup> 內藤湖南，〈京都大学と樸学の士〉，收入內藤乾吉、神田喜一郎編《內藤湖南全集 第三卷》（東京：筑摩書房，1971），頁271-275。

<sup>62</sup> 礪波護，〈內藤湖南〉，收入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頁81。

<sup>63</sup> 石田幹之助，〈白鳥庫吉先生小傳—その略歴と學業〉，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523。

狩野亨吉改聘請內藤湖南擔任講師負責東洋史學第一講座。<sup>64</sup> 1908 年（明治 41），桑原鷺藏擔任東洋史學第二講座教授。

基於前述京都帝國大學校長木下廣次的方針，儘管京都帝國大學設立之初的師資多為東京大學畢業，東洋史學也需要走出一條不同於東京帝國大學的路。如前所述，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的東洋史學主要是從德國實證主義歷史學中產生，<sup>65</sup> 基於西方研究法的採用與對中國史料的批判，重建全新的東洋史。

與此同時，敦煌發現大量出土材料的訊息傳到京都，獲得消息的狩野直喜等人相當興奮，快速的連繫北京的羅振玉，取得出土材料的照片，馬上舉辦研究會，內藤湖南、桑原鷺藏、羽田亨等人均分配到負責研究的出土材料，如其中狩野直喜的負責項目就是《老子化胡經》的研究，其後更前往北京進行考察，而羅振玉、王國維等人訪問日本時，也與京都帝國大學諸學者有密切聯繫，故可說京都是敦煌學的重要發展地點之一。<sup>66</sup> 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與中國學者的密切交流互動也成為有別於東京帝國大學的特徵之一。

在上述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等學者對於敦煌學的研究以及與中國學界的密切交流下，逐漸發展出有別於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源於德國實證主義學派的研究範式，也就是「支那學」。<sup>67</sup>

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史研究領域至此應該分為兩派，一類是將中國史視為東洋史的重點，被稱為東洋史學派，以桑原鷺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學者為代表；另一類則是將中國史與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並立，形成支那學的體系，主張中國史無法離開中國文學、中國哲學進行研究，被稱為支那學派，以內藤湖南、富岡謙藏、岡崎文夫等學者為代表。<sup>68</sup> 從此可看到，儘管桑原鷺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為東京帝國大學的出身，並將東洋史的概念代入京都帝國大學，但是內藤湖南等人仍然延續舊學傳統，另闢門徑，發展出獨特

---

<sup>64</sup> 礪波護，〈內藤湖南〉，收入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頁 82。

<sup>65</sup> 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歴史学研究》270，頁 32。

<sup>66</sup> 高田時雄，〈狩野直喜〉，收入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頁 15-16。

<sup>67</sup> 宮崎市定，〈內藤湖南とシナ学〉，收入氏著《宮崎市定全集 24 隨筆下》（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 239。

<sup>68</sup> 宮崎市定，〈独創的なシナ学者内藤湖南博士〉，收入氏著《宮崎市定全集 24 隨筆下》，頁 249。

的支那學。

1910年（明治43），「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下的「支那史學科」改為「東洋史學科」。<sup>69</sup>如前所述，在改稱「東洋史學科」前，中國史的講授是由那珂通世負責，其後是由市村瓚次郎與白鳥庫吉共同擔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市村瓚次郎講授中國史，白鳥庫吉講授蒙古史、西域史。<sup>70</sup>1916年（大正5），池內宏（1879-1952）負責朝鮮史講座。<sup>71</sup>

1920年（大正9），以內藤湖南等學者為基礎成立的支那學會發行刊物《支那學》，當時的學者還有支那文學的狩野直喜、鈴木虎雄、青木正兒，支那哲學的高瀨武次郎、本田成之、武內義雄、小島祐馬等學者，更有研究自然科學的新城新藏加入，相當具有影響力。<sup>72</sup>同年，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將「支那史學」改稱「東洋史學」，「史學」改稱「西洋史學」。

1925年（大正14），市村瓚次郎、白鳥庫吉退休，箭內互接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藤田豐八、加藤繁共同負責東洋史第二講座。1926年（大正15），箭內互病逝，藤田豐八接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sup>73</sup>

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教師在初期對於敦煌學的研究以及與中國學界的密切交流，可見其發展治學特色的端倪。在內藤湖南進入京都帝國大學任教後，逐漸發展不同於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研究的特色，最後形成「支那學」。

---

<sup>69</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624。

<sup>70</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626。

<sup>71</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626。

<sup>72</sup> 宮崎市定，〈独創的なシナ学者内藤湖南博士〉，收入氏著《宮崎市定全集 24 隨筆下》，頁249-250。

<sup>73</sup>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630。



## 第二章 北亞史的基本架構與早期發展

本章共分五節，從地域上分別從東至西探討此時期的東洋史發展。第一節討論滿鮮史，重點除討論滿鮮史研究的發展，更討論滿鮮史的研究成果是否能接受檢驗。第二節探討塞外史研究，在那珂通世提倡重視後，白鳥庫吉重新建立有別於歐洲東方學的阿爾泰民族體系，此時雖仍用中國本位的塞外史研究，但內容已具有近代學術研究的科學性。第三節探討白鳥庫吉的南北對抗論，此觀點與內藤湖南的中國中心論成為東洋史的主要概念，前者更成為北亞史的基本概念。第四節探討西域史研究，從白鳥庫吉、桑原鷺藏、藤田豐八對於西域的歷史地理考證開始，奠定扎實的基礎，再由羽田亨參照歐洲的出土文獻與歷史語言的考察，建立西域史的體系，另一方面，更由此衍伸東西交涉史的新學科，領導下一世代的研究。第五節探討西藏學，此學科有別於上述的學術脈絡，自行體系，且著重於對於宗教經典文獻的解讀，對於歷史的關注較少。

### 第一節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經營

本節主要分成三部分進行論述，首先先論述明治 20 年代開始的朝鮮史研究，帶出重要的研究人物。其次，以白鳥庫吉為主軸，論述其朝鮮史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課題，並敘述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設置與成果。最後，論述滿鮮史體系的成立。

#### 一、草創期的朝鮮史研究

日本人對於朝鮮的關注自江戶時代就已開始，此時期在日本已經有日本人是從朝鮮半島渡海而來之人的後裔的說法。<sup>1</sup> 明治中期關於日本與朝鮮關係

---

<sup>1</sup> 由中國、滿洲、朝鮮半島移住日本的人，在 1970 年代前被稱為歸化人，1970 年代後，因學界反省皇國史觀時，認為歸化人有著以日本中心的傾向，所以上田正昭等人提出渡來人一詞，遂成為主流用法。參見平野邦雄，《歸化人と古代国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頁 1-10。

之研究，主要可以分成國史學<sup>2</sup> 與東洋史學兩派。<sup>3</sup> 國史學的星野恒與重野安繹從提出的「日鮮同祖論」為具有影響力之說法。東洋史學方面，則是以白鳥庫吉為主的學者提出「滿鮮史」為重要的概念。

國史學中有關朝鮮史研究的部分，首推重野安繹、久米邦武、星野恒（1839-1917）等人，其三人都是當時「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臨時編年史編纂所」的第一代教授，也是近代日本實證史學的第一代，其共通的立場是不將記紀神話<sup>4</sup> 視為神聖的敘述，而是當作一般的古代史料進行研究，<sup>5</sup> 換句話說，是以日本方面的史料為主，進行朝鮮史研究。他們延續著江戶時代儒學者、漢學者對於朝鮮的關心，強調日本與朝鮮之間的深厚關係。如久米邦武則在其論文〈日本幅員の沿革〉提出，日本的國土原本就包含朝鮮半島，而從過去的互動交通、神功皇后的半島征服等歷史，連中國南部的人種也是與日本相同。<sup>6</sup> 星野恒著名的主張即認為天皇家的祖先為新羅王，祖先在朝鮮半島發現本州，而渡海來到日本列島發展王國，最後由祖先統一系列島與半島，所以在古代時期，「日韓人種、語言相同」、「兩國原為一域，而非他境」。<sup>7</sup>

所以「日鮮同祖論」又可稱為「日韓一域論」，<sup>8</sup> 其內涵主要可分為兩點，一是日本與朝鮮有相同的祖先與近親關係。二是自古代以來，朝鮮就在日本的統治之下。<sup>9</sup>

東洋史學者方面，則有林泰輔、那珂通世、白鳥庫吉等人。林泰輔<sup>10</sup> 是近代最早研究朝鮮史的學者，其在 1887 年（明治 20）「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

<sup>2</sup> 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學の成立》（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頁 39-58。

<sup>3</sup> 旗田巍，〈朝鮮史研究の課題〉，收入朝鮮史研究會、旗田巍編《朝鮮史入門》（東京：太平出版社，1972），頁 17。

<sup>4</sup> 記紀神話是指《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兩本在奈良時代編纂的書籍之簡稱，此兩書中記載日本人的起源、神明的系譜等。

<sup>5</sup>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頁 88-89。

<sup>6</sup>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頁 91。

<sup>7</sup>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頁 89。

<sup>8</sup> 旗田巍，〈朝鮮史研究の課題〉，收入朝鮮史研究會、旗田巍編《朝鮮史入門》，頁 17。

<sup>9</sup> 旗田巍，〈朝鮮史研究の課題〉，收入朝鮮史研究會、旗田巍編《朝鮮史入門》，頁 17。

<sup>10</sup> 鎌田正，〈林泰輔〉，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頁 13-24。

學附設古典講習科漢學課」畢業後，同年發表〈朝鮮文藝一斑〉<sup>11</sup>，並於 1891 年（明治 24）發表〈加羅の起源〉<sup>12</sup>，明治 25 年（1892）出版《朝鮮史》（全五卷）<sup>13</sup>，可以說林泰輔是從研究朝鮮史開始其學術生涯。林泰輔在《朝鮮史》的序言中提及研究朝鮮史的動機，主要可分成幾項，（一）近代局勢變遷甚快，朝鮮地屬東亞要衝，與日本相臨，故需加強了解。（二）如兩國相安無事，則其通商交流日益增加，所以日本了解朝鮮歷史可有助於交流。（三）近來文化日開，各種史著汗牛充棟，但述及朝鮮史的書籍則寥寥無聞，故著其書以知朝鮮史之梗概。<sup>14</sup> 另一方面，從《朝鮮史》的章節架構來看，也可看出與前近代通史之差異。如在《朝鮮史》第一卷的第一篇〈總說〉中，主要講述地理、人種、歷史沿革概略、政體等，<sup>15</sup> 可看出受到近代學術之影響，有別於一般傳統史學的著述方式。

那珂通世於 1893 年（明治 26）至 1897 年（明治 30）間，陸續發表〈高句麗古碑考〉、〈朝鮮古史考〉等論文。<sup>16</sup> 此時的那珂通世延續青年時期對於日本古代史的興趣，集中考察中國、日本、朝鮮三者的關係，並廣泛運用三方史料，進行論述，最後完成〈上世年紀考〉一文，<sup>17</sup> 其後的成果也陸續發表，就是上述的〈高句麗古碑考〉、〈朝鮮古史考〉等論文。那珂通世以史料比對考證的實證主義史學進行研究，有別於江戶漢學者的儒教揚善罰惡的史觀與明治初期的文明論史觀，<sup>18</sup> 可以說這樣的研究具有近代學術的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林泰輔、那珂通世的相關朝鮮史研究都不是以朝鮮史本身做為研究對象，而是考察日本、朝鮮、中國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sup>19</sup>

白鳥庫吉於 1894 年（明治 27）至 1896 年（明治 29）發表〈檀君考〉、

<sup>11</sup> 林泰輔，〈朝鮮文藝一斑〉，《東洋學會雜誌》1（6）、2（2）。

<sup>12</sup> 林泰輔，〈加羅の起源〉，《史學雜誌》2（25）。

<sup>13</sup> 林泰輔，《朝鮮史》（東京：吉川半七，1892）。

<sup>14</sup> 林泰輔，《朝鮮史》，頁 1-2。

<sup>15</sup> 林泰輔，《朝鮮史》，頁 1。

<sup>16</sup> 田中正美，〈那珂通世〉，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頁 6。

<sup>17</sup> 那珂通世此段的學術經歷可參考村上正二，〈小伝 那珂通世：草創期の東洋史学〉，《史學》60（2/3），頁 153；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9），頁 213-214。

<sup>18</sup> 村上正二，〈小伝 那珂通世：草創期の東洋史学〉，頁 153。

<sup>19</sup>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東京：青木書店，1976），頁 32。



〈朝鮮の古傳説考〉、〈朝鮮古代諸國名稱考〉、〈朝鮮古代地名考〉、〈朝鮮古代王號考〉、〈高句麗の名稱に就きての考〉等文章。〈檀君考〉主要考察檀君傳説，白鳥庫吉從佛經中論證檀君主要是佛教中的牛頭旃檀的故事為基礎所創出傳説人物，並在以《史記》、《魏書》等中國史料推測傳説形成時期約為佛教傳入高句麗時，約為 4 世紀至 6 世紀時，<sup>20</sup> 最後提出古傳説不等同史實，傳説只是顯示當時的思想之看法。<sup>21</sup> 〈朝鮮の古傳説考〉中，白鳥庫吉主要考察朝鮮所流傳的傳説，希望能從中得出在未有歷史記載時期的情況，此文延續〈檀君考〉的思路，從朝鮮地區中偉人誕生傳説為何均為卵生的問題切入，得出只有《三國志》中記載高句麗的傳説有別於其他以佛經為基礎所創之傳説，可視為真正的傳説。<sup>22</sup> 〈朝鮮古代諸國名稱考〉，白鳥庫吉利用梵語、巴利語等語言，考證朝鮮、雞林等名稱的來由，並延伸出考證語詞中的忽、夫里、伐、弗等均為城之義<sup>23</sup> 可以說是最早使用語言學來進行考證的文章。〈朝鮮古代地名考〉、〈朝鮮古代王號考〉同樣使用語言學的取徑，使用滿語、蒙古語、日本語、朝鮮語以及史料記載進行城名、河川名、王名號的考證。<sup>24</sup>

1897 年至 34 年（1901），白鳥庫吉陸續發表朝鮮史研究的論文，如〈『日本書紀』に見えた韓語の解釋〉、〈日本の古語と朝鮮語との比較〉、〈日本語と朝鮮語との比較に就きて福田芳之助君に答ふ〉、〈漢史に見えた朝鮮語〉、〈再び朝鮮の古語に就て〉。上述論文均是從語言學的取徑論述日本語與朝鮮語的關係。<sup>25</sup>

<sup>20</sup> 白鳥庫吉，〈檀君考〉，原收入《學習院輔仁會雜誌》28（1894），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二卷 朝鮮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4-7。

<sup>21</sup> 白鳥庫吉，〈檀君考〉，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二卷 朝鮮史研究》，頁 14。

<sup>22</sup> 白鳥庫吉，〈朝鮮の古傳説考〉，原收入《史學雜誌》5（12）（1894），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二卷 朝鮮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21。

<sup>23</sup> 白鳥庫吉，〈朝鮮古代諸國名稱考〉，原收入《史學雜誌》6（7/8）（1895），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二卷 朝鮮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25-36。

<sup>24</sup> 白鳥庫吉，〈朝鮮古代地名考〉，原收入《史學雜誌》6（10/11）、7（1）（1896）（1897），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二卷 朝鮮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7-68；白鳥庫吉，〈朝鮮古代王號考〉，原收入《史學雜誌》7（2）（1897），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二卷 朝鮮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69-80。

<sup>25</sup> 有關白鳥庫吉以語言學取徑撰寫的論文之分析，可參見三ッ井崇，〈白鳥庫吉の歴史認

值得注意的是白鳥庫吉如何習得語言學，根據五井直弘的研究，白鳥庫吉的語言學是來自德國學者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其著作中多有研究亞洲諸民族語言的關係。<sup>26</sup> 受到啟發的白鳥庫吉，也同時在外國語學校學習各種外語。<sup>27</sup>

從白鳥庫吉的著作目錄來看的話，朝鮮史研究可以說是白鳥庫吉研究的起點。<sup>28</sup> 其主要有以下幾點特色：1.以中國史料為基礎，比對朝鮮史料。2.明瞭朝鮮古傳說的來龍去脈。3.古傳說不等同史實，傳說只是顯示當時的思想之看法。4.在史料比對的基礎上，運用語言學的取徑與材料進行討論。<sup>29</sup> 對於古傳說、地名、王名的考證，以及語言學取徑的運用，都能在白鳥庫吉之後的塞外史、西域史研究看到，可以說白鳥庫吉在朝鮮史研究中建立了其方法論的基礎。<sup>30</sup>

值得注意的是，自 1897 年至 1901 年間所發表的論文，逐漸顯露出白鳥庫吉從語言學的角度，認為日本語與朝鮮語雖均為烏拉爾·阿爾泰語系，但兩種語言間仍有不小差異。<sup>31</sup> 這樣的說法可以說初步反對了早先國學者提出的日鮮同祖論的說法。從上所述，那珂、白鳥主要以中國的古典材料著手，指出日本古典材料記載的錯誤，藉此論證「日鮮同祖論」不成立。<sup>32</sup>

---

識形成における言語論の位相—朝鮮語系統論と朝鮮史認識をめぐる言説から—》，《史潮》48（2000年11月），頁68-88。

<sup>26</sup> Hartmut Walravens,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His Life and Work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Japan”, *Japonica Humboldtiana* 10 (2006), pp177-191.

<sup>27</sup>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46-47。

<sup>28</sup> 白鳥庫吉，〈朝鮮古代地名考〉，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542。

<sup>29</sup>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44。

<sup>30</sup>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45。

<sup>31</sup> 白鳥庫吉，〈韓史概説〉，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九卷 アジア史論下》（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290。

<sup>32</sup>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32-33。

## 二、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設立與成果

1901年春，白鳥庫吉前往德國、法國、匈牙利等地留學，直至1903年（明治36）歸國。歸國後的白鳥庫吉在東京大學兼課。<sup>33</sup> 1905年（明治38），隨著自歐洲留學歸來與日露戰爭的勝利，<sup>34</sup> 白鳥庫吉因為受到歐洲各地對於學術推廣的不遺餘力，<sup>35</sup> 對於將日本的東洋史研究推廣到世界有更積極的動力，其構想就是設置推廣東洋史研究的組織，將學者聚集形成更大的研究力量。<sup>36</sup> 之後馬上便與鳥居龍藏等人，共約70至80名學者成立亞細亞學會，但因經營困難，後來與東洋協會合併，成立東洋協會（後來為東洋學術協會，最後由東洋文庫管理，其刊物《東洋學報》為日本東洋學的重要刊物）。<sup>37</sup>

有了經營學會的經驗後，白鳥庫吉發現研究組織不能沒有經費的挹注，並在與文部省次官澤柳政太郎進行討論，澤柳則表示願意將成立研究組織的想法告知剛接任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並安排兩者會面商談。<sup>38</sup> 白鳥庫吉與後藤新平商談後，後藤新平同意在滿鐵內設置調查部，但達成協議的兩人卻各有不同的目的，後藤新平認為設立調查部是在滿鐵經營上有實際必要性，白鳥庫吉則認為是設立調查部在純粹的學術上有其重要性。<sup>39</sup>

1908年（明治41），白鳥庫吉在後藤新平的支持下，於南滿洲鐵道會社設置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白鳥庫吉擔任主任，其下則有箭內互、松井等、稻葉岩吉、瀨野馬熊等4人為部員，<sup>40</sup> 之後再加入津田左右吉、池內宏兩位，至此整個調查部共有7人，研究對象就是滿洲與朝鮮的歷史。<sup>41</sup>

<sup>33</sup> 松村潤，〈白鳥庫吉〉，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頁43-44。

<sup>34</sup> 日露戰爭的結果，日本拿到南滿洲，俄國則保有北滿洲的權利。

<sup>35</sup> 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386。

<sup>36</sup> 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頁387。

<sup>37</sup>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67-68。

<sup>38</sup> 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頁387。

<sup>39</sup> 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1986），頁56。

<sup>40</sup> 寺內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寺內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等著《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そのまなざしが残したもの》（東京：刀水書房，2004），頁30。

<sup>41</sup> 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頁387。

研究工作展開後，首先必須選擇研究課題，白鳥庫吉認為地理是歷史的基礎，其次考慮的是古代的史料較少，不易研究，故選擇相對近的時代進行研究。<sup>42</sup> 第一冊是稻葉岩吉負責漢代、箭內互負責漢魏南北朝時代、松井等負責隋唐時代，<sup>43</sup> 並於 1913 年（大正 2）出版。同年也出版二冊《朝鮮歷史地理》，隔年則出版池內宏的《文祿慶長の役》。松井等負責遼金時代、箭內互負責元明時代、稻葉岩吉負責明清時代，其成果主要收在第二冊。<sup>44</sup> 1915 年（大正 4），由於當時後藤新平已退任，新任總裁認為調查部的任務已告一段落，遂廢止調查部。調查部則轉移到東京帝國大學持續研究工作，而滿鐵仍持續資助，自 1915 年至 1941 年（昭和 16）間，陸續出版十六冊《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sup>45</sup>

檢視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所出版的著作，可以說是達成了當初白鳥庫吉希望集結學者耕耘滿洲、朝鮮史，並提出可向世界學術界報告的業績。這可以說主要有兩點貢獻，其一，研究資料的發現與收集，除了國內的圖書館相關資料外，<sup>46</sup> 也利用內藤湖南在奉天文溯閣發現的圖書史料，其中有玉牒、清朝實錄、滿文老檔、滿洲實錄、蒙古源流、官文書、《五體清文鑑》、各種方志等，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sup>47</sup> 其二，自歷史地理、疆域、交通路線、民族史、民族關係等研究課題來看，<sup>48</sup> 體現日本學者精密的實證研究。<sup>49</sup>

同樣在 1913 年，白鳥庫吉開始在東京帝國大學授課，首先開授滿韓上代史，池內宏則開授李朝史與滿韓史（高麗時代），直到 1921 年（大正 10），

<sup>42</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輯，《滿洲歷史地理》（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13），頁 6。

<sup>43</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輯，《滿洲歷史地理》，頁 6。

<sup>44</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輯，《滿洲歷史地理》，頁 6；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頁 387。

<sup>45</sup> 寺內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寺內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等著《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そのまなざしが残したもの》，頁 30。

<sup>46</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輯，《滿洲歷史地理》，頁 8。

<sup>47</sup> 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頁 63-68。

<sup>48</sup> 《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目錄，可參考桜沢亜伊，〈「滿鮮史觀」の再検討—「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と稻葉岩吉を中心として〉，《現代社會文化研究》39（2007 年 7 月），頁 24-26。

<sup>49</sup> 寺內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寺內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等著《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そのまなざしが残したもの》，頁 30。

池內宏開授滿鮮史，至此「滿鮮史」做為課程名稱，第一次出現在大學中。<sup>50</sup>再從白鳥庫吉至 1921 年前的發表文章來看，此時白鳥庫吉雖屢屢使用滿韓、滿鮮等詞彙，也積極地為日本殖民地經營提供協助，滿韓、滿鮮等詞彙只是滿洲、韓國或滿洲、朝鮮兩地的省略詞。<sup>51</sup>但從白鳥庫吉的視野來看，從古代世界中的西伯利亞東南、滿洲、朝鮮半島三地，均是歷史研究中通古斯系諸民族活動的範圍，可以說是以一個廣域的歷史文化圈來設定滿鮮的。<sup>52</sup>

### 三、稻葉岩吉的滿鮮史

稻葉岩吉早年師事內藤湖南，1900 年（明治 33）獲得陸羯南推薦前往中國留學，1904 年（明治 37），志願前往陸軍服務。1908 年（明治 41），成為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成員，1915 年調查部廢止後，陸續在陸軍大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參謀本部任教。1922 年（大正 11），經由內藤湖南推薦，前往朝鮮，擔任朝鮮史編纂委員會的委員，進行朝鮮史修纂。<sup>53</sup>其學問的風格，可以說是不單只是純粹的做學問，而是受到當代中國問題的刺激，因應時代的要求。<sup>54</sup>

1922 年，稻葉岩吉發表〈滿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提出滿鮮的共通性。1.民族的觀點，稻葉認為高句麗、百濟都是活躍於古代中國東北地方的夫余族所移住建國的國家，而新羅則是漢人移住建國的國家，高麗也不過是新羅的延長，朝鮮的太祖李成桂也是漢人，所以在民族上是不可分的。<sup>55</sup> 2.政治的觀點，稻葉認為自春秋戰國的燕國開始，就已確認滿鮮實為一體，到漢朝支配時期也是相同，所以不該把鴨綠江、豆滿江視為國界。<sup>56</sup> 3.經濟的觀點，稻葉

<sup>50</sup> 相關開授課程表，可參考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頁 34。

<sup>51</sup> 桜沢亞伊，〈「滿鮮史觀」の再検討—「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と稻葉岩吉を中心として〉，《現代社會文化研究》39，頁 27。

<sup>52</sup>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頁 14。

<sup>53</sup> 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頁 82-83。

<sup>54</sup> 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頁 83。

<sup>55</sup> 稻葉岩吉，〈滿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原收入《東洋》25（5）（1922），後收入氏著《支那社會史研究》（東京：大鐙閣，1922），頁 303-307。

<sup>56</sup> 稻葉岩吉，〈滿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收入氏著《支那社會史研究》，頁 307-309。

認為朝鮮人與滿洲的女真人都因為採收人參及尋找耕種地的需要，頻繁跨越鴨綠江、豆滿江進行遷徙。<sup>57</sup>此篇文章可以說是稻葉岩吉奠定滿鮮史架構的論文，相當重要。



---

<sup>57</sup> 稻葉岩吉，〈滿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收入氏著《支那社會史研究》，頁 309。

## 第二節 塞外史—民族分類、語文研究、原典譯註

本節主要分成兩部分進行論述，首先先論述明治 30 年代開始的塞外史研究，以白鳥庫吉、那珂通世為主軸，論述其塞外史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課題。其次，論述白鳥庫吉建立塞外民族分類體系。

### 一、塞外民族的分類與語文研究

塞外史做為一個研究領域，可以是在明治後期由白鳥庫吉開始進行研究後才出現的。而塞外此詞，可以說是以中國史籍的立場來看，論述周邊異民族的詞彙。白鳥庫吉在〈塞外民族・序說〉中提到：

所謂塞外民族，是做為南邊勢力的漢民族所稱的外夷，其中以東夷、西戎、北狄為主，欲對其進行了解。並想將此總括，稱其為北方民族。<sup>58</sup>

從上述可知，這裡的塞外民族是包括中國史料中敘述的東夷、西戎、北狄等外夷的北方民族。

明治 30 年代開始，白鳥庫吉開始選擇亞洲北部的戎狄進行論文撰寫，可以說東洋學中最早進行遊牧民族研究的開創者。1897 年 8 月，白鳥庫吉發表〈匈奴は如何なる種族に屬するか〉，利用語言學，比對史料中的詞彙，認為匈奴與土耳其是相同的種類。<sup>59</sup> 同年 11 月，白鳥庫吉發表〈突厥闕特勤碑銘考〉，由於當時學界對於突厥語的研究尚屬於起步階段，故此文首先介紹碑的現況，並以史料為基礎，廣泛參考俄國、德國等的研究成果，考察碑銘中的漢文部份。<sup>60</sup> 此篇論文也在二年後，以德文形式在在羅馬進行發表。1899

<sup>58</sup> 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486。

<sup>59</sup> 白鳥庫吉，〈匈奴は如何なる種族に屬するか〉，原收入《史學雜誌》8（8）（1897），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1-2。

<sup>60</sup> 白鳥庫吉，〈突厥闕特勤碑銘考〉，原收入《史學雜誌》8（11）（1897），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23-44。

年 1 月，白鳥庫吉發表〈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此文開宗明義闡述研究古代文字對東洋歷史的重要性，並提出創造文字對古代國家的獨立與強盛的作用，<sup>61</sup> 以此切入論述契丹、女真、西夏創造文字的沿革，以及三種文字的關係。

1900 年 4 月，白鳥庫吉發表〈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將月氏、匈奴、東胡、鮮卑、烏丸等民族，論證這些民族の種類，大體將其分為土耳其種、蒙古種、通古斯種。<sup>62</sup> 值得注意的是，白鳥庫吉開始注意到遊牧民與農耕民的敵對狀態：

中國由漢室統一，匈奴與漢室成為兩相並立的敵對之國。雖至清朝為止，中國與北狄皆有盛衰，但兩人種敵對的關係是沒有變化的。中國至今也有四、五千年之歷史，其間中國不斷變遷發展，直接或間接的給予影響的勢力就是北狄。<sup>63</sup>

此段初步論述兩個不同人種的衝突與發展，可以說是目前最早提到遊牧民與農耕民對立發展的論述。

1901 年 1 月，白鳥庫吉發表〈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首先提出亞洲北部戎狄的研究尚待開發，戎狄與漢民族在民族性上的差異，可以說是進一步將拓展戎狄與漢民族的比較觀。<sup>64</sup>

1901 年，白鳥庫吉受到文部省的補助，前往歐洲諸國留學，第一站為德國柏林，除了向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學習地理學、地質學外，也向東方語言學家 Wilhelm Grube (1855-1908) 學習亞洲各民族的語言，

---

<sup>61</sup> 白鳥庫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原收入《史學雜誌》10 (2) (1899)，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下》(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45-47。

<sup>62</sup> 白鳥庫吉，〈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原收入《史學雜誌》11 (4) (1900)，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9-21。

<sup>63</sup> 白鳥庫吉，〈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 9-10。

<sup>64</sup> 白鳥庫吉，〈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原收入《東洋哲學》8 (1) (1901)，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15。



更在語言學校學習土耳其語，<sup>65</sup> 讓白鳥庫吉對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諸民族的語言與歷史有極大助益。<sup>66</sup> 第二站前往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繼續學習土耳其語，並同時學習匈牙利語及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諸民族的相關研究。第三站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堡。1902年參加德國在漢堡所主辦的第13屆世界東方學者大會，1903年回到日本。<sup>67</sup>

有關白鳥庫吉在留學後，曾發表一篇〈西洋に於ける東洋學者の近況一斑〉，介紹歐洲各國的東洋學研究概況。<sup>68</sup> 1907年，白鳥庫吉發表〈蒙古民族の起原〉，此文首先介紹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 與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 對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諸民族的分類：

通古斯種：東胡、烏丸、鮮卑、拓跋、慕容、蠕蠕、契丹、奚、室韋、  
肅慎、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滿洲  
突厥種：匈奴、羯、丁令、高車、堅昆、黠戛斯、突厥、鐵勒、回紇  
蒙古種：韃靼、蒙兀<sup>69</sup>

白鳥庫吉認為此分類的問題在於屬於蒙古種的民族太少，如此的話，蒙古民族是在13世紀突然出現的嗎？接著考察匈奴民族的種類，最後提出翻案，推翻先前認為匈奴為土耳其種的看法，認為匈奴為蒙古種，並提出亞洲東北為

<sup>65</sup> 石田幹之助，〈白鳥庫吉先生小傳〉，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521。

<sup>66</sup> 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收入氏著《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四卷 自敘傳他》（東京：岩波書店，1965），頁132。

<sup>67</sup> 石田幹之助，〈白鳥庫吉先生小傳〉，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頁522-523。

<sup>68</sup> 文中介紹法國、德國、匈牙利重要的東洋學者，包括 Henri Cordier (1849-1925)、Friedrich Hirth (1845-1927)、Wilhelm Grube (1855-1908)、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Ármin Vámbéry (1832-1913)、Vilhelm Ludvig Peter Thomsen (1842-1927)、Vasily Radlov (1837-1918) 等人。參見白鳥庫吉，〈西洋に於ける東洋學者の近況一斑〉，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59-64。

<sup>69</sup> 白鳥庫吉，〈蒙古民族の起原〉，原收入《史學雜誌》18 (2/3/4/5) (1907)，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26-27。

通古斯種、北部為蒙古種、西北部為土耳其種的分類。<sup>70</sup> 值得注意的是，留學前後的白鳥庫吉在論述的呈現與研究方法的運用有何差別呢？首先是因為留學的經歷，得以接觸更多在相關領域的學者，能夠廣徵博引。第二是學習到更多的民族語言知識，能夠做出更詳盡的比較，如在單于一詞的比對上，在〈匈奴は如何なる種族に屬するか〉中論述時僅用古漢語、土耳其語、吉爾吉斯語與史料進行比對，得出匈奴為土耳其種的結論。在〈蒙古民族の起原〉中，白鳥庫吉延伸在〈匈奴は如何なる種族に屬するか〉中的推論，增加察合台語、滿洲語、蒙古語等民族語言的比對外，也徵引歐洲學者的相關著作進行討論，最後得出匈奴人主體為蒙古種的結論，推翻前論中匈奴人為土耳其種的看法。<sup>71</sup>

1910年至1912年（大正元），白鳥庫吉處理東胡及其苗裔（烏丸、鮮卑等族）的民族分類，陸續發表於《史學雜誌》，後彙整起來名為《東胡民族考》一書。文中如同〈蒙古民族の起原〉，以 Klaproth 與 Rémusat 以語言為標準，對於亞洲民族所做的分類為主，這兩位學者認為通古斯等於東胡，對於通古斯種的部分進行探討。<sup>72</sup> 白鳥庫吉以此開始進行批判，將烏丸、鮮卑、慕容、吐谷渾、禿髮、宇文、羯、拓跋、蠕蠕、奚、契丹等民族進行分類。<sup>73</sup> 其方法同樣廣泛蒐集史料，再利用多種語言進行考證，獲得東胡民族為蒙古種與通古斯種的混合民族。

1911年，白鳥庫吉撰文考證肅慎的民族種類。1919年（大正8）則撰寫長文〈室韋考〉考證室韋的民族種類。1935年（昭和10），白鳥庫吉發表〈塞外民族〉的長文，體系性的建構出塞外民族的分類，烏拉爾·阿爾泰語族下可分為通古斯種、蒙古種、突厥種（當時寫法為土耳其種），另外也有通古斯種與蒙古種混合的東胡民族。<sup>74</sup>

<sup>70</sup> 白鳥庫吉，〈蒙古民族の起原〉，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 23-61。

<sup>71</sup> 白鳥庫吉，〈蒙古民族の起原〉，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 64-65。

<sup>72</sup>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原收入《史學雜誌》18（2/3/4/5）（1907），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7-39。

<sup>73</sup>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 63。

<sup>74</sup> 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 488-490。

從 1897 年到 1935 年間，白鳥庫吉幾乎是獨自完成對於塞外民族的研究，在批判繼承歐洲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利用史料解讀與批判、比較語言學這兩套研究方法，大部分是使用比較語言學。問題是白鳥庫吉投入如此精力，建立阿爾泰語族的系譜，其目的為何？日本學界中曾經為白鳥庫吉立傳的學者，如津田左右吉、石田幹之助等人，對於此問題均是點到為止，只有提到此時期白鳥庫吉的研究特色是發展塞北民族的民族系統，但未提出解釋。美國學者 Stefan Tanaka 在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一書中，對此問題有其解釋：「在明治晚期，他發現在烏拉爾·阿爾泰中，資料能夠讓自己建構一套歷史哲學，……。在白鳥庫吉對於歐洲學者所建構的烏拉爾·阿爾泰的分類系統的批判中，可以發現第一步是恢復蒙古民族的應有地位。……藉由重新歸類匈奴、東胡、蠕蠕與其他民族為蒙古民族的系統，白鳥庫吉創造一個系譜以提升蒙古民族在歐亞大陸歷史中的地位。」<sup>75</sup> Stefan Tanaka 的看法就是藉由重建烏拉爾·阿爾泰民族的系統，獲得學術的話語權，提升蒙古民族的歷史地位。Stefan Tanaka 更認為：「白鳥庫吉進一步提出歐洲與遠東的根源不在歐洲，而在亞洲；而許多進入甚至定居歐洲的蠻族，不是歐洲東洋學者所宣稱的印度—日耳曼部落，而是來自亞洲。」<sup>76</sup>

Stefan Tanaka 將白鳥庫吉所進行塞外史研究的意義從古代拉到了當代，考察其研究的企圖，認為白鳥庫吉企圖重新建立一個烏拉爾·阿爾泰民族的系統，藉此提升蒙古民族的地位，並讓亞洲重新站在與歐洲相同的地位上。

我們則可以從明治後期東洋史創立的角度來思考。明治時代前期的史學界中有兩大潮流，一是從吸收清國考證學所衍生的考證史學，後來又受到德國蘭克史學影響，成為學院史學，代表人物為重野安繹等人。另一是以翻譯的途徑進入日本的文明史學，以史論為主，又稱為啟蒙史學，相關著作影響了福澤諭吉、那珂通世所著的《文明論之概略》、《支那通史》，也給了當時在讀大學的白鳥庫吉深刻的影響。<sup>77</sup>

1894 年那珂通世在制定東洋史的基本教授方針認為：「支那歷史僅以歷

---

<sup>75</sup>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88-89.

<sup>76</sup>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p89.

<sup>77</sup> 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收入氏著《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四卷 自敘傳他》，頁 115。

史興亡為主，而未能涉及人種之盛衰消長。東洋歷史中則不僅要論述東洋諸國之興亡，也需討論支那種、突厥種、女真種、蒙古種等的盛衰消長。」<sup>78</sup> 而上述 William Swinton 的《萬國史要》對於白鳥庫吉的影響最為深刻，《萬國史要》中寫到：「歷史記述著名的文明與國民之事蹟，然能夠創造歷史的人種只有一個，就是高加索種，也就是白色人種。」<sup>79</sup> 1906 年，為高桑駒吉所著《參考東洋大歷史》做序時提到：「如同當時我國學校間受到喜愛的 Swinton 所著《萬國史要》，書中斷言無高加索人種，便無真正之歷史。不得不說已經誤導國人的思考。」<sup>80</sup> 這種欲將提振東洋史研究的想法，或可說是白鳥庫吉研究塞外民族，並提出民族系統的動力之一。<sup>81</sup>

之後，一方面接受德國蘭克學派的訓練，也受上述文明史學的影響，但主要是以蘭克學派對於史料批判考證的部份為重。<sup>82</sup> 另一方面也開始主動對於歐洲東洋學中的民族語言進行學習。在前往歐洲留學後，更是有系統的在比較語言學領域學習，能夠更加熟練的利用民族語言進行民族分類的研究。

自此來看，與 Stefan Tanaka 的看法應是可以相連接，白鳥庫吉企圖重新以嚴密的史料批判考證、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重新建構烏拉爾·阿爾泰民族的系統，讓東洋史不只是歐洲學者眼中附屬於歐洲的東洋史，更是有亞洲主體性的東洋史。

## 二、原典史料的考證與譯註

1907 年，那珂通世出版《成吉思汗實錄》，為其晚年的精力所聚。那珂通世與白鳥庫吉相同，均從三宅米吉處得知如要研究蒙古史，必須學習漢文以外的亞洲諸語言，但當然日本尚未有相關師資，那珂通世遂從三宅米吉處

<sup>78</sup> 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收入故那珂博士功績紀念會編《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5），頁 11。

<sup>79</sup> 維廉·斯因頓（ウィリアム・スウィントン）著、松島剛譯，《萬國史要》（上卷）（東京：松島剛，1887），頁 2-3。

<sup>80</sup> 白鳥庫吉，〈「參考東洋大歷史」序〉，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445。

<sup>81</sup> 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43。

<sup>82</sup> 小沢榮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 明治編》，頁 136。

借閱滿洲語辭典自學，<sup>83</sup> 後再自學蒙古語、俄語等語言。另一方面，那珂通世藉由內藤湖南的介紹，認識當時清國的文廷式，得知需多蒙古史的文獻資訊，其中文廷式更有《蒙文元朝秘史》。<sup>84</sup> 但因兩國戰事頻仍，直到 1902 年（明治 35）那珂通世才拿到文廷式所藏《蒙文元朝秘史》的寫本，那珂通世便開始進行翻譯，此時已 52 歲。<sup>85</sup> 那珂通世在進行翻譯時，感到日本所蒐集元代史料的缺乏，就委託陳毅寄送《皇元聖武親征錄》、《双溪醉飲集》、《元儒攷略》、《元祕史李注補》、《黑韃事略》等書。<sup>86</sup> 此著作的重要性在於兩點：1.《元朝秘史》當時已無蒙文版本，是由漢字書寫，並以漢字標示出蒙古音。那珂通世是世界第一位翻譯的學者。<sup>87</sup> 2.此著作的歷史文獻考證，成為以後研究者的典範。<sup>88</sup> 另一方面也可看到，那珂通世、內藤湖南等人與清國的學者文廷式、陳毅等人有密切聯繫，因此能獲得不少珍貴材料；反之，白鳥庫吉則較少與清國學人交往。

<sup>83</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225。

<sup>84</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227。

<sup>85</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228-229。

<sup>86</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229。

<sup>87</sup> 中見立夫，〈「元朝秘史」渡来のこ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開始とヨーロッパ東洋学、清朝「边疆史地学」との交差—〉，《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4，頁 17。

<sup>88</sup> 杉山正明，〈《世界史を変貌させたモンゴル：時代史のデッサン》〉（東京：角川書店，2000），頁 170。

### 第三節 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論」

本節主要探討北亞史的基礎「南北對抗論」的形成與發展。承接著前兩節，草創期東洋學的學者，那珂通世、白鳥庫吉、桑原鷺藏、內藤湖南等人，在開創朝鮮史、塞外史、支那史各領域的研究時，對於整體東洋的發展如何進行總結與把握。

#### 一、東洋史教科書中的基礎設定

有關東洋史概說書的出現，可以 1894 年為一斷限，此前雖已有以東洋為題的書籍，<sup>89</sup> 但尚未定型，當時日本人理解外國歷史的主要來源，是以《支那通史》、《萬國史》（Universal History）為主，前者認識中國，後者認識西方。<sup>90</sup> 此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1888 年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1889 年市村瓊次郎、瀧川龜太郎合著的《支那史》、田口卯吉的《支那開化小史》等。<sup>91</sup> 那珂通世在教授支那通史課程時，屢屢接觸到北方的遊牧民族、中亞的綠洲諸國家、西藏、印度、東南亞等部份，加上受到當時西方研究東洋的刺激，認為瞭解上述部份的歷史與文化是相當必要的。<sup>92</sup>

如同在第一章第二節所論，1894 年後出版的相關東洋史書籍，認為瞭解北方的遊牧民族、中亞的綠洲諸國家、西藏、印度、東南亞等地域的歷史與文化是相當必要的。<sup>93</sup> 再從《中等東洋史》的設定可知，東洋史的主體是各個民族，其中突厥族、漢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在東洋史的發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sup>94</sup>

---

<sup>89</sup> 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93-194。

<sup>90</sup> 伊集院立，〈近代日本の世界史教科書における東洋史と世界史の叙述：歴史教育と歴史研究〉，《社會志林》56：1（2009 年 7 月），頁 27。

<sup>91</sup> 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69-174。

<sup>92</sup> 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95。

<sup>93</sup> 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95。

<sup>94</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收入《桑原鷺藏全集 第四卷》，頁 24。

## 二、南北對立論的形成與發展

白鳥庫吉在明治後期到大正年間投入龐大精力經營的塞外史研究、滿鮮史研究、西域史研究，對於整體東洋史的概念更加清晰。1900年4月，白鳥庫吉發表〈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將月氏、匈奴、東胡、鮮卑、烏丸等民族，論證這些民族の種類，大體將其分為土耳其種、蒙古種、通古斯種。<sup>95</sup> 值得注意的是，白鳥庫吉開始注意到遊牧民與農耕民的敵對狀態：

中國由漢室統一，匈奴與漢室成為兩相並立的敵對之國。雖至清朝為止，中國與北狄皆有盛衰，但兩人種敵對的關係是沒有變化的。中國至今也有四、五千年之歷史，其間中國不斷變遷發展，直接或間接的給予影響的勢力就是北狄。<sup>96</sup>

此段初步論述兩個不同民族的衝突與發展，可以說是目前最早提到遊牧民與農耕民對立發展的論述。

《白鳥庫吉全集》中收錄其著述的《東洋史》，這是1913年至1920年間擔任皇室教師時所作，後雖有出版計劃，最後仍未出版而收入《白鳥庫吉全集》，此書也是白鳥庫吉所著唯一的東洋史概說書。<sup>97</sup> 以此書與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來比較，觀察此時期的白鳥庫吉的東洋史概念。

首先，相較於桑原鷺藏將東洋史的地域分為五部份的做法，白鳥庫吉則將其分為南北兩地域，再延伸出其他地域。<sup>98</sup> 其二，民族分類，白鳥庫吉同樣先將亞洲人種分成黃色人種、白色人種兩類，但往下的分類則有差異。黃色人種分為漢民族、烏拉爾·阿爾泰民族，白色人種則分為亞利安

<sup>95</sup> 白鳥庫吉，〈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9-21。

<sup>96</sup> 白鳥庫吉，〈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9-10。

<sup>97</sup> 栗原益男，〈編輯後記〉，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頁594。

<sup>98</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頁233-234。

族、閃族。<sup>99</sup> 其三，在章節架構方面仍以中國歷史為主，加上些許印度歷史。整體而言，雖以加入民族的概念，但大體仍是以中國歷史為主。可見此時對於遊牧民與農耕民對立發展的概念雖已見端倪，但尚未明確成為完整的體系。

1926年（大正15），白鳥庫吉發表〈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提出東洋史發展的動力為北方勢力與南方勢力相互鬥爭的觀點。白鳥庫吉在文中開頭提到：「今日所謂貫穿東洋史的大勢，其根本就是我們近年所提倡南北兩大勢力對立的事實。大體上意即以漢民族為代表的南方勢力，與以北狄為名概稱的北方勢力，兩勢力的一興一廢、一張一弛，還有以此為中心發展的附屬勢力的離合與集散，成為東洋史發展的樞軸。直到近代，如英人做為南方勢力而出現，俄人做為北方勢力而活躍，也依然為此一形勢的存續，遠東歷史以此兩因素之對立為基礎發展就是我們的主張。」<sup>100</sup>

上述部份做為總綱，首先就明確提出南北對立的概念，接著論述以此為基礎發展的東洋史態勢。文中提到南北勢力發展的常態為一方強盛後，另一方則因受刺激也隨之強盛，呈現對抗的態勢；而發展的變態則是一方分裂離散衰弱後，另一方隨之擴張勢力。另一方面南北兩勢力之外的中亞與朝鮮半島部份，在兩勢力均勢對抗時，則獲得發展之契機，但如一方獨大時，只能臣服。<sup>101</sup> 白鳥庫吉在文中特地將北方勢力優勢的時期劃分為三期：五胡十六國時期、遼金元時期、清時期。<sup>102</sup>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在論述突厥等部落西遷所導致的十字軍遠征等現象，更加深從亞洲民族影響歐洲歷史的論述。其次，論述到有關歐人東漸的現象時，白鳥庫吉認為英俄兩國雖非亞洲民族，其互動爭雄之事仍可視為南北對抗的歷史。<sup>103</sup>

---

<sup>99</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頁234-235。

<sup>100</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69。

<sup>101</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69-70。

<sup>102</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80-82。

<sup>103</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82-84。



## 第四節 文明的十字路口—從西域史轉為東西交涉史

接續著滿鮮史、塞北史的相繼發展，同時期的白鳥庫吉、桑原鷺藏、藤田豐八等人也發展西域史的研究。本節首先論述西域史研究的發展，先以歷史地理考證為基礎，奠定扎實的學術基礎後，再廣泛吸收歐美的研究成果，建立起西域史的體系。其二，在理解西域史的特色是絲路後，發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東西交涉史。

### 一、西域史的成立、發展、體系

最初的西域史研究，可分成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為清朝發展的「西北史地之學」，第二條則是歐洲學者漢學研究的其中一部份。<sup>104</sup> 日本的西域史研究是向歐洲漢學研究學習，吸收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學習多國語言，如法、德等當時漢學研究興盛的國家的語言；另外也學習各種古代語言，如突厥語、粟特語等，使用語言學方法進行比較研究。此外，日本學者也擁有閱讀漢文史料的能力，故能在十九世紀初期開始，走出有別於中國對於西域歷史地理考證的侷限。此時重要的研究者有白鳥庫吉、藤田豐八、桑原鷺藏、羽田亨等人。

自明治後期白鳥庫吉首次發展有關西域的研究論文開始至羽田亨所著《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出版的這段約 40 年的時間，可以說是日本東洋史將西域史從無到成立體系的發展過程。以下就 40 年間所發表的重要論文與專著為材料，瞭解其發展過程。

#### （一）白鳥庫吉

日本的西域史研究自白鳥庫吉（1865-1942）開始，<sup>105</sup> 1900-1901 年陸續

<sup>104</sup> 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第三章〈域外漢學與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20。

<sup>105</sup> 石田幹之助，〈我國における西域史の研究〉，收入氏著，《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頁 304-305；岡崎精郎，〈〈批評・紹介〉西域史研究(上・下卷) 白鳥庫吉著〉，《東洋史

發表〈烏孫に就いての考〉，此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在提出西域史中數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其後的研究者所發表的論文均不離此篇的討論。首先此篇論文提到有釐清歷史上的民族的重要性：「研讀中國歷史並加以研究之時，讓人感到困難與遺憾的就是來歷與本質都不明的民族屢屢出現。……東洋歷史中，特別是中國歷史的研究因為仍然很幼稚，學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仍不多，民族種類的研究是其中最需先進行研究的題目。」<sup>106</sup> 雖說本篇在開頭時就提到民族研究的重要性，但在篇幅上只佔約五分之一，其餘則是討論烏孫所在之位置、勢力範圍等主題，有關烏孫的討論也因史料的稀少，所以有時也必須藉由探討周邊國家的位置等（如康居、大月氏），來旁證烏孫的位置。

分析此篇論文的研究方法，可以分成下列幾種：一、使用漢文史料、語言學等進行歷史地理考證。如白鳥庫吉在論證《史記·張騫傳》中對於烏孫、大月氏坐落於敦煌、祁連山的記載時，首先對祁連山進行考證，白鳥庫吉認為漢代的祁連山有兩說，一說為今祁連山中的南山山脈，另一說認為祁連就是匈奴語「天」之義，所以就是今日的天山。但考察史料中天山與祁連山都是分開書寫，無混用的案例。<sup>107</sup> 跟據不同史料的記載，可得知漢時代的天山指涉的是今天山山脈東部的某山，其後天山指涉的山體逐漸往西移，最後成為蔥嶺以東一帶山脈的總稱，具體指涉今日的 *Karluk Tag*（雪山）。<sup>108</sup>

顏師古漢書註將祁連山等同於天山的錯誤，章懷太子承襲其錯，將天山與祁連山混一而談，指出漢時代祁連山則是位於甘肅省內的高山。討論祈連的語源：Turk 語的 *kükler*（天），*Čagatai* 語的 *kar*（雪），*Osman turk* 語的 *kar* 或 *kiran*（雪），其中應為 *kiran* 為祈連之對音，所以祁連山應為雪山。焉支則是 *abechi*（妻）知對譯，非白粉之意。批判 *Deguignes*（德經）《匈奴史》中的祁連山、天山考證，因 *Deguignes* 其說影響歐洲學界，均認為天山古名為

---

研究》9（3）（1945），頁190。

<sup>106</sup>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原收入《史學雜誌》11（11）（1900）、12（1）、12（2）（1901），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六卷 西域史研究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1。

<sup>107</sup>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六卷 西域史研究上》，頁2-3。

<sup>108</sup>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六卷 西域史研究上》，頁3-5。

Kilien、Kiloman。祁連山在後來又名時羅漫，Turk 語的 Sara（白、清），馬札爾語的 menny（天），意為白天山、清天山。Turk 語的 ak（白）、tag（山），對譯為阿羯田，為隋《西域圖經》的阿羯田山。所以可得出烏孫與大月氏所居之地是在今燉煌與甘肅省西部之間的結論。<sup>109</sup>

二、利用歐洲學者的實地考察遊記與專著進行歷史地理考證。白鳥庫吉在推測大月氏與烏孫的具體與相對位置，因烏孫無材料，大月氏則有，故先考證大月氏，再間接推論烏孫位置，Richthofen 的 *China* 一書認為：大月氏與吐火羅實為同族，大月氏一部份先居於今肅州與敦煌間，其國疆域之西甚廣而不明。根據玄奘所說，吐火羅原居於塔里木盆地南，特別在和闐與羅布泊間，至玄奘時已將遷走，Vivian de St. Martin 與 Klaproth 看法相同，認為大月氏為西藏種。後小月氏退走西南，並有說西藏語的記載，又於和闐以東至 Tsaidam 間有稱為婁羌的西藏種民族居此，西藏種在此時於塔里木盆地南至玉門關蔓延，其最西的支族是吐火羅，而吐火羅移至 Oxus 河與大月氏的轉移應是相同之事。根據《隋書·西域傳》，推論大月氏世居於甘肅省東部進行遊牧，故推論烏孫在大月氏西，由敦煌治肅州的地區，即 Tang 河與 Bulungir 河流域居住。<sup>110</sup>

三、以比較語言、分析神話與傳說討論民族分類。白鳥庫吉首先對於歐洲學者對於烏孫民族的歸類做整理。Klaproth、Rémusat 認為烏孫為印度日耳曼種。Aristov 認為是突厥種。Grjimalio 認為是白晝種。使用語言來進行判別，因為語言可以判定民族的種類。先論大月氏之民族分類，Klaproth 認為先西藏種、後印度日耳曼種，白鳥庫吉認為突厥種。白鳥庫吉認為烏孫的民族分類則與突厥諸族中的 Kirgiz 有較深的關係。<sup>111</sup>

從上述看來，首先白鳥庫吉廣泛的使用漢文史料來進行比對與考證，並使用突厥語、察合台語、鄂圖曼土耳其語、馬札爾語等語言進行比對。以此比較歐洲的治學方法，歐洲學者多不能直接使用漢文史料，需經由翻譯才能

<sup>109</sup>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六卷 西域史研究上》，頁 7-16。

<sup>110</sup>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六卷 西域史研究上》，頁 16-21。

<sup>111</sup>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六卷 西域史研究上》，頁 44-53。

使用，多少造成理解上的阻礙，比較中國的治學方法，無法使用科學的方法來進行邏輯論述，如使用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除此之外，白鳥庫吉也與歐洲學者進行對話，針對其著作進行批判。<sup>112</sup> 其次，對於烏孫的民族分類則是以語言的分析為方法，認為藉由語言就可以判斷民族的種類。第三，論文中對於烏孫與大月氏的遷徙年代、康居與康國的差異、大宛國桂山城的位置等，不只成為之後白鳥庫吉的研究主題，也是後繼研究者的重要研究領域。

1901 至 1903 年，白鳥庫吉自歐洲留學，回國後陸續發表西域史研究的論文，首先是 1904 年發表於《史學雜誌》的〈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sup>113</sup> 在此篇論文中，白鳥庫吉首先對於歐洲學者對於大秦、拂菻的歷史研究概況進行敘述，並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 Friedrich Hirth（1845-1927）設定為論文對話的主要對象。

此外，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先進行史料的成書時間、性質後，再進行史料批判，發表本身見解，最後與以 Hirth 為主的歐洲學者進行論辯。所以這篇論文可說是充份表現出日本學者在研究上擁有與歐洲學界對話的實力。<sup>114</sup> 自此篇論文後，白鳥庫吉陸續發表相關論文，如發表於《東洋學報》的〈西域史上の新研究〉，<sup>115</sup> 在論文開頭先論述西域史研究的狀況，白鳥庫吉提出兩點：「一、中國方面之史料雖珍貴，但由於其瑣碎、錯誤甚多，所以尚需考證才能正確的了解西域歷史。二、近百年來，歐米學者從事東洋研究成績顯著，實是因為其修習亞洲各國之語言文字，不僅通曉史籍紀錄，更從事遺跡挖掘，得以發現新事實。」<sup>116</sup>

從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發現，白鳥庫吉對於將日本東洋史研究提升到可以與當時歐洲學者對話的程度，這也顯示出極高的競爭心理。白鳥庫吉的論文之所以能在當時引起回響，也是因為其不只具有語言學、民族學等相關知識，

---

<sup>112</sup>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 58。

<sup>113</sup> 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原載《史學雜誌》15（4、5、8、10、11）（1904），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七卷 西域史研究下》（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125-204。

<sup>114</sup> 石田幹之助，〈我國における西域史の研究〉，收入氏著，《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頁 306。

<sup>115</sup>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東洋學報》1（3）（1911），頁 307-349。

<sup>116</sup>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東洋學報》1（3）（1911），頁 307-308。

更在以中國史料為主的史料比對、批判，有精密的考證，才能讓西域史研究成為有近代科學性的實證學問。

1915年，桑原鷺藏發表〈張騫の遠征〉，此篇論文原為演講，後修訂發表，首先同意白鳥庫吉對於匈奴、烏孫的民族分類，從史料為主，語言比較為輔進行論述，接著對白鳥庫吉對月氏西遷年代問題的考證提供史料的補充。〈大宛の貴山城に就いて〉，1916年，藤田豐八<sup>117</sup>發表〈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

## （二）藤田豐八

藤田豐八（1869-1929）早期的重要論著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伝箋釈》一書，<sup>118</sup>，此著作是藤田豐八與羅振玉、王國維共事時，受到羅、王兩人對於當時敦煌、新疆出土古文書的啟發，對新出土的〈往五天竺國傳〉殘卷進行考釋，<sup>119</sup>可以說是最早對於漢文出土文書進行研究考釋的著作。藤田豐八有關西域、南海史的著作，在其逝世後，由池內宏進行編集，收入《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sup>120</sup>《東西交渉史の研究・南海篇》

<sup>117</sup> 藤田豐八（1869-1929），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漢文科畢業，為市村瓚次郎（1864-1947）的學生。1894年，在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之前身）、東洋哲學館（東洋大學之前身）任教，並創辦《江湖文學》、《東亞說林》等刊物。1897年至1912年間，則是待在中國，與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籌辦學社、刊物等。以1913年為基準，前期可以說研究與教學重心集中於中國文學史。重要的是，藤田豐八更頻繁的與當時的中國學人如王國維、羅振玉等人交流合作，促進了日清的學術交流。1913年之後，藤田豐八將研究重心逐漸轉移到南海史、西域史，具體而言，是關心東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交通路線、重要都（港）市等歷史地理研究，進而理解貿易、殖民、物產、人的活動，以及遊牧民族的汗號、王庭之位置等。重要著作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烏夷志略校注》、《東西交渉史の研究》（全兩冊）。參見細野浩二，〈早稻田大学東洋史学科小史梗概〉，《史滴》4（1983），頁89；江上波夫，〈藤田豐八〉，收入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頁15-16、25。

<sup>118</sup>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国伝箋釈》（藤田豐八，1911）。

<sup>119</sup> 石田幹之助，〈我國における西域史の研究〉，收入氏著，《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東京：創元社，1942），頁327。

<sup>120</sup> 藤田豐八遺著、池內宏編，《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

兩書中。<sup>121</sup> 因本文主要以討論西域史為主，故南海史不多做贅述。

《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中收錄共十三篇西域研究的相關文章，第一篇〈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主要是與白鳥庫吉的〈大宛國考〉與桑原鷺藏的〈大宛國の貴山城に就いて〉進行論辯，探討貴山城的具體方位，此後陸續發表的〈月氏の故地とその西移の年代〉、〈西域研究〉、〈焉支と祁連〉、〈條支國考〉、〈黎軒と大秦〉等，提出不同於白鳥與桑原的見解。特別的是，如〈西域研究〉一文中更利用斯坦因等人發現的出土資料進行論述；且如其中對薩寶的考釋，也是開拓早期粟特史研究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sup>122</sup>

### （三）桑原鷺藏

第三位則是桑原鷺藏（1871-1931），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漢文科畢業，後進入大學院專攻東洋史，指導教官為坪井九馬三、林泰輔，題目為「外國との交通關係」，對於蘭克、那珂通世也相當敬佩。<sup>123</sup> 大學院畢業後，1898年，前往京都第三高等學校任職，一年後再轉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06年，京都大學決定成立文科大学。1907年，桑原鷺藏前往清國留學，1909年回國後，擔任文科大学東洋史學第二講座。<sup>124</sup> 眾所皆知，京都大學是日本最早成立東洋史學講座的大學，卻同時也由內藤湖南等人發展出「支那學」的大學，而東洋史學部分正是由桑原鷺藏開始，支那學部分則是由內藤湖等、狩野直喜等人開始。<sup>125</sup> 桑原鷺藏的治學特色在於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主要的表現方式可以從其論著中的正文與註釋凜然分立，每個註釋都可視為一個獨立的小考證，藉由每個小考證，不斷的推進論著中的推論，進而達到目地。

桑原鷺藏有關西域史的相關研究，主要收入於其全集的第三卷，名為《東

<sup>121</sup> 藤田豐八遺著、池内宏編，《東西交渉史の研究・南海篇》。

<sup>122</sup> 石田幹之助，〈我國における西域史の研究〉，收入氏著，《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頁328。

<sup>123</sup> 礪波護，〈桑原鷺藏〉，今谷明等編《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5）日本編 續》（東京：刀水書房，2006），頁29。

<sup>124</sup> 礪波護，〈桑原鷺藏〉，收入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頁139。

<sup>125</sup> 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頁iii。

西交通史論叢》。<sup>126</sup> 首先是在 1910 年的〈張騫の遠征〉，後再補訂於 1916 年發表，此文遍列諸說，考證大月氏滅亡年代、月氏與烏孫的相對位置、張騫通使西域的來回路線（與白鳥庫吉說法相同）、貴山城之位置、匈奴的民族系統、自西域傳入中國之植物等問題。從其文來看，全文共 74 頁，其中正文 40 頁、註釋 34 頁，幾乎各占半數，加上如上所述，其考證精細，成為特色，並為以後東洋史研究者引為範本。第二、三篇為 1915 至 1916 年發表的〈大宛國の貴山城に就いて〉、〈再び大宛國の貴山城に就いて〉，提出貴山城為 Khodjiend 說，與當時的白鳥庫吉、藤田豐八提出的 Kasan 說，展開論辯。此外如在南海史領域中的《蒲寿庚の事蹟》以及《中等東洋史》皆為重要著作。

#### （四）羽田亨

第四位為羽田亨（1882-1955），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畢業，畢業論文為「蒙古窩闊台時代の文化」，原其志願想當新聞記者，但受到東大的老師白鳥庫吉影響，轉換志向研究東洋史學。畢業後回到京都，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兩年後即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講師。<sup>127</sup> 1922 年，以「唐代の回鶻に関する研究」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24 年，就任文學部教授，主要擔任東洋史學第二、第三講座，培育出宮崎市定、田村實造、安部健夫等重要學者。<sup>128</sup> 1938 年，就任京都帝國大學第 12 任總長（校長），1952 年（昭和 27），更獲得法蘭西學院儒蓮賞。

羽田亨之研究主要可分為四部分，分別是北亞史、西域史、東西交涉史、民族學。<sup>129</sup> 能讓羽田亨同時有如此不同的重要業績，主要是得力於一、精緻的邏輯思考、分析能力，二、能從大架構思考研究意義，三、強大的語言能

<sup>126</sup> 桑原鷲藏，《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33），後收入《桑原鷲藏全集》第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

<sup>127</sup> 間野英二，〈羽田亨〉，收入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頁 227。

<sup>128</sup> 間野英二，〈羽田亨〉，收入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頁 227。

<sup>129</sup> 那時當然無北亞史、東西交涉史的學科，是自間野英二的時代回顧過去，對於羽田亨的業績進行分類的。參見間野英二，〈羽田亨〉，收入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頁 228-231。

力。<sup>130</sup> 羽田亨在現代語言即能通曉英、俄、法、德等語言，此外做為文獻研究時，也會古漢文、突厥語、蒙古語、滿語、藏語、波斯語、梵語等，而對於當時新發現的粟特語也有相當程度之了解。<sup>131</sup> 自此發展出「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的研究方法。<sup>132</sup> 重要著作則有《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全兩冊）、《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等。

必須注意的是，羽田亨不只擁有前輩學者有的現代語言能力，更有尚不熟悉的古代語言能力，以此為基礎，羽田亨的西域史研究走向與上述三位學者產生差異。如在 1910 年，發表〈ペリオ（Pelliot）氏の中央亞細亞旅行—敦煌石室遺書發見の次第〉，提倡敦煌新史料的重要性。1918 年，發表〈輓近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進歩〉，介紹國外學界的研究資訊。其後更陸續發表〈新出波斯教殘經に就て〉、〈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に就いて〉等，其中最著名的則是對回鶻文的研究，如〈回鶻文の天地八陽神經〉、〈回鶻譯本安慧の俱舍論實義疏〉等，奠定世界性研究者的定位。<sup>133</sup>

1931 年（昭和 6），羽田亨出版《西域文明史概論》，<sup>134</sup> 此書的重要意義在於總結自明治晚期至昭和初期的西域史研究，論述西域文明的性質以及 20 世紀以來各國考古隊在當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書中依序論述地理形勢、民族構成、宗教信仰、藝術，最後在聚焦於西域文明的性質與變遷過程。首先，民族構成的論述，仍是延續白鳥庫吉的研究，從出土文書的文字來進行判斷，認為主要有三種語言：吐火羅語、和闐語、粟特語，這三種語言均屬於印歐語族，故民族應該可判斷為亞利安人中的伊朗系統。其二，在 9 世紀回鶻遷往西域前，西域在宗教、美術等方面主要受到希臘、西亞、印度等文明的強烈影響。回鶻遷往西域後，開始可清楚看到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其三，伊斯蘭文明傳入後，西域古代文明從 14 世紀開始逐漸消失。1948 年（昭和 23），

---

<sup>130</sup> 杉山正明、庄垣内正弘，〈羽田亨〉，收入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頁 160。

<sup>131</sup> 間野英二，〈羽田亨〉，收入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頁 231-232。

<sup>132</sup> 羽田亨，〈輓近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進歩〉，《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頁 634-636。

<sup>133</sup> 間野英二，〈羽田亨〉，收入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頁 229-230。

<sup>134</sup>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京都：弘文堂書房，1931）。



羽田亨出版《西域文化史》，<sup>135</sup> 此書在前著《西域文明史概論》的基礎上，增補新的研究成果。首先，論述的地理範圍比前著更大，包括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其二，增加帖木兒王朝與烏茲別克時代的論述。

羽田亨所著《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的重要性在於整合日本學界、歐洲學界的研究成果與出土材料，從地理、民族、文明三方面建構出一個西域史的體系。當然從此時期的發展來看，日本西域史研究仍然在古代語言的解讀運用上，跟歐洲學界有一段距離。但日本西域史研究對於漢文史料的批判考證，讓研究有更扎實的基礎。

### （五）日本西域史研究的崛起

如從上述塞外史、西域史早期的內部發展脈絡來看，松本善海在 1949 年撰文〈中国社会史の新たなる課題〉，認為：

東洋史學中在世界史學中沒有消失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有著處理漢文史料的特殊技術，這是相當明顯的，以下有 3 個證明。證據 1. 相對於漢文史料無法發揮作用的印度史。對於日本古代史而言，中國方面之史料相當重要，所以日本成為東洋史學的領域。證據 2. 東洋史學中，特別重視塞外民族研究，有能力的研究者不斷在此領域努力研究，其中也包括著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課題，當中存在著中國方面與西洋方面的史料，兩者之間有各式各樣的出入，將其比對，解決其問題，就有如同推理小說一樣的趣味，雖然運用史料之技術有好有壞，但是因最引人注目，所以成為東洋史學研究最興盛的領域。3. 一方面，列舉出無論如何都不需要技術的近代史研究，並加以輕視，東洋史學就是「伴隨著漢文史料處理的特殊技術」、「有別於漢學，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學問」，而東洋史學研究不是以中國史為中心，而是以中國史料為中心。<sup>136</sup>

<sup>135</sup>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京都：座右宝刊行会，1948）。

<sup>136</sup> 松本善海，〈中国社会史の新たなる課題〉，《史學雜誌》58（3）（1949 年 8 月），頁 92-93；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 11。

松本善海在戰後日本對於戰敗責任的反省氛圍下，討論歷史學的未來，其中對於東洋史學的特殊之處做出說明。其中的重點在於「當中存在著中國方面與西洋方面的史料，兩者之間有各式各樣的出入，將其比對，解決其問題……，所以成為東洋史學研究最興盛的領域。」由此可知戰前的東洋史學最受矚目的就是塞外史、西域史等研究領域。但自上述四位學者的研究業績與方法來看，雖自白鳥庫吉以開始有意識的使用現代語言學來進行比對，並對史料進行批判，讓西域史成為具有近代科學實證意義的學科，材料方面則是以漢文材料為主體，藤田豐八、桑原鷺藏亦同，隨著伯希和、斯坦因等人在中亞探險的成果逐漸展出，羽田亨更有意識的提出以當地的文獻材料來進行研究，即間野英二所說的「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另一方面，塞外史、西域史研究延伸出的東西文化交流課題，也逐漸浮出檯面。

## 二、新體系—東西交涉史的出現

日本學者對於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視，可從 1900 年，三宅米吉的〈古代歐亞大陸交通考〉，認為對於西方文物的傳播路徑是必須要重視的，所以撰下此文。另外有山下寅次、羽溪了諦均有撰寫相關論文，<sup>137</sup> 但因學科不同，在此不多做敘述。

在白鳥庫吉、藤田豐八、桑原鷺藏、羽田亨等四位學者的耕耘下，西域史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具有近代科學實證意義的學科。日本學界在西域史研究中對於民族分類、歷史地理、物質文化交流為主要關心的重點。但當時尚無一門「東西交涉史」的學科出現，上述提到藤田豐八、桑原鷺藏的著作，雖以「東西交通史」、「東西交涉史」為著作名稱，但是這些都是後輩研究者在整理其文稿時最後命名的，所以不能認為在明治晚期至大正年間就有「東西交涉史」學科之出現。但在了解西域史研究的課題後，可以發現較為集中在民族分類、歷史地理、物質文化交流等部分，

其中對於歷史地理與物質文化交流的研究，如西域的地名、部落名的考證，或者是如藤田豐八針對僧侶行紀的考釋等，逐漸對於西域作為東西交流

---

<sup>137</sup> 松田壽男，〈日本における東西交涉史の發達と現狀〉，收入氏著、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第3卷 東西文化の交流I》，頁356。

的重要場域有一定的認識。<sup>138</sup> 1939年，史學會編集出版《東西交涉史論》，收集在此領域中的重要論文，自此才有東西交涉史一詞。<sup>139</sup> 而在研究中對於印度、伊朗的文化自西域傳入中國，再影響到日本，也逐漸成為相當通俗的事實。<sup>140</sup> 所以從物質文化交流、人類移動為主要的研究，形成新的學科，名為東西交涉史或東西交通史。主要的學者有藤田豐八的兩位學生，松田壽男、前嶋信次，羽田亨之子羽田明，以及石田幹之助、榎一雄、佐藤圭四郎、岡崎敬、前田正名、林良一、長澤和俊等人。<sup>141</sup>

白鳥庫吉在史學會成立五十週年時，發表〈東西交涉史上より觀たる遊牧民族〉，後收入上述所提《東西交涉史論》中。<sup>142</sup> 另外，尚有一篇〈東西交涉史概論〉為未發表。<sup>143</sup> 但上述兩篇均可視為理解東西交涉史內涵的重要論文。首先可先看〈東西交涉史概論〉：

……特別是在史學中，明確了解個別史實，才能以此有綜合概念之可能，而能了解個別史實之意義，個別的精緻考證與綜合論述在史學研究中可以說是車的兩輪。在此意義下，過去眾多學者努力之結果，讓個別史實逐漸明朗，其細緻處已到了極限，以此概觀東西交涉史，明瞭東西相異之文化的性質，在兩文化接觸呈現何種型式，對於學界不會是無意義的作業。<sup>144</sup>

<sup>138</sup> 間野英二，〈トルキスタン〉，收入島田虔次等編，《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4 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頁47。

<sup>139</sup> 長澤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83），頁？；長澤和俊著、鍾美珠譯，《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頁4。

<sup>140</sup> 松田壽男，〈日本における東西交涉史の發達と現状〉，收入氏著、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第3卷 東西文化の交流I》，頁356。

<sup>141</sup> 間野英二，〈トルキスタン〉，收入島田虔次等編《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4 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頁47。

<sup>142</sup> 白鳥庫吉，〈東西交涉史上より觀たる遊牧民族〉，收入史學會編《東西交涉史論 上卷》（東京：大空社，1997），頁5。

<sup>143</sup> 白鳥庫吉，〈東西交涉史概論〉，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111-136。

<sup>144</sup> 白鳥庫吉，〈東西交涉史概論〉，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112。

由上述白鳥庫吉所寫之序言，可知其認為東西交涉史應可視為對於先前西域史研究中的個別史實考證的綜合歸納，提供東西方文化在性質上的差異，以及兩文化在相互接觸上所發生的變化。在〈東西交涉史上より觀たる遊牧民族〉一文中：

亞洲之歷史，一方面觀察其南北對抗史，同時也有東西交涉的重大事實。如將南北對立比喻為緯度，東西交涉則就是經度，明瞭其兩者關係就能了解亞洲史。……大月氏與塞等的西遷南侵曾讓一度占據蒙古的匈奴無法將勢力伸進南方支那，而在匈奴勢力伸進西方的結果就是南北對立引起東西交涉，而東西交涉又同時與南方發生交涉之關係，其有數個案例。如此一來，可以認為南北對抗、東西交涉經常同時發生，以研究兩種運動之關係來把握東洋歷史的實體。<sup>145</sup>

而在上述材料中，白鳥庫吉從另一角度來論述東西交涉觀點下遊牧民族之定位。可以發現白鳥庫吉延續南北對立論的觀點，<sup>146</sup>認為如再加入對東西交涉的考察，可以更好的把握東洋歷史的發展。

綜合上述兩段材料，兩篇論文從不同的角度論述東西交涉史研究的重要性。總結來說，白鳥庫吉首先是延續了東洋史是以南北對抗為軸心發展的概念，論述東西交涉史研究有助於了解東洋史發展。其二則是認為東西交涉史在歷史學中屬於歸納綜合的範疇，可以對東西洋文化進行比較研究。這樣的想法無疑是往更廣大的架構進行了解，可以說是企圖藉此了解東洋與西洋之間的差異，並且提出在研究或是國家發展上超越西洋的建議，這可說是藉由東西洋文明之比較來理解世界史。所以說白鳥庫吉認為東西交涉史研究不僅可以更完整的把握東洋史，更可以藉此了解世界史。值得一提的是，西域史除了衍伸出東西交涉史的領域外，更有研究者著眼於中國歷代王朝與西域的互動關係來進行研究，形成另一門領域，被稱為西域經營史或是西域統治史，

---

<sup>145</sup> 白鳥庫吉，〈東西交涉史上より觀たる遊牧民族〉，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 150、153。

<sup>146</sup> 請參見本章第三節。

主要的代表性學者有伊瀨仙太郎、松田壽男、羽田明等。<sup>147</sup>

1939 年後，松田壽男、前嶋信次等學者逐漸發展東西交涉史，主要的成果首先在於研究東西交涉的路線，歸納出三條路線，分別是草原之路、綠洲之路、海上之路。其二則是延續三條路線的研究，具體了解三條路線在東西交涉中的作用與定位。<sup>148</sup> 值得注意的是，三條路線之研究也與歐洲學界有所對話，尤其是綠洲之路又稱為絲綢之路。德國地理學家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在其著作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提出「die Seidenstrasse」，後來由英國學者 Stein 翻譯為「Silkroad」，也就是日語中的「絲路」、「絹の道」的由來。<sup>149</sup>

在東西交涉史的研究領域中，此時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可以說是松田壽男。以下就松田壽男對於東西交涉史與其路線的思考。松田壽男認為：

無論是遊牧生活或是綠洲生活，其中的人群生活在孤立的環境，將其視為「點」。「點」由添加隊商路而發展為「線」。當然此「線」不只是因商業成立，也有政治力與文化力交流的部分。在「點」之中重要的部分當然會出現強烈支配「線」的傾向。亞洲大陸的東與西就誕生上述「點與線的世界」，開始交流。如此一來這樣經由遊牧世界與綠洲世界的路線就產生了，這就是東西交通路，也就是做為滋養許多國家與民族的軸線而發揮作用，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自東方出發通過遊牧世界的是遊牧之路，經由綠洲世界（又稱為中亞、伊朗·伊拉克）的是綠洲之路（又稱之沙漠島），兩條路線均能到達地中海。後者就是狹義的絲綢之路。<sup>150</sup>

<sup>147</sup> 間野英二，〈トルキスタン〉，收入島田虔次等編，《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4 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頁47。

<sup>148</sup> 松田壽男，〈東西交涉史のおいたち〉，收入氏著、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第3卷 東西文化の交流I》，頁352-353。

<sup>149</sup> 松田壽男，〈シルクロード論〉，收入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編《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頁27；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7），頁14-16；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國》（東京：講談社，2007），頁62-63。

<sup>150</sup> 松田壽男，《東洋史》，收入氏著、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第5卷 アジアの歴史》（東京：六興出版社，1987），頁195-196。

從上述松田壽男的論述可以了解，自白鳥庫吉等人對於地名、城址的歷史地理考證開始，讓綠洲世界（西域）的各個「點」逐漸明朗，後藉由綜合歸納之方法進行東西交涉史研究，將各個「點」串連成一條「線」，在這個「點」與「線」所組成的世界中，人、政治力、文化力等不斷的移動交流，對於許多國家、民族產生影響。



## 第五節 西藏—從印度學往西藏學

日本近代的西藏學主要是以佛教學與東洋史的研究為中心，<sup>151</sup> 但早期的西藏學發展較少歷史研究。對西藏學的成立有重要貢獻的學者，主要有南条文雄、高楠順次郎、河口慧海等人。以下先敘述以南条文雄、高楠順次郎為主的印度學、佛教學發展，再連接到當時日本對於西藏的認知，最後接續河口慧海的西藏學發展。

### 一、印度學、佛教學的成立

明治後期開始，日本開始吸收歐洲的東方學研究（Oriental Studies，Orientalism），除了第一節提出的白鳥庫吉前往歐洲學習相關知識外，另一條學術脈絡就是印度學、佛教學。儘管在江戶時代以來對於佛教的研究已經有所發展，但是具有近代學術意義的研究，還是要到此時才開始發展。其中需要介紹的重要人物就是南条文雄（1849-1927），<sup>152</sup> 淨土真宗東本願寺派出身，1876年時前往英國，就學於牛津大學的 Max Müller（1823-1900），<sup>153</sup> Max Müller 的專長是歷史語言學、印度佛教神話研究。南条文雄在 1884 年學成歸國後，隔年即在東京大學教授梵語學，<sup>154</sup> 可以說是日本最早開設的歐洲東方學相關學科。<sup>155</sup> 南条文雄可以說是日本印度學與近代佛教學的重要開創人物。

<sup>151</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東京：芙蓉書房，2010），頁 11。

<sup>152</sup> 當時同行者尚有笠原研寿（1852-1883），但在英國研習途中不幸病故。參見陳繼東，〈釈迦への回帰：近代日中における釈迦原典探索の始まり〉，《インド哲学仏教学研究》23（2015），頁 20。

<sup>153</sup>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頁 21-24；高山龍三，〈河口慧海〉，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76。

<sup>154</sup> 南条文雄為首先在東京大學教授梵語學的老師，而其後的高楠順次郎則是東京大學開始實施講座制後的第一任梵語學講座。

<sup>155</sup>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頁 21。

另一位重要人物則是高楠順次郎（1866-1945），本名沢井洵，自青年時就熱心政治活動，陸續參加龍山會、起風館等相關社團，其後更創設佛教會。由於家族世代皆為淨土真宗信徒，其後進入西本願寺系統的普通教校（今龍谷大學之前身）就讀。1888年，沢井洵入贅高楠家，改名為高楠順次郎。此校當時除教授佛教學外，特別重視英語教育，年輕僧侶們受到開放的教育，其後更由教授與學生們共同組成以啟蒙為目的的組織反省會，發行《反省會雜誌》（後改名為《中央公論》），在當時蔚為風潮，當時南条文雄也在此組織發揮著影響。<sup>156</sup>

1889年自普通教校畢業，前往英國牛津留學，經由南条文雄的介紹，同樣受教於 Max Müller，主修梵語、巴利語，此時成為將興趣從政治轉向學術的重要轉折點。<sup>157</sup> 其後陸續於柏林、基爾、奧登堡、萊比錫等大學學習西藏、阿爾泰、吠陀、印歐的語言與歷史。<sup>158</sup> 1897年學成歸國，在東京大學擔任第一任梵語學講座，對於日本印度學與近代佛教學體系的建立有重要影響。<sup>159</sup>

從南条文雄與高楠順次郎的學術歷程來看，首先都是選擇學習梵語與巴利語做為進入印度學、佛教學的敲門磚，這是因為在此前的佛教研究，多是使用漢傳佛教的翻譯經典，如要進一步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的話，勢必要接觸第一手資料，即梵語、巴利語文獻，如此學會梵語、巴利語就成為第一步。<sup>160</sup>

## 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西藏的想像與理解

日本對於西藏的理解，最早可回溯至西元 8 世紀的相關記載，接著平安時代、江戶時代都有簡單介紹西藏的書物，但直到近代的昭和年間，有直接進入西藏旅行或考察的日本人只有 14 人。<sup>161</sup> 如從此中找出對西藏有專門的

---

<sup>156</sup> 雲藤義道，〈高楠順次郎〉，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63-64；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49-54。

<sup>157</sup> 雲藤義道，〈高楠順次郎〉，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65-66。

<sup>158</sup> 雲藤義道，〈高楠順次郎〉，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66-67。

<sup>159</sup> 雲藤義道，〈高楠順次郎〉，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67；前田惠學，〈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仏教学〉，《禪研究所紀要》4/5（1975），頁 351。

<sup>160</sup> 前田惠學，〈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仏教学〉，《禪研究所紀要》4/5，頁 351。

<sup>161</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8。



研究者或是有直接考察西藏文物的人就更少了。<sup>162</sup>

根據高木康子的研究，自明治初期的學制公布後，針對各種地理科教材中的西藏敘述進行考察的結果，當時的西藏是被納入中國的一部分進行敘述的。<sup>163</sup> 1890年，因國家對於培養國民的要求有所改變，認為要著重培養愛國精神，所以對世界的理解需要以與日本的關係來敘述。以此為背景，之後的地理科教材對於西藏僅止於地名式的介紹。<sup>164</sup>

那麼此時東洋史概說書中的西藏呢？東洋史概說書的發展如前第三節所論述，在此不再贅述。當時那珂通世在教授支那通史課程時，認為需以人種興亡為重點，<sup>165</sup> 增加中國周邊的歷史。<sup>166</sup> 相關概說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為明治 28 年（1895）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sup>167</sup> 桑原鷺藏在《中等東洋史·總論》提到：「東洋史的主人是亞洲人種，依照慣例可以大致分為兩類，西伯利人種、支那人種。支那人種可再細分為三族：漢族、藏族、交趾支那族。……（第二）西藏族是從西藏到喀什米爾、帕米爾及緬甸一帶綿延的人種，殷周的氐羌、秦漢的月氏、唐的吐蕃、南宋的西夏等皆屬此族。西伯利人種有四族：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突厥族。<sup>168</sup>」此處的人種說明與那珂通世認為東洋史需要說明人種盛衰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sup>169</sup>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其中有屬於西藏本身的歷史嗎？由於桑原鷺藏對於西藏的設定也與上述地理教科書相同，是在中國之內。<sup>170</sup> 但從《中等東洋史》中可以看到，此書較像是《支那通史》的擴大版，而非東洋史，仍是以中國史為基礎的論

<sup>162</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11。

<sup>163</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22-23。

<sup>164</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25-26。

<sup>165</sup> 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收入故那珂博士功績紀念會編《那珂通世遺書》，頁 11。

<sup>166</sup> 窪寺絃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 195。

<sup>167</sup> 吉澤誠一郎，〈東洋史學の形成と中國〉，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 3 卷 東洋學の磁場》，頁 57-58。

<sup>168</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收入《桑原鷺藏全集 第四卷》，頁 23。

<sup>169</sup> 藤田豐八的《中等教科東洋史》中，則將東洋史的人種分為漢族、苗族、通古斯族、都爾古族（突厥族）、蒙古族、圖伯特族（藏族）、韓族等七族，但書中論述仍是以漢族為主。參見藤田豐八，《中等教科東洋史》，頁 4-5。

<sup>170</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收入《桑原鷺藏全集 第四卷》，頁 17-18。

述，未見到有西藏史的敘述。

其他如相關記載西藏的資訊，也是相當簡略。1892 年的《清国通商綜覽》中，因為是要理解清朝，所以在宗教部分討論到清朝如何利用喇嘛教來控制其他民族，開始有了對喇嘛教的相關記載。另一個重點則是提到活佛的轉生制度。<sup>171</sup>

明治後期，日本理解西藏的狀況，首先要提到的是淨土真宗東本願寺派的石川舜台（1841-1931）與小栗栖香頂（1831-1905）兩人。當時的背景是東本願寺積極發展海外佈教事業，石川舜台做為東本願寺的寺務總長，遂開始積極接觸中國的喇嘛教高僧，希望能夠與西藏的達賴喇嘛建立起聯繫，但此時並非對於西藏有興趣，而是對北京周邊的佛教有興趣。<sup>172</sup> 小栗栖香頂在 1873 年為了考察中國佛教而前往中國，在一年間，在北京、五台山積極的訪問藏傳佛教高僧，試著對話。最後寫成《喇嘛教沿革》與《真宗教旨》兩書，前者是了解藏傳佛教的概說書，後者是了解淨土真宗的概說書，可用來作為東本院寺前往中國佈教的前置知識。<sup>173</sup> 此書雖大部分是介紹藏傳佛教內容，<sup>174</sup> 但仍是第一本日本人所寫的西藏歷史著作。<sup>175</sup>

### 三、河口慧海與西藏學的成立

承續著南条文雄與高楠順次郎之後的是河口慧海（1866-1945），大阪人，自小遵守佛戒律，屬黃檗宗。23 歲時前往東京，進入哲學館就讀（今東洋大學的前身），在學問、思想上都受到井上円了的影響。<sup>176</sup> 其後在黃檗山別峯院研讀一切藏經時，思考如何將經文簡單的讓社會大眾讀懂時，發現漢譯經典中

<sup>171</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34-35。

<sup>172</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37-39。

<sup>173</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40。

<sup>174</sup> 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40。

<sup>175</sup> 此書主要使用魏源的《聖武記》、《大清會典》、《蒙古源流》等書，導致書中有關政治史的敘述佔多數，教義的部分反而不多，所以被認為較似歷史著作，請參見 Sato, Hisashi.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ibetan History in Japan." *Acta Asiatica* 64 (1993), pp81-82.

<sup>176</sup> 高山龍三，〈河口慧海〉，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 74-75；高木康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頁 104-105。

對一事有許多不同的解釋，需要回歸原典才能確定，以此為契機開始思考前往西藏的可能性。<sup>177</sup>

1897年，自神戶出港，前往西藏，至1903年回到日本，成為日本第一位前往西藏考察的學者。隔年將本身的見聞寫成《西藏旅行記》，成為不朽名著。除此之外，河口慧海也在遊歷考察時，帶回大量的經典，如現藏於東洋文庫與大正大學圖書館的藏文大藏經、藏外文獻、梵語字本，成為發展西藏學研究的重要文獻。<sup>178</sup> 另一方面，在河口慧海第二次前往西藏（1913-1915）歸國後，開始進行經典的翻譯與研究，藉此機會開始培養能夠通曉藏文的研究者，如橋本凝胤、山田無文等人即是此時培養。河口慧海也出版一系列相關著作，如《西藏傳印度仏教歴史》、《梵蔵伝訳法華経》、《西藏文典》、《西藏語読本》等，<sup>179</sup> 對於促進西藏學有著重要作用。<sup>180</sup>

其後，青木文教（1886-1956）、多田等觀（1890-1967）也陸續前往西藏。兩人同樣屬於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在就讀佛教大學（今龍谷大學的前身）的1912年時，被當時的本願寺寺主大谷光瑞派往西藏。<sup>181</sup> 兩人同時在拉薩學習西藏學相關知識。分別著有《西藏遊記 秘密之國》、《チベット滞在記》等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青木文教在1940年出版的《西藏文化の新研究》一書，此書共分12章，系統論述西藏的國名由來、民族由來、神話傳說、歷史發展、宗教制度、文字習俗等，相當全面。第四章提到：

古來中國文獻中雖有記載氐羌等種族，但今日的西藏人種並非單純的原住民或土生人，是因時代變遷與地域差異也有相當的複雜性，無法直接說是屬於何種族。從現代的民族分類學中，有屬於南亞民族系統中的西藏・緬甸種或是屬於北方民族系統的烏拉爾・阿爾泰系統等兩

---

<sup>177</sup> 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上）（東京：博文館，1904），頁1-3。

<sup>178</sup> 高山龍三，〈河口慧海〉，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80。

<sup>179</sup> 高山龍三，〈河口慧海〉，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頁81。

<sup>180</sup> 三上諦聽，〈日本西藏學成立經過〉，《日本西藏学会々報》1（1954），頁4；Sato, Hisashi.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ibetan History in Japan." *Acta Asiatica* 64, p82.

<sup>181</sup> 青木文教，〈自序〉，《西藏遊記 秘密之國》（東京：内外出版，1920），頁1。

種看法。<sup>182</sup>

自此可看出青木文教也有近代民族學的相關知識，在民族學上無法確認西藏人的歸屬時，青木文教認為可從神話傳說來進行判斷，可大致有印歐亞利安人（王族階層）、中亞蒙古人種（平民階層）、西藏的原住民（下層階級、邊緣部落）。而王族階層人少，西藏人主要是以中亞蒙古人種為主，混合原住民所形成。<sup>183</sup>自第五章至第七章，簡述西藏的神話傳說與歷史，雖簡但具有系統性，可說是相當簡易的通史。此書雖未討論西藏的東洋史中的定位，但確是有完整論述西藏史的著作。



---

<sup>182</sup> 青木文教，《西藏文化の新研究》第四章〈民族の由來〉（東京：有光社，1940），頁50。

<sup>183</sup> 青木文教，《西藏文化の新研究》第四章〈民族の由來〉，頁53-60。



### 第三章 北亞史的理論研究與中期發展

如第二章所述，自 1897-1935（明治 30 年至昭和 10 年），白鳥庫吉開始針對朝鮮、滿洲開始進行研究，其後逐漸往西推進，進入歐美學者所精通的蒙古與突厥斯坦地區，以民族、語言、歷史為主要研究對象，建立日本東洋學研究的基礎。1926 年（大正 15），白鳥庫吉則以〈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一文，奠定東洋史是以農耕民與遊牧民的相互對抗、互動而產生的歷史；另一方面，也成為北亞史框架的基礎。

在這樣的脈絡中，第一節論述自昭 1935 年開始，隨著日本大陸政策的推進，建立了西北研究所、蒙古善鄰協會、回教圈攷究所等組織，對於西域史研究更進一步。對於整個東洋，提出了有別於白鳥庫吉的思考，其為「乾燥亞洲文化史」。另一方面，隨著塞外史研究成果的累積，對於遊牧民世界的主體性逐漸明顯，藉由東亞研究所的組織下，提出異民族王朝論，總結北魏、遼、金、元、清等政權之歷史。第二節有鑑於目前學界尚未完整討論 Karl A. Wittfogel 提出征服王朝論的思想背景與過程，故此節詳細討論其人與征服王朝論在歐美學界的影響。

第三節著重討論日本如何在思考戰敗責任與世界史框架的影響下，批判性的繼承征服王朝論，成為北亞史重要的理論基礎。進一步發展本身獨有的北亞歷史世界觀。此時北亞、內陸亞、中央歐亞的概念並存，這些概念的特色與局限也是此節討論重點。第四節討論在東西交涉史的學科發展後，松田壽男等人仍持續尋找中亞史的主體性，進而提出中洋史的概念。另一方面，山田信夫等人提出突厥斯坦作為突厥人的土地，在中亞史上的意義，最後在間野英二、森安孝夫爭論絲路對於中亞的特殊性，產生了更為體系性的中亞史。

第五節則持續探討西藏在東洋史的定位，首先論述戰前東洋史系統下的西藏史研究如何發展，再進一步論述戰後的重要研究者佐藤長等學者，最後討論北亞史、中亞史、東洋史等概說書中西藏的定位。

## 第一節 乾燥亞洲史觀與異民族王朝論

本節敘述以松田壽男為主的乾燥亞洲史觀的研究發展，主要就是尋找中亞史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在日本學界對遊牧民族史研究的扎實累積下，學者們在東亞研究所統合的調查案中，提出異民族王朝統治中國的論述。前 4 個部分論述乾燥亞洲史觀發展的梗概，後 2 個部分則論述異民族王朝論發展的梗概。

### 一、日本第一本的《中亞史》概說書

1935 年，平凡社出版「世界歷史大系」叢書，其中第 11 卷為《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sup>1</sup> 中亞史部分由松田壽男與小林元共同撰寫，印度史部分是木村日紀撰寫。此書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亞史概說書，<sup>2</sup> 那麼以下出現的問題就是此書與先前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兩書有何差異呢？這首先要自此書開始分析，後進行比較。

有關此書的背景，首先可以在此書的緒言看到「亞洲的心臟」一詞與論述，<sup>3</sup> 此是受到英國學者 F.H.Skrine 與 E.D.Ross 所撰寫的 *The Heart of Asia* 影響，<sup>4</sup> 此觀點認為中亞是歷史的地理樞紐，引起世界對於中亞的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也開始認知中亞的重要性。

此書共分為四篇，依順序分別為松田壽男、小林元、前島信次、宮城良造撰寫，第一篇以支那及其周邊諸族為中心、第二篇以伊斯蘭諸族為中心、

---

<sup>1</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東京：平凡社，1935）。

<sup>2</sup> 山田信夫，〈解說〉，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1 砂漠の文化》（東京：六興出版，1986），頁 369。

<sup>3</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頁 3。

<sup>4</sup> Hisao Matsuda, "General Survey", Kazuo Enoki, Akira Fujieda, Seiichi Iwao, Hisao Matsuda, Tatsuro Yamamoto ed. *Research in Japan i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 its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Japan: 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1957., p6.

第三篇以蒙古及突厥族為中心、第四篇以斯拉夫族為中心。<sup>5</sup> 首先從松田壽男寫的緒言來看：

「亞洲的心臟」的鼓動是單純的，可視為亞洲的一部分。但是此部分因支配亞洲的肢體，所以反映世界的生命。所以中亞的生活樣態在整體的觀點中決不簡單。從地理、人種、語言、宗教來看，以此理解其社會與歷史的整體發展過程。<sup>6</sup>

自上述論述來看，應是受到了中亞為歷史發展之樞紐的觀點影響。從章節架構可看出以時間為軸，將中亞劃分為四時期，以諸民族的互動為中心來撰寫。那麼中亞的地理範圍呢？松田壽男認為：

如以目前的突厥斯坦為中心的話，「亞洲的心臟」之輪廓，東以支那的甘肅、戈壁沙漠為界，北以阿爾泰山脈、吉爾吉斯草原為界，西以裏海、伊朗大鹹地為界，南以興都庫什山脈、崑崙山脈為界。再以帕米爾高原為界，將其一分為二，右邊約為東突厥斯坦或是支那·突厥斯坦，左邊約為西突厥斯坦或是俄屬突厥斯坦。<sup>7</sup>

在上述地理範圍中，可看到在民族、宗教的多元，所以歷史發展過程也必然呈現複雜性。<sup>8</sup> 另一個特色則是外部支配力對中亞的影響，所以這也影響了章節的安排，就是以主要四個外部勢力為中心論述。<sup>9</sup> 如此論述，松田壽男也認為這並非完整的中亞史，只是一部分。<sup>10</sup>

從此書的背景、作者的撰寫概念來看，其背景是受到 F.H.Skrine 與 E.D.Ross 的「中亞是歷史發展的樞紐」觀點影響，承續了羽田亨的對於西域史總結的成果，進一步的將論述時間往下延伸。但是松田壽男遭遇了無法明確描述中亞史

<sup>5</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頁 11。

<sup>6</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頁 3。

<sup>7</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頁 3。

<sup>8</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頁 8。

<sup>9</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頁 11。

<sup>10</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木村日紀，《世界歷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頁 11-12。



發展的內部自律性的問題，也就是中亞無法成為一個獨自的歷史世界，使得他在文中認為目前此書尚不能算是完整的中亞史的想法。自此，松田壽男開始致力於尋找中亞史的獨特性與發展規律。

## 二、乾燥文化地帶的提出

松田壽男在思考東西交涉史的概念與體系時，也同時重新反思白鳥庫吉的東洋史架構，就是「南北對立論」。在這樣的思維下，松田壽男與小林元共同撰寫《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一書，提出乾燥亞洲的概念，松田壽男的專長為中亞史、小林元的專長則是西亞史。松田壽男與小林元在其書中緒言提到：

先前吾等一邊研究中亞史與西亞史，也就是所謂的乾燥亞洲史，一邊感到舊時的東洋史往往拘泥於支那史，也就是漢文亞洲史，是很奇特之事。吾等屢屢討論有關於真正的亞洲史，但由吾等來提供亞洲史全貌之設計，其構圖絕對不會是全新之事物。……。<sup>11</sup>

從此緒言可以看到，雖然日本學界重新設計歷史的架構（西洋史、東洋史、國史），但是在松田壽男看來，東洋史仍然有其侷限，就是無法擺脫支那史，主要表現在只能使用漢文材料。在這樣的想法下發展出新的史觀，松田壽男認為：

……從季節風的觀點來看亞洲的話，其中可以分成受到自大海吹來海洋季節風影響的部分，與無法了解季節風的部分。此狀況因為受到地形的複雜與相互作用，大概能將亞洲分為三個文化帶，即「濕潤文化地帶」、「亞濕潤文化地帶」、「乾燥文化地帶」。<sup>12</sup>

從上述來看，首先可以看到是以受到季風的影響來進行文化帶的劃分，那麼

---

<sup>11</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 12。

<sup>12</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 20。

「乾燥文化地帶」的特徵為何呢？松田壽男認為：

……亞洲的第三部分是幾乎沒有受到太平洋、印度洋、北極洋等外洋影響的地域，可以說是沒有海風的乾燥地區。這就是亞洲的「乾燥文化地帶」，是以所謂內陸地域或是內陸地域的點為其特色。其地帶大概是大興安嶺附近，貫穿蒙古利亞、土耳其斯坦，遠至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當然，此地帶以東連接滿洲平原，形成一漸移地帶，而西則到敘利亞海邊與安那托利亞，就是小亞細亞沿岸，……。整體來說，「乾燥文化地帶」大部分帶有遊牧生活之色彩。遊牧生活樣式可說是帳篷文化、綠洲文化、商隊文化，這就是遊牧民文化發生的基礎。<sup>13</sup>

此段論述中，松田壽男說明乾燥文化地帶的範圍與其文化特色，重要的是，此地帶就是以遊牧民為主體的地帶。這與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論中的遊牧民所在的亞洲北部比較的話，松田壽男無疑將遊牧民的活動地帶擴大到中亞、西亞，並將綠洲民也納入遊牧民的範疇，這可以說是從歷史地理學中，建構乾燥亞洲與濕潤亞洲的二元對立概念。<sup>14</sup> 松田壽男認為：「一直以來，大家思考的「東洋史」，可說是很細緻的「亞洲史」，但是其中並沒有充分納入「乾燥亞洲史」，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乾燥亞洲史」是沒有意義的。」<sup>15</sup> 從此句論述表示松田壽男首先認為的「東洋史」就是「亞洲史」。其二就是要提升中亞史、西亞史在東洋史中的重要性。

把「東洋史」=「東亞史」=「亞洲史」的概念似乎在白鳥庫吉開始就有混用的狀況，如在〈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一文中，便將「東洋」、「東亞」兩詞交互使用。<sup>16</sup> 而提升中亞史、西亞史在東洋史的定位，桑原鷺藏在《中等東洋史》的緒論早有不同觀點，其書提到：「東洋史雖然以東亞為主，闡明古來之沿革，但同時卻也必須略述與東亞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南

<sup>13</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 21-23。

<sup>14</sup> 村上正二，〈征服王朝論〉，《月刊シルクロード》2/3「特集・中國征服王朝」（1980年2月），頁7。

<sup>15</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25。

<sup>16</sup>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69。

亞與中亞。北亞則因氣候寒烈，人煙亦稀少，因此在東亞的大勢中，無法成為重要舞臺。西亞則可說因為無法與歐洲大勢分離，所以在東洋史範圍之外。」<sup>17</sup> 松田壽男在增強中亞史在東洋史的論述時，也要將桑原鷺藏眼中與歐洲密切關連的西亞拉進東洋史範圍中。

在西域史、東西交涉史領域都有長足發展的狀況下，該領域的研究者提出要在整體架構中增加該領域的論述比重是可以理解的，松田壽男對於中亞史在東洋史中比重的增加應該就屬於此類。但西亞史部分如何解釋呢？

### 三、日本西進政策與回教圈攷究所的成立

1904年（明治37），隨著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除了從朝鮮西進，進一步獲得滿洲南部，更重要的是，日本開始與此處的韃靼系穆斯林進行互動接觸。此處的穆斯林在19世紀80年代已開始進行反抗帝俄的活動，因此在日本眼中，有極大的利用價值。<sup>18</sup> 在1917年（大正6）發生的十月革命中，帝俄滅亡後，不少韃靼系穆斯林遷徙至日本，也使得日本開始能更近距離理解伊斯蘭與穆斯林。在這樣的氛圍中，日本伊斯蘭研究逐漸萌芽，其中重要的學者有大久保幸次（1887-1950）等人。1932年（昭和7），以大久保幸次為首的學者，包括飯田忠純、內藤智秀、小林元，成立日本第一個伊斯蘭研究組織「伊斯蘭文化研究所」，但此組織成立不久後大久保幸次離開，由內藤智秀接手。<sup>19</sup> 隔年，大久保幸次另設置「伊斯蘭學會」，成員有小林元、松田壽男、宮城良造、八木龜太郎等人。<sup>20</sup> 1938年（昭和13），以「伊斯蘭學會」成員為核心，成立「回教圈攷究所」，<sup>21</sup> 值得注意的是組織名稱中的「回教圈」一詞所代表的概念。

1940年由回教圈攷究所出版的《回教圈史要》論述其地理範圍：

---

<sup>17</sup> 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收入《桑原鷺藏全集》第四卷，頁18。

<sup>18</sup> 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41。

<sup>19</sup> 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頁143-144。

<sup>20</sup> 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頁144。

<sup>21</sup> 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頁147-148。

如展望現今回教圈的範圍，在亞洲中自阿拉伯開始，包括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土耳其、高加索、伊朗、阿富汗、突厥斯坦、支那、蒙古、滿洲等，往南則有印度、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sup>22</sup>

在上述的背景上，為了理解伊斯蘭與穆斯林而將西亞納入東洋的範疇，但更重要的是：「不幸的是，現階段的回教圈，都是處於殖民或半殖民的狀態下，……，回教徒屢屢受到歐洲之羞辱……。」<sup>23</sup> 也就是將亞洲中的穆斯林脫離歐洲殖民。

#### 四、乾燥亞洲的核心概念：「中介的商業活動」

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下，松田壽男、小林元提出「乾燥亞洲文化史」的概念。<sup>24</sup> 松田壽男在《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論述「乾燥亞洲地帶」的意義認為：

總之，「乾燥亞洲」之歷史必須理解為「遊牧生活樣式」的發展或變遷。一言以蔽之，這也可視為上述的發展或變遷就是遊牧民推進本身的遊牧生活，上升到下個階段為止的努力過程。這就是遊牧民生活設計之歷史。但是，這種「遊牧生活樣式」從古代至中世到近代歷經悠久的風霜，或多或少有往「農耕生活樣式」的傾向，考察其「不變的動搖」，其最後的答案就是要從「中介的商業活動」中尋求。<sup>25</sup>

<sup>22</sup> 回教圈攷究所編，《回教圈史要》（東京：四海書房，1940），頁4；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立》，頁161。

<sup>23</sup> 回教圈攷究所編，《回教圈史要》，頁13-14。

<sup>24</sup> 值得注意的是，松田壽南、小林元在日本一開始發展伊斯蘭研究時，便積極的加入相關組織，其中在回教圈攷究所設立初期，松田壽男擔任資料部長、小林元擔任研究調查部長，但對於整體組織的影響似乎不大。可以說組織關注的重心在於當代的回教圈，而對於歷史的興趣相對淡薄。參見田村愛理，〈回教圈研究所をめぐって：その人と時代〉，《學習院史學》25（1987），頁19-20；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立》，頁154。

<sup>25</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229-230。

接著論述「乾燥亞洲史」與東洋史、西洋史之間的關係：

但是，西洋史對乾燥亞洲史有著間斷性的親切感，但是與比起東洋史，不過是有相對的善意而已。構成乾燥亞洲史的中亞史與西亞史，對於東洋史也好、西洋史也好，多數都是「需除去的部分」或「障礙的部分」。……無需贅言，東洋史如果不是在支那史之上的話，吾等所提出的論述就必須收回。東洋史如果不是亞洲史的話，問題也只能另外思考。然而，人人都認為東洋史等同於亞洲史。事實上，為照應祖國日本的躍進，必須同意東洋史就是亞洲史，這就不是令人困惑的問題了。的確，這就是先前東洋史的矛盾，將其分為東西二洋史，卻曝露亞洲區域(Asian region)的弱點。所以，吾等自東西二洋史的交響樂中，將東洋史自漢文東洋史解放。<sup>26</sup>

最後，松田壽男著眼於日本大陸政策之拓展，認為：

關於乾燥亞洲史的概論，反映吾等之真心，為了祖國日本之前進及之後東洋史之新生，能夠寄託何種意義，讓吾等抱持些許喜悅。如果此等貧乏之試論，能作為祖國日本亞洲大陸政策的基礎而發揮作用的話，吾等之真心就能充分得到回報。<sup>27</sup>

從上述所引三段論述，可得知一、東洋史等同亞洲史，但中亞史、西亞史在東洋史、西洋史中都處於尷尬的地位，需要獲得相應的重視，並重新建構新的東洋史。<sup>28</sup> 二、要理解由中亞史與西亞史所組成的乾燥亞洲史，關鍵在於其中「中繼性質的商業活動」。三、藉由歷史研究，希望能讓亞洲地區的穆斯林脫離被殖民的狀態。四、希望此研究有助於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政策。

自此來看，乾燥亞洲史的概念，無疑是自西域史到東西交涉史的學術發展中，研究者發現中亞史與西亞史在東洋史中的不受重視與研究累積不扎

<sup>26</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 238-239。

<sup>27</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 241。

<sup>28</sup> 長澤和俊，〈松田壽男先生の思い出〉，《史滴》4（1983），頁 100。

實，而東洋史又受到漢文材料的制約，加上當時日本大陸政策發展需要更進一步了解伊斯蘭世界，進而提出乾燥亞洲的思考。<sup>29</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學術得力於日本大陸政策之發展，而對於中亞史與西亞史的重新思考，無疑提醒東洋史學界。但是中亞史與西亞史的狀況仍然需要持續累積與分別觀察，中亞史在經過明治晚期至昭和初期的發展，從西域史發展到以東西文化交流為焦點的東西交涉史與以中國為主體的西域經營史，自成體系，但是西亞史在此時仍然屬於需要開拓之階段。此外，松田壽男提出理解乾燥亞洲史的關鍵是「中繼性質的商業活動」，與東西交涉的本質也是相同的。我們或可這麼說，松田壽男的上述努力都與尋找中亞史的發展關鍵有關。

在東西交涉史研究的逐漸累積下，松田壽男更進一步的提出東西交涉史的重要性與主體性，把中亞與西亞合併，提出乾燥亞洲概念，企圖讓東洋史學界重視中亞史與西亞史。值得注意的是，松田壽男認為理解乾燥亞洲的關鍵在於「中繼性質的商業貿易」，這也影響後續的絲路史研究的基本思路。而在上述研究累積的基礎下，不斷的提出新的理解概念解釋東洋史，是此時期的特色之一。

## 五、東亞研究所：異民族統治政策調查

在 1937 年（昭和 12）時，日本國內局勢因內閣與軍部磨擦日趨緊張，在這樣的情勢下，同年 6 月 4 日近衛文麿就職內閣總理大臣，希望能緩解內閣與軍部的對峙態勢。<sup>30</sup> 同年 7 月 7 日中國發生盧溝橋事變，日中之間的戰火持續擴大，在上述背景下，為了緩解國內壓力，近衛內閣決定出兵華北，並希望日本全體國民能「舉國一致」的協助戰爭體制。<sup>31</sup> 值得注意的是，更加理解中國與完善的制定政策，陸續設置興亞院、東亞研究所等研究機構。

1938 年，在企劃院調查官池田純久的規劃下，<sup>32</sup> 於同年 9 月 1 日成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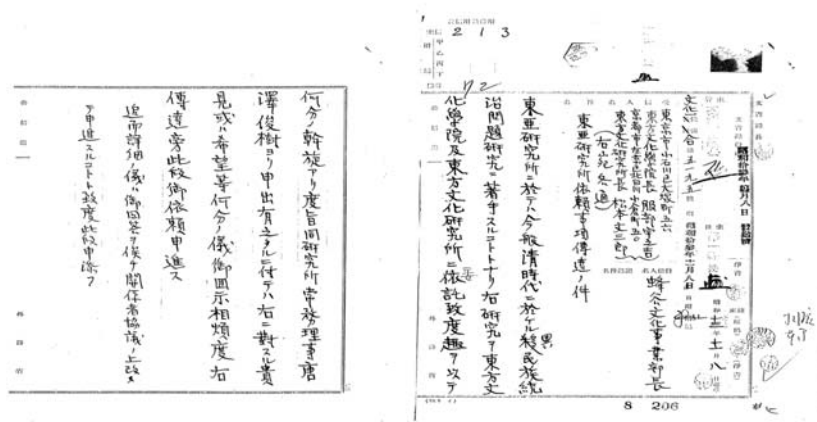
<sup>29</sup> 細野浩二，〈早稻田大学東洋史学科小史梗概〉，《史滴》4（1983），頁 95。

<sup>30</sup> 蕭李居，〈中日戰爭初期的政治變革與權力之爭（1937-1938）〉，《國史館學術集刊》9（2006 年 9 月），頁 106。

<sup>31</sup> 蕭李居，〈中日戰爭初期的政治變革與權力之爭（1937-1938）〉，頁 107。

<sup>32</sup> 企畫院是在昭和 13（1938）年 10 月 25 日由近衛內閣合併企畫廳與資源局所成立，負責管理擴充和運用綜合國力之計畫與預算業務，同時也協助與統合機關間國家總動員計畫

亞研究所，以總理近衛文麿為總裁，具有滿鐵理事、貴族院議員身分的大藏公望為副總裁。<sup>33</sup> 東亞研究所的設置目的是進行關於東亞的人文與自然的科學性綜合調查研究，分別以研究所內的人員、委託其他學術機關進行調查研究並出版。<sup>34</sup> 其內部組織為了對應軍事行動，所以依照地域分成 5 部，第 1 部（企畫班、業務班、自然科學班、統計班、翻譯班）、第 2 部（蘇聯班、外蒙青海班、回教班、滿州班）、第 3 部（支那政治班、支那社會班、第 1 支那經濟班、第 2 支那經濟班）、第 4 部（南洋第 1 班、南洋第 2 班、大洋班、列國班）、第 5 班（印度緬甸班、英國班）。<sup>35</sup>



H-0923

8848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Studies  
http://www.nac.ac.jp/

圖 3-1：企劃院委託東亞研究所進行調查案之文件

資料來源：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会 <1>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40。

同年的 11 月 8 日，東亞研究所請當時的東方文化學院院長服部宇之吉（東京）與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松本文三郎（京都）進行有關「清時代的異

的策畫與執行，而東亞研究所則是為企畫院的外圍團體。參見蕭李居，〈中日戰爭初期的政治變革與權力之爭（1937-1938）〉，頁 108；渡邊新，〈東亞研究所小史〉，《政經研究時報》13 特別號（2010 年 3 月），頁 2。

<sup>33</sup> 渡邊新，〈東亞研究所小史〉，頁 2。

<sup>34</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東亞研究所關係(1)(財)東亞研究所概要〉，編號：I-1-3-0-6\_003；渡邊新，〈東亞研究所小史〉，頁 2。

<sup>35</sup> 渡邊新，〈東亞研究所小史〉，頁 3。

民族統治問題研究(清時代二於ケル異民族統治問題研究)」的調查案。<sup>36</sup> 其後陸續進行幾次的協商討論，討論者除了上述提到的兩位院長外，還有後來成為調查案主要負責人的池內宏，與羽田亨、瀧精一等人。<sup>37</sup> 12月3日正式提出相關規劃，「清、元、金各朝的諸民族統治事例(清、元、金各朝ノ諸民族統治事例)」調查案，主要目的與收集資料之要點：

主要調查做為異民族統治中國的清朝諸政策，以及金、元兩朝，對於進行東亞新秩序樹立、新東亞體制確立的帝國使命，有所參考。<sup>38</sup>

資料的選擇著重在於各朝如何制定壓制方式、相關政策，如何讓民眾生活安定、收攬民心等事例。<sup>39</sup>

從上述來看，此調查案原以了解清朝統治中國的各種政策為主，再往上延伸至金、元兩朝，主要仍是要做為日本統治中國的參考。

東亞研究所也提出此調查案的參考綱要<sup>40</sup>：

(一) 侵入支那本土前的工作

1. 塞外諸民族的連橫運動
2. 對漢民族政策

(二) 統一支那後的行政

1. 支那邊疆統治的行政機構
2. 支那內地的保甲制、里老制
3. 上下的聯繫溝通

<sup>36</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會 <1> 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40。


<sup>37</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會 <1> 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51。

<sup>38</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會 <1> 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58。

<sup>39</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會 <1> 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58。

<sup>40</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會 <1> 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59-60。



- 
- (三) 軍制
    - 1. 支那內地的各種軍隊組織以其配置
    - 2. 支那邊疆的傭兵
  - (四) 官吏登用
    - 1. 諸民族的官吏登用及禮遇
    - 2. 諸民族出身官吏的相互牽制
  - (五) 戶籍、婚姻
    - 1. 身分的規定、戶籍的編成
    - 2. 婚姻政策
  - (六) 土地政策
    - 1. 支那內地
    - 2. 支那邊疆
  - (七) 財政經濟政策
    - 1. 徵稅
    - 2. 賑恤
    - 3. 交易
  - (八) 交通政策
  - (九) 宗教政策
    - 1. 邊疆諸民族統治中對諸宗教的利用
    - 2. 對漢民族的宗教政策
  - (十) 文化、教育政策
  - (十一) 關於習俗的諸政策
  - (十二) 民族同化問題
    - 1. 保持本身民族性的諸政策
    - 2. 對弱小民族的同化政策
    - 3. 元清的封禁問題
  - (十三) 叛亂
    - 1. 諸民族叛亂的原因
    - 2. 針對叛亂的對策
  - (十四) 清朝的沒落
    - 1. 扶清滅洋運動

## 2.排滿興漢運動

從上述綱要來看，是以「資治」為主的的方向，具有強烈的參考借鑑意義，14項幾乎均以統治政策為主，對於文化、教育等方向則較為薄弱。

12月27日，陸續決定參與成員：1.三上次男 2.旗田巍 3.松本善海 4.周藤吉之 5.村上正二 6.百瀨弘。<sup>41</sup>但從此份文件來看，均為東方文化學院之成員，並無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成員。

1939年1月1日，正式發文聘任東方文化學院評議員池內宏為委託調查案之主任，以1939年1月1日至1940年12月31日的兩年為限，三上次男則以「金朝諸制度與其治下的漢人」與「對於金朝治下漢人社會、經濟、文化政策」為主題進行研究。旗田巍以「從清朝異民族統治政策來看朝鮮」為主題進行研究。村上正二以「元朝的制度與漢人統治政策」為主題進行研究。周藤吉之以「清朝的土地制度—以八旗田制為中心」為主題進行研究。松本善海則以「明清時代的村落自治—從里甲制到保甲制」為主題進行研究。<sup>42</sup>

## 六、《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與《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

1942年，東亞研究所在收取研究成果報告後，交由第3部的支那政治班負責處理彙整，<sup>43</sup>當時的負責人為中村治兵衛<sup>44</sup>、沼田鞞雄，<sup>45</sup>前者負責北

<sup>41</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会 <1>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62。

<sup>42</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4・学会、協会 <1>東亞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81-84。

<sup>43</sup> 當時的東亞研究所第3部支那政治班，主要集中進行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調查。班長由在滿鐵調查部任職的土井章兼任，成員共有7名沼田鞞雄、角田順、阿部宗光、竹內孫一郎、中村治兵衛、小川平二、大山梓。支那社會班也是由在滿鐵調查部任職的大上末広擔任班長，成員則有福滿武雄、山本秀夫、酒井忠夫、藤井正夫、河合慎吾。但因成員時常有外務或轉任，人員更動相當頻繁，所以兩班時常一起工作，之後陸續加入具有東洋史背景的百瀨弘等人。參見中村治兵衛，〈東洋史と私〉，收入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刀水書房，1986），頁512。

<sup>44</sup> 中村治兵衛（1916-），大阪人。1935年，就讀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同期有大淵忍爾、

魏、金、元的編纂，後者負責清的編纂。<sup>46</sup> 但由於京都研究所發表的研究論文因為戰火而損毀，所以無法看見原本。<sup>47</sup> 1943年，東亞研究所出版《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在例言中對於上面提及的調查案做說明<sup>48</sup>：

本研究所以異民族支那統治事例為題，委託當時的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京都研究所（現東方文化學院、東方文化研究所）在昭和13年12月至昭和16年3月之間進行研究，得到以下十九篇論文：

東京研究所

金朝前期的漢人統治政策 三上次男

金朝的諸制度與金朝治下的漢人—金朝的官制與漢人官吏登用制度 三上次男

元朝的諸制度與漢人統治政策 村上正二

清朝的異民族統治中的財政經濟政策 百瀨 弘

清朝的土地制度—特別是八旗的田制 周藤吉之

清朝的村落統治政策—從里甲制到保甲制 松本善海

從清朝異民族統治政策來看朝鮮 旗田 巍

京都研究所

北魏的社會與民族 內田吟風

---

守屋美都雄，跟隨池內宏先生學習朝鮮史，與加藤繁先生學習唐宋經濟史，和田清先生學習東洋史概論與明代史等。1938年，東洋史學科畢業，進入大學院就讀，成為和田清的助手，協助支那地方自治發達史的撰寫。1939年進入東亞研究所第3部支那政治班任職。1946年，東亞研究所解散後，陸續在九州大學、岡山大學、中央大學任教，最後於1986年，在中央大學退休。主要著作有：《中国漁業史の研究》、《中国聚落史の研究》、《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研究》。參見中村治兵衛，〈略年譜〉，收入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頁iv-viii。

<sup>45</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頁3。

<sup>46</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頁3。

<sup>47</sup> 中村治兵衛，〈東洋史と私〉，收入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頁514。

<sup>48</sup> 詳細經過可參見中村治兵衛，〈東洋史と私〉，收入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頁513-514；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頁1-2。

金的對契丹人政策	外山軍治
金的對宋政策	外山軍治
元的對漢人政策	愛宕松男
遼金元的宗教政策	野上俊靜
清朝的官制及官吏登用法	宮崎市定
清朝的文化政策	田村實造
清朝初中期的思想對策	安部健夫
清朝的婚姻制度研究	小川裕人
清朝的宣撫救賑工策	宮川尚志
清朝的蒙古統御政策	田村實造
從異民族統治看清朝的回部統治政策	羽田 明

19 篇論文中，有關清朝的論文占了 11 篇，超過一半，對照參考綱要來看，撰寫的對應參考綱要最多。此外金朝 4 篇，元朝 2 篇，北魏 1 篇，綜合（遼金元）1 篇。對漢人統治政策共有 3 篇（金、元、元），諸制度與官吏任用制度共有 3 篇（金、元、清），主要是集中在對漢人統治政策與制度兩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調查案中未出現遼的相關研究。

由第 3 部支那政治班的中村治兵衛負責編纂第一篇、沼田軻雄負責編纂第二篇，兩篇合起來成為《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一書。<sup>49</sup> 從此書的內容來看，第一篇共有三章，分別為北魏、元、清，大概分為概説、官制、軍制、村落統治、土地政策、經濟政策、宗教政策等；第二篇共有七章，概説、官制、軍制、財政、村落政策、文化與社會政策、邊境統治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中村治兵衛所撰寫的〈序説〉，此部分開宗明義：

先論述北魏、金、元、清四異民族王朝如何統治支那的概略，考察上述異民族統治支那的類型。……支那大陸的歷史大勢，如先前白鳥庫吉博士所提倡的，是南北抗爭史，也就是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的對立抗爭史。南方民族即指自稱中夏以農耕為業的漢民族（支那民族），北方民族則指居於支那北邊的諸民族。也就是被支那人稱為東夷，居於滿洲森

<sup>49</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頁 3。

林地帶周邊的通古斯民族；被稱為東胡民族、北狄，居於內外蒙古，以遊牧維生業，自古有突厥民族、蒙古民族；被稱為西戎的氐羌的牧畜半農耕的西藏民族。換言之，南北抗爭史就是農耕民族與遊牧、狩獵半農耕（牧畜半農耕）民族的鬥爭史。北方民族壓倒南方民族，於支那中原樹立政權的即所謂異民族王朝。……考察異民族的支那統治時，首先就必須理解不同民族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差異。<sup>50</sup>

中村治兵衛此段敘述的主要論點承襲了白鳥庫吉於 1926 年提出的「南北對立」論，南北分別對應南→農耕民與北→遊牧民、半狩獵半農耕民、半牧畜半農耕民。在近 20 年的學術發展後，對於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民族與中國史研究有更深厚的累積。中村治兵衛更進一步的將上述北亞民族在中國建立王朝成為異民族王朝，認為要理解這樣的歷史現象，必需要先理解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差異。

在「南北對立」論的概念框架下，中村治兵衛試著總結異民族王朝的統治方式、類型、特徵。方式：1.在經略中國時，吸收漢人發展政治經濟或從西域人處獲得新兵器等增加優勢。2.懷柔各區域的自治勢力（魏晉南北朝的塲主、唐末五代的義軍、宋末元初的漢人世侯），完成經略中國的任務。<sup>51</sup> 類型：1.上述異民族王朝在文化上的程度比漢人低，所以從統治中國的形態來看，除了元朝具有鮮明的征服國家色彩外，其他都無法有征服國家的形態，形成與中國王朝相差不大的絕對專制君主國家體制。2.雖只有元朝因為與西域文化接觸而對中國文化冷淡，加上強制執行基於身份制度組成的部族體制，使得征服國家的色彩明顯，但是元朝是異民族王朝中最為短命的王朝也是值得注意的。<sup>52</sup> 特徵：1.少數的異民族直接統治多數的漢人，將漢人以外的民族作為股肱，將其視為準統治者優遇，如金的契丹人、元的色目人、清的內蒙古人等等。2.政治的權力在於兵制，統治民族掌握由實施部族制度發展形成獨特制度的兵權，如北魏的八國制、金的猛安謀克制、元的千戶、萬戶府制、清的八旗制等。3.行政機構對於官吏任用有特別的方式，支配民族容易就任高

<sup>50</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頁 1-2。

<sup>51</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頁 3-4。

<sup>52</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頁 5。

官，漢人多在下級行政機構。4.異民族王朝崩壞的原因，外因有軍隊的叛亂、農民暴動的擴大、外國勢力的侵入等；內因有支配民族統治意識的衰退、中國嬪妃、官僚勢力的興起導致宮廷的中國化、官僚腐敗、兵力不振、支配民族人才缺乏等。<sup>53</sup>

1944 年，東亞研究所編纂《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由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出版（現今講談社之前身），本書與前述《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的差別在哪？其中主要的差別就是加入遼代的概說與分析與〈異民族の支那統治要綱一覽〉，此部分則由中村治兵衛擔任。<sup>54</sup> 在加入遼代後，在〈總說〉中對於統治方式、類型、特徵上均有增補，類型：只有遼、元保持本民族固有的部分，以獨特的統治機構統治漢人，遼採用分離遊牧民與農耕民的統治方式，稱為二重體系的統治組織以及軍事上的幹耳朵軍，元則與上述的相同。<sup>55</sup>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異民族の支那統治要綱一覽〉，<sup>56</sup> 此部分以表格形式，簡明扼要的讓讀者可以迅速理解編纂者的歸納重點。

表 3-1：北魏、遼、金、元、清等 5 王朝統治特徵表

	北魏	遼	金	元	清
統治期間	150 年	200 餘年	120 年	100 餘年	269 年
統治範圍	北支那 內蒙古	滿州 內外蒙古 北支那	滿州 內蒙古 北支那	支那全土 滿州 內蒙古 西藏	支那全土 滿州 內外蒙古 西藏
統治特色	徹底漢化政策	統治的二重體系	以漢制漢	身分制度、重用色目人	高壓政策，具有精神上的緊張性
一般方式	1.以漢制漢，再由支配民族監督之				

<sup>53</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頁 5-6、12。

<sup>54</sup> 遼的部分除了宗教政策已有東方文化研究所的野上俊靜撰寫〈遼金元的宗教政策〉之外，其餘均為中村治兵衛執筆。參見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4），頁 1。

<sup>55</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頁 7-8。

<sup>56</sup>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頁 378-399。

	<p>2. 統治的支柱是從支配民族中出來的人才</p> <p>3. 統治機構幾乎完成承襲支那王朝的官制（遼、元例外）</p> <p>4. 與支那王朝相異的特徵：</p> <p>（1）少數異民族統治多數漢人，以漢人以外的民族為準支配民族，如遼代的奚人、金代的契丹人、元代的色目人、清代的內蒙古人。</p> <p>（2）政治的權力在於兵制，實施由部族制發展而來的獨特制度，兵權由支配民族掌握，如北魏的八國制、遼的斡魯朵軍、金的猛安謀克制、元的軍團制、清的八旗制。</p> <p>（3）行政機構中的官吏任用有特別方式，支配民族容易就任高官，漢人主要在事務系統的行政機構任職。</p> <p>（4）對邊疆異民族採用分而治之的統治原則。</p>
--	---

資料來源：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4），頁 378-399。

值得注意的是，如表 2 所示，中村治兵衛除了在解釋框架使用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觀點外，主要使用支配⇔被支配的解釋方式，是因為考慮到要從支配統治的「資治」角度來獲得上述資訊。卻也因為如此，日本做為支配者的立場，與上述異民族王朝的統治立場相近，加上自明治末期以來的學術研究之累積，由當時兩間代表最高水平的研究機構進行調查研究，再由東亞研究所統整歸納出這兩本著作。

同樣是 1944 年，東亞研究所出版《清朝の辺疆統治政策：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一書，此書的內容不超出調查案中論文的範圍，主要是收入異民族如何統治異民族的論文。<sup>57</sup> 纂寫此書〈序說〉的是中村治兵衛，本書的目的在於：「對於清朝邊疆統治政策的檢討，在理解支那邊疆問題的同時，更能有助釐清大東亞共榮圈內的民族政策。」<sup>58</sup> 清朝的邊疆統治政策原則：1. 是分而治之，也就是除了撫慰、懷柔政策外，更將其與漢人分開治理，加以

<sup>57</sup> 此部分共有五篇：田村實造，〈清朝の蒙古統治策〉、羽田明，〈從異民族統治看清朝的回部統治政策〉、旗田巍，〈從清朝異民族統治政策來看朝鮮〉、外山軍治，〈金的對宋政策〉與〈金的對契丹政策〉。參見東亞研究所編，《清朝の辺疆統治政策：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東京：至文堂，1944），頁 1。

<sup>58</sup> 東亞研究所編，《清朝の辺疆統治政策：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頁 2。

保護，並使其相互牽制。2.在考慮上述地區的邊疆問題時，必須考慮到宗教的影響力，清朝對於反對的宗教領袖則是壓制滅絕，並扶植多人，以達到分權監督的作用，3.重新進行地方組織的再編，如蒙古的盟旗制、回部的三者並行（州縣制、札薩克制、伯克制）、西藏的達賴、班禪統治。3.清朝由理藩院為最高治理邊疆的機關，各地域則有不同的官員駐在治理。<sup>59</sup>

從《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清朝の辺疆統治政策：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三本書來看，無疑都是在日本帝國對外擴張的背景下，由官方主導的研究機構中所總結出來的歷史著作。其特色首先在於具有強烈的「資治」傾向，也就是為了更加理解「異民族」如何統治中國而進行的調查研究。

那麼，此類著作在當時到底造成多少的影響？昭和 18 年（1943），東亞研究所出版《東研成果摘要》，其中所有的班與調查委員會中，多數是實地調查，其次是翻譯，對於各地域的歷史研究是相當少的。<sup>60</sup> 第 3 部支那政治班主要集中進行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調查，所以對於異民族的調查案，是委託東方文化學院與東方文化研究所處理。那麼這類的歷史類出版物對於當時的軍部有多少參考價值呢？

---

<sup>59</sup> 東亞研究所編，《清朝の辺疆統治政策：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頁 4-6。

<sup>60</sup> 東亞研究所，《東研成果摘要》（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頁 1-28。



## 第二節 征服王朝論的提出及其與異民族王朝論之比較

在北亞史與中亞史均有明顯進展的昭和 20 年代時，Karl A. Wittfogel 發表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在日本學界引起相當大的迴響。相關領域學者無不撰寫介紹、書評等，積極的將征服王朝概念引介進日本，經過吸收批判後，最後在北亞史歷史分期中，成為分別古代至中世的基準。故本節討論 Karl A. Wittfogel 的生平、受到的學科訓練與影響、征服王朝概念的形成等，希冀在日本北亞史的脈絡下，能夠對其人與著作有更完整的探討。

### 一、Karl A. Wittfogel 與征服王朝論的誕生

#### (一) 青年—壯年：學術基礎的培養

1896 年，Karl A. Wittfogel 出生於德國漢諾威 Lüneburg 區 Woltersdorf 村，其父為該村的學校教師，因父親在學問上主要側重於歷史與地理，也影響小時候的 Wittfogel，另一方面，由於周圍均為農業地帶，所以小時的 Wittfogel 也對農業有著興趣。<sup>61</sup> 在青年求學過程中，很早就表現出獨立精神的 Wittfogel 在 16 歲時就參與了青年運動的組織，對當時保守的國家主義思想，利用尼采的哲學思想進行強烈的批判，並在刊物上發表對經濟問題與農地改革的看法。<sup>62</sup>

1914 年 Wittfogel 至 Leipzig 就讀大學，分別向 Wilhelm Max Wundt (1832-1920) 學習哲學史、Karl Lamprecht (1856-1915) 學習德國史、August Conrady (1864-1925) 與 Eduard Erkes 學習中國學，並在 Karl Lamprecht、

<sup>61</sup> 張廣達，〈魏特夫與艾博華教授〉，收入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206；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Mouton, The Hague, 1978., p8.; G·L·ウルメン (G. L. Ulmen) 著、亀井兔夢監訳，《評伝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東京：新評論，1995），頁 47。

<sup>62</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8-9.

August Conrady、Eduard Erkes 三位先生的指導下撰寫學位論文。<sup>63</sup> 1915 年前往慕尼黑攻讀美學。1916 年前往柏林大學攻讀哲學，同年其父逝世，他到 Rostock 大學向 Eugen Geinitz (1824-1925) 學習地理學、地質學，向 Richard Ehrenberg (1857-1921) 學習經濟史。<sup>64</sup>

1917 至 1922 年間，Wittfogel 重心移向參與社會主義運動，以及撰寫小說。1924 年，Wittfogel 出版第一本專書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Schwelle der grossen* (布爾喬亞社會的科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此書是 1921-1923 三年間，以參與社會主義運動時演講為基礎，此書的重要性在於揭示其後學術生涯中的研究方向與相關主題。<sup>65</sup>

書中所揭示的重點在於 Wittfogel 提出兩個問題：一、個人研究的孤立化。二、研究社會學科的細分化問題。<sup>66</sup> 其認為解決方法首先可以參考馬克思的產業分工概念，以大規模的團隊研究與調查進行知識的分工研究。再者，強化大學中各學科與其輔助學科的橫向聯繫，如西洋史一定要協助東亞史的研究，並把作為輔助學科的經濟史、民族學、社會學等也進行聯繫研究。這樣的方式就可稱為是社會科學的研究法，而其中的核心學科則是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sup>67</sup>

Wittfogel 在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時，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實證主義的關係需要放在精神科學 (Geistwissenschaften 文化·歷史科學) 的脈絡中思考。<sup>68</sup> Wittfogel 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的發展的本質與基礎，就是從生產過程

---

<sup>63</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11.

<sup>64</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14-15.

<sup>65</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31.

<sup>66</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32.

<sup>67</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32-33.

<sup>68</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33-34.

中使用唯物史觀進行考察，這樣的研究是不會偏離真正的事實。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發展階段的類型論、歷史上鬥爭的類型論，是今日歷史學所需注意的課題。<sup>69</sup> 對於 Wittfogel 來說，上述的研究方法與課題不僅止於哲學或知識本身，而是包含於解決現實問題，也就是有著實踐上的意義。<sup>70</sup> 另一位對 Wittfogel 有重要影響的學者是馬克斯·韋伯（1864-1920）。在韋伯的重要研究與概念中，Wittfogel 受到像是韋伯的比較研究方法、權力與官僚制的相關討論等深刻影響。<sup>71</sup>

Wittfogel 雖然無緣與兩位學者相遇切磋，但在批判性繼承兩位的相關概念與研究後，逐漸形成本身的學術風格。Wittfogel 與馬克思與韋伯兩人的差異，首先是對於亞洲的研究，馬克思與韋伯兩人是用比較研究的方式，關心西洋的狀況，而 Wittfogel 則是直接以亞洲為研究對象，並承接了比較研究的方式，進一步建立比較後的類型。<sup>72</sup> 其二，受到馬克思的啟發，從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研究開始，就將其作為整體來進行考察，並了解其構造。其三，以大規模的團隊研究與調查進行體系性知識的分工研究。

## （二）學問的核心：理解亞洲

如上所述，Wittfogel 對於亞洲的興趣來自馬克思與韋伯兩位學者，在兩位前輩學者的著作中，注意到相對於歐洲，亞洲的社會型態是相當特殊的類型，在這樣的理解下，在 1924 年出版的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Schwelle der grossen*，首先從對於都市的比較著手，將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俄國等納入比較。<sup>73</sup> 再者，承

<sup>69</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33.

<sup>70</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33-34.

<sup>71</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38-39.

<sup>72</sup> 有別於馬克思的單線發展的比較，Wittfogel 主張需要多線發展的比較。參見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2, 39-40.

<sup>73</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續馬克思的概念，認為歷史是人與自然互動的體現，<sup>74</sup> 再進一步提出農業是了解經濟的關鍵。<sup>75</sup> 1926年，Wittfogel 出版 *Das erwachende China, Ein Abriß der Geschichte und der gegenwärtigen Probleme Chinas*（《覺醒的中國·中國今日的問題與歷史概論》），書中在討論中國階級國家的起源時，從討論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國家起源論開始，進一步將原因分為內外兩部分，<sup>76</sup> 也同樣注意到草原遊牧民與農耕民的差異。1927年，發表 *Probleme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中國經濟史的諸問題〉），提出目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問題，認為現今研究只有歸納式的事實調查，不具有方法論，所以無法構成具有體系性分析的中國經濟史。<sup>77</sup>

值得注意的是，Wittfogel 在討論中國的農業危機時，同樣將原因分為內外兩部分，外部原因提到中國與亞洲草原地帶的互動關係，雖然兩個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但是兩者的互動是中國史的基本規律之一，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只有農業的中國史的不完整的中國史。<sup>78</sup>

1931年，Wittfogel 出版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 groß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此書主要反映作者想要從經濟與社會來動態的把握中國，其中的核心概念則是對生產樣式、社會發展的各種型態、官僚主義、權力等的探討。<sup>79</sup> 此書與後來1957年出版的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東洋專制主義》）可說是上下兩部系列作，具體體現了他

---

August Wittfogel, p40.

<sup>74</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42-43.

<sup>75</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42.

<sup>76</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127-128.

<sup>77</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75-76.

<sup>78</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78.

<sup>79</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90.

對於亞洲的整體理解。

1935年，Wittfogel 前往中國，在北京認識王毓銓，成為他第一個中國籍的共同研究者。<sup>80</sup> 9月在前往山西考察時結識 Owen Lattimore，Wittfogel 與 Owen Lattimore 相互切磋。其後陸續認識陶希聖、胡適、陳翰笙等人。<sup>81</sup> 其後 Wittfogel 訪問當時由美國人設立最現代化的北京協和醫院，由於醫院留下許多患者的個人紀錄，Wittfogel 認為這些資料對於社會學、經濟學研究相當重要，所以在獲得許可後，自 1936 年開始進行中國家族研究計畫(The Chinese Family Project)。<sup>82</sup> Wittfogel 在此計畫中著重在討論家長權威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在比較各地域差異後，提出各種不同的類型。<sup>83</sup> 最後 Wittfogel 在此計畫告一段落後，認為：「雖然家族做為中國社會重要的特徵之一，但是如果家族不是決定性特徵的話，何者才是決定性特徵呢？恐怕就是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sup>84</sup>

### (三) 征服王朝論的誕生：中國歷史編纂計畫

自此 Wittfogel 開始接觸中國的正史，對於正史中記載的官僚產生興趣，並提出中國官僚與世界其他地域官僚的異同問題。<sup>85</sup> 1939年，洛克斐勒基金會批准國家社會科學研究所(IISR)與太平洋學會(IPR)的申請，資助 Wittfogel 的「中國歷史編纂計畫」(The Chinese History Project)，計畫先從秦、漢、

---

<sup>80</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187.

<sup>81</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189-190.

<sup>82</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191.

<sup>83</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192-197.

<sup>84</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197.

<sup>85</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197.

遼、金、清史優先選擇，<sup>86</sup> 其後陸續招募到王毓銓、馮家昇、瞿同祖、趙增玖、房兆楹、杜聯喆、何茲全等學者，工作地點則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四樓。<sup>87</sup>

上述團隊的工作方式也如上述提到的，是以團體分工方式進行研究。首先是將史料中收集有關社會經濟的記載，進行年代編排與分類。<sup>88</sup> 第二、進行翻譯與註解。王毓銓負責秦、漢，馮家昇負責遼，整理完成後交由 Wittfogel，由其寫一篇導論。<sup>89</sup> 在《東洋專制主義》的〈序言〉中 Wittfogel 提到：「1930 年代初期，我將中國經濟狀態的特殊性，定調為中國（或亞洲）社會的一部分，是以宏觀分析的方式來進行研究的。1940 年代初期，我試著確定中國的征服王朝與典型的中國人王朝間的差異時，仍是以宏觀方式研究。我試著確定東洋專制主義、西洋（及日本）的多中心社會、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的極體主義間的差異時，還是以宏觀方式研究。現在關於全面權力形式的比較研究中，還是以宏觀方式研究。」<sup>90</sup> 由此可知，Wittfogel 以宏觀方式研究時，主要是將中國分為兩部分來理解，典型中國人王朝與征服王朝。

1942 年，Wittfogel 完成書中各部分的導論，1943 年再完成全書的序論。1946 年，Wittfogel 先後發表“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與之後專書的序論（general introduction），兩文將當時對於「中國歷史編纂計劃」的研究成果進行概述，此文集中於討論遼、金、元、清等四個征服王朝與中國文明接觸的文化轉變，作者首先提出需要以新角度來看待上述四征服王朝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文化方面的轉變，先前均是以文化的同化理論（theory of absorption）解釋，但這是過度簡化兩個文明互動的複雜過程，應該用涵化（acculturation）解釋更為恰當。作者先比較四個征服王朝的性格，

---

<sup>86</sup> 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第五章〈魏特夫與近代中國學術界〉，頁 262。

<sup>87</sup> 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第五章〈魏特夫與近代中國學術界〉，頁 262。

<sup>88</sup> 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第五章〈魏特夫與近代中國學術界〉，頁 263；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198-199.

<sup>89</sup> 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第五章〈魏特夫與近代中國學術界〉，頁 263。

<sup>90</sup> カール・A・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著、湯淺赳男訳，《オリエンタル・デスポティズム：專制官僚国家の生成と崩壊》（東京：新評論，1991），頁 6。

認為契丹、蒙古屬於較為純粹的遊牧民，故與女真、滿州比較，前者對於中國農業的社會制度無法像後者較快適應。<sup>91</sup> 接著按照時間順序分別從統治方式、政治制度、軍事制度、科舉制度論述遼、金、元、清的個別狀況。再將時間回溯，Wittfogel 認為在突厥、回鶻汗國崩壞後直到蒙古出現前，草原有其重要的轉變導致遼等征服王朝的出現。<sup>92</sup> 值得注意的是，Wittfogel 也將周、秦、北魏、五胡十六國也列入討論，先將北魏認為其統治中國的過程非是征服，而是滲透（Infiltration），<sup>93</sup> 再者認為周、秦兩朝代在當時人眼中也是屬於戎狄的範疇，其征服當時其他勢力的過程，在政治制度、文化上也有所區別，但在文化涵化的過程中，由於周、秦更早被視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所以與上述征服王朝有了差異。<sup>94</sup>

此文中可大概看出 Wittfogel 提出「征服王朝」概念與說明，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征服一詞是一個敘述獲得政權的過程，將周、秦、遼、金、元、清等都納入討論範圍，在考慮到不同民族與文化互動的狀況後，再將遼、金、元、清等自成分類，並將北魏、五胡十六國的狀況視為滲透。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研究方法與分析切入點，都有跡可循，如研究方法一貫延續著分工合作，以宏觀角度進行研究，分析切入點則是從政治制度（官僚）、軍事制度、文化習俗等。

1947 與 1948 年，陸續發表“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Religion under the Liao Dynasty”兩文。

#### （四）日本學界的關注：藤枝晃的《征服王朝》

在 1946 年 Wittfogel 陸續發表“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ynasties of

---

<sup>91</sup> Wittfoge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pp112-114.

<sup>92</sup> Wittfoge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hina*, p122.

<sup>93</sup> Wittfoge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hina*, p123.

<sup>94</sup> Wittfoge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hina*, pp124-126.

Conquest”與之後專書的序論（general introduction）後，日本學界首先進行介紹的是野原四郎在《中國研究所所報》發表的〈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博士の躍進〉。<sup>95</sup> 其後在 1948 年，藤枝晃發行了專書《征服王朝》，<sup>96</sup> 作者在此書中採用了 Wittfogel 所提出的征服王朝一詞，提出對於遼、金史研究的建議，首先是目前為止的遼金史研究都只使用正史的材料，仍屬於上層階級的歷史，必須開始使用文集等材料，才能讓遼金史研究更有豐富性與可能性。其二，提醒日本學界，歐美學界目前已有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應與國外研究者積極互動。

#### （五）*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的主要觀點與評價

1949 年，Wittfogel 與馮家昇共同發表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為「中國歷史編纂計劃」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研究專著。<sup>97</sup> Wittfogel 在接觸正史後，認為要體系性的研究中國制度史，就要從正史出發，並再進一步從中了解中國的過去與現在。<sup>98</sup> 如前所述，Wittfogel 以研究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為核心，尤其以農業為切入點，了解中國到亞洲社會的權力運作與社會結構。在研究過程中，Wittfogel 的宏觀視野中，亞洲除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外，俄國與游牧民族是兩個需要補充的關鍵，理解不同民族如何控制農業的重要性後，整體亞洲的官僚權力比較研究就能完成。<sup>99</sup> 所以此書的基本思路可說是之後《東洋專制主義》的比較與補充。

書中開頭的序論總結 Wittfogel 的主要觀點，將書名定為社會史，承襲

<sup>95</sup> 野原四郎，〈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博士の躍進〉，《中國研究所所報》2（1947 年 5 月），頁 10-26。

<sup>96</sup> 藤枝晃，《征服王朝》（大阪：秋田屋，1948）。

<sup>97</sup> 編纂時期的過程請參考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第五章〈魏特夫與近代中國學術界〉，頁 262-264。

<sup>98</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231.; G·L·ウルメン (G. L. Ulmen) 著、亀井兔夢監訳，《評伝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頁 348。

<sup>99</sup>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231-232.; G·L·ウルメン (G. L. Ulmen) 著、亀井兔夢監訳，《評伝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頁 349。



Wittfogel 一貫從農民社會開始的研究方式，其認為：「社會史，就是處理帝國的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制度與其人民，主要是中國人，及創建國家的契丹人。……本書的「社會」非僅指洛克所說的「政治的或公民的社會」，它包括亞當·斯密的經濟上的含意，並且最後還包括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正常標準之系統，這系統存在於每一個社區的組織裡」。」<sup>100</sup> 由上述論述來看，除了自早期 Wittfogel 主張社會的整體研究外，更加入帕森斯的概念，應可理解為非是注意社會的性質，而是更在意社會內部的構造、互動等。

但遼朝的特殊性，卻因為早期研究者以同化的觀點進行解釋，而產生誤解，所以必須使用新的涵化觀點進行解釋，則不只可以適用遼的案例，更可擴大使用金、元、清，甚至到對中亞地區國家的考察上。<sup>101</sup> 另一方面則是上述提到的可以對了解亞洲的權力比較研究進行補充。<sup>102</sup>

如此先將中國史上的王朝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典型中國朝代，另一類是征服與滲透王朝。<sup>103</sup> 再進一步比較遼、金、元、清四個朝代後，在征服者本身的生業可以發現可分為游牧民族與擁有牧群的農業民族兩類，<sup>104</sup> 進一步理解這些民族與中國文明的互動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類：遼是文化抵抗型、

---

<sup>100</sup>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p1-4.

<sup>101</sup>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p4-6.

<sup>102</sup> 湯淺赳男，〈「東洋的專制主義」論の今日性：還ってきたウィットフォ-ゲル〉（東京：新評論，2007），頁 229。

<sup>103</sup>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p4-6；田村實造，〈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東洋史学研究の一動向—ウィットフォ-ゲル「中国征服王朝理論」その他—〉，《史林》33：1（1950年1月），頁 80-81；李明仁，〈中國史上的征服王朝理論〉，收入臺灣歷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認識中國史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0），頁 110。

<sup>104</sup>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16.

金是文化讓步型、清則是處於前兩者中間的過渡型。<sup>105</sup> 征服王朝之外，可以發現北魏的狀況不同於前四個王朝，由於是主動或被動的先進入中國境內居住，以滲透的方式建立政權，所以稱為滲透王朝。但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兩者的界線是移動的，但兩種方式最後都形成複雜的二元社會，兩者的制度與文化形態均無多大區別。<sup>106</sup>

Wittfogel 在導論中雖也有專門討論對內陸亞文明的新看法，但由於其研究的主體並非遊牧民，且當時的研究目的是考察中國史，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討論社會構造、軍事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等面向都不夠深入。

再從整本書的組成方式來看，也可對本書的立場有更集中的理解。本書在導論之後，接著是有關《遼史》正文的選譯、註釋，作者將整本《遼史》分為 16 個主題，每個主題先有一篇序論探討該主題的重要性，之後接著選譯。前面已提過，Wittfogel 認為正史是研究中國社會的重要資料，所以才有「中國歷史編纂計劃」的出現，但是由於資料太過龐大，所以需要有一個統一性的解釋框架，才能更有效率的研究。再加上龐大的資料中也有重覆或不甚重要而不需翻譯的部分，所以採用選譯的方式來做資料的剪裁，另一方面，由於近期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理解到將不同面向的資料加以整合的重要性，而中國歷史經常忽略動態關係的理解，所以分類的作法雖然也會有重覆的情形，但卻是為了呈現其社會做為一個整體，及其脈絡下的動態關係與制度本身的複雜性。<sup>107</sup>

本書出版後，做為第一部系統的選譯中國正史與進行整體分析的專著，歐美學界大多是肯定稱讚的評價。<sup>108</sup> 而從 Wittfogel 個人的學術研究史來

---

<sup>105</sup>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p24-25.

<sup>106</sup>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p15-16.

<sup>107</sup>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p26-29.

<sup>108</sup> Lien-sheng Yang, *Sinological studies and reviews*. Taipei city: Shih-Huo Publisher Co.,1982,pp129-150.;張廣達，〈魏特夫與艾博華教授〉，收入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

看，早先受到馬克思與韋伯的影響，對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官僚制研究、人類整體的比較研究產生興趣，其後陸續接受自然地理學等學科的訓練，到 1930 年代前往中國後，陸續接觸中國學者，接觸相關資料與研究，逐漸的摸索出本身對於東洋社會的理解（主要是以中國為主）。

在 1936 年開始執行「中國歷史編纂計畫」後，試圖從人類如何與自然共存而發展出來如遊牧、畜牧、天水農法、灌溉農法等方式，進而產生人類如何適應自然而發展上述生業，如何管理社會的問題。發展後，商品經濟如何開展，進而形成各式各樣的文明史的概念出發，<sup>109</sup> 處理從中國史的立場來看中國王朝・遼的發展問題。使用了文化涵化的理論，重新對遼、金、元、清四朝分析，提出「征服王朝」的概念。但從當時的學術趨勢來看，本書始終是做為歐美學界研究中國史的一個重要成果，仍是在中國史的範疇下來研究，雖然作者已經認識到契丹、女真、蒙古、滿州等民族有別於漢民族。而另一方面，本書的研究成果，也是作為《東洋專制主義》裡中國水利社會中的一部分。<sup>110</sup>

## 二、征服王朝論與異民族王朝論的比較

異民族王朝論於 1943 年發表，征服王朝論則晚了 6 年，兩者同樣是對中國史中的非漢民族王朝進行分析概括，但在學術脈絡與研究方法與概念有著不小差異，所以便從基本概念、學術脈絡、研究方法三方面進行分析討論。

---

術》，頁 209；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第五章〈魏特夫與近代中國學術界〉，頁 264-265。

<sup>109</sup> 湯淺赳男，《「東洋的專制主義」論の今日性：還ってきた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東京：新評論，2007），頁 218。

<sup>110</sup> カール・A・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著、湯淺赳男訳，《オリエンタル・デスポティズム：専制官僚国家の生成と崩壊》（東京：新評論，1991），頁 237-238、405-408；湯淺赳男，《「東洋的專制主義」論の今日性：還ってきた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東京：新評論，2007），頁 72-73。

表 3-2：異民族王朝論與征服王朝論比較

	異民族王朝論	征服王朝論
發表年代	1943-1944	1949
補助機構	東亞研究所 東方文化學院 東方文化研究所	哥倫比亞大學 洛克斐勒基金會
基本概念	南北對立 支配⇔被支配	征服、滲透 涵化
學術脈絡	融合中國傳統考據學+ 德國的東方學= 日本東洋學	受到 Karl Marx 與 Marx Webber 的影響，社會學的分析
研究方法	歷史學	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
成果	1. 建立北亞民族的主體性 2. 異民族王朝論	1. 歐美學界第一本翻譯史料之專著 2. 征服王朝論

資料來源：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4）。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從上表來看，首先，異民族王朝論的提出雖比征服王朝論早，但由於補助機構的性質上，東亞研究所是日本政府的外圍研究機構，所以在為政府服務提供參考的「資治」傾向相當強烈；而哥倫比亞大學的部分則顯得學術性較強。在統治政策部分，日本學者仍然較為詳細。但 Wittfogel 的重點在於提出從文化涵化的角度進行分類，但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未進行分類（參見表 4）。

再從學術方面來看，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自明治末期以來，已自成一體系，從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論點初步建立亞洲大陸北方民族（即後來的北亞民族）的主體性，而最後歸納成果及撰寫序說的是東大出身的中村治兵衛，承續使用「南北對立」將全書貫穿。相比於 Wittfogel 的主要觀點是涵化，背後的結構仍是以理解中國社會史為目的，來補全對東洋專制主義的架構，

始終是中國史的框架，導致了其侷限性。

其三，對於北魏、遼、金、元、清等王朝的統治型態的研究，日本學術研究的累積較有體系且更為深厚，對於各王朝的基礎研究與歸納較為完整；Wittfogel 是以遼代社會史為主題進行研究，再延伸出對北魏、金、元、清王朝的歸納，並提出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的概念。兩者的核心概念都在於「少數異民族統治多數漢民族」，進而衍伸出的類型中，有別於漢民族王朝的特色，但對於各王朝的特色概括則各有側重。（參見表 4）

研究方法方面，東亞研究所主導的這個調查案，是將歷史學中相關領域的學者匯集而成；Wittfogel 則是以歷史學為主，更廣泛的利用語言學、人類學等研究成果，是跨領域的研究成果。

表 3-3：異民族王朝論與征服王朝論比較表

	異民族王朝論		征服王朝論
分類基準	支配形式		
北魏	軍事	無提及	
	行政	徹底的漢化政策	無提及
	協力民族	無提及	
遼	軍事	斡魯朵軍	二元軍事制度
	行政	二元行政制度	
	協力民族	奚人	無提及
金	軍事	猛安謀克制	
	行政	以漢制漢	漢化政策
	協力民族	契丹人	外族
元	軍事	千戶、萬戶制	無提及
	行政	身分制、重用色目人	無提及
	協力民族	色目人	
清	軍事	八旗制	
	行政	滿人擁有絕對主導權	
	協力民族	內蒙古人	無提及

資料來源：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大日本雄辯会講談社，1944）。

Wittfogel ,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 with Feng Chia-sheng,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 第三節 日本對征服王朝論的繼承與批判

1949年，在Wittfogel與馮家昇共同發表*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後，在日本學界引起熱烈討論，本節依時間論述日本學界對征服王朝的討論。

#### 一、白鳥、田村的北亞史研究：前Wittfogel時期

自明治晚期以來，以東京大學白鳥庫吉開始，持續的發展東洋史是南北兩民族對抗歷史的論點。京都大學內藤湖南則認為東洋史是以中國為中心發展，進而影響周邊的歷史。兩者對於東洋史的概念截然不同，對於東洋史上的匈奴、鮮卑、柔然、突厥、蒙古等族也就有著不同的看法，前者認為將以遊牧為生業的匈奴、突厥、蒙古與以狩獵與農耕為生業的契丹、女真，都稱為北方民族、北族等稱呼。後者則是稱之為中國周邊民族。

隨著對於上述北方民族的研究越來越多，研究者如松田壽男等人已經發覺研究上的限制（主要是史料），導致無法給予歷史上的北方民族更多主體性，故而進一步提出拓展新史料的呼籲。

在上述背景的發展下，1948年，京都大學田村實造發表〈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sup>111</sup>此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試圖發展出獨立的北方民族史。田村實造首先提出東方史（oriental history）的概念：

目前為止，我國所謂的東洋史，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史，所謂東洋，是相對於西洋。東洋史的範圍也包含西南亞、印度等地，是與亞洲史有相同的範圍。如此，做為亞洲史的東洋史，至少可以很當然的認為有兩個歷史世界包含其中。即，包含西南亞及印度的伊朗·亞利安世界，是為西方史；包含中國及其北方地域的蒙古、滿洲的支那·蒙古世界，是為東方史。此外還有印度支那、馬來、爪哇等所謂的南海地方，被稱為突厥斯坦的西域地方。……

<sup>111</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36-48。

我們所說的東方史，……，與狹義的東洋史幾乎相同。<sup>112</sup>

在上述田村實造的論述中，針對東洋史的定義發表了本身的東洋史設定，首先將東洋分為東方與西方兩部分，另外再附加西域與南海兩部分。再進一步的將東方史分為中國與北方地域兩部分。接下來田村實造論述東方史裏中國與北方地域的關係，其認為：

當前我們所謂的東洋史，從構成上來看，完全是中國史，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圈的歷史。關於突厥族、蒙古族、通古斯族等北方民族，與漢民族對抗，在東方史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被稱為北狄或塞外種族，……，完全只是附屬於中國史的一部分。這是正確的東洋史或東方史嗎？<sup>113</sup>

上述說法，無疑是從北方民族的角度，檢視內藤湖南對於東洋史的設定，田村實造認為因為本民族史料的缺乏，導致無法構成自身的歷史世界。<sup>114</sup> 至此，田村實造進一步的提出白鳥庫吉的南北對抗論與宮崎市定的觀點，強調南北兩民族的二元對立。<sup>115</sup> 那麼，接著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北方民族的歷史世界成立。田村實造提出四點：一、上述北方民族活躍的舞台，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廣義來說，東至滿洲利亞，北至西伯利亞，西至中亞，成為一個地域整體，與中國本土是不同的地理世界。二、在生產樣式上，或遊牧，或狩獵與一部分農耕，與南方農耕漢民族在本質上有所差異。三、漢籍史料中的北方民族，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是以一部族為中心，吸收其他諸族，構成部落連合體的國家，至此可看出北方民族歷史的連續性。四、北族（北方民族之簡稱）國家支配的原則是絕對權力，君長必須有勇敢、具備才能、公平的人格特質，由君長的領導而興亡。<sup>116</sup> 田村實造以上述觀察為基礎，進行北方世界的分期。第一期是 B.C.300 至 A.D.900，北方民族統合為部落連合體的遊牧國家向南方民族展現優勢武力，南方民族則以強勢的政治、文化力

<sup>112</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 36-37。

<sup>113</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 36-37。

<sup>114</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 37。

<sup>115</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 37。

<sup>116</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 38-39。



影響北方，是兩元對立並交互影響時期。第二期是 A.D.1000 至 AD.1400，北方民族受到隋唐文化影響，產生民族自覺，進而發展併吞南方世界，是北方民族以武力統一南北兩世界的時期，建立不同於前期的國家型態。第三期是 A.D.1400 至 A.D.2100，此時期的清朝，不同於第二期的元朝，致力消除民族對立，懷柔漢民族，而清朝也是北方民族發展的終點。<sup>117</sup>

這篇論文應該能看做是當時總結北亞民族史研究的綱要，從表 3-4 中可看到田村實造所發表過北亞史的相關論文，可見最早至 1935 年，田村實造就已經有南北對立的意識，直到 1950 年介紹征服王朝理論前，已發表三篇相關論文或概說。再者，我們也可以自田村實造的論文中，

表 3-4：田村實造發表北亞史相關論文一覽表

時間	論文與專書篇章
昭和 10 年 9 月	北方民族と支那文化
昭和 23 年 6 月	北方世界の成立—東方史のはじまり
昭和 23 年 10 月	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
昭和 25 年 1 月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東洋史学研究の一動向—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中国征服王朝理論」その他—
昭和 27 年 2 月	アジアの社会の後進性と遊牧民族との歴史の関係
昭和 30 年 7 月	世界史の構造と東洋史
昭和 31 年 11 月	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國家の類型
昭和 39 年 6 月	世界史とのアジア構造
昭和 40 年 6 月	世界史からみた東洋史の構造
昭和 40 年 10 月	北アジア世界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看到對於北亞遊牧國家型態的研究與後來所謂征服王朝的特徵，如遼朝的二元體制、元朝的蒙古至上主義等，這些概念在此時已經被田村實造歸納為北方世界發展第二期的特徵。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我們可以發展這些特徵都是之後接受征服王朝概念後，仍然繼承與發展的概念。所以我們必須說，日本學界關於北亞史的研究成果，在征服王朝論引進日本前，已經有開始總結的趨勢。

<sup>117</sup> 田村實造，〈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頁 40-48。

## 二、田村實造等學者對征服王朝論的介紹與研究

1950年，田村實造首先發表〈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東洋史学研究の一動向—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中国征服王朝理論」その他—〉，<sup>118</sup> 是對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的介紹與討論，文中主要的重點除了詳細介紹該書的內容與觀點外，在於田村實造陸續提到三個問題：1. 儘管已將遼、金、元、清作為征服王朝而分類出來，但其中對於政治、文化、社會上的關係，遼、元仍是有所差異。2. 作者雖提出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的論點，但並未多加說明；如從制度與軍事組織的角度來看，必須注意到北魏與前燕可以說是征服王朝的祖型。3. 中國史上征服王朝的特徵之一就是包含牧畜與農耕的複合社會類型，而牧畜體制則是培養武裝力量的關鍵，如果這點消失，則王朝也隨之崩潰。4. 從官吏任用制度看到兩種制度接觸後的變化。<sup>119</sup>

此文重要處在於率先對 Wittfogel 的成果做出介紹與討論，在肯定其成果代表當時美國學界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前提下，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這無疑是立基在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上所做出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田村實造提出的第2點，將前燕與北魏認定為征服王朝的祖型。此說法有別於 Wittfogel 的滲透王朝說，更具體的讓人聯想到，征服王朝的發展是否可以追溯到更早，進而提出一個征服王朝的發展系譜。

1953年（昭和28），小林高四郎發表〈征服王朝の諸性格〉，<sup>120</sup> 作者歸納其特性有四：一、以少數統治多數時，在多民族國家中，支配方式中，如遼重用渤海人、金重用契丹人等都成為其特色。二、由於沒有以本民族語言書寫的史書等材料，所以其歷史存在著曖昧性，也就是有被歪曲的可能。三、Wittfogel 僅從中國史、邊境史的角度來看征服王朝，是無法確實了解征服王朝的本質，其本質就是異民族支配，這從官制、文化政策可以看到，並非一味遵循漢文化，如清的薙髮令。四、征服王朝對於被支配民族的反抗，

<sup>118</sup> 田村實造，〈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東洋史学研究の一動向—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中国征服王朝理論」その他—〉，《史林》33：1，頁78-88。

<sup>119</sup> 田村實造，〈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東洋史学研究の一動向—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中国征服王朝理論」その他—〉，《史林》33：1，頁84-86。

<sup>120</sup> 小林高四郎，〈征服王朝の諸性格〉，《歴史教育》1：3（1953年11月），頁69-75。

也有其政策，如清的文字獄，來嚴禁華夷意識的發展。<sup>121</sup>

### 三、田村實造的北亞歷史世界

1956年（昭和31）11月，田村實造發表〈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國家の類型〉一文，作者首先定義北亞的範圍：「以蒙古利亞高原為中心，東邊以興安嶺與滿州利亞相隔，西邊以阿爾泰山與準噶爾利亞相隔，再與中亞大草原相連，南邊則是以陰山、祁連山、天山山脈與中國相隔。」<sup>122</sup> 接著作者使用文化圈的概念，<sup>123</sup> 將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與以蒙古利亞為中心的北亞文化圈區分開來。其二從匈奴、鮮卑、突厥、回鶻等遊牧民族，依時間論述，將其建立的國家類型分為以遊牧為主要經濟來源的遊牧國家型與以牧農混合政權形式成立的征服王朝型。<sup>124</sup> 同年12月田村實造接著發表《北アジ

<sup>121</sup> 小林高四郎，〈征服王朝の諸性格〉，《歴史教育》1:3，頁71-74。此外，昭和29（1954）年，小林高四郎發表〈元代社会における「文化変容」小考〉，從羽田亨對蒙古至上主義的研究與Wittfogel的涵化論點相互檢視，認為進入漢地的蒙古貴族雖標榜蒙古至上主義，但始終有意無意的漢化，而進入漢地的一般蒙古人也快速漢化。而羽田亨對於北魏、遼、金、元、清與漢文明的互動方式與同化程度有其見解，可參見羽田亨，〈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原刊1928）、〈支那の北族諸朝と漢文明〉（原刊1928）、〈漢民族の同化力説に就いて〉（原刊1944）等諸文，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北魏、遼、金、元、清王朝與漢文明的互動關係已經很早就已注意到。上述羽田亨諸文收入氏著《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 上卷 歴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57）。參見小林高四郎，〈元代社会における「文化変容」小考〉，《社会労働研究》2（1954年11月），頁38-50；後收入氏著《モンゴル史論考》（東京：雄山閣，1983），頁101-117。

<sup>122</sup> 田村實造，〈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國家の類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4（1956年11月），頁475。

<sup>123</sup> 二戰後，戰敗的日本，在各方面開始進行檢討，其中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有眾多討論，如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和辻哲郎提出的風土論的被批判等，對於世界的設定也從東洋史、西洋史的體制，轉變為世界史。在眾多討論中，專長為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石田英一郎提出使用文化圈的概念，來理解世界史的原則。其認為主要的核心概念是如牧畜社會或農耕社會一樣，在相異的基盤上，長期隔離成長的數個文化複合體，各自也有一定的空間。有血肉的世界史中，不問文獻紀錄的前後，縱向內部的發展及發展階段與橫向並存的文化圈之形成與其傳播、擴大、接觸等運動，都是具有同樣的重要機能。參見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29-30。

<sup>124</sup> 田村實造，〈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國家の類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4，頁

アにお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一文，<sup>125</sup> 與前文相比，本文在國家類型的分析與北亞時代區分問題論述更為詳細。<sup>126</sup> 在國家類型上，遊牧國家屬於以氏族制為基礎的部族連合體國家，征服王朝則將氏族制打破進行重新編整，以強化中央權力。在時代分期上，遊牧國家屬於古代，征服王朝則為中世。<sup>127</sup>

如果將〈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國家の類型〉、《北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等三篇綜合來看，無疑是論述越見成熟。

#### 四、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概念及其主編的《北アジア史》

##### （一）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概念

自 1934 年（昭和 9）、1956 年開始，江上波夫先後發表〈考古学上より観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人類社会における農耕民型と遊牧民型〉，從考古學論證遊牧民與農耕民的差異。<sup>128</sup> 這可以視為江上波夫的對於歐亞大陸對於遊牧民與農耕民在歷史上各種類型之分析與歸納，提出歐亞大陸的全體像。<sup>129</sup>

1948 年（昭和 23），江上波夫出版《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將整個亞洲根據自然環境的不同，分為五塊地域，分別是溼潤地帶的農耕民族、乾燥地帶的遊牧民族、中間山岳地帶的半農半牧民、亞溼潤地帶的

---

482-490。

<sup>125</sup> 田村實造，〈北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京都：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会，1956），於 1962 年修訂，再於 1964 年收入氏著《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 上》（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4），頁 1-58。

<sup>126</sup> 田村實造，〈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國家の類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4，頁 490-491。

<sup>127</sup> 田村實造，《北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世界の形成》，頁 53-56。

<sup>128</sup> 江上波夫，〈考古学上より観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8 人類史の構想》（東京：山川出版社，2001），頁 59-100；江上波夫，〈人類社会における農耕民型と遊牧民型〉，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8 人類史の構想》，頁 101-110。

<sup>129</sup>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1967 年版），頁 viii。

狩獵民、半狩獵農耕民與半狩獵半遊牧民（此兩類視為一種）五種。<sup>130</sup> 江上波夫進一步論述乾燥地帶的遊牧民族得知掠奪資源的好處後，轉化為騎馬民族，逐漸發展為東洋史上的南北對抗，<sup>131</sup> 進而影響到中間山岳地帶的半農半牧民與亞溼潤地帶的狩獵民也轉化為騎馬民族。上述概念除了補充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論外，「騎馬民族」概念也被提出。

## （二）概說書：江上波夫主編的《北アジア史》

在田村實造介紹征服王朝理論時，也就是 1956 年，山川出版社也發行了世界各國史系列叢書，第 12 冊為《北アジア史》。<sup>132</sup> 編纂者的陣容也都是時之選，由江上波夫主編，纂寫的有護雅夫、山田信夫、村上正二、板本是忠、外山軍治、神田信夫、末松保和、旗田巍、佐藤長、松村潤。<sup>133</sup> 書中的〈序說〉認為歷來都是以中國民族的發展為主，周邊民族的發展為輔的歷史認識，但是這樣忽略了歷史上的發展也有以周邊民族發展為主的時期，而且文化在本質上也是完全相異。周邊民族中的相互關係也時常被忽略，所以將中國周邊民族的歷史與中國史分開論述。<sup>134</sup> 進一步說，以蒙古利亞、南西伯利亞、滿州利亞、朝鮮為中心的民族史就是北亞史，以印度支那、泰國、緬甸、印尼為中心的民族史就是東南亞史。西藏與北亞、東南亞都有很深的關係，因為是以藏傳佛教文化圈為中心，與蒙古利亞、滿洲利亞的政治與文化都有特別的聯繫，所以其歷史被放在北亞史的附編。<sup>135</sup>

此書也將最新的概念介紹給讀者，首先是將遊牧國家與征服王朝論點納入，在論述遊牧國家的篇章時，護雅夫認為遊牧國家大體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匈奴至突厥時期，以氏族制為基礎形成的部族連合國家，為大統一時

---

<sup>130</sup>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2 東アジア文明の源流》（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 25-128。

<sup>131</sup> 江上波夫，《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2 東アジア文明の源流》，頁 66。

<sup>132</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61）。

<sup>133</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3。

<sup>134</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1-2。

<sup>135</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2。

期。<sup>136</sup> 第二期則是 Toquz Oguz、葛羅祿、可薩汗國為代表的純粹草原遊牧國家的並立時期。<sup>137</sup> 第三期則是突厥斯坦的回鶻汗國與哈喇汗國、進入東方的契丹國、統治伊朗的 Oguz，特色是以草原世界的邊緣中心，實行征服王朝的建設。<sup>138</sup>

在論述遼的篇章時，山田信夫認為：

……帶有上述特徵的王朝，現在被稱為征服王朝……。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擴大發展規模的征服王朝之現象，當時也是中國史、東亞史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主角們出身的亞洲北方世界史的問題，這與突厥斯坦的成立相同，是做為牧民社會文明化的潛在因素。<sup>139</sup>

從叢書的構成來看，關於東洋的部分有中國史、印度史、西亞史、日本史。從東洋、西洋、日本的三分體制來看，東洋有中國、北亞、西亞、印度四部分，我們可以試著將中國視為東亞，印度視為東南亞，所以此時的北亞等於滿州利亞、蒙古利亞、中亞，此外還有地位較為曖昧的西藏。

在內文的構成也是分成四編（先史時代、蒙古利亞、滿州利亞、朝鮮）與附編（西藏），也就是從上述五個地域來論述，在加上各篇的執筆者不同，缺乏一條能夠貫穿全書的線，像是將五個小地域史拼湊為一個中地域史。不過本書的重要之處在於，是提出對於中國周邊民族史脫離中國史的論述。但這樣的說法是以白鳥庫吉的南北對立論點為基礎。

1961 年（昭和 36），村上正二發表〈征服王朝〉，<sup>140</sup> 首先藉由比較歐洲與亞洲的社會型態，認為前者是農牧一致型，後者是農牧分離型，所以農牧分離型才導致兩者的對立關係。<sup>141</sup> 遊牧社會對於馬匹使用方式的改進，產

<sup>136</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25。

<sup>137</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64。

<sup>138</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64。

<sup>139</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81。

<sup>140</sup> 此文雖為〈征服王朝〉，但綜觀內文，自環境開始，對比歐亞兩洲，可說是一篇很詳細的北亞史導論，故放在此處。參見村上正二，〈征服王朝〉，收入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世界の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變貌》（東京：筑摩書房，1961），頁 147-185。

<sup>141</sup> 村上正二，〈征服王朝〉，收入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世界の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變貌》，

生了與農耕社會對抗的遊牧國家。遊牧國家在歷史發展中的系譜則是：匈奴、柔然（初期遊牧王朝）→南匈奴、北魏（滲透王朝）→突厥、回鶻（後期遊牧王朝）→遼、金、元、清（征服王朝）。<sup>142</sup>

值得注意的是，江上波夫在〈序說〉中也提到上述的「騎馬民族」概念，認為北亞史的主要推動者是乾燥地帶（蒙古利亞）的遊牧騎馬民，與滿洲利亞的狩獵民等也對歷史推動有很大的影響力。<sup>143</sup> 可見到此處江上波夫已將前述的五塊地域的分類融入北亞中，但騎馬民族的部分則尚未明確，主要的觀點仍是要先將北亞史自中國周邊史劃出。

### （三）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國家論

1967年（昭和42），江上波夫出版《騎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一書，此書提出騎馬民族國家的概念，考察遊牧民族在北亞建立的遊牧國家（匈奴、突厥、鮮卑、烏桓）與中國建立的征服王朝（北魏）的歷史；其後與日本的大和王朝進行比較研究，最後提出大和王朝是由東北亞的夫余系騎馬民族的辰王朝，經由南部朝鮮，到達北九州，與在地勢力建立的聯合王朝。<sup>144</sup>

此假說是江上波夫在考察文獻、考古等資料的基礎上所提出，在當時的學界引起相當大的論爭。<sup>145</sup> 此處主要考察江上波夫對於騎馬民族國家概念的提出及其與北亞史研究的關聯，不觸及日本古代史的相關討論。

首先考察江上波夫書中的〈序言〉，其中提到三階段的歷史研究法，一、史料的復原。因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史料是難以復原到原貌的，僅能儘可能的復原。二、比較研究或是分類研究。將史料相互比較，對於全體像進行設定，決定史料的相對位置，此步驟沒有固定的步驟或方法，需要視情況而決定進行方式。三、總合研究。設定全體像之後，從不同的角度反覆的考察

---

頁 152。

<sup>142</sup> 村上正二，〈征服王朝〉，收入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世界の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變貌》，頁 159-167。

<sup>143</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3。

<sup>144</sup>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頁 329-330。

<sup>145</sup> 參見江上波夫，《江上波夫の日本古代史：騎馬民族說四十五年》（東京：大巧社，1992）；江上波夫、佐原真，《騎馬民族は来た！？来ない？！》（東京：小学館，1996）。

設定的內容，確定結果未有矛盾，將其組合。<sup>146</sup> 此序言的重要性在於揭示江上波夫的方法論。

其中有關騎馬民的設定上較先前的著作，如《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北アジア史》更加明確，江上波夫認為：

如上所述，因亞洲地理環境的差異，在前述 4 個地域中（筆者註：1. 溫暖濕潤地帶—農耕 2. 內陸歐亞乾燥地帶—遊牧、綠洲農耕 3. 亞濕潤地帶—狩獵 4. 西南亞乾燥地帶—遊牧、農耕），遊牧民的主要地域是內陸歐亞、西南亞的乾燥地帶，此兩地域是騎馬民主要的發源地，也是活躍的舞台。在此二地域中，某個時期或可說遊牧民即騎馬民，兩者為一體的存在，因此也稱為「遊牧騎馬民」是恰當的。但是不能將騎馬民都視為遊牧民。因為狩獵民、半獵半農民、半獵半牧民、半牧半農民也是騎馬民的決不在少數。特別是北部歐亞的森林地帶、內陸歐亞的乾燥地帶及其接壤地帶，或是從內陸歐亞的乾燥地帶到季風的濕潤地帶間的過渡地帶，都有非遊牧民的騎馬民出現。但是上述的非遊牧民的騎馬民儘管不少，卻都是受到鄰遊牧騎馬民的影響而成為騎馬民的，在歐亞大陸騎馬民的出現、發展裏，遊牧民族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這是必需重視的。<sup>147</sup>

從上述江上波夫的論述，使用「騎馬民族」<sup>148</sup> 一詞來涵蓋歐亞大陸的各種非農耕民，包含遊牧民、狩獵民、半獵半農民、半獵半牧民、半牧半農民等。這些熟悉騎馬技術的集團成為推動世界史的重要推手。

江上波夫在書中對於中國史上由鮮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多有著墨，將

<sup>146</sup>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頁 iii-vi。

<sup>147</sup>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1967 年版），頁 10-12。

<sup>148</sup> 江上波夫將騎馬遊牧民為代表，形成的國家稱為騎馬民族。但林俊雄認為，所謂「民族」一詞，是在歷史學中結合國家與政治權力所使用的詞彙，用以指涉近代政治上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或是對於從國家中獨立的集團之稱呼。如此，現代的政治家將民族視為從古代到當前的連續存在體，而屢屢使用。……但在無法忽略時代變遷的歷史學中，如此的「民族」概念之使用，不由得要多加思考。所以林俊雄認為使用「騎馬遊牧民」來指涉古代歷史中的狀況似乎更恰當。參見林俊雄，《スキタイと匈奴：遊牧の文明》（東京：講談社，2007），頁 15-16。



其視為征服王朝，而非前面提及的 K. A. Wittfogel 所說的滲透王朝。其認為：

北中國裏的五胡國家，對於部族實施部族制，對於中國人則實施漢魏以來的郡縣制來進行國家統治，也就是所謂的二元體系的統治。這樣征服王朝的最完整形式就是契丹（遼）的北面・南面二元統治機構，成吉思汗的蒙古（元）的中國統治，原則上也是以二重統治的方式進行。拓跋珪以大決心進行諸部族的解散、部族民的編戶齊民、郡縣制。希望能達成王權強化、胡漢融合。在這樣的征服王朝中，能夠讓珍貴的胡漢一體得以實現的關鍵在於拓跋珪的軍事力。<sup>149</sup>

文中江上波夫將北魏視為征服王朝，而非滲透王朝，是相當值得注意之事。雖然北魏從拓跋珪開始，將國家從征服王朝帶向中國式集權國家，但其征服王朝的個性無疑在初期是相當明顯的。而北魏是否為征服王朝到目前仍是學界尚未解決的問題。

《騎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一書於 1991 年（平成 3）改版再刊。主要增補的有〈後記〉一篇，其重要之處在於，自 1967 年提出日本古代的大和王朝是來自於東北亞夫余系的騎馬民族後，其後在朝鮮、滿洲利亞、日本陸續出土的考古材料，都顯示江上波夫想法的正確性，〈後記〉就是總結這些考古材料的發現及其意義。

## 五、內陸亞、北亞、中央歐亞概念的重疊

1961 年，角川書店出版「図説世界文化史大系」叢書，第 13 卷為《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由江上波夫與松田壽男負責編輯。<sup>150</sup> 在松田壽男撰寫的序章中提到：

作為歷史概念的北亞與中亞，是以天山為分界線。前者以草原為主體，也包含凍原，地域上來看，以蒙古利亞、準噶爾利亞、哈薩克斯坦的大

<sup>149</sup>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1967 年版），頁 134-135。

<sup>150</sup> 江上波夫、松田壽男，《図説世界文化史大系 第 13 卷 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

草原地帶為中心，西伯利亞與滿洲利亞也包含其中。後者，即中亞，一般指涉將帕米爾夾在其中的東西突厥斯坦，這是以綠洲為基礎。而將位於其南，相當高的西藏也包含在其範圍的情況也相當多。可以說，除去凍原，全部都是乾燥地帶，屬於所謂乾燥亞洲的東半部。<sup>151</sup>

由上述論述，再對照 1938 年松田壽男的《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中對於乾燥亞洲的定義：「其地帶大概是自大興安嶺附近，貫穿蒙古利亞、土耳其斯坦，遠至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當然，此地帶以東連接滿洲平原，形成一漸移地帶，而西則到敘利亞海邊與安那托利亞，就是小亞細亞沿岸，……。整體來說，「乾燥文化地帶」大部分帶有遊牧生活之色彩。遊牧生活樣式可說是帳篷文化、綠洲文化、商隊文化，這就是遊牧民文化發生的基礎。」<sup>152</sup> 可確定松田壽男的乾燥亞洲是北亞+中亞+西亞，<sup>153</sup> 而北亞與中亞屬於乾燥亞洲的東半部，西亞則是西半部。另一方面，松田壽男也提到內陸亞的特殊性：

……內陸亞中，樹海的狩獵生活、草原的遊牧生活、漠島的農耕・商業生活，三段並立，各自活動，相互間可見到微妙而複雜的交涉。但是凍原的狩獵已超越原始狩獵的階段，草原的牧畜不是在農耕地帶中屬於農業副產物的牧畜，而綠洲所經營的農耕，也與中國或印度等地的濕潤平野農業的意義相異。北亞與中亞的歷史所內含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便是由此而生。<sup>154</sup>

從上述的松田壽男對於內陸亞洲的地域設定來看，其範圍包含北亞、中亞。

1962 年（昭和 37），長沢和俊發表〈近年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の研究動向〉，<sup>155</sup> 其中提到北亞史研究的成果豐碩，主要是理論的推進有極大進展，

<sup>151</sup> 江上波夫、松田壽男，《圖說世界文化史大系 第 13 卷 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頁 27。

<sup>152</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 21-23。

<sup>153</sup> 目賀田嘉夫，〈世界史における乾燥アジアの位置づけ〉，内陸アジア学会編《内陸アジア史論集 第二》，頁 215。

<sup>154</sup> 江上波夫、松田壽男，《圖說世界文化史大系 第 13 卷 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頁 33。

<sup>155</sup> 長沢和俊，〈近年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の研究動向〉，《史学雑誌》71：12，頁 51-68。

除 Wittfogel 的征服王朝論外，也整理出 Tonybee 的地理環境決定論、還原論、蘇聯學者的唯物史觀理論、Lattimore 的螺旋過程發展論等五種論點，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實證。<sup>156</sup>

1963 年（昭和 38），鴛淵一發表〈征服王朝〉一文，<sup>157</sup> 簡述征服王朝的概念與其在歷史上的發展。1966 年（昭和 41），松田壽男發表〈北アジア〉，<sup>158</sup> 此文也是站在北亞史從中國史脫離的立場論述，有別於田村實造等人與 Wittfogel 的對話，本篇大多的使用蘇聯學者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論述北亞遊牧社會史研究的問題，如弗拉基米爾佐夫。唯討論到遊牧與農耕之間的交流時，提到歷來征服王朝的研究多從中國史的立場考慮，而幾無從遊牧民的立場考慮。<sup>159</sup>

#### 第四節 突厥斯坦的成立—從東西交涉史轉為中亞史

在第一節中，已經論述了日本學界從 1935 年開始展開的乾燥亞洲史觀與東西交涉史，在研究開展的過程中，與北亞史研究發展時所遭遇到的狀況十分相似，欲超越漢文史料，所以不斷的尋找新的史料、切入角度、研究方法，希望建構出有主體性的中亞史，但始終無法超越漢文史料的限制。這樣的狀況始終未曾改變，那麼接下來的日本學者是如何持續努力的呢？

本節先自 1965 開始論述松田壽男提出的中洋史觀點，再接著討論山田信夫等人提出突厥斯坦作為突厥人的土地，在中亞史上的意義，最後在間野

<sup>156</sup> 長沢和俊，〈近年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の研究動向〉，《史学雑誌》71：12，頁 53。

<sup>157</sup> 鴛淵一，〈征服王朝〉，收入板野長八等編《講座社会科教育 第 10 卷 世界史Ⅱ》（東京：柳原書店，1963），頁 102-116。

<sup>158</sup> 松田壽男，〈北アジア〉，收入井上幸治、入交好脩編《經濟史学入門》第 3 分冊東洋經濟史学入門（東京：広文社，1966），後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2 遊牧民の歴史》（東京：六興出版，1986），頁 366-380。

<sup>159</sup> 松田壽男，〈北アジア〉，後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作集 2 遊牧民の歴史》，頁 380。

英二、森安孝夫爭論絲路對於中亞的特殊性，誕生了更為完整的中亞史。

## 一、中洋史—持續尋找主體性

1955年，松田壽男出版文庫版的《中央アジア史》，全書約70頁，在1935年所出版的《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後，此書可說是第二次嘗試，松田壽男在書中開宗明義說到：「從東西亞洲的交涉，再到亞洲與歐洲聯繫的觀點，概述中亞的歷史。……我認為中亞史需要自草原與綠洲兩者的對照來思考。<sup>160</sup>」另一方面，提到乾燥亞洲時認為：「乾燥亞洲是由沙漠、草原、綠洲等三種要素所組成。」<sup>161</sup>那麼由此來看，乾燥亞洲或中亞的世界史意義為何呢？松田壽男從對天山的考察中認為：「第一是東西的關係，在亞洲的內部，天山與綠洲並列，引導出國際貿易路線，讓亞洲文化與東亞得以交流。第二是在南北的方式中，遊牧民與綠洲民結合，這雙方相對的生活中發展各式各樣的關係。」<sup>162</sup>

藉由觀察上述的特點，松田壽男提出新的中亞史分期，共分三期。第一期是古代，自有史以來到9世紀前後，亞利安族居住於突厥斯坦，以商業活動與中國、蒙古、伊朗、印度等地互動。也因此導入了多元文化。第二期是中世，自9世紀回鶻進駐突厥斯坦到15世紀帖木兒帝國沒落，此時期的特色就是突厥—伊斯蘭文化，但南綠洲、北遊牧的生活差異仍存在。第三期是近世，15世紀末之後，歐人地理大發現後，中亞的商隊貿易逐漸沒落，導致中亞的沒落，諸方勢力進駐，也導致無法有自主地位。<sup>163</sup>

1966年，松田壽男出版《砂漠の文化：中央アジアと東西交渉》，松田壽男對於亞洲歷史的論述是奠基在所謂「風土」的概念，其先將亞洲分為

<sup>160</sup> 松田壽男，《中央アジア史》，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1 砂漠の文化》（東京：六興出版，1986），頁169-170。

<sup>161</sup> 松田壽男，《中央アジア史》，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1 砂漠の文化》，頁179。

<sup>162</sup> 松田壽男，《中央アジア史》，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1 砂漠の文化》，頁186。

<sup>163</sup> 松田壽男，《中央アジア史》，收入日比野丈夫等編、松田壽男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1 砂漠の文化》，頁224-225。

濕潤亞洲、半濕潤亞洲、乾燥亞洲三類，在此基礎上，風土的意涵為：「是以三地帶中的生活為特徵，生活在其中的人則創造各自獨特的歷史。」<sup>164</sup> 也由於松田壽男注意到上述的多樣性，再回頭思考戰後的世界史體系。其認為以西歐中心史觀創造出來的單一發展式的解釋，是無法解釋上述多樣性的地域，而中國史也是以王朝為單位直線論述，同樣無法處理。戰後則是擅自的將東洋史與西洋史合併為世界史，如此一來，兩者僅有在無法處理多元地域的這點是相同的之外，是無法處理像是遊牧生活、綠洲生活、海洋生活等多元地域。<sup>165</sup> 這樣的思考，應可自松田壽男本身是學習明治時代以來的西域南海史的學術背景來了解，才會讓松田壽男有如此思考。進一步來說，遊牧生活、綠洲生活、海洋生活分別衍伸出草原之道、綠洲之道、海洋之道，這就是絲路，<sup>166</sup> 也是東西交涉史的核心。

1971年，松田壽男出版的《アジアの歴史：東西交渉からみた前近代の世界像》也延續這樣的想法，試圖提出更完整的解釋體系。其認為：

現在的世界史，是西歐與中國兩個一元世界的歷史並存，是無體系的拼湊。……兩者之間的廣大部分，只不過是讓風吹過而已。……最近有不少教科書將此地帶以伊斯蘭來說明，雖有觸及到些許。但是，這是與西歐與中國全無關係的，只不過坐落其中而已。但是，其空白地帶的意義，實際上是很重要的。其與東洋、西洋都是各自不同民族的舞台。……將此廣大的地域稱為「中洋」，三洋史並立，各佔相同的比重。<sup>167</sup>

上述所論述的中洋概念，是松田壽男再進一步思考的結果，我們如果回到第一節所討論的部分，可以發現在提出乾燥亞洲概念時，松田壽男仍然在東洋史的框架中思考問題，希望能有超越漢文東洋史的東洋史。<sup>168</sup>

<sup>164</sup> 松田壽男，《砂漠の文化：中央アジアと東西交渉》（東京：中央公論社，1966），頁180。

<sup>165</sup> 松田壽男，《アジアの歴史：東西交渉からみた前近代の世界像》（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1），頁10-13。

<sup>166</sup> 松田壽男，《砂漠の文化：中央アジアと東西交渉》，頁181。

<sup>167</sup> 松田壽男，《アジアの歴史：東西交渉からみた前近代の世界像》，頁13-14。

<sup>168</sup> 松田壽男、小林元共著，《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頁238-239。

## 二、突厥斯坦的研究意義—突厥系諸民族對中亞的重要性

突厥斯坦（Turkestan），為波斯語，其意為突厥人的土地。自 19 世紀以來，主要是作用地理名詞而為人所知，其中又可分為支那·突厥斯坦（東突厥斯坦）與俄屬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再加上興都庫什山脈以南的阿富汗·突厥斯坦等三部分。<sup>169</sup> 突厥斯坦一詞作為地理名詞使用直到巴托爾德的研究出現後，才賦予其歷史意義，巴托爾德認為在六世紀西突厥的支配勢力到達阿姆河流域後，此詞開始有歷史上的意義。<sup>170</sup> 另一方面，在東洋史研究中，第二章所論及白鳥庫吉、桑原鷺藏、藤田豐八、羽田亨等人的西域史研究，也屬於日本早期的突厥斯坦史研究。1955 年，安部健夫出版專書《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為理解西回鶻國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間野英二、羽田明、小田壽典等人對中亞進行伊斯蘭的研究，開啟日後對學界對於中亞的突厥化、伊斯蘭化的研究。<sup>171</sup>

1966 年，愛宕松男發表〈西域史の第三展開—トルコ化する西域〉，<sup>172</sup> 此文本收錄在《世界の文化 15 西域》一書中，在其文之前尚有護雅夫的〈西域史の第一展開〉與松田壽男的〈西域史の第二展開〉。愛宕松男在此文提到：

9 世紀中葉，被黠戛斯擊敗而喪失外蒙古統治權的回鶻，分別向東、南、西三方向逃散，其中主力往西，以天山北路為據點重新建國，這個以別失八里為國都的新回鶻國，相對於外蒙古的故國，被稱為西回鶻國。……首先，蒙古利亞，就如同其名，是指涉為蒙古民族的活動舞台而發展的

<sup>169</sup> 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 463。

<sup>170</sup> 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 463。

<sup>171</sup> 堀川徹，〈<學界展望>中央アジア・テュルク民族史研究の展望〉，《東洋史研究》34：4（1976 年 3 月），頁 136-137。

<sup>172</sup> 愛宕松男，〈西域史の第三展開—トルコ化する西域〉，原刊於《世界の文化 15 西域》（東京：河出書房，1966），後收入氏著《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 第五卷 東西交渉史》（東京：三一書房，1989），頁 21-42。

地域。即自 10 世紀初開始，以契丹族為開端，到 13 世紀興起的蒙古族，從興安嶺到阿爾泰山的廣大草原，全部都是蒙古族的生活圈，所以將其稱為蒙古利亞是名實兼具的。在正確的意義下，與蒙古利亞的成立有直接關聯，就是突厥民族的動向從 Sogdiana 到伊朗的走勢獲得確認，而回鶻也持續西遷的事實。10 世紀末的哈喇汗朝、塞爾柱·土耳其朝、花喇子模朝等突厥系王朝的出現，確實是中亞史上重要的改變。在這個意義下，西回鶻國的成立，形成了西域史上重要的轉換期。<sup>173</sup>

此段論述很清楚的說明了自黠戛斯大破回鶻後，北亞草原的變化連帶影響中亞的形勢，更出現將民族名定為該地域名稱，如蒙古利亞與突厥斯坦。這也就是突厥斯坦成立的歷史背景。在此背景下，愛宕松男提到西回鶻國自游牧國家轉變為定居國家的過程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到，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文化、伊朗系文化的融合與對立。<sup>174</sup>

1971 年，山田信夫在上述巴托爾德與日本西域史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在〈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中論述突厥斯坦的歷史意義。其認為：

突厥斯坦成立的其中一個世界史意義，是以中亞為中心的民族分布之交替，而這是影響現代中亞情勢的第一步。9 世紀到 10 世紀間，在河西、天山、七河流域中，以回鶻、葛邏祿等族為名的突厥系國家的興盛，10 世紀末薩珊王朝滅亡，11 世紀，伽色尼王朝、塞爾柱·土耳其王朝等，可見到中亞的伊斯蘭化突厥系諸民族的南下，與進出西亞區域。此成為西亞地域突厥民族分布的基礎。……上述總括諸地域、諸民族之時，我們應能認為這是在 11 世紀的中央歐亞世界中，以突厥系民族為中心的民族移動期。這就是「突厥斯坦成立」的完成期，連 13 世紀的蒙古大

<sup>173</sup> 愛宕松男，〈西域史の第三展開—トルコ化する西域〉，收入氏著《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 第五卷 東西交渉史》，頁 22。

<sup>174</sup> 此部分山田信夫也同意愛宕松男的相關考察，請參考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 490；愛宕松男，〈西域史の第三展開—トルコ化する西域〉，收入氏著《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 第五卷 東西交渉史》，頁 23-30。

征服期都未能改變此民族分布。<sup>175</sup>

從山田信夫的論述中可以看到，自 9 世紀到 13 世紀間，突厥系民族在中亞的頻繁建立政權，成為中亞的主要民族；另一方面，再加上伊斯蘭教的傳入，形成了中亞往後的發展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 9 至 13 世紀時期，中亞頻繁興起的突厥系國家，山田信夫認為：

特別是在東亞史研究中，所謂的征服王朝幾乎是定型的專門歷史詞彙。如最近，已有學者試著考察與征服王朝相關聯的邊境王國。……在考察中亞的突厥諸王國的性格、歷史定位，與東亞史上的征服王朝，特別是有直接關係的遼、金、元、清合併時；事實上，可說有更深厚關係的西方的伽色尼王朝、塞爾柱土耳其王朝都不能忽略。或是東歐史上的俄羅斯各諸侯國到莫斯科公國的發展、匈牙利王國的成立，也都需要放在同一範疇考察。如此，做為歐亞舊世界各種現象的焦點之一，才能從更完整的角度思考突厥斯坦的成立。<sup>176</sup>

此處討論的把中亞的遊牧國家與東亞的征服王朝的納入同一個範疇進行考察分類。這樣的思考是可以理解的，自北亞史的立場來思考此問題，如以北亞為根據地的遊牧民或狩獵農耕民統治東亞的一部分或整體的王朝是為征服王朝的話，那麼自北亞西遷至中亞發展建立政權的回鶻，不也是同樣的狀況，僅有地域上的差異。但是由於東亞與中亞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結構完全不同，導致了完全不同樣貌的政權，如此將中亞的突厥系諸國家也納入北亞遊牧國家的發展系譜，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末處山田信夫提到，要從歐亞舊大陸的角度來思考，才能更完整的考察突厥斯坦的成立。那麼，如果上述的遊牧諸國家都是自北亞所出，為何山田信夫並無提出一個大北亞的概念，而是提出歐亞

<sup>175</sup> 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 489-490。

<sup>176</sup> 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 490。



舊大陸的思考呢？



## 第五節 北亞史對西藏史的接納與排拒

在第二章第五節中，我們討論了印度學、近代佛教學、西藏學的相互關係與發展過程。由於上述學科的脈絡並非與東洋史的德國脈絡一致，而是來自於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印歐語系的東方學傳統。以此發展的西藏學重視原著經典，所以具備解讀梵語、巴利語、藏語的能力，成為研究西藏學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能力，但西藏史研究，就處於較邊緣的地位。

直到二次大戰戰敗後，東洋史系統才逐漸體系性的發展本身的西藏史研究，主要的研究人物有佐藤長、石濱純太郎、山口端鳳等人。本節首先討論東洋史系統研究西藏史的過程，其次討論佐藤長等學者對於西藏史研究的重要性，最後探討東洋史中西藏的地位。

### 一、中亞史研究裏的西藏

東洋史系統的西藏史研究起於對史料的收集，羽田亨與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共同編輯的《燉煌遺書》，<sup>177</sup> 收入在敦煌出土的珍貴文獻，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卷》、《漢蕃對音千字文殘卷》等。伯希和、羅振玉、藤田豐八等人均對《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進行譯註，<sup>178</sup> 其中便有對於古代西藏的部落的相關記載，其後羽田亨校勘前面的譯註版本的錯誤，成為最可靠的版本。<sup>179</sup>

其後大谷勝真、松田壽男針對上述的出土材料進行研究，<sup>180</sup> 雖非是以西藏史為主題，但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已經開始接觸西藏史的相關材料。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藤田豐八、羽田亨、大谷勝真、松田壽男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sup>177</sup> ポール・ペリオ、羽田亨編，《燉煌遺書 第1集》（上海：東亞研究会，1926）。

<sup>178</sup>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藤田豐八，1911）。

<sup>179</sup> 羽田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原刊於《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史學論文集》（1941），後收入氏著《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 上卷 歷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頁610-629；Sato, Hisashi.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ibetan History in Japan." *Acta Asiatica* 64 ,p86.

<sup>180</sup>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考 Sato, Hisashi.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ibetan History in Japan." *Acta Asiatica* 64 ,p86.

都可將其歸類為中亞史研究者。中亞史研究與西藏的緊密性，與西藏與中亞在相鄰地域不無關係，但此時東洋史研究者仍不能說是直接研究西藏史。

## 二、佐藤長與西藏史研究

佐藤長（1913-2008），北海道旭川市人，就讀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科時，閱讀斯坦因、伯希和的中亞探險報告，與羽田亨先生、馬伯樂等人的論文而受到吸引，決定要以當時已蔚為風潮的塞外史（滿蒙史）與為研究方向，後以明朝宮廷與喇嘛教的關係為論文題目。1939年，進入大學院就讀時卻因思考到已經有很多名優秀的前輩開始研究（田村實造、羽田明等），所以選擇以西藏史為研究領域，題目為西藏的政治與文化。<sup>181</sup> 其後，佐藤長陸續跟隨原真乘、青木文教等學者學習西藏語，與此同時，也作為羽田亨的助手，整理《五體清文鑑》，藉此學到滿洲語、蒙古語、畏兀兒語等相關知識。1942年，佐藤長前往中國北京留學，經由青木文教介紹向筍薩克喇嘛丹巴達筍（bsTanpazlagrags）學習西藏語，期間也陸續前往各地考察。

戰後，佐藤長成為京都大學大學院的特別研究生，開始進行西藏史研究，除了從史料中輯錄相關記載外，利用藏文文獻、漢文文獻、敦煌出土文獻進行比較研究，其成果為1958年（昭和33）出版的上下兩大冊《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其後也出版《明代西藏史料 明實錄抄》、《兩唐書·吐蕃傳》的譯註等。延續著對古代西藏史中的歷史地理問題，在1978年（昭和53）出版《チベット歷史地理研究》，1981年（昭和56），出版《中世チベット史研究》，為西藏史研究奠定堅實基礎。

## 三、東洋史中的西藏

1956年，山川出版社發行《北アジア史》，其中西藏的部份為附編，主編江上波夫認為：

在世界各國史叢書中，將中國周邊民族歷史自中國史切離，其北邊的蒙古利亞、西伯利亞、滿洲利亞、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民族史歸為北亞史，

---

<sup>181</sup> 佐藤長、沈衛榮譯，〈謝恩—西藏史研究回顧〉，收入《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8；佐藤長，《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 上卷》（京都：同朋舍，1958），頁1-2。

其東南邊的印度、泰國、緬甸、印尼為中心的民族史歸為東南亞史。西藏與北亞、東南亞的關係都相當密切，其是以喇嘛教文化圈為中心，也考慮到其與蒙古利亞與滿洲利亞的政治與文化有特別聯繫的事實，故將其歷史作為附編放入北亞史中。<sup>182</sup>

但至 1981 年出版的新版《北アジア史》中，就無西藏史的位置。西藏史則是轉移到 1987 年（昭和 62）由江上波夫主編的《中央アジア史》，在其第一章〈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人種・民族・文化の形成と歴史の流れ〉提到：

廣義來說就是位於亞洲大陸的內部，以其水系沒有出海口的地域的總稱，其範圍是東以大興安嶺、陰山、南山等諸山脈為界，北以阿爾泰山脈、Tarbagatay 台地、哈薩克台地為界，南以西藏高原、興都庫什山脈、Zagros 山脈為界，西則以裏海、亞美尼亞高地為界。其中則包括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大部分、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的大部分以及甘肅省西部；另一方面則也包括舊蘇聯的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以及哈薩克南部，還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南半部，伊朗、阿富汗北部。狹義則是以亞洲大陸中央為重點，除去內蒙古自治區、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及伊朗，也就是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舊蘇聯為界的區域，與所謂的內陸亞洲的範圍大致相同。相對於廣義定義，狹義的中亞將重點放在亞洲的中央地域，在上述的地域中，除去東北方的內蒙古自治區、蒙古人民共和國、西南方的伊朗，也就是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指涉位於其東邊的中屬突厥斯坦，位於其西的俄屬突厥斯坦，與現在一般所說的內陸亞洲範圍大致相同。本書所包含的中亞史地域也就是狹義的中亞範圍。大致來說，就是東突厥斯坦（中屬突厥斯坦）與西突厥斯坦（俄屬突厥斯坦），以及被稱為西藏的南方所組成。<sup>183</sup>

自此可以看到西藏的定位從《北アジア史》中的曖昧地位，到被納入《中央アジア史》。

<sup>182</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56），頁 2。

<sup>183</sup>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頁 3-4。



## 第四章 北亞史與其鄰近區域的相互關係

本章第一節討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教育政策將世界史取代東洋史、西洋史後，當時已發展出體系的北亞史如何應該這樣的轉變。第二節討論朝鮮的定位，從北亞史轉變為東亞史，但也另有東北亞史的出現。第三節討論中亞史在間野英二提出以使用當地住民的原典史料研究的基礎下，提出南北共生為中亞史的主體性後，展開著名的「絲路史觀論爭」，最後中亞史的主軸為東西交流與南北共生。第四節討論中央歐亞概念的起源與日本學界對此概念的接納與批判。第五節討論西藏史在此時被歸類於中央歐亞史的範疇，另一方面石濱裕美子提出西藏佛教世界的概念。

### 第一節 北亞史概念與內陸亞史概念的整合

本節首先論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教育政策也將先前的東洋史、西洋史的分科體制改為世界史，研究者如何回應這樣的轉變。接著論述以東洋史概說書為基礎，探討東洋史架構中北亞與內陸亞概念的關係。最後則是以 1971 年（昭和 46）岩波書店出版的《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為基礎，探討世界史架構中北亞與內陸亞概念的關係。

#### 一、從東洋、西洋轉變為世界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必需負起戰敗責任的日本，在歷史學領域中也開始檢討反省，其中的課題之一就是檢討反省自明治以來的日本史（國史）、東洋史、西洋史的三分體制。<sup>1</sup> 在戰後初期的 1945-1955（昭和 20 至 30 年代），對於該如何重建新的歷史認識有相當多的討論，但限於篇幅，只能先討論與本文相關的部分。<sup>2</sup>

在相關討論中，最重要的課題應是如何處理橫（共時性，synchronic）與

---

<sup>1</sup>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頁 v。

<sup>2</sup> 相關部分請參考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中的第一章〈新たなる門出〉，參見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頁 1-51。

縱（貫時性，diachronic）的關係。首先是昭和 22 年（1947），石田英一郎提到對於世界史的理解是諸文化圈的並存與交涉<sup>3</sup> 文化圈理論的概念是來自民族學的概念，並且認為這應該是世界史學理論中最重要且唯一的原則，以此概念來整合橫與縱的關係。<sup>4</sup> 飯塚浩二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出發，提出從人與自然互動的關係，自不同文化間的接觸與交涉中，理解其內在的本質，進一步理解世界史。<sup>5</sup>

1949 年（昭和 24）4 月，日本新制的高校社會科，將東洋史、西洋史統整為世界史，雖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時間過於匆促，無法形成充分討論，使得當時撰寫世界史教科書的學者們都有無所適從之感，所以在教科書中的內容上，只是一定程度的將東洋史、西洋史混合，無法說是有體系的世界史。<sup>6</sup>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開始反省批判東洋史研究。松本善海在 1949 年 8 月撰文〈中国社会史の新たなる課題〉，其中提出東洋史在廣泛的吸收歐洲與中國學術後，使得塞外史與東西交涉史成為東洋史成為最興盛的研究領域；但發展出處理漢文史料的技術後，也陷入漢文史料的束縛。<sup>7</sup>

在這個背景下，如前面章節所述的松田壽男、田村實造等學者也陸續發表對於世界史的理解，以及從世界史的角度切入，提出對中亞、北亞的看法。此外，前田直典<sup>8</sup> 也發表〈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東アジアの連関性と発展性〉、〈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斡—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等

---

<sup>3</sup>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頁 29。

<sup>4</sup> 文化圈理論首先應用於地理學，後由德國學者 Fritz Graebner 等人再提出，此概念傾向於文化傳播的論點，是由許多文化元素構成的複合文化單位，同時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sup>5</sup>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頁 37。

<sup>6</sup> 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頁 67。

<sup>7</sup> 松本善海，〈中国社会史の新たなる課題〉，《史學雜誌》58(3)（1949 年 8 月），頁 92-93；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頁 63-64。

<sup>8</sup> 前田直典（1915-1949），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指導教官為加藤繁，其後就讀東大研究所時，指導教官為和田清，同時進入蒙古善隣協會附屬的蒙古研究所任職，當時的所長為白鳥庫吉，立志要專攻蒙古史，但因身體虛弱，患急性流行性腦炎，不得已同時休學與辭去蒙古研究所之職，兩年後才康復就學，期間陸續發表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的論文，如〈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等，但最後仍然不敵病魔摧殘，英年早逝。參見山田信夫，〈あとがき〉，收入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頁 347-358。

文，<sup>9</sup> 由於其對於中國史與北亞史都有研究，所以其對於世界史與中國史時代區分的思考都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在前田直典的論述中，東亞是以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包含滿洲、朝鮮、安南的歷史世界，更重要的是提出如果東亞是一個歷史世界，上述地域就會跟中國有關連性與平行性。<sup>10</sup>

從上述學者的討論來看，將東洋史、西洋史合併為世界史後，學者們除了思考如何正確的把握世界史外，還需考慮世界史與日本史（國史）的關係。但在體制改變為世界史的初期，世界史與日本史的關係，無疑仍需從東洋史的架構中重新考察。

## 二、東洋史體系中的內陸亞洲史與北亞史

1960年（昭和35），在《史學雜誌》第70編第5號裏，佐口透撰寫的中亞史的「回顧與展望」中提到：「此中所取的地域，包含內外蒙古利亞、東西突厥斯坦、以準噶爾為中心的哈薩克草原、西藏等地，為內陸亞洲。<sup>11</sup>」另一方面，同年也由松田壽男為首組成內陸アジア史学会。<sup>12</sup> 1967年（昭和42），在西嶋定生編的《東洋史入門》中，由山田信夫執筆的內陸亞洲部分，提到：

內陸、內陸亞洲是地理學上的概念。在歷史學上，決不是合理的地域區劃。但能便利的概括，故以內陸亞世界為主題。其中包含有歐亞的草原

<sup>9</sup> 上述論文，均收入氏著《元朝史の研究》。

<sup>10</sup> 前田直典，〈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原收入《歴史》1：4（1948），後收入氏著《元朝史の研究》，頁205。此文與〈東アジアの連関性と發展性〉，可和Fletcher, Joseph F., Jr.在1970年代的論文“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此文雖然討論的時間斷限與前田直典的論文有所差異，但對於世界史間的各區域的相互關係的討論是相同的。

<sup>11</sup> 佐口透，〈中央アジア〉，《史學雜誌》70：5（1960年5月），後收入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東京：山川出版社，1988），頁210。

<sup>12</sup> 此學會組成之前，松田壽男等人已經開始刊行《遊牧社会史探究》，至昭和53（1978）年停刊；學會組成後，首先發行兩冊《內陸アジア史論集》（1964、1979），昭和59（1984）年開始刊行《內陸アジア史研究》。第一任會長松田壽男、第二任會長長澤和俊、第三任會長吉田順一、第四任會長小松久男。



世界，也就是遊牧民世界，這是能視為一個歷史世界。接著是東西突厥斯坦的沙漠綠洲地域，再者是西藏方面的高原山岳區域。如果將上述地域視為小地域史來看的話，是被視為與東亞、南亞、西亞、上述的草原歷史世界的接觸地帶、中間地帶。<sup>13</sup>

上述可知內陸亞洲史的具體範圍，也可稱為乾燥地帶，與松田壽男的乾燥亞洲的東半部（不包括西亞）相當。值得注意的是，在《東洋史入門》中，東亞歷史世界的範圍是以中國為中心，包含日本、朝鮮、越南。<sup>14</sup> 如此，滿洲地域則不在東亞，也不在內陸亞洲。以此看來，內陸亞洲約等同於北亞加中亞，但滿洲則未曾提及，這是因為滿洲被視為中國東北地域而涵蓋於中國內。

1969年（昭和44），島田正郎執筆的《アジアの歴史》，此概說書與其他蓋概說書相比較為特別。此書的核心概念也是文化圈，以此將亞洲分為東亞、南亞、西亞、北亞，前兩者為濕潤亞洲，後兩者則為乾燥亞洲。<sup>15</sup> 觀看其章節，可看到各地域的構成，東亞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北亞則較為特別，包括滿洲、蒙古利亞、西伯利亞、中亞、西藏等5部分，並認為北亞等同內陸亞洲（乾燥亞洲）再加上西藏，其中有亞利安系、阿爾泰系、西藏系等民族，有共同的牧民生活樣態。<sup>16</sup> 但有趣的是，島田正郎的分類及其分類所涵蓋的地域，都有別於其他東洋史概說書，如內陸亞洲的定義多了滿洲，約等同江上波夫所編著的《北アジア史》，但少了朝鮮。

1971年（昭和46），田村實造發行《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 中》，其中有一篇〈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值得注意。<sup>17</sup> 其中田村

<sup>13</sup> 西嶋定生編，《東洋史入門》（東京：有斐閣，1967），頁75。

<sup>14</sup> 西嶋定生編，《東洋史入門》，頁11。

<sup>15</sup> 島田正郎，《アジアの歴史》（京都：啟文社，1966），頁15。

<sup>16</sup> 島田正郎，《アジアの歴史》，頁147-148。

<sup>17</sup> 此文的「中國征服王朝とその歴史的役割」與「ウイットフオゲル『中國征服王朝理論』の紹介・批評」的原刊日期是寫1949年10月20日，經筆者比對後是發表在1950年的《史林》。但「中國征服王朝とその歴史的役割」中的論述中有：「關於北亞世界是怎麼樣的世界，已在上卷第一章論述。」的語句，所以應該是在1964-1971年間所寫。「遊牧民族と農耕民族との歴史的關係—東アジアと西アジアの場合—」則是1968年所做，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頁623-655。

實造如同 1956 年（昭和 31）《北アジア史》裏山田信夫在論述遼代時提到的論述，提出 1.如何明確分辨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2.這一系列的征服王朝被視為中國史的一環，或者有別於中國史形成北亞歷史世界的一環；是否應該由包含中國史和北亞史高層次的立場考察，是做為東洋史家重要且趣味深刻的課題。<sup>18</sup> 在這裡可以看到田村實造對於征服王朝更進一步的思考，不僅是北亞史的一部分，如果將征服做為世界史的普遍現象的話，更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延續著先前田村實造從日本學界研究成果中，對於征服王朝理論的重新歸納。1.征服王朝均是統一北亞世界後，進而征服、支配中國的全部或一部分。2.在社會關係與政治制度上都是以共生關係並存，如牧農社會與二元制度。3.如二元屬性消失，王朝也隨之崩潰。4.兩種文化接觸後，產生了全新文化，如契丹文、女真文。<sup>19</sup> 另外值得注意的部分是，田村實造將五胡北魏時期與征服王朝時期的兩段歷史進行比較，提出前者促進成為歷史的推進力，後者卻阻礙了歷史的進步。<sup>20</sup>

此時的田村實造也提出將征服王朝放在世界史的脈絡考察的想法，這應該是順應著當時世界史潮流的想法。但結合上述內陸亞洲史的設定來看，北亞史無疑變成下一層的次地域。

此時的東洋史體系已從東亞、北亞、南亞、西亞、中亞的架構，轉變為東亞、內陸亞、南亞、西亞的架構。

### 三、世界史體系下的內陸亞史與北亞史

1970 年，岩波書店出版了「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叢書，是具有代表性的叢書，撰寫學者均是一時之選。從整套叢書的構成，主要分成數個歷史世界進行討論，古代東方（Orient）世界、地中海世界、南亞世界、東亞世界、內陸亞世界、西亞世界。<sup>21</sup> 上述 6 個世界組成了整體世界，如此的編排方式從

<sup>18</sup>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頁 627。

<sup>19</sup>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頁 627-628。

<sup>20</sup>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頁 652。

<sup>21</sup> 岩波書店編輯，《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 31 總目次・總索引》（東京：岩波書店，1974）。

古代延續到中世，到了近代、現代則全部打散。其中有關北亞、內亞的論述分別在第 6 卷「內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第 9 卷「內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 I」、第 13 卷「內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 II」。那麼，在這套叢書中是如何設定內陸亞世界的概念呢？

在第 6 卷「內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中由佐藤長撰寫的〈總說〉提到：

由歷史來看，伊朗以西的地區是所謂古代東方（Orient）文明誕生與發展的地區，也被視為 7、8 世紀後伊斯蘭文化的中心地帶。本講座中，在整體架構上，上述地域為西亞的範圍，其以東的乾燥地帶則為內陸亞洲。具體來說，興都庫什山脈以北，西突厥斯坦以東就是內陸亞洲。……將乾燥地帶（乾燥亞洲）與內陸亞洲兩個詞彙並排，「西域」一詞是在東洋史中使用的詞彙，也想做些說明。西域一詞在中國文獻中出現可回溯到西元前一世紀，此詞彙有著廣狹兩種意義。廣義是指自中國往西，自中亞開始到西亞，也包含了歐洲。狹義是指漢代的「西域三十六國」，所以指涉的地域包含東突厥斯坦，或是當中國的政治力往外發展時，也包含西突厥斯坦。上述西域的狹義內涵，與所謂「中亞」的概念幾近相同，包含從準噶爾利亞到吉爾吉斯的草原地帶。在論述蒙古利亞、準噶爾利亞的草原遊牧民活動時，也會使用「北亞」一詞，但是此地域不用說也能適用於乾燥地帶的稱呼。無論如何，上述詞彙是有相互重複的部分，不一定有明確的地域概念。<sup>22</sup>

如佐藤長論述，內陸亞洲、中亞、北亞等詞彙的使用，並無明確的地域概念。觀察此卷的文章名稱，有〈ユーラシア草原世界の形成〉、〈中央アジア・オアシス都市国家の性格〉、〈北アジア・古代遊牧国家の構造〉，可知其中至少有內陸亞洲、中亞、北亞、歐亞等 4 種不同詞彙的出現。但整體來看，內陸亞洲應屬於是一個大概念，其中包含中亞、北亞，歐亞草原世界則大概等同與北亞加上中亞的草原地帶。

此叢書的世界史體系，先以時限劃分，至近代開始即不以歷史世界為單

---

<sup>22</sup> 佐藤長，〈總說〉，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 282-283。

位進行敘述，前近代中再分為古代與中世，古代部分有古代 orient、地中海、南亞、東亞、內亞、西亞等 6 個歷史世界。中世則是中世歐洲世界、南亞、東亞、內亞、西亞等 5 個歷史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東亞歷史世界的設定，先前《東洋史入門》中所設定的東亞歷史世界，至「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叢書中執筆的西嶋定生認為：

具體而言，東亞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加上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及蒙古高原與西藏高原中間的西北迴廊地帶東部的諸地域，從上述歷史世界也可推知，領域是流動的，不能認為是固定的。但即使同樣是中國的周邊地域，北方的蒙古高原、西方的西藏高原，以及越過西北迴廊地帶的中亞諸地域或是越過越南的東南亞諸地域通常是不在其範圍的。<sup>23</sup>

做為提出東亞歷史世界設定的著名學者，西嶋定生的說法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但也可看到遵循著先前《東洋史入門》中所設定的東亞歷史世界，滿洲仍然不在其中，另一方面，增加了西北迴廊的部分，但主要的東亞周邊地域，仍是朝鮮、日本、越南，滿洲則是在中國的範疇內。

1981 年（昭和 55），山川出版社發行新版的「世界各國史」叢書，其中第 12 卷為《北アジア史》、16 卷為《中央アジア史》、17 卷為《朝鮮史》。《北アジア史》由護雅夫、神田信夫共同編輯，在護雅夫執筆的〈序說〉中提到：「本書論述西伯利亞、蒙古高原、滿洲（現今的中國東北地區）等三地域的歷史。」<sup>24</sup> 北亞史與中亞史的關係則認為：

首先，關於中亞史，其與蒙古高原同樣因位於亞洲內部或呈現乾燥的風土而被稱為內陸亞洲與乾燥亞洲。……雖然中亞北半部的草原地域與蒙古高原間隔著阿爾泰山脈，但卻也是一個連接的地域，生活於中亞北部而創造歷史的遊牧民中，有不少便是以蒙古高原為故鄉。<sup>25</sup>

<sup>23</sup> 西嶋定生，〈總說〉，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 4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I》（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3-20；後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二篇第一部第一章〈序說—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頁 398。

<sup>24</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1。

<sup>25</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3-4。

而北亞史與東亞史的關係：

北亞諸民族，眾所皆知，與中國諸王朝間的對立・抗爭關係也好、共生關係也好，有相當密切的關連。……但是，遠不止如此，北亞諸民族在華北建立以五胡十六國、北魏為首的滲透王朝；再者，征服・支配中國的4個征服王朝遼、金、元、清，即使只為了考察上述王朝之性格，必需瞭解北亞史。……北亞史，是了解中國史再到日本古代史，甚至是東亞史全體的理解，非常重要的部分。<sup>26</sup>

最後提到北亞史的時代意義：

北亞諸民族與位於南方的中國歷代諸王朝間的對立・抗爭，同時也有共存關係。在此意義下，亞洲歷史是以南北關係為軸，來進行理解。但是，北亞諸民族中，某民族往西方移動，對於中亞史、西亞史有重要影響，某民族壓迫西邊鄰近的遊牧民族，對於東歐史產生極大影響，而某民族吸收西方文明世界的文物，發展遊牧騎射文化。如此，亞洲史就不只南北關係，也必需考慮東西關係的話，就無法理解其全貌。<sup>27</sup>

上述所引護雅夫的論述，已經與先前江上波夫在舊版《北アジア史》的論述更有體系，將北亞與鄰近區域的相互關係都有所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北亞與中亞、東亞的關係，依照護雅夫的說法，北亞諸民族的擴張，往東亞建立滲透王朝、征服王朝，往中亞促使突厥斯坦的成立（即突厥化），更往西則影響阿拔斯王朝內部軍閥的突厥化，塞爾柱土耳其王朝等王朝的建立也與其有關。更往西，則是匈人（Huns）、保加爾人（Bulgars）等對於匈牙利國家之形成有莫大影響。筆者認為這無疑是提示需要一個更大的構圖框架，來繼續考察北亞諸民族對於世界史的影響力，所以在〈序說〉結尾處，護雅夫才

<sup>26</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5-6。

<sup>27</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7-8。

提醒對於北亞史研究需要繼續努力。<sup>28</sup>

## 第二節 東北亞史的成立—通古斯民族

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原先成果最為豐碩的滿鮮史領域也產生改變。1950年（昭和25）學界開始發現，滿鮮史研究的人才逐漸缺乏、<sup>29</sup> 問題意識需要重新思考。<sup>30</sup> 1952（昭和27）年，三上次男更提出與此前的朝鮮史、滿洲史研究告一段落，期待能有全新的學者提出全新的問題意識，在此基礎上開始研究。<sup>31</sup>

### 一、自律性的朝鮮史像—日鮮共同合作

1945年（昭和20）8月15日，日本宣佈戰敗後，原本興盛的滿鮮史研究、滿洲史、朝鮮史的研究也進入停滯的狀態。<sup>32</sup> 其中，1950年，由天理教團為主成立的朝鮮學會，匯集散於各地的朝鮮史研究，重新建構朝鮮史，成為戰後推動朝鮮史研究的重要推手。<sup>33</sup>

1951年，旗田巍刊行《朝鮮史》，做為戰後首部體系性論述朝鮮史的專著，其重點在於「從朝鮮人的角度來進行朝鮮史研究」<sup>34</sup>，但如從〈結語〉來看，是否已走出戰前的他律性史觀，值得注意：

朝鮮的歷史，從最初到現代為止，是苦於受到外國不間斷的侵略與壓迫

<sup>28</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8。

<sup>29</sup> 神田信夫，〈北アジア〉，《史学雜誌》60：5（1950年5月），後收入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頁2。

<sup>30</sup> 三上次男，〈北アジア〉，《史学雜誌》61：5（1951年5月），後收入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頁8。

<sup>31</sup> 三上次男，〈北アジア〉，《史学雜誌》62：5（1952年5月），後收入史学会編《日本歴史学界の回顧と展望》，頁10。

<sup>32</sup> 旗田巍，〈朝鮮史像の諸問題〉，收入朝鮮史研究会《新朝鮮史入門》（東京：龍溪書舍，1981），頁9。

<sup>33</sup> 旗田巍，〈朝鮮史像の諸問題〉，收入朝鮮史研究会《新朝鮮史入門》，頁9。

<sup>34</sup> 旗田巍，《朝鮮史》（東京：岩波書店，1951），頁v。

的歷史。朝鮮完全擺脫外國的壓力，獲得解放的時間相當短。這是日本歷史所無法比較的。因此朝鮮史無法正常的發展。……其發展過程雖有眾多特殊性，但基本上與世界諸民族的發展是相同的方向。……因日本的敗退，朝鮮期待的獨立成為可能。所謂朝鮮人、朝鮮民族的詞彙，現今也帶著驕傲而使用。<sup>35</sup>

至此來看，可看到旗田巍想要提出一種朝鮮民族自律性發展的朝鮮史，但上述敘述是否已經能夠說明朝鮮史的發展是自律性的，應該仍有考察的空間。此書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為〈文獻解題〉，此為旗田巍介紹重要的研究文獻，並進行解說。其中介紹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的35冊的《朝鮮史》與相關的現地調查資料，以及戰前學者包括池內宏、金西龍、末松保和等人外，更有稻葉岩吉的相關著作，<sup>36</sup> 這應該可以說戰前著作的可靠性，非因殖民支配而有所偏頗。

以旗田巍開始，其後的研究潮流開始批判戰前提出的朝鮮社會停滯論、他律性史觀，並提出內在的、自律性的發展史觀。<sup>37</sup> 此無疑是民族國家史觀。

## 二、東洋史與世界史中的朝鮮——從北亞到東亞

1956年，山川出版社也發行了世界各國史系列叢書，第12冊為《北アジア史》。其詳細內容已在第三章第三節論述，故只論述相關部分。朝鮮部分的執筆者為末松保和與旗田巍，<sup>38</sup> 在〈序說〉中，江上波夫認為以蒙古利亞、南西伯利亞、滿州利亞、朝鮮為中心的民族史就是北亞史，其核心的共通概念則是上述地域的民族都屬於阿爾泰語族，而且不只是語言系統的一致，各地域的社會與文化之基礎也有不少共通要素。<sup>39</sup> 至此看來，北亞史的核心單位仍是民族。

由於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朝鮮的文明發展就同時受到北亞與中國的影

---

<sup>35</sup> 旗田巍，《朝鮮史》，頁251-252。

<sup>36</sup> 旗田巍，《朝鮮史》，頁253-267。

<sup>37</sup> 朝鮮史研究会編，《朝鮮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1），頁4。

<sup>38</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3。

<sup>39</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2。

響，<sup>40</sup> 使得朝鮮同時有兩方的特色，因為如此，加上朝鮮民族屬於阿爾泰語族，所以將朝鮮地域納入北亞史的範疇。

但是自此之後，朝鮮地域的歸屬從北亞轉變為東亞，這樣的轉變可從此時期的東洋史概說書清楚看到。1967年西嶋定生編的《東洋史入門》、1969年島田正郎執筆的《アジアの歴史》，都開始將朝鮮納入東亞史的範疇。1971年出版的「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叢書，其中負責執筆東亞史部分的西嶋定生提出東亞世界的完整定義，其中便包含朝鮮，<sup>41</sup> 其後的東亞歷史世界多是遵循其說法。西嶋定生提出4個辨識指標：「漢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sup>42</sup> 以上述指標，更確定將朝鮮納入東亞史。

從上述過程來看，戰後朝鮮史的獨自成立是日本學界努力的方向之一，但如果回溯到日本殖民時期，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耗費20餘年（1915年（大正4）到1938年（昭和13））所編纂的朝鮮史，至今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如第二章中提到稻葉岩吉的滿鮮史體系，在此段時間前後，都有不斷的朝鮮通史成果與滿洲通史，並非由稻葉岩吉提出滿鮮史體系後，就無體系性的朝鮮史與滿洲史。再者，從白鳥庫吉的視野來看，滿鮮地域可以說是以一個廣域的歷史文化圈來設定。<sup>43</sup> 自稻葉岩吉後，除三品彰英外，池內宏在戰後陸續出版的《滿鮮史研究》四大冊，其中並無闡述滿鮮史體系的論文，只能認為其書名為滿洲、朝鮮史研究的簡稱。故滿鮮史體系只是當時學者提出的一種歷史文化圈概念的地域史。所以要建立單獨的朝鮮史對戰後的日本學界來說並不困難，困難的是要批判滿鮮史體系中對於朝鮮地域的他律性發展史觀的批判。

<sup>40</sup> 如同三上次男的論點，朝鮮半島位於南北兩政治勢力的影響下，受到其刺激而發展。而江上波夫認為北亞歷史世界的特色之一，便是櫛目文土器與打製石器。參見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北アジア史研究第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頁116；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10-13。

<sup>41</sup> 西嶋定生，〈總說〉，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 4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I》（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3-20；後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二篇第一部第一章，改題為〈序說—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398。

<sup>42</sup> 西嶋定生，〈總說〉，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 4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I》（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3-20；後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二篇第一部第一章，改題為〈序說—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399。

<sup>43</sup>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頁14。



觀察自明治開始至昭和 40 年代為止的東洋史概說書，藉此討論概說書中的設定的變化。從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以來，<sup>44</sup> 從章節來看，多是以民族為東洋史的章節名進行論述。戰後，順應當時將東洋史與西洋史合併為世界史的潮流，陸續的接受歷史文化圈的概念，<sup>45</sup> 1949 年由三上次男執筆的《ぼくらの東洋史》、1967 年西嶋定生編的《東洋史入門》、1969 年島田正一郎執筆的《アジアの歴史》、1970 年岩波書店出版了「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叢書等四種概說書均使用歷史文化圈的概念來做為章節名，將整個亞洲地域與全世界地域分為數個地域，但因分類概念的不同，也產生數個不同但卻相互重疊的概念，如內陸亞、北亞、東亞等概念。

### 三、東北亞的成立

在地域概念頻繁使用的昭和 20 年代，學者也開始使用東北亞（北東亞）一詞。在戰前時期，東北亞（北東亞）是相當少使用的，目前僅見可是 1917 年（大正 6）鳥居龍藏發表的〈東北亞細亞に於ける無言貿易に就て〉，<sup>46</sup> 文中從民族學的角度出發，以古西伯利亞族（Paleo-Siberian）為討論對象，其地域主要是島嶼與亞細亞的沿岸。<sup>47</sup> 其後陸續發表有關東北亞的論文，可知鳥居龍藏的東北亞概念是以民族學為基礎，而非地理概念。<sup>48</sup> 1942 年三上次男發表〈古代東北アジアの諸民族、とくに挹婁人について〉、1943 年發表〈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毒矢使用の慣習に就いて〉等文。從三上次男的論文中，東北亞的概念為約東經 125 度以東，即北方以勒拿河（Lena），南方以遼東

<sup>44</sup> 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在設定東洋史的範圍時，將亞洲分為東亞、南亞、中亞、西亞、北亞等 5 部分，但是其設定的北亞的範圍為阿爾泰山脈、黑海、裏海以北之地，概約當時的俄領西伯利亞一帶。而其章節安排則是：上古期 漢族膨脹時代、中古期 漢族優勢時代、近古期 蒙古族最盛時代、近世期 歐人東漸時代，參見桑原鷺藏，《中等東洋史》，收入《桑原鷺藏全集 第四卷》，頁 7-18。

<sup>45</sup> 古田元夫，〈地域区分論—つくれる地域、こわされる地域〉，收入樺山紘一等編集《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1 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ーチ》（東京：岩波書店，1998），頁 37。

<sup>46</sup> 鳥居龍藏，〈東北亞細亞に於ける無言貿易に就て〉，《人類學雜誌》32：8（1917），頁 222-233。

<sup>47</sup> 鳥居龍藏，〈東北亞細亞に於ける無言貿易に就て〉，《人類學雜誌》32：8，頁 222-223。

<sup>48</sup>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頁 268。

山系為界的地域，<sup>49</sup> 其中的民族複雜，有貊、夫餘、高句麗、鮮卑、契丹、女真、滿洲等活動。<sup>50</sup> 三上次男認為：

古代東北亞中，引導此地域發展的有幾個中心，其一是滿洲地域的遼東半島，其二是朝鮮半島的大同江與漢江的下流流域。此兩地可說是自早期就受到中國與內陸亞先進各國，在經濟上、文化上的影響，再到前3世紀至2世紀時，因為成為中國政權的統治下，結果在某種意義下，成為東北亞中的先進地域。在此政治、文化的環境下，其地域及周邊地區的民族當時受到影響，導致其社會發展。如此成為周邊地區土著民初期民族國家成立的契機。<sup>51</sup>

從上述三上次男的論述，其設定的東北亞概念，就是戰前的滿鮮地域為中心設定的地域。<sup>52</sup> 另一方面，東北亞地域在新石器時代開始雖同時受到內陸亞洲與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學界仍認為東北亞與東亞較為相近，但是東北亞的雙重性質還是存在，這可從渤海史研究中觀察到此現象。

渤海史研究在東洋史中是最早開始發展的領域之一，屬於滿鮮史、滿洲史的範疇，自明治後期，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松井等、稻葉岩吉、池內宏等學者均有所涉獵。<sup>53</sup> 1915年，鳥山喜一<sup>54</sup> 出版《渤海史考》，是當時總

<sup>49</sup> 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の諸民族、とくに挹婁人について〉，《帝国学士院報告会記録》6（1942），後改題為〈古代東北アジアの諸民族と挹婁人の民族的性格〉，收入氏著《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北アジア史研究第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頁243。

<sup>50</sup> 三上次男，〈初版の序〉，收入氏著《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北アジア史研究第二》，頁3。

<sup>51</sup> 三上次男，〈初版の序〉，收入氏著《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北アジア史研究第二》，頁4。

<sup>52</sup>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頁270。

<sup>53</sup> 外山軍治，〈〈学界展望〉渤海史研究の回顧〉，《東洋史研究》1：5（1936年1月），頁77-78。

<sup>54</sup> 鳥山喜一（1887-1959），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畢業，其後陸續在中央大學、新瀉高等學校任教。大正4年將其畢業論文改訂出版為《渤海史考》，之後前往中國大陸東北地區考察，其中對於間島省古城有出版詳細的調查報告書，因此培養出對於出土文物的鑑定能力。京城帝國大學任教，由於對於渤海史的專業與熱愛，有「渤海王」的稱號。

結渤海史研究成果的著作，具有重要意義。<sup>55</sup> 此外，和田清、日野開三郎、三上次男等人也有相關著作，多是從滿鮮史觀進行研究。<sup>56</sup> 戰後，1973 年開始，渤海史研究逐漸恢復活力，主要的研究者有石井正敏、酒寄雅志、濱田耕策、鈴木靖民等人。與戰前研究的差異在於立場的變更，將渤海史從滿洲史的範疇轉移到朝鮮史，從渤海對日朝貢史觀到日渤交涉史，東亞關係史等角度，突破滿鮮史的研究立場。<sup>57</sup>

至此可看到渤海史研究過程的轉變，如從《史學雜誌》的〈回顧與展望〉中更可清楚的看到渤海史從北亞轉移到東亞的過程，但由於渤海史研究在地域上的特殊性，在〈回顧與展望〉中仍然不斷在北亞、內陸亞、朝鮮等範疇游移。<sup>58</sup> 1982 年，井上光貞等人編著「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叢書，其中在第 7 卷《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中，森安孝夫發表〈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sup>59</sup>

森安孝夫撰寫的目的是：「在當時的東亞—北亞的國際關係中，尋找渤海（以及契丹）的位置。」<sup>60</sup> 森安孝夫在論述時提到：

如上所述，雖只有零碎的史料，渤海也與當時的新羅、日本相同，屬於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國家之範疇，在此意義中，可以說是完全被包括進以唐為中心的古代東亞文化圈。……但是雖說是律令制，也不能說渤海是

---

重要著作除上述的《渤海史考》外，有《黃河の水》、《渤海史上の諸問題》、《滿鮮文化史觀》、《東洋史觀》等著作。參見船木勝馬，〈鳥山喜一〉，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二集〉》，頁 140-149。

<sup>55</sup> 船木勝馬，〈鳥山喜一〉，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第二集〉》，頁 145-146。

<sup>56</sup> 古畑徹，〈戰後日本における渤海史の歴史枠組みに関する史学史的考察〉，《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9（2003 年 1 月），頁 222。

<sup>57</sup> 古畑徹，〈戰後日本における渤海史の歴史枠組みに関する史学史的考察〉，《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頁 222-223。

<sup>58</sup> 古畑徹，〈戰後日本における渤海史の歴史枠組みに関する史学史的考察〉，《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頁 231-232。

<sup>59</sup> 森安孝夫，〈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收入井上光貞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第 7 卷《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東京：学生社，1982），頁 71-96。

<sup>60</sup> 森安孝夫，〈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收入井上光貞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第 7 卷《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頁 75。

完全仿照中國的律令體制，這從同時代的日本與朝鮮之案例也可很容易推知。特別是井上光貞認為當時日本是律令制與氏族制的二元國家，此看法在渤海也可適用，雖然有細微的差別。……如此觀察時，渤海雖然以律令體制為目標進行一元性支配，但只是理想，實際上，由律令體制實施農耕市的直接支配，由貢納實施狩獵市的間接支配，兩者同時並存。渤海從其歷史、地理的條件來看，必然要實施二元的支配機構。<sup>61</sup>

森安孝夫接著提出北亞史中征服王朝也使用二元體制概念的重要性，在契丹發展過程中，受到渤海人的影響不下於漢人。<sup>62</sup> 再進一步將二元體制的特性與渤海、東丹國、契丹三者進行連結：

如前所見，渤海國是以律令制統治農耕市，以間接支配制統治狩獵市的二元體制國家。雖說國家仍然失敗，但帶著可說是再現渤海國的東丹國的治理經驗，帶給遼二元體制成立之過程任何形式的影響都非是不可能的。上述推測如無誤，渤海人為了讓身為遊牧帝國達到高度發展階段的契丹，再更進一步到達征服王朝的更高階段，扮演著不輸於漢人的重要角色。<sup>63</sup>

森安孝夫如此說法，將渤海國作為前・征服王朝的國家，具有征服王朝的特性的這點是相當有參考意義的。先不論研究本身證據性足夠與否，首先顯示出的是位於東北亞的渤海國，仍然是受到北亞與東亞兩歷史世界的影響，如此或許正可說明東北亞概念的雙重性或曖昧性。直至最近，高井康典行也提出遼同時具有中華王朝、北亞的征服王朝、東北亞政權的三種面向，<sup>64</sup> 應可

<sup>61</sup> 森安孝夫，〈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收入井上光貞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第7卷《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頁77-79。

<sup>62</sup> 森安孝夫，〈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收入井上光貞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第7卷《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頁87-90。

<sup>63</sup> 森安孝夫，〈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收入井上光貞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第7卷《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頁90。

<sup>64</sup> 高井康典行，〈世界史の中で契丹〔遼〕史をいかに位置づけるか—いくつかの可能性〉，收入荒川慎太郎等編《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東京：勉誠出版，

視為上述思考的延伸。

### 第三節 中亞史的主體性—絲路史觀論爭

在理解中亞史的主體民族就是突厥系民族後，接著學者們提出突厥系民族與當地綠洲民的共生關係，由於遊牧民在北，綠洲民在南，又被稱為南北關係。這個南北關係與自明治後期以來的東西交涉史、絲路研究所發展的東西關係，兩者如何構成中亞史的基調，成為此段時間的重要事件，而以此引起的論戰，又被稱為「シルクロード史觀論爭」（絲路史觀論爭）。本節分成三個部份論述之，第一部分論述主張以南北關係為重心的間野英二之主張，第二部分則論述主張綜合東西交流與南北共生的江上波夫，具體呈現於山川出版社的新版《中央アジア史》，第三部分論述論爭的後續。

#### 一、南北關係—間野英二的論點

1977年，間野英二出版《中央アジアの歴史》，在序章中，作者首先歸納當時研究中亞史的三種立場：

第一是東西交涉史或東西交通史的立場。以此立場，中亞因位於東邊的中國與西邊的西亞・歐洲的中間，所以將中亞理解為東西貿易、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大中繼地。如此，從此立場來看中亞，最大的關注點是，中亞存在著何種東西交通路線，或是經由此交通路線，有何種物品、思想、文化，自東往西或自西往東傳播。第二是中國的西域經營史或是西域統治史的立場。以此立場下的西域廣義範圍為中國西邊的某些地域，狹義範圍則大約等同中亞。所以中亞被理解是中國人往西方發展政治、經濟的對象地域。在此意義下，中國人如何進出此地域，或如何支配此地域，成為關注的焦點。第三是突厥民族史的立場。此立場是理解中亞是突厥民族的活動舞台，突厥民族幾乎是現在中亞住民的全部。關注點在於原本為草原遊牧民的突厥人，是如何成為綠洲的定居民，再者，形成現今

---

2013)，頁 21-33。

中亞的突厥民族的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維吾爾等諸民族是如何形成的。<sup>65</sup>

間野英二總結當時中亞史研究的三個主要方向後，認為前兩個研究立場的形成，無疑都是因為受到史料制約所導致的，<sup>66</sup> 那麼應該如何把握中亞史呢？間野英二認為必須要從中亞北方的突厥系遊牧民與其南方的綠洲民之間的關係來觀察：

具有相異生活樣態的南北兩世界的居民，在鄰近之地生活之外，更必須經常建立密切關係。這不時形成征服・被征服、支配・被支配的關係，又不時對於其他的文化形成強勢・弱勢的關係。最後，文化的強弱勢也形成互補的共存關係。如此，在各式各樣的型態中持續保持密切關係的中亞南北兩世界的居民，首先描繪出各自的特徵與歷史，接著在此基礎上具體檢討兩者歷史關係的各種樣貌。<sup>67</sup>

這樣的立場得到相當數量學者的支持。1978 年的《史學雜誌》的「回顧與展望」中，加藤和秀提到：「最近我國的中亞史研究，從先前的東西交涉史・比較文化論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的是基於精密的史料批判的原典研究，明確的提出要追求中亞本身展開自律的・內在的歷史之方向性。其方向的具體化，在間野英二氏的《中央アジアの歴史》中首先出現。」<sup>68</sup>

## 二、概說書：江上波夫主編《中央アジア史》

1981 年，護雅夫出版《中央アジア史—シルクロードに興亡した国々》。護雅夫在其序言提到：

---

<sup>65</sup> 間野英二，《中央アジアの歴史》（東京：講談社，1977），頁 6-7。

<sup>66</sup> 間野英二，《中央アジアの歴史》，頁 10。

<sup>67</sup> 間野英二，《中央アジアの歴史》，頁 14。

<sup>68</sup> 加藤和秀，〈中央アジア〉（1978 年 88 編），收入史學會編《日本歷史學界の回顧與展望 17 內陸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1988），頁 287。

我在執筆寫作時，經常於我腦海中的是近年間野英二氏在其著作《中央アジアの歴史》中論述的所謂「脫絲路史觀」。如同在本書第一章介紹的，間野英二氏認為「一直以來，基於「絲路史觀」對中亞史的理解，可說是就將中亞視為絲路通過的地方，為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西亞與歐洲間文化交流的中繼點，對此觀點提出疑問，並且試著將中亞自東西交涉史中獨立，做為一個完整的小世界來進行描述。」……將中亞史視為一個世界當然是正確的，其歷史無須贅言是必需以期住民為主體。但是，中亞不單只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如果看到北方的草原，也是連通著東西兩世界。如此，中亞史在以獨自、固有的歷史為中心時，也連通八方或四方，至少是三方的歷史。這主要是因為中亞在地理位置而導致的歷史複雜性。中亞史如果沒有東西關係的歷史，也就不會只有南北關係的歷史。這可以說是以兩關係（東西、南北）的交錯複雜關係，而形成的中亞歷史。<sup>69</sup>

在針對絲路史觀的論爭中，護雅夫對於間野英二的觀點有所質疑的。<sup>70</sup> 但是如果只將論爭視為東西關係與南北共生的對抗，可能就過於簡單而誤解了。從護雅夫的論述來看，其也贊成南北共生為中亞史的主體，但是如果因此忽略了東西交流的重要性，則是無法認同的。

換個角度來看，會讓間野英二等人會如此強力的批判東西交涉史的原因為何？宇山智彥認為：

對於日本人來說，提到中亞就是絲路的印象相當強烈，在交通工具只有駱駝與馬的時代中，於歐亞大陸的東西邊進行著人與文物的交流，是這樣的歷史，這是因為夢與浪漫。但是這樣的看法，將中亞只視為東西交流的「通路」，完全不關心當地的社會的情況相當多。再者，即便在中亞地域裏，也有東西交流較少的地域與時代，也就很可能將這些地域與時代忽略。對於這樣的「絲路史觀」，日本的中亞研究者從 1960 年代

<sup>69</sup> 護雅夫，《中央アジア史—シルクロードに興亡した国々》（東京：旺文社，1981），頁 4-5。

<sup>70</sup> 森安孝夫，〈序文—シルクロード史觀論争の回顧と展望〉，收入森安孝夫責任編輯《中央アジア史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2004），頁 v。

以來逐漸論述其不滿。<sup>71</sup>

自此來看，針對間野英二的觀點，贊成與反對的學者各有其道理，但並非不可調和。

1987年，山川出版社發行了新版的世界各國史系列叢書，第16冊為《中央アジア史》，由江上波夫主編。其認為中亞史的範圍則可以分成廣義與狹義兩種：

廣義來說就是位於亞洲大陸的內部，以其水系沒有出海口的地域的總稱，其範圍是東以大興安嶺、陰山、南山等諸山脈為界，北以阿爾泰山脈、Tarbagatay台地、哈薩克台地為界，南以西藏高原、興都庫什山脈、Zagros山脈為界，西則以裏海、亞美尼亞高地為界。其中則包括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大部分、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的大部分以及甘肅省西部；另一方面則也包括舊蘇聯的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以及哈薩克南部，還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南半部，伊朗、阿富汗北部。狹義則是以亞洲大陸中央為重點，除去內蒙古自治區、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及伊朗，也就是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舊蘇聯為界的區域，與所謂的內陸亞洲的範圍大致相同。<sup>72</sup>

江上波夫說出叢書進行改版修訂的緣由，並進一步的再度將其範圍重新劃分。其後更提出三點撰寫中亞史的考量：

一、中亞史本身具有的歷史性格是相當獨特的。不用說中亞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與東方的中國大陸、西方的西亞兩大文明圈相連，北則與歐亞遊牧騎馬民族歷史的大根據地北亞相鄰，南則是以很早就形成特殊宗教文明的印度次大陸連接，因為中亞經常在與上述周邊的關係中，其民族、文化、經濟才得以存在，所以中亞的歷史作用與存在理由也在於此。

---

<sup>71</sup> 宇山智彥，《中央アジアの歴史と現在》（東京：東洋書店，2000），頁6。

<sup>72</sup>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頁3-4。



回過頭說，如果排除與東西南北周邊的關係，如此中亞並無獨自的歷史，所以無論如何要加上頭、尾巴、手腳來撰寫中亞史。二、中亞史中，一方面有與北亞的騎馬遊牧民族（行國）、本身的綠州都市國家（城郭國）的統治關係形成的南北問題；另一方面有綠州都市國家與東亞中國、西亞以及歐洲東西方兩大文化圈在經濟上、文化上的交流的東西問題。這是治中亞史必須注意的。三、中亞史的基礎是印歐語族，對於此民族在文化、言語、宗教等的瞭解，以及與周邊關係上的考察是非常重要的。<sup>73</sup>

從江上波夫的論述來看，由於同時並重中亞與周邊地域的交流互動與南北共生，這無疑更貼近護雅夫的觀點。

### 三、絲路論爭之後—森安孝夫的論點

2004年（平成16），森安孝夫在其編輯的《中央アジア史出土文物論叢》中發表〈序文—シルクロード史觀論争の回顧と展望〉<sup>74</sup> 與近年的概論書《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等書都有詳細論述。森安孝夫認為：

間野氏認為我國中亞史研究的重點是偏向東西交涉史，以下是其看法。……但是，做為開創者的松田壽男，其絲路史觀並不是那麼淺薄。將松田氏宏觀的史觀冠上絲路史觀的名稱，認為這樣的史觀都無考慮到生活於當地的遊牧民與綠州農耕民・都市民的動向，這是不公平的。一開始提出將北方遊牧民與南方綠州農耕民以天山—錫爾河一線分開，而關注中亞史中的南北關係的，不用說正是松田氏。<sup>75</sup>

簡要言之，森安孝夫認為間野英二誇大了松田壽男忽略考察中亞史主體性的這一點，進而提出南北共生關係才是中亞史成為獨立完整歷史世界的重要基

<sup>73</sup>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頁 ii-iii。

<sup>74</sup> 森安孝夫，〈序文—シルクロード史觀論争の回顧と展望〉，收入森安孝夫責任編輯《中央アジア史出土文物論叢》，頁 i-vii。

<sup>75</sup>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07），頁 74。

礎。但是這一點是錯誤的，因為南北共生關係，松田壽男也早有關注，這從松田壽男、小林元在 1935 年（昭和 10）出版的「世界歷史大系」叢書第 11 卷《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中就有提到，這在前文也有論述到，不再贅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產生絲路史觀的論爭，但在當時的中亞史研究者中，仍然遵從著羽田亨提出的「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的研究方法。<sup>76</sup>從護雅夫、山田信夫、森安孝夫等人持續對於回鶻史料文書的解讀與研究，或是間野英二對於中亞阿拉伯文、察合台文史料的相關研究均是「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這裡面不但是要超越漢文史料，尋找更多的歷史可能性，更是要建立地域的主體性。



---

<sup>76</sup> 羽田亨，〈輓近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進歩〉，《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頁 634-636。

## 第四節 中央歐亞概念的形成與影響

中央歐亞的概念，並非是自日本學界本身所創造，而是來自匈牙利學者 Denis Sinor 所提倡，其後日本學界開始推廣採用。本節首先論述中央歐亞概念的內涵，再論述在日本學者接受此概念的過程。

### 一、Denis Sinor 的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概念

Denis Sinor (1916-2011) 於 1940 年在法國首先提出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概念，其後 1963 年出版的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中系統討論此概念：

在空間上能夠給中央歐亞所作的定義是否定性的。它是舊大陸的一部分，這一部分，這一部分位於偉大的定居文明的邊界之外。這個定義暗示兩者間的邊疆是不穩定的。雖然隨著文明化和非文明化之間張力的平衡，它在不同時代會發生變動，但對於任何具體的歷史時刻來說，歐亞草原的邊界是很容易描繪出來的。<sup>77</sup>

Denis Sinor 在此處的論述無疑將中央歐亞與定居文明視為二元對立，其後他論述到生活於中央歐亞的人們時，提到：「土壤與氣候兩者均不利於農業，……卻是理想的牧場，……。但是想想中央歐亞的所有居民都是遊牧民肯定是錯誤的。在那些採取可能聚集最多財富之生活方式的人們中，遊牧民只是最成功的。……飼養家畜的人不能生活在森林裡，森林居民的生計是靠打獵來維持的。」<sup>78</sup> 這裡的論述中，他將生活於中央歐亞的人們之生業，不只是遊牧，

---

<sup>77</sup> 丹尼斯·塞諾著、王小甫譯、羅新校，〈論中央歐亞〉，收入氏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

<sup>78</sup> 丹尼斯·塞諾著、王小甫譯、羅新校，〈論中央歐亞〉，收入氏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頁 5-6。

更包含狩獵，而森林狩獵民更掌握了冶金技術。<sup>79</sup> 筆者認為這或許揭示了儘管生活樣式不同，但遊牧民與狩獵民之間的界線與遊牧民與農耕民的界線更加模糊與更加容易互換，所以遊牧民與狩獵民的關係比遊牧民與農耕民的關係更加密切不可分。他也提到：「中央歐亞歷史的發展趨勢也是逐漸趨同的，而非分化的，甚至語言也表現出一種緩慢的趨同過程，所以如要對中央歐亞的人們做區分，標準也是社會的與經濟的，而非民族的與語言的。」<sup>80</sup>

1969年，Denis Sinor 出版了 *Inner Asia. 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 A syllabus*，此為當時重要的通史概論書。在其第一章是論述中央歐亞的定義：「假如在相當方面的情況下，歐亞是由歐洲與亞洲所組成，那中央歐亞很清楚的就是歐亞大陸的中央部分。」<sup>81</sup> 因為歐洲與亞洲的在概念上是既相對又互補的，與其說是地理概念，不如說是歷史或文化概念。也因為地理上無法形成天然的界線。<sup>82</sup>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地圖也包括滿洲與朝鮮的大部分。

1990年，由 Denis Sinor 等人編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中也有對相關概念進行論述，而且因為此套劍橋史可說是歐美學者體系性研究歷史的論著，所以有其參照意義。Denis Sinor 儘管在此書是使用 Inner Asia 此詞，但是在此書導論裏，Inner Asia 與 Central Eurasia 的概念是幾近相同的，論述也與上面兩篇文章的中央歐亞相同。Denis Sinor 也認為之所以用 Inner Asia 只是因為比起 Central Eurasia 不那麼沉重，<sup>83</sup> 但是卻不那麼準確。<sup>84</sup>

<sup>79</sup> 丹尼斯·塞諾著、王小甫譯、羅新校，〈論中央歐亞〉，收入氏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頁5。

<sup>80</sup> 丹尼斯·塞諾著、王小甫譯、羅新校，〈論中央歐亞〉，收入氏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頁7-8。

<sup>81</sup> Denis Sinor, *Inner Asia. 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 A syllab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

<sup>82</sup> Denis Sinor, *Inner Asia. 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 A syllabus.*, p1.

<sup>83</sup> 有關歐美學界對於 Central Asia、Inner Asia、Central Eurasia 等概念的使用，需要另闢專文討論，本文僅先論述概念本身與概念在日本學界中的接受與批判。

<sup>84</sup>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

## 二、日本學界對中央歐亞概念的引介與接納

### (一) 山田信夫

1978 年，山田信夫發表〈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構想〉，他提到：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被問到研究領域時，很久之前是回答東洋史，過了約 20 年後，多回答北亞史、中亞史，最近則大多試著回答中央歐亞史。……確實，中央歐亞史的概念尚未普及。但是在歐美中英語是使用 Central Eurasia 的說法，我國則不只是我，最近也開始經常使用。一言以蔽之，可說是開始替代中亞史、內陸亞史、北亞史的用法。其根據與內涵是將歐亞大陸中央部分視為一個整體，做為歷史考察的對象。<sup>85</sup>

山田信夫的敘述很簡單的道出此研究領域的變遷，是相當值得注意的。而在論述到中央歐亞的範圍與住民時，其認為：

歐亞大陸的中央部分，東從興安嶺，西至歐洲的喀爾巴阡山脈，除原本的草原地帶外，南邊是以東西突厥斯坦為中心的綠洲地帶，北邊則是南西伯利亞的森林地帶。其住民包含亞利安系、阿爾泰系、烏拉爾系等，跨過人種、民族的分類，他們有草原的遊牧民、綠洲的農耕民、森林的狩獵民。<sup>86</sup>

此部分大致與 Denis Sinor 相同，但應不包含滿洲，值得注意。再討論到中央歐亞與內陸亞、中亞、北亞等概念的相互關係時，山田信夫提到：

中亞或內陸亞是相同的地理概念，將其地域的歷史視為一個整體有其意

---

<sup>85</sup> 山田信夫，〈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構想〉，原收入《ヘディン探検紀行全集 月報二》（東京：白水社，1978），頁 3；後收入氏著《天山のからた—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京都：阿吡社，1994），頁 92。

<sup>86</sup> 山田信夫，〈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構想〉，後收入氏著《天山のからた—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頁 93。

義。定義中有廣狹兩義，無論如何其核心是突厥斯坦，而再加上北方的草原地帶或西藏高原，也包含伊朗高原東北部等地域。斯文·赫定等人被稱為中亞探險家，上述地域即其行動範圍。與此相比，北亞史主要是在日本東洋史學者間使用。與包含印度·東南亞的南亞史相對的北亞史中，於兩者間的中國成為重點，相對於中國·漢民族世界的是北方民族的世界，將北亞視為具有獨自歷史的地域把握，與中國史截然劃分的意圖就是北亞史的基礎。但是試著將北亞與南亞、中亞、內陸亞等地域比較的話，北亞概念很明顯不是地理概念。講到北亞史時，其內容可說是從古代的滿州開始，到蒙古利亞、準噶爾利亞的地域為重點，有時也包含哈薩克斯坦，這樣是否恰當，從此處的思考，實際上就是中央歐亞史的誕生。<sup>87</sup>

從山田信夫的論述來看，首先是在日本學者進行歷史研究的操作中，中亞、內陸亞、北亞、中央歐亞等概念都是設定其地理範圍，但是這些概念並非單純的地理概念，也有文化概念、歷史發展分期、生活樣式等概念，進而形成一個完整而獨自發展的歷史世界。其二，在討論上述地域概念的相互關係時，山田信夫發現北亞史的概念是源自於要從中國劃分出來的思考，也就是北亞的發展非是中國周邊史。<sup>88</sup> 但是這樣的思考在進行研究時，不斷發現地域與地域間的劃分不可能截然分立，如蒙古利亞與準噶爾利亞、準噶爾利亞與哈薩克斯坦的關係，所以由此來思考，北亞史的概念就自然發展到中央歐亞史。而自中央歐亞的角度來考察蒙古利亞的歷史，應會有更深刻、更正確的認識。<sup>89</sup> 其三，儘管中央歐亞的概念是來自於歐美學界，但是日本學界並未完全接受，而是在討論時將此概念放進日本本身的研究脈絡進行討論。

---

<sup>87</sup> 山田信夫，〈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構想〉，後收入氏著《天山のからた—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頁 93。

<sup>88</sup> 山田信夫，〈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構想〉，後收入氏著《天山のからた—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頁 93-94。

<sup>89</sup> 山田信夫，〈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構想〉，後收入氏著《天山のからた—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頁 94。

## （二）岡田英弘

1990 年（平成 2），岡田英弘在山川出版社發行的「民族の世界史」叢書中的第 4 卷《中央ユーラシアの世界》與護雅夫共同擔任主編，他則是撰寫此書序論，此文後也收入 2013 年出版的《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中。首先觀察書中目錄，書中依照民族劃分章節，第 1 部分是伊朗系民族、第 2 部分是突厥系民族、第 3 部分是蒙古系民族、第 4 部分是烏拉爾系民族、第 5 部分是西藏系民族。通古斯系民族、朝鮮民族的討論是放在三上次男、神田信夫主編的第 3 卷《東北アジアの民族と歴史》中，漢民族的討論是放在橋本萬太郎主編的第 5 卷《漢民族と中国社会》中。如此首先可知滿州、朝鮮地域的討論在當時的學界中，已不在中央歐亞地域，而是屬於中國東北地方與朝鮮半島。<sup>90</sup>

回到岡田英弘所撰寫的序論〈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歴史世界〉，<sup>91</sup> 他首先追溯歐亞（Eurasia）一詞的使用方式與變遷，進一步探討中央歐亞的定義時，先介紹 Denis Sinor 對於中央歐亞的定義，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Denis Sinor 的定義包含滿洲、朝鮮，但岡田英弘的定義中未提及滿洲、朝鮮。岡田英弘在綜觀整體歷史後，認為：

如前述所見，中央歐亞的諸民族，首先因反覆移動的遷徙，決定周邊文明的命運，接著集結於蒙古帝國，最後誕生現在的中國與俄國。相對於此，未受到蒙古帝國統治的日本，在 14 世紀有倭寇；西歐則在稍後的 15 世紀進入大航海時代，相關事物在 16 世紀合流的結果，產生現在世界的三大資本主義經濟，就是日本、美國、歐盟。所以要理解現今的世

---

<sup>90</sup> 在此叢書的劃分中，分為日本、東北亞、中央歐亞、東亞、東南亞、南亞（印度）、西歐、東歐、西亞、非洲、美洲、大洋洲等 12 部分。參見岡正雄、江上波夫、井上幸治編，〈總目次（第 1 卷—第 15 卷）〉《民族とは何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1），頁 373-417。

<sup>91</sup>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歴史世界〉，收入護雅夫、岡田英弘主編《中央ユーラシアの世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0），頁 1-24；後改題為〈中央ユーラシアとは何か〉，收入氏著《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13），頁 17-39。

界情勢，中央歐亞史的視角是不可或缺的。<sup>92</sup>

從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岡田英弘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考察中央歐亞史，有別於上述山田信夫從學術脈絡的立場。平成 3 年（1991）岡田英弘發表〈中央ユーラシアの可能性〉：

中央歐亞大概等同於廣義的內陸亞。具體來說，包含蒙古利亞、突厥斯坦、西伯利亞、阿富汗斯坦、高加索。滿洲是很微妙。中央歐亞史的範圍從遼河的西岸到多瑙河的左岸為止，是由草原地帶所連結的地帶。<sup>93</sup>

從上述可以看到，岡田英弘對於中央歐亞的具體定義，大體上與 Denis Sinor 與山田信夫相同，但是值得注意的仍是滿洲的定位，但岡田英弘在文中未有詳細說明。此處可更清楚的看到岡田英弘從世界史的角度來推廣中央歐亞概念，再從另一方面來看，岡田英弘也是在反思自明治晚期以來，東洋史與西洋史的劃分導致的困境：

為了將西歐歷史觀帶入中國史的結構中，學者們不斷的努力，但仍然有矛盾，幾乎沒有共通點。努力的途徑有三個，一、時代區分：依照西歐的時代區分，是以羅馬帝國為基準，五世紀前的西羅馬帝國滅亡為線，前為古代，後至十五世紀時，東羅馬帝國被滅為中世，十五世紀後開始為近代。但東洋史無法使用這樣的時代區分，首先，從古代到中世，中國有其特徵，但西歐沒有，也就是雙方沒有共通處。其二，專業用語的混亂，如封建制與 feudalism。……第二個努力的途徑是東西交涉史，通過絲路的交流，不斷的將東與西聯結起來，想要建構東與西同時有因此交流而推動歷史的說法，但實際上，如托勒密所說的，從安提阿到長安間的交通路來看，不認為有改變歷史的力量。第三個

---

<sup>92</sup>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とは何か〉，收入氏著《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頁 39。

<sup>93</sup>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の可能性〉，《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通信》71（1991 年 3 月）；後改題為〈中央ユーラシアが果たす役割〉，收入氏著《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頁 147。



努力的途徑是塞外史，將其作為東洋史與西洋史之間的媒介。滿洲語、蒙古語、突厥語是歐洲學者自古就研究的課題，所以研究的話，會與歐洲學者有所聯繫。<sup>94</sup>

另一方面，他也認為：「東洋史的原型就是中國史。目前為止，東洋史是在中國與其邊疆的諸民族的架構中成立，研究中國史以外的學者，無法對抗中國史的重量。即使是從事蒙古史研究的筆者也必須承認。」<sup>95</sup> 也就是說，自明治晚期，那珂通世所提議的東洋史、西洋史、日本史的三科劃分制度，不僅無法脫離中國中心觀點，也無法脫離西歐中心觀點。即使如此，延續著研讀原典一手史料的傳統，岡田英弘從蒙古、滿洲等史料尋找著中央歐亞史獨自成立的可能性，發展出中央歐亞地域是推動世界力量的觀點。<sup>96</sup>

### （三）杉山正明

1997年（平成9），杉山正明出版《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在其第1部分〈民族も国境もこえて〉中論述到中央歐亞的定義，在定義之前也論述到其研究的構想，就是從人類史（歐亞世界史、地球世界史）的角度思考，歐亞大陸加上北非的一部分是人類自古以來主要居住的世界，在地理大發現前，舊大陸的歷史就是人類的世界史，也是歐亞世界史的時代。<sup>97</sup>

相較於前述山田信夫、岡田英弘兩位學者對於中央歐亞的看法，杉山正明是受到本田實信（1923-1999）的影響，本田實信是日本少數能使用波斯史料研究蒙古史的學者，在其代表著作《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中，提出蒙古時代是與世界史相連接的概念。<sup>98</sup> 杉山正明認為：

---

<sup>94</sup>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が果たす役割〉，收入氏著《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頁149-150。

<sup>95</sup>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が果たす役割〉，收入氏著《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頁151。

<sup>96</sup>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が果たす役割〉，收入氏著《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頁156-162。

<sup>97</sup> 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頁7-8。

<sup>98</sup> 杉山正明，《世界史を変貌させたモンゴル—時代史のデッサン》，頁187-188。

由宏觀來看，13、14 世紀的蒙古時代史研究有兩種立場，就是「縱」、「橫」兩種。「縱」的立場是將中國、中亞、東南亞、印度、伊朗、中東、西北歐亞、歐洲等文明圈，以時間來進行縱向觀察的立場。規定地域、貫穿時代，通過「歷史的脈絡」來觀察的立場。……「橫」的立場是重視歷史的共時性，跨越地域的構造，橫切歐亞非三洲，進行考察的立場。蒙古時代是世界史上相當特別的時代。<sup>99</sup>

至此可知，杉山正明受到本田實信的影響，從蒙古開始進行對於世界史的考察。杉山正明在論述中央歐亞的範圍時提到：

若以削蘋果的方式將歐亞大陸轉圈削皮，儘管會有些許誤差，大抵就是乾燥氣候。乾燥就是此世界的共通點。相當概略的說，中央歐亞就是這樣世界的通稱。與內陸亞或中亞有少許差異，範圍較廣，且不僅限於亞洲。乾燥世界也到達歐洲，是相當廣泛的地帶。<sup>100</sup>

而在此廣闊地域中住民的生活樣式也相當多元，狩獵、牧畜、遊牧、農耕、工商業等等，其中也可再細分為中小規模的地域。<sup>101</sup>

## 第五節 中央歐亞史中的西藏—藏傳佛教世界的形成與發展

本節論述在西藏被歸入中亞史後，隨著中央歐亞史概念的興起，西藏定位的轉變。第一部分是討論森安孝夫在上述背景中，如何用交流與主體性並存的論述，將西藏納入中亞史，再進一步放入中央歐亞史的框架。第二部分則是在尋找西藏定位時，石濱裕美子提出以宗教觀點來歸納被西藏佛教影響的地域，進而提出西藏佛教世界的概念。

<sup>99</sup> 杉山正明，《世界史を変貌させたモンゴル—時代史のデッサン》，頁 191。

<sup>100</sup> 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頁 12。

<sup>101</sup> 杉山正明，《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頁 12-13。

## 一、森安孝夫

1987 年，森安孝夫發表〈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一文，在討論西藏的定位時，他認為：

西藏在地理上的關係，與其說是與南亞或東亞的一部分，不如說是與中亞有密切關係來得更加恰當。儘管在我國裏，將西藏史放在中亞史的框架中來考察的看法尚未得到大眾承認。這是因為我國的西藏學可說是以佛教學為中心，在與佛教的關係中，無論如何其視角會看往印度與中國。確實在吐蕃時代（7 世紀—9 世紀中葉）中期以降的西藏史如去除佛教就無法論述，而西藏的文學、美術、音樂，甚至到天文、曆法、醫學、藥學等也是與佛教有密切相關而開始發展。但是吐蕃輝煌文化的極盛時代中，在西藏裏摩尼教、景教，甚至是伊斯蘭教都有傳播。這就是表示西藏與中亞或是西亞有其交涉的事實存在。<sup>102</sup>

森安孝夫首先論述中亞、西亞也有西藏有所交流，藉此切入討論中亞與吐蕃的關係。接著從 7 世紀的古代吐蕃王國開始論述，從商品交流的角度，認為由於經濟力量的興起，形成西藏文化圈的基礎。至此之後，儘管 9 世紀中葉吐蕃王國崩潰，政治分裂，但是西藏文化圈仍然持續存在。<sup>103</sup> 上述的視角應是受到內亞史研究者 Christopher I. Beckwith 對於 7 至 9 世紀中，從歐亞史的角度，看當時帝國並立，如法蘭克、伊斯蘭、突厥—回鶻、吐蕃、唐、渤海等帝國的啟發，是歐亞上史的中世前期。<sup>104</sup> 在此前提上，森安孝夫認為：

---

<sup>102</sup> 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收入長野泰彦、立川武藏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東京：冬樹社，1987），頁 44-45。

<sup>103</sup> 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收入長野泰彦、立川武藏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頁 48-49。

<sup>104</sup> 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收入長野泰彦、立川武藏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頁 64。

及至近代，西歐（天主教、新教：羅馬文字）、東歐（基督教、東正教：希臘文字、西里爾文字）、西亞（伊斯蘭教：阿拉伯文字）、南亞（印度教、佛教：印度系文字）、東亞（佛教、儒教：漢字）等文化圈並存的現象是世界史上重要的時代。這些文化圈並不是自然發生與自我形成的，而是從相互的交流與對立中誕生的。……筆者從上述歐亞規模的交流與對立中，認為有一個連結全歐亞世界，被稱為歐亞中世前期的時代，產生活躍於地中海、黑海、中亞、東南亞等路線的人們。當時中亞裏留下大量足跡的突厥系民族、吐蕃、粟特人的重要性，至此能夠理解。不是以此世界史的視角是沒有論述吐蕃史的；相反的，如將吐蕃拔除也無法論述歐亞史。<sup>105</sup>

綜觀此文，森安孝夫是從交流與主體性兩者共同考察西藏史，並將西藏放進歐亞史的脈絡中討論，最後得出吐蕃為中央歐亞史一員之結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僅論述在西藏古代史，其後的部分則未討論到。

## 二、石濱裕美子的藏傳佛教世界論

2000年，山川出版社發行第三版的「世界各國史」叢書，其中北亞史、中亞史已經改版為中央歐亞史，由小松久男主編，他提到：

本書所論「中央歐亞」不完成按照 Denis Sinor 的概念。考慮到叢書的體系與其需要論述到現代的通史性質，本書的「中央歐亞」之範圍，西至窩瓦河—烏拉爾地方（Volga-Urals），東至大興安嶺，也就是蒙古高原為止，北至南西伯利亞的森林地帶，南至西邊的伊斯蘭文化圈，考慮到西藏佛教世界的重要性，也包含西藏高原，西南至伊朗東北部至阿富汗斯坦北部。「中央歐亞」是從現代的眼光來看其歷史，能夠有效的

---

<sup>105</sup> 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收入長野泰彦、立川武藏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頁 64-65。

考察的地域、文化概念。<sup>106</sup>

從此序言來看，西藏能否算是中央歐亞的一員，仍然是有點曖昧的。在石濱裕美子撰寫的第五章〈チベット佛教世界の形成と展開〉中認為：

「西藏佛教」的此一辭彙也只是指涉西藏佛教僅於西藏高原上，無法顯示出其跨越西藏，到中亞、青海高原、蒙古高原、滿洲平野等地域，形成廣大的教圈。13 世紀以後的中央歐亞有著更大的影響力，是最後一波，也就是西藏佛教的北傳。佛典中佛被比喻為王是為人所知的，可知佛教與王權有深厚的關係。佛教所傳播的地域中，無一例外都誕生受到佛教思想強烈影響的王權。以西藏佛教思想的影響為基礎成立的王權，有古代西藏王朝、蒙古人成立的中國王朝元朝、滿洲人成立的中國王朝清朝。西藏佛教所傳播的地域與大乘佛教所傳播的地域相比，在政治上、文化上有著更緊密的關係。……總之，可以說此三地域（西藏、蒙古、滿洲）是以西藏佛教文化為紐帶形成的西藏佛教世界。<sup>107</sup>

上述可知，西藏佛教世界是以信仰西藏佛教為主的地域，主要有蒙古利亞、滿州利亞、西藏等三地域。由於宗教與王權的結合，使得西藏佛教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具體案例為康熙、乾隆兩朝的軍事活動。<sup>108</sup>

自此來看，西藏本身的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宗教，也就是西藏佛教，石濱裕美子以此為切入點，提出受到西藏佛教強烈影響的三塊地域，也就是蒙古利亞、滿州利亞、西藏，以此組成的西藏佛教世界，有著更主動且廣大的影響力。這讓人不禁想到西藏佛教世界與同樣是宗教為主的伊斯蘭文化圈有何差異。

---

<sup>106</sup> 小松久男編，《中央ユーラシア》（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頁4。

<sup>107</sup> 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佛教世界の形成と展開〉，收入小松久男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245-246。

<sup>108</sup> 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佛教世界の形成と展開〉，收入小松久男編《中央ユーラシア》，頁265-274。

## 第五章 世界史中的遊牧民

在前四章裡，我們梳理了日本北亞史研究的大致過程，儘管無法面面俱到，但聚焦於有關於北亞史、中亞史、中央歐亞史等重要地域概念均有涉及。本章將要試著將這些重要的地域概念彙整，進行分析與歸納，希望能找出其中的基本元素與重要概念。一方面能夠有效的對概念本身有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則能夠更深入理解概念的內涵。

### 第一節 從北亞史到中央歐亞史

從第二章至第四章，筆者討論日本學界針對北亞史、朝鮮史、中亞史等地域史以及相關史觀的研究歷程。在此章第一節首先選出 10 本具有代表性的概論書著作，將 10 本概論書著作（北亞史 6、中亞史 4、中央歐亞史 1，其中 1 本為北亞·中亞史）進行歸納分析，進而理解這些地域之關係。

#### 一、基本特徵的彙整

此表使用從 1956 的《北アジア史》到 2001 年的《中央ユーラシア史》共 10 本概論書著作，從中分解出宗教、民族、社會、生活方式、環境等 5 個特徵。

表 5-1：概論書要素統整（1956-2001）

			南俄草原	西亞	印度	西突厥斯坦	東突厥斯坦	西藏	蒙古利亞	南西伯利亞	滿洲利亞	朝鮮
1955	田村實造	環境				乾燥	乾燥	乾燥	乾燥		亞濕潤	
	《北アジア史》 北亞的範圍	生活方式				遊牧・綠洲農 耕民・商業	遊牧・綠洲農 耕民・商業	遊牧・農 耕	遊牧・狩獵		遊牧・狩獵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印歐・阿爾泰	印歐・阿爾泰	漢藏	阿爾泰		阿爾泰	
		宗教									
1956	江上波夫 《北アジア史》 北亞的範圍	環境					乾燥	乾燥	乾燥	亞濕潤	
		生活方式					遊牧・農耕	遊牧	遊牧・狩獵	遊牧・狩獵・農耕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阿爾泰	阿爾泰	阿爾泰	阿爾泰	
		宗教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	
1961	江上波夫與 松田壽男 《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史》 北亞・中亞的範圍	環境			乾燥	乾燥	乾燥	乾燥	濕潤	濕潤	
		生活方式			遊牧・綠洲農耕民・商業	遊牧・綠洲農耕民・商業	遊牧・農耕	遊牧	狩獵	遊牧・狩獵・農耕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宗教									
1969	島田正郎	環境	乾燥		乾燥	乾燥		乾燥	亞濕潤	亞濕潤	

	《アジアの歴史》 北亞・西亞的範圍	生活方式		遊牧・農耕		遊牧・綠洲農耕民・商業	遊牧・綠洲農耕民・商業	遊牧・農耕	遊牧	狩獵	遊牧・狩獵・農耕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阿爾泰・印歐・閃族		印歐・阿爾泰	印歐・阿爾泰	藏族	阿爾泰	阿爾泰	阿爾泰	
		宗教										
		環境	濕潤	乾燥	濕潤	乾燥	乾燥	木	乾燥	亞濕潤	亞濕潤	
	護雅夫等 《北アジア史》	生活方式	農耕	遊牧・農業・商業	農耕	遊牧・綠洲農耕民・商業	遊牧・綠洲農耕民・商業		遊牧	狩獵	牧畜・狩獵・原始農耕民	
1981	北亞的範圍及其與中亞、西亞、東歐的關係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印歐・阿爾泰	閃族	印歐	印歐・阿爾泰	印歐・阿爾泰	←影響	阿爾泰	阿爾泰	阿爾泰	
		宗教										
	護雅夫 1981 《中央アジア史》 中亞的範圍	環境										
		生活方式				遊牧・綠洲農耕民	遊牧・綠洲農耕民	遊牧	遊牧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印歐·阿爾泰	印歐·阿爾泰	阿爾泰				
		宗教				乾燥	乾燥	乾燥	乾燥			
1987	江上波夫 《中央アジア史》 中亞的範圍	環境				乾燥	乾燥	山地氣候				
		生活方式				遊牧·綠洲農耕民	遊牧·綠洲農耕民	遊牧·農耕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印歐·阿爾泰	印歐·阿爾泰	漢藏				
		宗教										
1999	間野英二 《中央アジア史》 中亞的範圍	環境				乾燥	乾燥					
		生活方式				遊牧·綠洲農耕民	遊牧·綠洲農耕民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印歐·阿爾泰	印歐·阿爾泰					
		宗教										
1999	若松寬	環境					乾燥	乾燥	亞濕潤	亞濕潤		

《北アジア史》 北亞的範圍	生活方式						遊牧・農耕	遊牧		狩獵・農耕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漢藏	阿爾泰		阿爾泰	
	宗教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	
2000 小松久男 《中央ユーラシア史》 中央歐亞的範圍	環境	亞濕潤		乾燥	乾燥	乾燥	乾燥	亞濕潤			
	生活方式	遊牧		遊牧・綠洲農耕民	遊牧・綠洲農耕民	遊牧・農耕	遊牧	狩獵・農耕			
	社會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騎馬民			
	語族	印歐・烏拉爾・阿爾泰		印歐・阿爾泰	阿爾泰	漢藏語系	阿爾泰	阿爾泰			
	宗教			伊斯蘭	伊斯蘭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				

本節討論北亞史、中亞史、中央歐亞史組成的相關地域，故以上述地域為討論重點，由東到西包括朝鮮、滿洲、南西伯利亞、蒙古利亞、西藏、東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印度、西亞（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埃及、阿拉伯、土耳其等地）、南俄草原。以下依次討論。

從表 5-1 可以看到，首先是環境方面，中央歐亞史的主要是草原，也就是乾燥地帶，最東邊的滿洲利亞與最西邊的南俄草原則屬於亞濕潤地帶。社會、

生活方式、環境等 3 個因素相互影響，可視為一個整體綜合考察。其次是社會方面，其共通處就是騎馬民，騎馬民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遊牧騎馬民，另一類則是半牧半農或半牧半獵的騎馬民。<sup>1</sup> 江上波夫認為：

如上所述，因亞洲地理環境的差異，在前述 4 個地域中（筆者註：1. 溫暖濕潤地帶—農耕 2. 內陸歐亞乾燥地帶—遊牧、綠洲農耕 3. 亞濕潤地帶—狩獵 4. 西南亞乾燥地帶—遊牧、農耕），遊牧民的主要地域是內陸歐亞、西南亞的乾燥地帶，此兩地域是騎馬民主要的發源地，也是活躍的舞台。在此二地域中，某個時期或可說遊牧民即騎馬民，兩者為一體的存在，因此也稱為「遊牧騎馬民」是恰當的。但是不能將騎馬民都視為遊牧民。因為狩獵民、半獵半農民、半獵半牧民、半牧半農民也是騎馬民的決不在少數。特別是北部歐亞的森林地帶、內陸歐亞的乾燥地帶及其接壤地帶，或是從內陸歐亞的乾燥地帶到季風的濕潤地帶間的過渡地帶，都有非遊牧民的騎馬民出現。但是上述的非遊牧民的騎馬民儘管不少，卻都是受到鄰遊牧騎馬民的影響而成為騎馬民的，在歐亞大陸騎馬民的出現、發展裏，遊牧民族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這是必需重視的。<sup>2</sup>

從上述江上波夫的論述，騎馬民是屬於中央歐亞史的一個重要的組成元素，而遊牧騎馬民影響了周邊的狩獵民、半獵半農民、半獵半牧民、半牧半農民也成為騎馬民。這也可以延伸到生活方式，中央歐亞史包含三個生活方式，遊牧、狩獵、綠洲農耕，而這三個生活方式，又同屬於一個騎馬民文化。

其次是語族，從圖表來看，北亞史、中亞史、中央歐亞史的主要語族是印歐語族與烏拉爾·阿爾泰語族兩支。儘管印歐語族的起源地、遷徙過程都尚未有定論，<sup>3</sup> 但屬於印歐語族的斯基泰人（Scythians）、亞利安人（Aryan）自西元前 9 世紀開始，東歐開始由西向東的發展出的騎馬遊牧文化在中央歐

---

<sup>1</sup> 江上波夫、大林太良，〈終章「民族の世界史」をめぐって〉，《民族の世界史 1 民族とは何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1），頁 349。

<sup>2</sup>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東京：中央公論社，1967），頁 10-12。

<sup>3</sup> 大林太良，〈第二章広域間の移動—大語族の移動〉，《民族の世界史 1 民族とは何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1），頁 56-61、67-82。

亞史上都具有重要影響，在圖表中主要在南俄草原、西亞、印度、突厥斯坦等地發展。另一方面，烏拉爾·阿爾泰語族的發展則是在印歐語族後，其相關論點也尚未定論，其下可再分為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個系統，是中央歐亞史在西元後的主要民族，主要活動範圍是在滿洲利亞、蒙古利亞、突厥斯坦、印度、西亞、南俄草原。

最後是宗教，綜觀歷史，騎馬民對於宗教的包含力是相當大的，從原先的薩滿信仰、佛教、景教（聶斯托留教）、摩尼教、猶太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等，均先後傳入北亞、中亞、東歐，對政治、文化、藝術上都發揮重大的影響力，而其中占有最要影響力的應可說是藏傳佛教與伊斯蘭教。從圖表上來看，藏傳佛教在西藏、滿洲利亞、蒙古利亞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進而形成一個藏傳佛教世界。伊斯蘭教則是自 8 世紀崛起後，逐漸東傳，與突厥系民族的西遷相互影響交融，讓中亞、西亞等地域的居民都開始信仰伊斯蘭教，成為在考察中亞史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地域的擴大

### 1. 遊牧文明圈

從田村實造編的《北アジア史》（以下簡稱田村編《北アジア史》）、江上波夫主編的《北アジア史》（以下簡稱江上編《北アジア史》）、江上波夫與松田壽男共編的《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史》、護雅夫、神田信夫主編的《北アジア史》（以下簡稱護編《北アジア史》）、島田正郎著的《アジアの歴史》、若松寬主編的《北アジア史》（以下簡稱若松編《北アジア史》），共有 6 個版本。6 個版本的北亞史範圍有了明確的變化。

田村編《北アジア史》的特色之一是將中亞史與西藏史做為附編，因為編輯者認為：「將中國文化圈視為東亞世界，將包含滿洲、蒙古利亞、中亞的遊牧文化圈視為北亞世界，將波斯·伊斯蘭文化圈視為西亞世界，將印度·亞利安文化圈視為南亞世界，此四個歷史世界在近代之前是各自並存的。」

<sup>4</sup>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田村實造將中亞列入遊牧文化圈，視為北亞歷史世界。江

---

<sup>4</sup> 此文出自〈序說〉，儘管〈序說〉未標示執筆人，但應是監修者田村實造或羽田明所撰。參

上編《北アジア史》與田村的北亞史有所差異，所先是增加朝鮮、西藏、西伯利亞，去除了突厥斯坦（即中亞）。相較於田村使用遊牧文化圈為此地域的最大公約數，江上波夫則是使用阿爾泰民族為最大公約數。兩者的最大差別則是田村實造將北亞視為一個整體，用遊牧國家、征服王朝來貫穿整體；江上波夫則是分為蒙古利亞、滿洲利亞、朝鮮三地域來分別論述，如此看來田村編《北アジア史》的整體性似乎更強。江上波夫、松田壽男的《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史》，將北亞史與中亞史分為凍原、森林、草原、綠洲共四個地域，將人分為遊牧民、狩獵民、綠洲商業・農耕民三類。<sup>5</sup>島田正郎的《アジアの歴史》，則將蒙古利亞、滿洲利亞、中亞、西伯利亞、西藏都納入北亞史。<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島田正郎認為：「北亞的內陸台地，也被稱為內陸亞洲或乾燥亞洲，是將內陸地帶視為乾燥性風土帶，也包含綠洲的農耕社會、森林與山岳的狩獵社會，形成以游牧為主軸的牧畜型態，從太古開始發展其歷史。」<sup>7</sup>

到了護編《北アジア史》時，承續前面三本的主要概念，除了要將北亞史自中國史切離觀察，呈現其獨立性外，更系統論述北亞歷史世界對於中國史、中亞史、西亞史、東歐史的影響。筆者認為這可視為田村實造的遊牧文化圈的擴大闡述。<sup>8</sup>將遊牧文化的影響力擴大到西亞與東歐。中亞與西亞部分，護雅夫認為中亞的北半部屬於遊牧文化的地域，此處的遊牧民多為北亞而來，其中突厥民族更在中亞有重要地位；南半部則是綠洲農耕民的地域，其後突厥系民族在南半部的定居化，也讓此處的人口結構逐漸轉變為以突厥系民族為主。<sup>9</sup>北亞對於西亞地域則是以突厥民族的持續西進所帶來的影響為主，包括突厥系民族以優勢的軍事力成為西亞諸國家的統治階層等，成為北亞遊牧文化的影響範圍。<sup>10</sup>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使用「文明圈」所形成的歷史世界，是具有彈性的

---

見田村實造、羽田明監修，河地重造責任編輯，《アジア史講座 第1卷 中国史I》（東京：岩崎書店，1955），頁6-7。

<sup>5</sup> 江上波夫、松田壽男，《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史》，頁27-33。

<sup>6</sup> 島田正郎，《アジアの歴史》，頁15-16。

<sup>7</sup> 島田正郎，《アジアの歴史》，頁147。

<sup>8</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1-8。

<sup>9</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3-4。

<sup>10</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4-5。

概念，使得北亞史的範圍在不同學者的定義中，有著不同的範圍，但是經過上述圖表的呈現，北亞史核心應是以蒙古利亞為中心的「騎馬遊牧民」所建立的「遊牧文化」，加上鄰近的狩獵民、綠洲民而形成的「遊牧文明圈」。

## 2. 北亞史與中亞史範圍的延展

從上述討論可知，北亞史的範圍具有延展性，田村編《北アジア史》納入突厥斯坦，江上編《北アジア史》，納入西伯利亞、朝鮮、突厥斯坦，<sup>11</sup>島田正郎的《アジアの歴史》則納入突厥斯坦。護編的《北アジア史》則無朝鮮、突厥斯坦。上述四本北亞史著作中不變的地域是蒙古利亞、滿洲、西伯利亞三地域。有變動的地域則是突厥斯坦；未有明確定位的是西藏。

護雅夫的《中央アジア史》的地域設定，中心地域是突厥斯坦，廣義則包括蒙古利亞、東突厥斯坦北部（準噶爾利亞）、西藏、阿富汗斯坦北部。<sup>12</sup>值得注意的是，護雅夫同時出版了《北アジア史》與《中央アジア史》兩書，但兩書的地域重疊了蒙古利亞，這應是研究者對於地域範圍有各自見解所造成，另一方面，也可說明歷史世界本身因文化傳播，並無明確的地理界線。江上波夫的《中央アジア史》在南北共生與東西交涉的基礎下，基本與護雅夫的中亞史設定相同，僅未加入蒙古利亞。值得注意的是，江上波夫認為，考慮到印歐語族在遷徙時傳播文化的相關問題，如大乘佛教與犍陀羅美術的形成等。這些問題已經超越中亞史的框架，進而提出大中亚史的框架，綜合使用文獻史料、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取徑來研究。<sup>13</sup> 間野英二的《中央アジア史》則著重於闡釋南北共生為中亞史的基調，非是東西交涉，地域範圍與前面的中亞史著作大致相同，包括突厥斯坦、準噶爾利亞、哈薩克斯坦，但未加入西藏。

---

<sup>11</sup> 江上波夫在序言提到，1956年出版的北亞史，因為就是將北亞與中亞合併論述，認為太過簡略，所以在新版時才會分為北亞史、中亞史兩卷論述。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頁 i。

<sup>12</sup> 護雅夫，《中央アジア史—シルクロードに興亡した国々》（東京：旺文社，1981），頁 11-12。

<sup>13</sup>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頁 iii-iv。

### 三、中央歐亞史的誕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即將高等教育原本的東洋史・西洋史體制，改為世界史體制。在這樣的狀況下，如同第四章討論的發展過程，在接受 Denis Sinor 的 Central Eurasia 的概念後，在原本的北亞史、中亞史框架的基礎上，產生了中央歐亞史的框架。

小松久男主編的《中央ユーラシア史》承接了先前北亞史、中亞史研究者的架構，將草原、沙漠、綠洲的乾燥地帶視為最大的特徵之一，騎馬遊牧民與綠洲遊牧民則成為創造歷史的主要居民。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之前的中亞史概論書的範圍，小松久男將範圍更往西移，增加了南俄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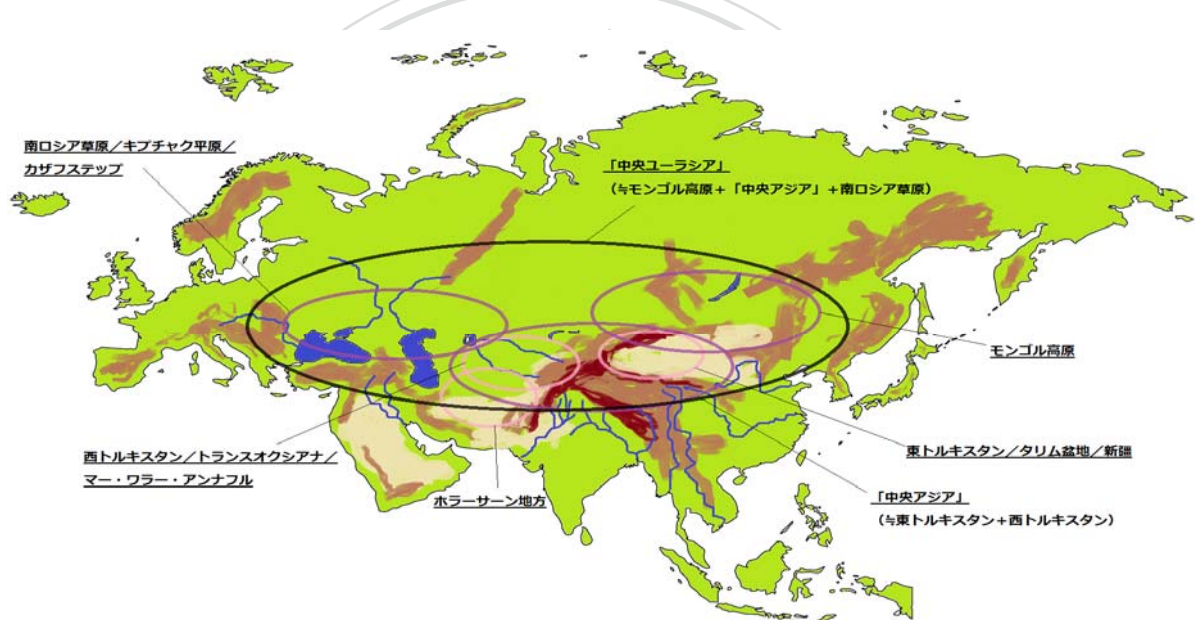


圖 5-1：中央歐亞地域圖

資料來源：<http://wsh1420.blog.fc2.com/page-8.html> 2016/05/23

從上述北亞史、中亞史、中央歐亞史概論書的地域比較與核心要素的匯整結果來看，筆者認為中央歐亞史可說是北亞史的延伸，將遊牧文化圈的概念超越東洋史的範疇，拓展到世界史，進而將範圍拓展到南俄草原。

## 第二節 滿洲、西亞地域的特徵與比較

在第一節中已經討論北亞史地域的擴大，並討論由此形成中央歐亞史的過程。其核心的概念就是由騎馬遊牧民在乾燥地帶形成的遊牧文化。但是其中仍有具有討論空間的地域，如滿洲利亞屬於濕潤地帶的地域，與雖同屬乾燥地帶，但文化因素更加多元的西亞。本節依序討論滿洲利亞、西亞兩個地域是否適合納入中央歐亞史的範疇中。

### 一、滿洲利亞

滿洲利亞是亞濕潤地帶，具有比蒙古利亞更為複雜多元的生態，如第一節提到的江上編《北アジア史》、護編《北アジア史》、Juha Janhunen 的 *Manchuria: An Ethnic History* 都有相同見解。研究者都將滿洲利亞分為從西伯利亞到東滿與南滿，並延伸到朝鮮半島北部的森林地帶、西滿洲到北滿洲的草原沙漠地帶、南滿洲的農耕平原地帶。<sup>14</sup> 神田信夫認為滿洲利亞史的主角是狩獵民：「「滿洲史」的主角是森林地帶的住民，因經常與西方的遊牧民與農耕民接觸，反覆進行經濟交流與對立抗爭。其勢力時強時弱，「滿洲史」的發展如無視與遊牧民與農耕民的關係，則無法理解。在森林地帶住民占有優勢時，領有平原地帶，再將草原地帶納入統治，如此發展到巔峰時，進入中國本土，建設中國王朝。」<sup>15</sup> 此時已將滿洲利亞視為狩獵民為主的地域，而其後如第四章所述，更進一步的將滿洲利亞納入東北亞史的範疇。

從第四章第二節的討論可知，東北亞地域就是以通古斯族為主體設定的地域，其範圍與戰前滿鮮史的設定範圍大致相同，<sup>16</sup> 東北亞史的設定可視為研究者欲強調通古斯族在東北亞地域的重要性，但是如同三上次男認為此地域自古以來就同時受到內陸亞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影響，<sup>17</sup> 此地域具有內陸亞

<sup>14</sup> 江上波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183-184；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272-274；Juha Janhunen, *Manchuria: An Ethnic History*. Helsinki: Finno-Ugrian Society, 1996., pp3-6.

<sup>15</sup>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北アジア史》，頁 273。

<sup>16</sup>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頁 270。

<sup>17</sup> 三上次男，〈初版の序〉，收入氏著《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北アジア史研究第二》，



與中國的部分特性。Juha Janhunen 則將滿洲利亞與蒙古利亞、中國兩者視為一個三角關係來進行考察，<sup>18</sup> 這與三上次男的觀點有相似之處。

自江上編《北アジア史》開始的北亞史設定中，因為滿洲利亞的民族為阿爾泰語族，所以將其納入北亞史的範疇，而 Denis Sinor 也以同樣的理由將滿洲利亞納入中央歐亞史的範疇。

中央歐亞史的核心是以乾燥地帶為活動地域的騎馬遊牧民形成的遊牧文化圈，以此為基礎形成的遊牧國家，在政權發展時，研究者注意到由綠洲地帶中各城邦形成的絲路，是遊牧國家得以獲得足夠經濟力，進而擴展的重要因素之一。<sup>19</sup> 如此發展為中央歐亞史是騎馬遊牧民與綠洲農耕民為主角開展的歷史。

遊牧民的牧畜經濟由於本身的精密複雜性，加上受到生態環境的限制，無法如農耕民穩定發展，呈現出不穩定的脆弱結構。松田壽男提出「遊牧經濟+X=發展」的概念，<sup>20</sup> 除了絲路的隊商貿易外，貨品重要來源之一的皮毛就是來自森林狩獵民。其二，歷史上常見到由狩獵民轉變為遊牧民的案例，<sup>21</sup> 如鮮卑、蒙古都有經歷過從狩獵民轉為遊牧民的過程，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狩獵民跟遊牧民的關係也是相當密切。由此從地域互動的角度來觀察，滿洲利亞與蒙古利亞的關係無疑比中國來得更加緊密。<sup>22</sup> 另一方面，狩獵民與農耕民關係也相當密切，如烏桓、女真等，在與漢朝、宋朝頻繁接觸後，最後也都受到漢人生活方式的影響。而從阿爾泰語族的一致性、地域間的互動、遊牧民與狩獵民的密切關係等來考慮的話，將滿洲利亞納入中央歐亞史的範圍也是有其根據。

其四，從日本學界的研究趨勢來看，滿洲史的定位越來越模糊。從上述

---

頁 4。

<sup>18</sup> Juha Janhunen, *Manchuria: An Ethnic History*, p7.

<sup>19</sup> 松田壽男，〈蒙古遊牧民とその歴史の役割〉，收入氏編《蒙古學》第1冊（東京：善鄰協會，1937），頁6、21-23。

<sup>20</sup> 松田壽男，〈北アジア〉，收入氏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第二卷 遊牧民の歴史》（東京：六興出版，1986），頁368-369。

<sup>21</sup> 松田壽男，〈蒙古遊牧民とその歴史の役割〉，收入氏編《蒙古學》第1冊，頁10；松田壽男，〈シベリア史論〉，收入氏著《松田壽男著作集 第二卷 遊牧民の歴史》（東京：六興出版，1986），頁296-297。

<sup>22</sup> Juha Janhunen, *Manchuria: An Ethnic History*, p8.

的概論書的彙整表來看，滿洲首先被歸納入北亞史的範圍，此做法幾乎不曾改變，但至近期，則被歸納進中國史裏清朝史的範疇。<sup>23</sup> 戰後日本學界對於世界史的理解是國別史→地域史→世界史的層層推進，<sup>24</sup>

## 二、西亞

在西亞史中，與本文相關的有兩個重要概念，一為伊斯蘭文化圈，二是突厥系民族西遷而帶來的變化。

在第三章中已提到的由大久保幸次、松田壽男、小林元為主要人員成立的回教圈攷研所，提出「回教圈」的概念，因應當時日本大陸政策的需求，重點集中在中國西北與東南亞兩地的調查。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隨著相關的昭和 29（1954）年開始，日本東方學會、中東調查會、日本伊斯蘭協會等組織的陸續成立，逐漸發展出以西亞為主的伊斯蘭世界的概念。<sup>25</sup>

伊斯蘭世界無疑是以伊斯蘭教為核心建構的歷史世界。當此概念的初步提出後，印度史學者荒松雄就提出如果伊斯蘭世界存在，那麼是否應該思考基督教世界、佛教世界的存在。前嶋信次則認為：

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在於伊斯蘭制度處於絕對性的支配地位，大家知道佛教世界及基督教世界中沒有佛教法學及基督教法學，可是在伊斯蘭，《古蘭經》的教義本身就是法，人們根據它來進行政治活動。也就是說，伊斯蘭法是存在的。既然其支配體制存在，就應存在過不同於其他宗教的伊斯蘭世界。我認為伊斯蘭世界史涉及的範圍就是伊斯蘭教徒根據伊斯蘭法實行統治的地區。故而中國等地雖然也生活著許多伊斯蘭教徒，但它不是伊斯蘭世界。但是印尼的確是伊斯蘭世界，即處於伊斯蘭法支配

<sup>23</sup> 塚瀨進，《マンチュリア史研究：「滿洲」六〇〇年の社会変容》（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頁 42-43。

<sup>24</sup> 古田元夫，〈地域区分論—つくりられる地域、こわされる地域〉，收入樺山紘一等編集《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1 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ーチ》（東京：岩波書店，1998），頁 40。

<sup>25</sup> 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67-168。

下的世界。<sup>26</sup>

從上述來看，前嶋信次認為，由穆斯林使用伊斯蘭法進行統治的地區，就屬於伊斯蘭世界。如此自北非、蘇丹、西亞、巴基斯坦、印尼、西突厥斯坦等地都在此範圍。<sup>27</sup> 接著產生的問題就是伊斯蘭世界與中央歐亞史的世界產生了重疊，如西突厥斯坦；另一方面，由於突厥族、蒙古族的西進，也帶給西亞地區重要的影響。這點在最近的西亞史研究史也意識到了。主編《西アジア史 II イラン・トルコ》的永田雄三認為：

本書的特徵之一是，從中央歐亞遷徙而來的突厥・蒙古系的住民，特別是突厥人所起的作用成為論述的重點。其特色在於，從十一世紀以後的西亞史到十四世紀的西亞・伊斯蘭史的後半段，突厥人不只掌握政治的主導權，他們將中央歐亞遊牧騎馬民的規範、習俗、精神、文化等，在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蘭文明上，添加了新的活力。<sup>28</sup>

有關歷史世界的重疊性也有所意識：「本書的範圍，有很廣泛的地域與巴爾幹半島或中亞有所重複，所以需要與本叢書的《バルカン史》與《中央ユーラシア史》相互參照。」<sup>29</sup>

根據間野英二對於西突厥斯坦在 10、11 世紀，當突厥人與伊斯蘭文化交會時，逐漸形成的「突厥・伊斯蘭文化」，有以下見解：

喀喇汗國（Kara-Khanid Khanate）社會的基本構成要素是突厥系游牧諸部族—Chigil、Turgis、Yaghma、Karluk 等部族—的貴族所組成。如此，以自豪高貴血統的可汗一族為中心，由游牧諸部族的貴族階層占據國家要職的喀喇汗國之社會，可視為保持、繼承突厥・回鶻以來的內陸亞・突厥系游牧社會傳統。與此同時，由突厥人「奴隸」出身的統治者所建立的伽色尼王朝（The Ghaznavid Dynasty）、花拉子模・沙王朝（Dynasty

<sup>26</sup> 前嶋信次，《イスラムとヨーロッパ》（東京：平凡社，2000），頁 391-393。

<sup>27</sup> 前嶋信次，《イスラムとヨーロッパ》，頁 393-395。

<sup>28</sup> 永田雄山編，《西アジア史 II イラン・トルコ》（東京：山川出版社，2002），頁 ii。

<sup>29</sup> 永田雄山編，《西アジア史 II イラン・トルコ》，頁 3。

of Khwarazm Shahs) 等社會與喀喇汗國相比有些許相異。<sup>30</sup>

其相異的部分應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屬於不同文化導致的，也就是要將其視為遊牧民向外擴張勢力而成立的征服王朝。如第三章提到的，山田信夫認為：

特別是在東亞史研究中，所謂的征服王朝幾乎是定型的專門歷史詞彙。如最近，已有學者試著考察與征服王朝相關聯的邊境王國。……在考察中亞的突厥諸王國的性格、歷史定位，與東亞史上的征服王朝，特別是有直接關係的遼、金、元、清合併時；事實上，可說有更深厚關係的西方的伽色尼王朝、塞爾柱土耳其王朝都不能忽略。或是東歐史上的俄羅斯各諸侯國到莫斯科公國的發展、匈牙利王國的成立，也都需要放在同一範疇考察。如此，做為歐亞舊世界各種現象的焦點之一，才能從更完整的角度思考突厥斯坦的成立。<sup>31</sup>

儘管在目前台灣的認知中，征服王朝一詞都僅指涉中國史裏的遼、金、元、清等四王朝，但是早在征服王朝一詞開始引介日本時，田村實造也就言明征服王朝應是一班名詞，廣泛適用於西亞的伊兒汗國、薩珊帝國、塞爾柱土耳其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帖木兒汗國、蒙兀兒帝國等。<sup>32</sup> 所以加入征服王朝的思考時，喀喇汗國史雖因資料太少，很多部分僅止於推論，但是做為第一個改宗伊斯蘭教的遊牧國家應該是能夠確定的。<sup>33</sup> 自此以後，改宗伊斯蘭的突厥系民族，在 11-15 世紀的安那托利亞與伊朗地域持續發揮軍事上絕對優勢，<sup>34</sup> 其軍人多數出身於突厥系、伊朗系、蒙古系等的遊牧民，使用優良的騎射技術戰鬥。進入統治層的契機則是哈里發、蘇丹欣賞其軍事技術，以軍事用奴隸的名義由統治者購入，這些軍事用奴隸被稱為馬木魯克 (Mamluk)，伽色尼王朝使

<sup>30</sup> 間野英二編，《中央アジア史》（京都：同朋舎，1999），頁 101。

<sup>31</sup> 山田信夫，〈トルキスタンの成立〉，收入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III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頁 490。

<sup>32</sup>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中國征服王朝について—總括にかえて—〉（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71），頁 625-626。

<sup>33</sup> Michal Biran, "Karakhanid Khanate," *Encyclopedia of Empires*.2016, pp1-2.

<sup>34</sup> 永田雄山編，《西アジア史 II イラン・トルコ》，頁 100。

用馬木魯克的其中一個王朝。<sup>35</sup>

突厥系民族自 11 世紀開始，廣泛的在中亞、西亞地區建立類似的奴隸兵王朝，有別於喀喇汗國，產生差異的根源相當複雜，但只要在於遊牧國家制度、伊朗傳統制度、伊斯蘭教統治制度等三者的比例。根據 Peter B. Golden 的研究，他認為：

塞爾柱土耳其在早期的突厥·伊斯蘭化政權中可說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某種程度上，它處於伽色尼王朝與喀喇汗國的政權構成模式的中間。伽色尼王朝基本上是一個私人的、建構式的政權，以變動的軍隊或軍事階層為主，以及與薩曼王朝模式為基礎的波斯官僚機構為輔，強迫統治被征服地區。它具有殖民性質與掠奪性質，通過征服、戰利品、來自哈里發的合法性而凝聚在一起，沒有共同的起源與歷史將臣民與王朝聯繫，即便是宗教聯繫也不普遍。另一方面，喀喇汗國儘管擁有上述基礎，但同樣不安的是，也是因為它由共享的傳統的突厥帝國傳統所支撐著。雖然急於尋求的伊斯蘭合法性對它有所幫助，但在遊牧部落中並未有決定性的作用，各部落伊斯蘭化的程度仍然是個問題。塞爾柱土耳其雖然企圖在突厥傳統的脈絡上，拓展可汗氏族的影響力，但卻只能更加依靠伊斯蘭傳統，如同先前喀喇汗國宣稱要繼承遊牧國家傳統的情況相同。所以這也針對那些部落提出某些問題，就是部落民的意識依然停留在部落層次上。塞爾柱蘇丹現在成為伊斯蘭社會的當權者，成為薩曼王朝「沙」的繼承者。<sup>36</sup>

從上述 Golden 的論述可更清楚的看出喀喇汗國、伽色尼王朝、塞爾柱土耳其三個政權的差異性。喀喇汗國應是承續突厥遊牧國家傳統最多的政權，但由於改宗伊斯蘭，也使得本身的突厥帝國傳統相當程度的淡化。伽色尼王朝是由馬魯路克用優勢的軍事力量所建立的王朝，但並未繼承如喀喇汗國的突厥遊牧國家傳統，而是更依賴伊斯蘭教。塞爾柱土耳其則的狀況則是位於兩者中間，但仍逐漸往伊斯蘭傾斜。

<sup>35</sup> 佐藤次高編，《西アジア史 I アラブ》（東京：山川出版社，2002），頁 256-257。

<sup>36</sup> Peter B. Golden, "The Karakhanids and Early Islam,"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Harvard: Cambridge, 1990), p366.

由此來看，符合護編《北アジア史》中論述北亞史與中亞史、西亞史的關係。小松久男編的《中央ユーラシア史》也對此有所論述：

突厥系民族的伊斯蘭化現象在中央歐亞各地同時發生，其中有決定性地位的是喀喇汗國。其可汗氏族是否為遊牧部族出身，仍有很多看法，尚未定論。但以西元 840 年，蒙古利亞的回鶻汗國被滅後，在血統與突厥的首領氏族阿史那氏有聯繫的人自稱可汗，從怛羅斯到伊黎河谷，再到喀什的地域間形成部族聯盟是目前較為人接受的見解。……改宗伊斯蘭後，喀喇汗國持續維持遊牧統治體制。<sup>37</sup>

總結上述討論，一方面從西亞發跡的伊斯蘭教，東傳進入中亞形成影響，另一方面突厥系民族的向西遷徙也影響了中亞、西亞的民族結構、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如此伊斯蘭因素與北亞遊牧民因素交互影響，使得西亞史與中央歐亞史有共同重疊的部分，而《中央ユーラシア史》只討論喀喇汗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要理解西亞史的塞爾柱土耳其，也需要有中央歐亞史的背景。

---

<sup>37</sup> 小松久男編，《中央ユーラシア史》，頁 163-164。

### 第三節 世界史的基本單位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史教學與世界史概說書

1945（昭和 20）年，日本宣布戰敗。1947（昭和 22）年，文部省發布的「學習指導要領」中的西洋史（試案）寫到：

人類的歷史是被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發展，其發展視地域而各有差異，所以將世界史分為東洋史與西洋史兩大部分。東洋史的重要性是因為我們為其中一部分，故要理解東洋的特殊性，但是當前世界的主流是西洋文明，所以為了理解東洋歷史，西洋史的知識是絕對必要的。<sup>38</sup>

此時世界史的基礎還是東洋史、西洋史。1951（昭和 26）年，「學習指導要領」就成為沒有東洋史、西洋史，只有世界史。所以 1951 年後，高中教育開始使用新的世界史架構，但大學仍然持續使用東洋史、西洋史的架構。<sup>39</sup> 從內容來看，時代區分為近代以前、近代、現代，其中強調近代的重要性。其二，架構仍然使用東洋、西洋的思考。其三，強調歐洲文明的進步，以及現代歐洲文明的領導地位。<sup>40</sup>

1960（昭和 35）年，岩波書店出版上原專祿主編《日本国民の世界史》。此書原本就是要做為教科書來使用的，但因未獲文部省審查通過，其後才做為一般書籍發行。<sup>41</sup> 此書的特色在於使用文明圈的概念來論述世界史，上原專祿認為：「形塑民族的形成與其樣貌的，有其一定的歷史特徵，用以總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構造與內容的整體。如此，「文化圈」一詞，其意義就是形成一個共通的文明。」<sup>42</sup> 延續著 1951 年的「學習指導要領」，將世界史分

<sup>38</sup> 學習指導要領データベース：<https://www.nier.go.jp/guideline/s22ejs5/index.htm> 2016/05/16

<sup>39</sup> 羽田正，《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東京：岩波書店，2011），頁 32-33。

<sup>40</sup> 羽田正，《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頁 34-37。

<sup>41</sup> 上原專祿，《日本国民の世界史》（東京：岩波書店，1960），頁 iii-x。

<sup>42</sup> 上原專祿，《日本国民の世界史》，頁 8-9。

成東洋文明圈與西洋文明圈兩部分，東洋文明圈再分成東亞文明圈、印度文明圈、西亞文明圈三個，西洋文明圈未再細分，<sup>43</sup> 其中對於中央歐亞遊牧民族的敘述，分散於論述東亞文明圈、印度文明圈的章節中，為有獨立成章。時代分期也是近代之前、近代、現代。

## 二、梅棹忠夫及其《文明の生態史觀》

1967 年，民族學者梅棹忠夫發表《文明の生態史觀》一書。其主要立論是以演替理論 (ecological succession) 為基礎，認為：「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歷史就是人與土地相互作用的結果。換言之，就是環境系統自我運動的結果。」<sup>44</sup> 世界史的發展為多元的並相互影響。不同地域的人類，其生態環境也有所差異，交互作用下各地域均有獨特的文明。<sup>45</sup>

表 5-2：文明的生態史觀論點簡表

	第一地區	第二地區
具體地域	1. 西歐 (德、法) 2. 日本	1. 中國世界 2. 印度世界 3. 俄羅斯世界 4. 地中海·伊斯蘭世界 5. 東南亞世界 6. 東歐
政治意識與政治實踐的分化	知識分子不直接參與政治， 但會提出大量議論	知識分子就是執政者，專制政治

<sup>43</sup> 上原專祿，《日本国民の世界史》，頁 9-10。

<sup>44</sup> 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收入梅棹忠夫著《梅棹忠夫著作集 第 5 卷 比較文明学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頁 145。

<sup>45</sup> 谷泰，〈世界史理論への挑戦〉，收入梅棹忠夫著《梅棹忠夫著作集 第 5 卷 比較文明学研究》，頁 570-571。



歷史類型	從第二地區引進文明，經歷封建制、專制主義、中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成為高度現代文明地域。	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但封建制未充分發展，後來雖建立巨大的專制帝國，但後來成為第一地區的殖民地
生態類型	氣候適宜、如在溫室中的發展	乾燥地區、惡魔之巢、暴力與破壞之源

資料來源：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收入梅棹忠夫著《梅棹忠夫著作集 第5卷 比較文明学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頁 60-89、135-137。

文明生態史觀的考察範圍主以歐亞兩洲加上部分北非所組成的舊世界為考察對象外，再加上東南亞。梅棹忠夫將上述地域分為第一地域與第二地域，比較文明發展的差異。第一地域分別位於中緯度溫帶的東西兩端，為西歐與日本，有適宜的雨量與豐富的自然資源。比較西歐與日本，具有平行進化現象，同樣的經歷過封建制、絕對主義、中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等階段，成為高度現代的優勢文明地域。

第二地域則位於中央歐亞，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誕生巨大的專制帝國，但居住在其中乾燥地帶的遊牧民憑藉優勢的軍事力，頻繁的往四周發動戰爭，使得此地域無法像第一地域發展高度的文明。梅棹忠夫乾燥地帶的遊牧民向鄰近的農耕民發動戰爭，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相較於第一地域依照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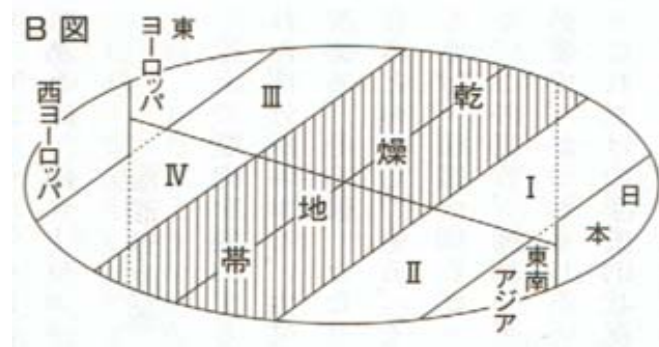


圖 5-2：生態史觀所見的世界史

資料來源：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收入梅棹忠夫著《梅棹忠夫著作集 第5卷 比較文明学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頁 143。

替理論 (ecological succession)，不斷的自我進化，最後形成高度文明的狀況，第二地域文明則是需要經由交流互動而獲得進化，如東亞的農耕地帶國家因

為遊牧民的軍事行動，逐漸完善本身的行政組織。<sup>46</sup>

由上述的論述看來，儘管文明生態史觀忽略了考察第一地域與第二地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導致第一地域看似成為完全自我進化而形成的烏托邦。<sup>47</sup>但是仍然對於日本學界的世界史理解產生強烈的衝擊。梅棹忠夫將文明視為基本單位，進一步將各文明歸納為第一地域與第二地域，此點與戰後以來將文明視為基本單位的看法是相同的。



---

<sup>46</sup> 楊海英，〈內陸アジア遊牧文明の理論的再検討：今西錦司『遊牧論そのほか』と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の現在〉，《文化と哲学》28（2011），頁36。

<sup>47</sup> 小林道憲《文明の交流史観—日本文明のなかの世界文明》（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頁3-4。

### 三、世界史的基本單位

1970年，文部省公布的「學習指導要領」，開始使用「文化圈」的詞彙，其架構為東亞、西亞、西洋等三文化圈，北亞遊牧民族則在東亞文化圈中敘述。並提到：「希望能夠提出文化圈的歸納方式。」<sup>48</sup> 這也可以得知此時文化圈的使用尚未固定，但此時東洋、西洋的概念已經逐漸薄弱。<sup>49</sup>

1971年，岩波講座出版《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叢書，同樣使用文化圈的概念，將世界史分為五個歷史世界：古代近東、地中海、南亞、東亞、內陸亞、西亞，內陸亞中包含北亞與中亞。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個歷史世界的緒論，都有專章用文明圈的概念論述各歷史世界的獨特性與得以成立的原因。

1978年，文部省公布修改的「學習指導要領」，延續文化圈的使用，理解前近代的世界為複數的文化圈相互影響，架構為東亞、西亞、歐洲三個，中央歐亞的遊牧民、南亞、東南亞僅少部分提及。<sup>50</sup>

1996年，新版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叢書，延續文化圈的概念，將世界史分為：近東、地中海、南亞、東南亞、東亞、中央歐亞、伊斯蘭。值得注意的是，內陸亞轉為中央歐亞，以及多出伊斯蘭。同年改版的「學習指導要領」開始出現「地域世界」的概念，並且更加強調各文化單位的相互影響。

<sup>51</sup>

2001年，高谷好一發表專書《「世界單位」から世界を見る－地域研究の視座－》，此書首先將生態環境分為沙漠與草原、森、野、海四類，野的範疇有中華世界、印度世界，海的範疇有印度洋世界、地中海世界、東南亞海域世界、東亞海域世界。沙漠與草原、森的範疇沒有專章論述。

從上述看來，儘管學界已經將草原、綠洲、森林民的世界建構出北亞史、中亞史、內陸亞史、中央歐亞史等範疇，但從世界史教學的角度來看，草原與森林民的概念仍然無法獨立成為一個可論述的單位。可是從筆者自第一章

<sup>48</sup> 學習指導要領データベース：<https://www.nier.go.jp/guideline/s45h/chap2-2.htm> 2016/05/16

<sup>49</sup> 羽田正，《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頁38。

<sup>50</sup> 羽田正，《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頁38-39。

<sup>51</sup> 羽田正，《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頁39-40。

至目前的討論來看，遊牧民、綠洲民、森林狩獵民組成的中央歐亞歷史世界，應是成立的。在學術上成立困難的原因在於史料的缺乏與漢文史料的限制，教學世界史的困難則是在於，遊牧民本身移動性的優勢，導致難以論述一個確定地域的歷史世界。

由筆者看來，世界史的單位在前近代的歐亞大陸中應該包含東亞、中央歐亞、伊斯蘭、南亞、歐洲等五個歷史世界較為恰當。

延續著西嶋定生的定義，東亞歷史世界應包含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台灣等地，這是一個以儒教、佛教、漢字、律令制為共同要素組成的歷史世界。儘管朝鮮、日本是否應該也同時屬於阿爾泰語族的中央歐亞史仍然尚未有定論，但從 8 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日本、朝鮮與東亞歷史世界聯繫，比起中央歐亞歷史世界，無疑是更緊密的。

中央歐亞史則如前所述，包含滿洲利亞、蒙古利亞、西藏、突厥斯坦、南俄草原等地域，以騎馬遊牧民為核心，聯繫綠洲農耕民、森林狩獵民，創造的遊牧文化圈，多為印歐語族、烏拉爾·阿爾泰語族。

伊斯蘭歷史世界則是以西亞史的範圍為主，包括近東的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阿拉伯半島、伊朗、土耳其等地域，其特色為遵守圍繞著《可蘭經》建立的伊斯蘭文化體系運行，儘管在 8 世紀以後同時受到突厥系民族西遷所帶來的遊牧文化影響，但是整體仍是以伊斯蘭文化占絕對性的支配地位。

南亞則是以印度史為中心，包含東南亞史，近期則有是否將東南亞自立獨立成為歷史世界的討論。此地域相較於東亞、中央歐亞，獨立成為一個歷史世界。歐洲則是以地中海世界為基礎，自成一脈絡。

從上述世界史教學發展的脈絡來看，為了讓學生確實理解世界上的重要文明，並正確把握中央歐亞對世界史各文明所起到的交流作用，使得以各文明為主要脈絡，中央歐亞則穿插於各章裏是可以理解的。其二，從世界史教學的變遷來看，首先建立世界史的體系，再者使用文明圈概念來詮釋個歷史世界的形成，第三在各歷史世界並立的狀況下，強調相互交流的影響，逐漸完善對世界史的理解方式。其三世界史論述與教學使用文明圈概念不但可彈性的解釋各歷史世界的重疊部分，也不讓學生陷入對各歷史世界有固定僵化的認識，是有其必要性。



## 結論

本論文探討日本北亞史的發展歷程，自明治維新依序論述，聚焦於三個問題。其一，日本北亞史的建立及其調整。其二，日本學界如何因應西方的挑戰，建立本身獨特的研究體系。

### 一、北亞史的建立及其調整

#### (一) 北亞史體系的建立

自 1926 年（大正 15），白鳥庫吉在先前對於阿爾泰語族的歷史語言學研究、神話傳說研究等基礎上，提出「南北對抗論」，這除了奠定東洋史發展的二元對立觀點，更將遊牧民（烏拉爾·阿爾泰語族）從中國傳統的邊疆民族史論述脫離出來，形成北亞史體系的基礎。昭和 9 年（1934），江上波夫從考古學來看史前遊牧民與農耕民的差別，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騎馬民族說」。1938 年（昭和 13），松田壽男等人發展的乾燥亞洲史觀，提出「乾燥」是遊牧民的共同生態環境，同時松田壽男開始對遊牧國家的構造進行研究。其後，護雅夫、山田信夫等學者陸續對匈奴、突厥等遊牧國家進行研究，其後遊牧國家成為北亞古代史第二個基礎。

1943 年（昭和 18），東亞研究所組織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北亞史研究者，研究北魏、遼、金、元、清等北亞民族進入中原建立的政權，提出異民族王朝論，成為其後提出日本獨特征服王朝論之基礎。1949 年（昭和 24），Karl A. Wittfogel 與馮家昇合著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提出中國史可分為典型中國王朝與征服王朝、滲透王朝兩大類。Wittfogel 的觀察未有在北亞史的立場上觀察，導致其局限型，以田村實造為首的研究者，結合先前的異民族王朝論等相關研究成果，提出日本獨自的征服王朝論，是北亞中世史的國家特徵，成為第三個基礎，北亞史體系自此完備。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出現兩種不同概念的北亞史概說書。第一種是田村實造的北亞史，他認為北亞史核心應是以蒙古利亞為中心的「騎馬遊牧民」所建立的「遊牧文化」，加上鄰近的狩獵民、綠洲民而形成的「遊牧文明圈」。

第二種是江上波夫的北亞史，他認為北亞史是以蒙古利亞、南西伯利亞、滿洲利亞、朝鮮為中心的民族之歷史。比較來看，田村實造的北亞史因為使用歷史世界，使得他的北亞史範圍更加擴大、更有彈性；江上波夫的北亞史則是地域範圍就明確。

## （二）北亞史的擴展：中亞史的納入與中央歐亞史的出現

中亞史研究也是由白鳥庫吉等人開始進行，早期是稱為西域史研究，主要是歷史地理考證，考察古代城址的位置。1931年（昭和6），羽田亨在歷史地理考證與出土材料的基礎上，建立西域史的體系。其後松田壽男、護雅夫等人提出東西交涉觀點，將西域視為文明交流之處，將歷史地理考證的各城址串連成路線，也就是「絲路史觀」，是中亞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之一。再者，山田信夫、愛宕松男等學者論述中亞史的主要居民是突厥系民族，而優勢宗教則是伊斯蘭教，就是伊斯蘭·突厥斯坦的成立，奠定中亞史的基調。1977年（昭和52），間野英二提出「南北共生論」，就是中亞史的主軸是中亞北部的遊牧民與中亞南部的綠洲民所構成的，同時強烈批判「絲路史觀」，是中亞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之二。最近，森安孝夫提出要「南北共生論」、「絲路史觀」並重，認為在尋找地域主體性的同時，必需同樣重視文明的交流。

上述可看到，研究者一直努力尋找中亞史的主體性，最後將「南北共生論」、「絲路史觀」並重，奠定中亞史的基本架構。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歷史上的北亞遊牧國家，對於中亞的絲路掌控相當嚴密，遊牧國家據此維持穩定與擴張。另一方面，北亞遊牧民往中亞移動，如突厥系民族，無論是統治北部草原，或是在南部綠洲定居。這都顯示出北亞史與中亞史的緊密聯繫。使得研究者在定義北亞史範圍時，如上述的田村實造、島田正郎都使用歷史世界的概念將中亞史納入北亞史的範圍。

隨著日本學界對高等學校將東洋史、西洋史合併為世界史，研究者更加注意尋找北亞史在世界史上的定位。在前述的北亞史、中亞史的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已經開始注意到東洋架構的侷限性，如田村實造、山田信夫、護雅夫等人紛紛提出從世界史的觀點來考察騎馬遊牧民。加上批判性的繼承 Denis Sinor 的 Central Eurasia 概念後，在上述田村實造等人的北亞史基礎上，提出本身的中央歐亞史，也就是以乾燥地帶為活動地域的騎馬民形成的「遊牧文

明圈」之歷史。故筆者認為中央歐亞史是北亞史的擴展。

## 二、北亞史學界：面對西洋的挑戰

在北亞史研究發展的過程中，日本學者也不斷的與歐美學界交流，從中吸取相關研究方法與理論。在五章的討論裏，歐美的重要學者分別有 K.A.Wittfogel 與 Denis Sinor，前者在 1949 年提出「征服王朝」的概念，後者則在 1963 年提出「中央歐亞」的概念，以下分別論述日本學界如何理解這兩個概念。

### （一）K.A.Wittfogel 的「征服王朝」論

如第三章所述，1942 年，東亞研究所委託當時東京東方文化學院與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聚集宮崎市定、田村實造、愛宕松男、三上次男、外山軍治、旗田巍、松本善海、周藤吉之、村上正二、百瀨弘等學者針對北魏、遼、金、元、清等「異民族」如何統治中國進行研究。1943 年、1944 年，東亞研究所彙整了這批學者的研究成果後，彙整編輯出版了《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與《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兩書。

當時的時代背景，這兩本書的確是要提供日本政府在侵略、統治中國時的參考，具有強烈的「資治」目的，這是需要反省並檢討的。但從日後學者們的討論與引用，此書仍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昭和 1948 年，田村實造發表〈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一文，具體的論述一個有別於中國歷史世界的北方民族歷史世界。這些都在 K.A.Wittfogel 發表「征服王朝論」前，可見此時日本學界已經有一個北亞歷史世界的論述出現。

在 K.A.Wittfogel 發表「征服王朝論」後，田村實造、村上正二、護雅夫、吉田順一、島田正郎等人都撰文介紹與討論「征服王朝論」，從第三章的論述來看，日本學界在接受 K.A.Wittfogel 的文化涵化解釋下，使用日本學界自明治末期以來的北亞史研究成果，進行批判並提出屬於日本學界的「征服王朝論」。日本學界與 K.A.Wittfogel 對於「征服王朝論」的論述差異，首先是日本學界從白鳥庫吉提出的「南北對抗論」開始，已經將北亞視為不同於中國的歷史世界，K.A.Wittfogel 則仍將遼、金、元、清視為中國王朝，而在中國史的架構裏進行考察。從這個角度來看，島田正郎認為 K.A.Wittfogel 的研究不出日本學界的研



究業績，是有其道理的。

## （二）Denis Sinor 的「中央歐亞」

在北亞史的架構形成後，1955 年開始，山田信夫、田村實造、村上正二等學者都開始提出開始思考北亞史在世界史上的定位，但此時尚未開始使用「中央歐亞」一詞，而是用北亞歷史世界來含括滿洲利亞、蒙古利亞、西伯利亞、西藏、突厥斯坦等地。Denis Sinor 的中央歐亞則是滿洲利亞、蒙古利亞、西伯利亞、西藏、突厥斯坦、南俄草原。兩者相較，Denis Sinor 所定義的範圍更加龐大。

昭和末期開始，杉山正明、岡田英弘開始引介 Denis Sinor 的中央歐亞概念，並開始批判性的使用。杉山正明提出中央歐亞主要是乾燥世界，其中是草原、沙漠、綠洲，其中遊牧民與綠洲農耕民貫穿整個中央歐亞史。再者，杉山正明認為 13 世紀興起的大蒙古國，連通當時的世界，提倡「蒙古時代史」的概念。岡田英宏則認為中央歐亞史裏的騎馬遊牧民帶動了位於兩端的中國與歐洲歷史之發展，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意義。大蒙古國的遺緒最後也由中國與俄國所繼承，影響了現代的政治局勢。

小松久男的《中央ユーラシア史》，承接杉山正明的論點，將乾燥視為中央歐亞的地域特徵，包含蒙古利亞、西伯利亞、西藏、突厥斯坦、南俄草原等地，將遊牧民與綠洲農耕民視為主體，不完全接受 Denis Sinor 的中央歐亞定義。從上述可以看出，日本學者在吸收外來概念或理論時，都會重新審視歷來研究成果，結合新概念或理論，來批判性的使用，這也是日本學者至今在國際學界有影響力的原因。

## 徵引文獻

Canfield, Robert L.

- 1991 "Introduction", Robert L. Canfield ed., *Turko-Per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34.

Christian, David

- 1994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2): 173-211.

Di Cosmo, Nicola

- 1999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Asian History"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0(1) : 1-40. (後由田歡譯為〈內亞史上的國家形成與階段劃分〉，收入伊沛霞等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33-70)

Janhunen, Juha

- 1996 *Manchuria: An Ethnic History*. Helsinki: Finno-Ugrian Society, 1996.

Kazuo Enoki, Akira Fujieda, Seiichi Iwao, Hisao Matsuda, Tatsuro Yamamoto ed.

- 1957 *Research in Japan i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 its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Tokyo: 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Lattimore, Owen

- 1932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 Macmillan.

Sato, Hisashi

- 1993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ibetan History in Japan." *Acta Asiatica* 64 ,pp81-120.

Sinor, Denis

- 1969 *Inner Asia. 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 A syllab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  
北京：中華書局。
- Tanaka, Stefan  
1993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Ulmen, G. L.  
1978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Mouton, 1978.( 亀井兔夢監訳、《評  
伝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東京：新評論，1995。)
- Walravens, Hartmut  
2006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His Life and Work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Japan”, *Japonica Humboldtiana* 10 , pp177-191.
- Wittfogel, Karl A.  
1946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112-126.
- Wittfogel, Karl A., Feng Chia-sheng.  
1949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 Transaction 36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 カール, A  
1991 《オリエンタル・デスポティズム：専制官僚国家の生成と崩壊》(湯  
浅赳男訳)東京：新評論。
- ペリオ, ポール(Pelliot, Paul)、羽田亨編  
1926 《燉煌遺書 第1集》上海：東亞研究会。
- 三ッ井 崇  
2000 〈白鳥庫吉の歴史認識形成における言語論の位相—朝鮮語系統論と  
朝鮮史認識をめぐる言説から—〉，《史潮》48：68-88。
- 三上次男  
1966 《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北アジア史研究第二》東京：吉川弘  
文館。
- 三上諦聴

- 1954 〈日本西藏學成立經過〉，《日本西藏学会々報》1：4。
- 三宅米吉
- 1929 〈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傳〉，收入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刊行會編《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上卷）東京：文學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刊行會，頁 267-333。
- 三品彰英
- 1944 〈滿鮮地帶の歴史〉，收入《世界史講座（第四卷）東亞世界史（二）》東京：弘文堂，頁 151-184。
- 上原專祿
- 1960 《日本國民の世界史》東京：岩波書店。
- 大久保利謙
- 1988a 《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 6 明治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
- 1988b 《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 7 日本近代史學の成立》東京：吉川弘文館。
- 小沢栄一
- 1968 《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小松久男（編）
- 2000 《中央ユーラシア》東京：山川出版社。
- 小林高四郎
- 1953 〈征服王朝の諸性格〉，《歴史教育》1（3）：69-75。
- 1983 《モンゴル史論考》東京：雄山閣。
- 小林道憲
- 2006 《文明の交流史観—日本文明のなかの世界文明》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 小熊英二
- 1995 《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 岸本美緒（編集）
- 2006 《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
- 山田信夫
- 1989 《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

- 1994 《天山のかなた—ユーラシアと日本人—》京都：阿含社。  
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会（編）
- 1986 《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刀水書房。  
中見立夫
- 1992 〈日本の東洋史學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收入神田信夫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 清朝と東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頁97-126。
- 2006 〈日本的「東洋學」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岸本美緒編集《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東京：岩波書店，頁13-54。
- 2009 〈「元朝秘史」渡来のこ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開始とヨーロッパ東洋學、清朝「边疆史地學」との交差—〉，《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4，頁3-26。
- 2013 《「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五井直弘
- 1976 《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東京：青木書店。
- 井上直樹
- 2013 《帝國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東京：塙書房。
- 今谷明(等編)
- 2006 《20世紀の歴史學家たち(5)日本編 續》東京：刀水書房。
- 内陸アジア学会(編)
- 1964 《内陸アジア史論集》東京：大安。
- 1979 《内陸アジア史論集 第二》東京：国書刊行会。
- 内藤湖南
- 1969 《内藤湖南全集 第十卷》東京：筑摩書房。(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編集)
- 1971 《内藤湖南全集 第三卷》東京：筑摩書房。(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編集)
- 古畑 徹
- 2003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渤海史の歴史枠組みに関する史学史的考察〉，《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9：215-245。
- 史学会(編)
- 1988 《日本歴史學界の回顧と展望 17 内陸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
- 1997 《東西交渉史論 上卷》東京：大空社。

外山軍治

1936 〈〈学界展望〉 渤海史研究の回顧〉，《東洋史研究》1(5) 77-8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東亜研究所関係(1)(財)東亜研究所概要〉，編號：I-1-3-0-6\_003。

〈4・学会、協会 <1>東亜文化研究所ヨリ東方文化学院、東方文化研究所  
ニ依頼事項〉，編號：H-7-2-0-4\_3\_003。

平野邦雄

2007 《帰化人と古代国家》東京：吉川弘文館。

本田実信

1991 《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永田雄山(編)

2002 《西アジア史Ⅱ イラン・トルコ》東京：山川出版社。

永原慶二

2003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

田村実造

1948 〈東方史の構造とその展開〉，《史林》32(1)：36-48。

1950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東洋史学研究の一動向—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  
「中国征服王朝理論」その他—〉，《史林》33(1)：78-88。

1956 《北アジア史》(田村実造、羽田明監修「アジア史講座」)東京：  
岩崎書店。

1964 《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 上》京都：東洋史研究會。

1971 《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 中》京都：東洋史研究會。

田村愛理

1987 〈回教圏研究所をめぐって：その人と時代〉，《学習院史学》25：  
16-35。

白鳥庫吉

1969-1971 《白鳥庫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

石田幹之助

1942 《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東京：創元社。

石見清裕

1999 〈ラティモアの辺境論と漢～唐間の中国北辺〉，收入唐代史研究

会編《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東京：刀水書房，頁 278-299。

伊集院 立

2009 〈近代日本の世界史教科書における東洋史と世界史の叙述：歴史教育と歴史研究〉，《社会志林》56（1）：23-37。

吉澤誠一郎

2006 〈東洋史學の形成と中國—桑原隲蔵の場合〉，收入岸本美緒編集《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3巻 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頁 55-97。

回教圏研究所

1940 《回教圏史要》東京：四海書房。

宇山智彦

2000 《中央アジアの歴史と現在》東京：東洋書店。

寺内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

2004 《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そのまなざしが残したもの》東京：刀水書房。

成瀬 治

2001 《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東京：岩波書店。

江上波夫

1934/2001 〈考古学上より観たる遊牧民と農耕民〉，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8 人類史の構想》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59-100。

1953/2001 〈人類社会における農耕民型と遊牧民型〉，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8 人類史の構想》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101-110。

1967 《騎馬民族国家》東京：中央公論社。

江上波夫（主編）

1956 《北アジア史》（世界各国史〈第12〉）東京：山川出版社。

1987 《中央アジア史》（世界各国史〈第16〉）東京：山川出版社。

1992 《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

1994 《東洋學の系譜(第二集)》東京：大修館書店。

江上波夫、松田寿男

1961 《図説世界文化史大系 第13巻 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東京：角川書店。

李明仁

- 2000 〈中國史上的征服王朝理論〉，收入臺灣歷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認識中國史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頁 105-126。

羽田 正

- 2011 《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東京：岩波書店。  
2012 《“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劉麗嬌、朱莉麗譯，朱莉麗校）

羽田 亨

- 1931 《西域文明史概論》京都：弘文堂書房。  
1948 《西域文化史》京都：座右宝刊行会。  
1957 《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 上卷歴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

西嶋定生

- 1967 《東洋史入門》東京：有斐閣。  
1983 《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佐藤 長

- 1958 《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 上卷》京都：同朋舎。

佐藤次高(編)

- 2002 《西アジア史 I アラブ》東京：山川出版社。

杉山正明

- 1987 《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2000 《世界史を変貌させたモンゴル—時代史のデッサン》東京：角川書店。

李孝遷

- 2014 《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村上正二

- 1961 〈征服王朝〉，收入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世界の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變貌》東京：筑摩書房，頁 147-185。  
1999 〈小伝 那珂通世：草創期の東洋史学〉，《史學》60(2/3)：145-159。

町田三郎

- 1998 《明治の漢学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

那珂通世



- 1890 《支那通史 第一卷》東京：中央堂。  
1915 《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故那珂博士功績紀念會編）

和田 清

- 1943 〈滿蒙史の大勢〉、收入氏著《東亞史論叢》東京：生活社，頁 269-290。

岡正雄、江上波夫、井上幸治編

- 1991 《民族の世界史 1 民族とは何か》東京：山川出版社。

岡田英弘

- 2013 《岡田英弘著作集 II 世界史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

岡崎精郎

- 1945 〈〈批評・紹介〉西域史研究（上・下巻） 白鳥庫吉著〉，《東洋史研究》9（3）：190-192。

東亞研究所

- 1943a 《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東京：東亞研究所。  
1943b 《東研成果摘要》東京：東亞研究所。  
1944a 《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  
1944b 《清朝の辺疆統治政策：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東京：至文堂。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

- 1984 《東京大学百年史 通史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  
1986 《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

松本善海

- 1949 〈中国社会史の新たなる課題〉，《史學雜誌》58（3）：86-96。

松田壽男

- 1937/1997 〈蒙古遊牧民とその歴史の役割〉，收入氏編《蒙古學》（第1冊）東京：善鄰協會；後刊東北亞研究所編《蒙古學》（滿蒙地理歴史風俗誌叢書）（서울特別市：景仁文化社，1997），頁 153-181。

- 1986 《松田壽男著作集》東京：六興出版。（日比野丈夫、護雅夫、山田信夫、古賀登、長澤和俊、松田知彬編輯）

松田壽男、小林元

- 1938 《乾燥アジア文化史論：支那を越えて》東京：四海書房。

松田寿男、小林元、木村日紀

1935 《世界歴史大系 11 中央アジア史・印度史》東京：平凡社。

松田寿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会(編)

1975 《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

松沢弘陽

1982 〈文明論における「始造」と「独立」—『文明論之概略』とその前後—(一)〉，《北大法学論集》31(3/4)：347-375。

林 俊雄

2007 《スキタイと匈奴：遊牧の文明》東京：講談社。

林 泰輔

1892 《朝鮮史》東京：吉川半七。

河口慧海

1904 《西藏旅行記》(上)東京：博文館。

油井大三郎

2012 〈社会構成体史と世界史、そして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收入研究会「戦後派第一世代の歴史研究者は21世紀に何をなすべきか」編集《われわれの歴史と歴史学》東京：有志舎，頁39-49。

芳賀 登

1974 《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東京：柏書房。

長沢和俊

1962 〈近年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の研究動向〉，《史学雑誌》71(12)：51-68。

1983a 〈松田壽男先生の思い出〉，《史滴》4：97-104。

1983b 《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

青木文教

1920 《西藏遊記 秘密之國》東京：内外出版。

1940 《西藏文化の新研究》東京：有光社。

前田直典

1973 《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前田惠學

1975 〈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仏教学〉，《禅研究所紀要》4/5：349-353。

前嶋信次

2000 《イスラムとヨーロッパ》東京：平凡社。

南満洲鐵道株式會社(編輯)

1913 《滿洲歴史地理》東京：丸善株式會社。

津田左右吉

1965 《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四卷 自叙傳他》東京：岩波書店。

若松 寛

1999 《北アジア史》(竺沙雅章監修「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7) 京都：同朋社。

原山 煌

1971 〈北アジア遊牧民族史研究の一視点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0 (2/3)：262-269。

原 覺天

1986 《滿鐵調査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

宮崎市定

1994 《宮崎市定全集 24 隨筆下》東京：岩波書店。

島田正郎

1966 《アジアの歴史》京都：啟文社。

2014 《契丹国—遊牧の民キタイの王朝》東京：東方書店。

島田虔次(等編集)

1984 《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4(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 京都：同朋舎。

桑原鷲藏

1968 《桑原鷲藏全集》東京：岩波書店。

荒川正晴

2010 《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荒川慎太郎、澤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辺健哉編

2013 《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東京：勉誠出版。

荒松雄(等編)

1971 《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6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Ⅲ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

高木康子

- 2010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像の形成と展開》東京：芙蓉書房。
- 堀 敏一
- 2008 《東アジア世界の歴史》東京：講談社。
- 堀川 徹
- 1976 〈〈學界展望〉中央アジア・テュルク民族史研究の展望〉，《東洋史研究》34（4）：134-142。
- 張廣達
- 2008 《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梅棹忠夫
- 1989 《梅棹忠夫著作集 第5卷 比較文明学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
- 細野浩二
- 1983 〈早稲田大学東洋史学科小史梗概〉，《史滴》4：85-96。
- 野原四郎
- 1947 〈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博士の躍進〉，《中國研究所所報》2：10-26。
- 陳繼東
- 2015 〈釈迦への回帰：近代日中における釈迦原典探索の始まり〉，《インド哲学と教学研究》23：19-37。
- 鳥居龍藏
- 1917 〈東北亞細亞に於ける無言貿易に就て〉，《人類學雜誌》32（8）：222-233。
- 朝鮮史研究会
- 1972 《朝鮮史入門》東京：太平出版社。
- 1981 《新 朝鮮史入門》東京：龍溪書舎。
- 2011 《朝鮮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森安孝夫
- 1982 〈渤海から契丹へ—征服王朝の成立〉，收入井上光貞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第7卷《東アジアの変貌と日本律令国家》（東京：学生社，頁71-96。
- 1987 〈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收入長野泰彦、立川武藏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東京：冬樹社，頁44-68。

- 1995 〈日本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史並びに東西交渉史研究の歩み—イスラム化以前を中心に—〉，《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0：1-26。
- 2004 《中央アジア史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
- 2007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
- 2011 〈基調講演：内陸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現場への提言〉，《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6：3-34。
- 2015 《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森部 豊
- 2014 《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渉》東京：勉誠出版。
- 渡辺 新
- 2010 〈東亜研究所小史〉，《政経研究時報》13 特別號：1-12。
- 湯浅赳男
- 2007 《「東洋的専制主義」論の今日性：選ってきたウィットフォ-ゲル》東京：新評論。
- 菅沼愛語
- 2013 《7世紀後半から8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國際情勢とその推移—唐・吐蕃・突厥の外交關係を中西に—》廣島：溪水社。
- 間野英二
- 1977 《中央アジアの歴史》（新書東洋史8）東京：講談社。
- 1999 《中央アジア史》（竺沙雅章監修「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8）京都：同朋舎。
- 塚瀬 進
- 2014 《マンチュリア史研究：「満洲」六〇〇年の社会変容》東京：吉川弘文館。
- 愛宕松男
- 1989 《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 第五卷 東西交渉史》東京：三一書房。
- 楊海英
- 2011 〈内陸アジア遊牧文明の理論的再検討：今西錦司『遊牧論そのほか』と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の現在〉，《文化と哲学》28：21-46。
- 葉碧苓

2009 〈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臺灣史研究》16（3）：87-132。

旗田 巍

1951 《朝鮮史》東京：岩波書店。

1962 〈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傳統〉，《歷史學研究》270：28-35。

窪寺 紘一

2009 《東洋學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

維廉·斯因頓（ウィリアム・スウィントン, Swinton, William）著、松島剛譯

1887 《萬國史要》（上卷）東京：松島剛自印。

稻葉岩吉

1922 《支那社會史研究》東京：大鐙閣。

鄭欽仁、李明仁（編譯）

2002 《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樺山 紘一（等編集）

1988 《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1 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ーチ》東京：岩波書店。

蕭李居

2006 〈中日戰爭初期的政治變革與權力之爭（1937-1938）〉，《國史館學術集刊》9：125-168。

鴛淵 一

1963 〈征服王朝〉，收入板野長八等編《講座社会科教育 第10卷 世界史Ⅱ》東京：柳原書店，頁102-116。

藤田 豐八

1899 《中等教科東洋史》東京：文學社。

1911 《慧超往五天竺国伝箋釈》藤田豐八自印。

1943 《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荻原星文館。（池内宏編）

礪波護、藤井讓治編

2002 《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会。

護雅夫

1981 《中央アジア史—シルクロードに興亡した国々》東京：旺文社。

護雅夫、神田信夫編

1981 《北アジア史（新版）》（世界各国史〈第12〉）東京：山川出版社。

桜沢亜伊

2007 〈「満鮮史観」の再検討—「満鮮歴史地理調査部」と稲葉岩吉を中心として〉，《現代社会文化研究》39：19-36。

